

同文馆·文学

帝国意识

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美〕埃娃·汤普森
(Ewa M. Thompson) 著
杨德友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再到现代的俄罗斯，作家们是在为帝国歌功颂德吗？本书为我们理解俄国，尤其是俄国文学中的某些不为人知的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埃娃·汤普逊以后殖民主义的时代意识切入俄国文学与文学理论。作者尝试表明，在俄国文学中，政权与文学本文之间的联系要比乍看起来更为深刻、更为微妙。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ISBN 978-7-301-14897-6



9 787301 148976 >

定价：32.00元

同文馆·文学

帝国意识

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美】埃娃·汤普逊
(Ewa M. Thompson) 著
杨德友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449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美)埃娃·汤普逊(Thompson, E.)著:
杨德友译. —北京: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 2009. 6

(同文馆·文学)

ISBN 978-7-301-14897-6

I. 帝… II. ①汤… ②杨… III. 殖民主义-文学研究-俄罗斯
IV. 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5789号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by Ewa M. Thompso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Westport, CT, USA. Copyright © 2000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Mainlan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printing, or o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书 名: 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

著作责任者: [美]埃娃·汤普逊著 杨德友译

责任编辑: 岳秀坤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897-6/K·058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0.5 印张 305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中文版序

我的著作《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被翻译成中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到十分荣幸。一想到中国这一伟大的国家的读者阅读我的著作，我就感到骄傲，同时也感到谦恭。我愿意简述我写作这部著作之前的学术生涯，从而把这部著作置入我的研究工作的语境之中。

在1960年代，我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和万特比尔特大学求学期间，对文学的兴趣引导我专攻三个国家的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我的博士论文涉及美国、英国和俄国的文学评论：我注意到了三者的相同之处，但是也注意到了巨大的差别。我的教学生涯始于讲授法语、英语和俄语；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为了发表有意义的学术著作，我必须集中精力研究一种文学。出自各种原因，我选择了俄国文学，并且发表了关于俄国文学的几部著作。我的著作之一已经由本书译者杨德友教授翻译成中文出版（《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北京，三联书店，1998）。我也研究波兰文学，发表了一部关于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的著作。其次，我还发表了几部关于文学理论和哲学的著作。

在我阅读和分析俄国文学作品的同时，我注意到了一个人发人深思的现象。俄国作家从来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帝国（存在于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苏联（1917—1991）和现今的俄罗斯联邦（1991年至今）都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多民族的实体，有多达一半的人民认为自己不是俄罗斯人。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和20世纪的苏联都是如此；而据人口学家的统计，在当今的俄罗斯联邦也只有79%的人口是俄罗斯人。这样的统计资料在世界上是独特的，但是在俄国文学中没有得到反映。托尔斯泰描写了关于俄国和拿破仑的战争，他描写了战争的舞台，似乎这个舞台就在俄国——然而，战争的大部分是发生在乌克兰、波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摩尔

多瓦、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国土上的。同样,俄国作家也描写中亚细亚,他们描写这些地区的国家,就好像这些国家一向就是俄国的,而事实上俄国在19世纪后半期才征服了这些国家。俄国作家们描写西伯利亚,却几乎没有注意到西伯利亚位于亚洲,那里居住着许多亚洲民族。换句话说,俄国文学所制造的话语涂抹和勾销了被称为俄国的一个国家里的非俄罗斯人的诸民族。

面对这一情况,我重新研究俄国文学,寻找这类涂抹行为的痕迹,或者说这一地区的真实历史所陷入其中的裂缝。英语世界现代和后现代文学评论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工具。在最近几十年,英语世界的文学评论特点之一是促进了分析技巧专门化,有助于发现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里的“隐藏的”层次,这些层次在初次阅读的时候难以立即发现。举例说明。俄国作家拉斯普京创作了关于西伯利亚的短篇小说。这些故事中的不成比例的叙事注意力都用于说服读者,西伯利亚事实上就是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和俄罗斯欧洲本部是十分相似的。如果像拉斯普京说的那样,西伯利亚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还要大肆强调呢?过度强调西伯利亚的俄国属性的做法给文学评论家带来的信号是,故事作者不仅是一个文人,而且还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因为这位作者是在努力为俄国完全确定并不完全是俄罗斯的一片土地。这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事例;正像我在书中论说得那样,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向非俄罗斯人推进俄罗斯人优越性的做法一向是更为微妙的。遮蔽西伯利亚的非俄罗斯的各方面情况,此类的过程在俄国文学中仍然在继续,所以那一地区的本地各民族就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利,因而西伯利亚的历史依然在遭受歪曲。

我收集到的足够的例证表明,俄国作家和学者,包括重要而令人尊敬的作家,例如托尔斯泰,重要的学者,例如利哈乔夫,是如何从他们的作品和著作中消除“他者”的,而且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似乎只有俄罗斯人才是重要的。于是,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现在把它呈献给读者。我向中国的同行提供这本著作,希望在无损俄国文学的伟大的同时,本书能够为俄国文学的阐释增添一个新的视野。

2008年2月15日,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莱斯大学

波兰文版序

在英语世界中,后殖民主义时代研究的蓬勃发展始于20世纪后半期,本书即产生于这一语境。在这一时期内,和后殖民时代意识的觉醒联系在一起的不只有英国和法国等殖民大帝国的瓦解,而且还有话语的新视角,话语中对统治与归属的因素、权威与服从之游戏的注意。当然,这里涉及的不是“党的命令”,而是被普遍接受的见解,被视为牢不可破的分类法,或者只有得到具备凛然不可侵犯的声誉的科学家检验的历史“事实”的习惯性冲力。爱德华·萨义德称这一话语为东方主义。东方主义在欧洲国家流行,用来对付非欧洲国家,而且在欧洲国家对非欧洲国家的整体理解以及对欧洲宗主国地位的理解方面都颇具影响。

对英国文学或者法国文学的阐释中有这一现象的例证。在后殖民时代意识形成(萨义德的著作对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前,没有一个人敢于斗胆动笔,例如,把莎士比亚描写成殖民主义作家,任何人大概也不可能想到要把英国19世纪一位谦虚平和的外省女作家简·奥斯丁列入大不列颠帝国政治图册。

《帝国意识》把萨义德的概念用于斯拉夫人地域。该书尤其专注于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理论语境中的后殖民主义时代意识。该书尝试表明,在俄国文学中,政权与文学本文之间的联系也是比初看上去要深刻而微妙得多的。这些联系不仅表现在叙事者的语调和评论中,而且也同样表现在对文学形象的刻画和地理空间在读者记忆中留下的长期印象之中。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了拿破仑战争的地理空间,但是,似乎没有人(当地居民除外)想到,在俄国和使用德语的诸国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小国,而且,它们的历史常常和俄国的历史多有矛盾之处。继续影响着东欧和中欧地理概念的,就有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书籍,充分意义上的帝国

意味极强的书籍,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书籍。另外一个事例:这本小说的的确确抹掉了这样一个事实:奥斯特里茨战役不仅打乱和“破坏”了俄国人的、法国人的、奥地利人的生活,而且也打乱和“破坏”了捷克人的家庭生活,因为战役是在现今的捷克共和国领土上进行的。

后殖民时代意识几乎尚未触及美国和欧洲对俄国的研究。欧美的俄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复述俄国的俄罗斯研究的判断、意见、票据和发现;在俄国的俄罗斯研究之中,后殖民时代的意识几近于无。对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产生过影响的是把俄国文化成果理想化的倾向,这种影响早在沙皇时期就已经出现,而且在苏联时期也同样明显。把俄国文化理想化的这一传统的力量,是下面一个形象的部分原因,亦即:美国研究人员和俄国研究人员,一般都不使用后殖民时代的方法论;然而,这一方法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广泛出现在涉及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和西班牙文学的文学理论著作之中。

本书作者希望,通过把后殖民时代方法论引入俄罗斯研究这一领域的过程,能够揭示俄国文学迄今没有被注意到的方面:这一文学对统治权力结构的依赖,这一文学对世人施加某些观察方法的努力,或者,相反:这一文学没有能力走出早已定型的话语界限,因为它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改正这种话语的不确定之处和多重干扰。

破解俄国文学(代译序)

杨德友

《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是美国赖斯大学汤普逊博士的一部力作,为我们理解俄国的,尤其是俄国文学的某些不为人知的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楔子、一把新的解剖刀以及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

既然标题表明本书谈论的是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就先略谈俄国殖民主义吧。

有几件涉及俄国的有趣的事,不妨简谈一下。

首先是“俄国”这个专有名词。在汉语里,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国家的简略名称,同类的还有中国、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后面这四个国家的名称是半音译的缩写)等,在汉语里,其他国家的名称因为是音译,显得烦琐些,如西班牙、意大利、印度尼西亚、乌拉圭、巴拉圭、尼加拉瓜、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等。

“俄国”在俄语里是 Rossiia,在英语里是 Russia,词的开端之前都没有“俄”之音。这个“俄”之音始于元朝;元朝称俄罗斯民族为“罗斯”,或者“罗刹国”。当时蒙古人用蒙文拼读 Rossiia 的时候,在 R 音前面加上了一个元音 O,所以, Rossiia 变成了 Orossiia,清朝时期就把 Orossiia 音译成为“俄罗斯”——“俄罗斯”就是“俄国”。至于“俄罗斯民族”中的“俄罗斯”代表的是民族,“俄罗斯人的国家”,即“俄国”。

中国人现在对这个词的使用显得混乱而麻烦;据说“俄国”是指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前的这个国家,而“俄罗斯”是指 1990 年苏联解体后的这个国家。

1922—1990年,这个国家的名称是“苏联”,或者“前苏联”。虽然叫“苏联”,实质上还是俄国,因为苏联其他14个(二战后先是15个,很快减少了一个“卡列利亚—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和国都生活在俄国的阴影下面,其语言、文化、文学少为或者不为外国人所知,显得默默无闻。

笔者认为,直截了当地称这个国家“俄国”就很好;在提及20世纪的时候,可以用“苏联时期的俄国”,或者“俄国的苏联时期”,甚至“前苏联”。也许有些中国人觉得“俄罗斯”这个词亲切,这大概是一种自作多情、一相情愿的感触吧。古代俄国对中国了解有限,称中国为“契丹”(Cathay, Kitai),对于这个称呼,我们中国人未必感到亲切,但是俄国人也不会改变它。一个词语在本国和外国在语义上的微妙变化很有意思,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与俄国人心理状态和历史很有关系的还是领土问题。大略地说,从1679年(康熙十八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到1858年,中俄之间保持了大约180年的和平、平等关系。从1858年到1946年(在这一年,当时的中国政府被迫同意外蒙古独立——俄国人长时间策划、唆使、包办的外蒙古的独立),俄国趁火打劫,趁中国长期贫弱、内忧外患,从中国东北、西北、北部掠夺了大约3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约等于现在中国领土960万平方公里的37%。

另外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1929年,苏联时期的俄国抢占了乌苏里江流入黑龙江之处的黑瞎子岛(抚远三角洲),约350平方公里。中俄在1964年开始谈判,中国要求归还中国领土黑瞎子岛;谈判延续了43年,到2007年方才达成协议:俄国占领的这块土地的一半归还中国,约175平方公里,到2008年年底才能完成归还。读者可能觉得数字枯燥,但是也有有意思的时候:俄国一共抢走中国约3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中国争回约175平方公里,亦即两万分之一。即便是如此的“半璧归赵”,可以想象,俄国也是极度不情愿的,否则何以谈判谈了大约两代人的时间。在领土问题上,俄国人一向是寸土不让的。

这些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中国人都应该牢记。笔者认为,历史应该得到尊重。同时,历史不应该干扰当今的地缘政治和当今的国际关系。但是,在和某个邻国关系好的时候,就不谈该国历史真相,这样的做法就是不尊重历史,难以得到本国人民和邻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尊敬。

中俄关系在 20 世纪大起大落。1917 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促使中国共产党成立,引导中国革命成功,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历史。1950 年代,中俄蜜月勉强维持了 10 年,然后两国交恶大约 30 年,直到 80 年代末才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然而,勉强维持了大约 10 年的蜜月,给中国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至今依然主导着我们国家的整体:政治体制、人事制度、经济结构、大学体制、科学院系统等等。我们今天面对的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多半与此有关。

二

现在尝试谈谈俄国文学。

1950 年代,中国被迫实行向苏联时期的俄国一边倒的政策,几乎完全拒绝了西方的古今文化,只有苏联时期的俄国和以往的俄国的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关于俄国的一切,中国人不能表示丝毫的不满和批评。俄国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从一流到末流的,都被翻译成汉语出版,据统计,在 1950 年代,约有 700 部中、长篇小说在中国面世。作品中的不少“英雄人物”,当时是家喻户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被大力推广,一枝独秀。俄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作品,也有相当一部分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尤其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只出版一部分,大概是因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作出定论,说他是“魔鬼般的天才”吧。1980 年代后,译介到中国的现代作家有雷巴科夫、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各个时期译介到中国的俄国文学作品,无不受到十分的肯定,得到高度的赞扬。

但是,中国学人对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在总体上是薄弱的,优秀的论著不算很多,而一般的评论又多倾向空泛,缺乏新意和理论深度。然而,无论是专家论著还是一般的评论,都是踏着俄国学者的价值观、理论和语调节拍起舞,鲜有创建。

这一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中国,而且也出现在欧美。出自意识形态的原

因,欧美轻视和忽视苏联时期的俄国文学,但是对俄国19世纪、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其方法和基本态度和中国的专家学者有共同之处——都逃不出俄国学者的阴影,追随俄国学者。

俄国作家的作品是对以扩张为轴心的俄国历史的崇拜、赞颂、讴歌,是歌功颂德;本书波兰语译本和乌克兰语译本都把“帝国意识”翻译成了“歌功颂德”,是很有道理的。歌功颂德,歌俄国领土开拓征战者的大功,颂历代沙皇无限扩张国策这一北极星之德。作家是这样,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亦然。

后殖民时代研究在欧美展开之后,俄国人几乎完全不予理睬,岿然不动。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老牌殖民帝国,都有作家和学者对本国的殖民帝国扩张作出反省和探讨;美国也不掩盖国土开拓的侵略掠夺史、虐待灭绝美国印第安人的史实和压迫非裔美国人问题。

例外是俄国。俄国是大陆国家,通过种种办法和策略夺得的土地都和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维)原有的土地连成一片,无限扩大,南到高加索,北到北冰洋,西到波兰,东南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东边,跨过白令海峡,占有阿拉斯加(在1867年出售给了美国)。俄国取得的这样大面积的土地,当然是殖民地,但是因为不是“海外殖民地”,所以俄国历来不承认是殖民地,也从来不承认俄国是殖民国家,历史书、教科书对于其来源的说明或者全付阙如,或者语焉不详。笔者遇到过一位俄国知识分子,他坦诚承认,他自己观看俄国远东地图,看到中国东北被俄国领土包围,感觉十分奇怪,但是对于1858—1960年俄国抢夺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历史,则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实例。

俄国人对于俄国殖民地扩张史一无所知,乃是俄国历来的愚民政策和历史障眼法等这些做法的后果之一。这是往日沙皇们和当今领袖们的既定政策。不幸的是,这样的伎俩所造成的意识也渗入了俄国文学。它使得俄国人在无意识、下意识、非意识——无知之中,化成了“祖国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和莫斯科广播电台长期的开始曲,化成了掩盖的严严实实的“帝国意识”。被严实掩盖的历史知识,不为俄国国民所知,但是,俄国人竟然能够做到也不让欧美人民所知。这

实在是一大“奇迹”。在文学方面,俄国作家们的态度和俄国殖民主义一致,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雷巴科夫到索尔仁尼琴,都是一样。

《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正是尝试向我们揭示、分析和讨论俄国文学和俄国殖民主义的关系。相信本书的中文版会引起中国学界和一般读者的注意,引发出耳目一新之感,因为中国近代史受到俄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我们对俄国的了解和理解则太少、太浅,在这方面让俄国人牵着鼻子走的时间太长了。

本书是在2007年所出英文原版的基础上翻译的。作者为中文版写了简短序言。译者还为本书翻译了作者为该书波兰语版写的序言,以及乌克兰学者为乌克兰文版写的前言。为了翻译这篇乌克兰文的前言,笔者对照波兰文、乌克兰文和英文版本,并且参照了作者惠寄的该书的俄文片段译文,阅读几十页之后,方才读懂了这篇前言。(山西大学图书馆目录上有《乌克兰语—汉语词典》,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找到;给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外文书店打电话求助,他们都表示爱莫能助。)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见识,感谢本书作者汤普逊所在的赖斯大学所给予的慷慨资助,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东博士对于该书的推荐。

杨德友

2008年3月20日,星期四,山西大学

摆脱帝国

——乌克兰文版前言

后殖民研究活动一步一步地到达警戒线,进入乌克兰科学研究话语和社会话语。这一事实对于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完全是符合规律的;乌克兰的历史可以从基督教第一个千年中期纪年,从特雷皮拉文化^①或者查卢别涅茨文化^②开始,也可以从1991年开始。这取决于从哪一种观点看待问题。但是,有一个事实很明显,现代的乌克兰人都急欲在俄罗斯语境之外显示自身的存在。无论如何,俄罗斯不仅存在于许多乌克兰人的意识之中,而且也存在于现代乌克兰知识精英意识之中。这是长期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帝国文化政策造成的后果。因此,大多数乌克兰公民,包括那些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乌克兰、乌克兰文化联系起来的人,都应该脱离无所不在的俄罗斯文学的包围,都应该把俄罗斯看做是“他者”,脱离它的影响,而同时意识到自己的、乌克兰的“自身”和自我价值。

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还在于,在俄罗斯“全人类性”、“普遍性”的强横的话语中,乌克兰的教育遭受摧残。这样形成的普遍印象是,乌克兰人不必

① 特雷皮拉文化: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文化。名称来源于基辅地区的一个名为特雷皮拉的村庄,因为在这里第一次发现了文物。第一时期在公元前5300—前4600年;第二时期(中期)在公元前4600—前3200年;第三(最后)时期在公元前3200—前2750/2600年。

② 查卢别涅茨文化:铁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在大约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位于基辅地区普雷帕特河畔。从这两个时代我们至少有很好的物质文化的例证。

遗憾的是两种文化都更多地是我们“远古”历史的象征,而不是真正的知识,现在还很难证实这些远古时期的人类和斯拉夫诸民族之间的联系,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在中部乌克兰的土地上,在公元前5000年已经有人类居住。

换言之,这是对于神话时代的过去的参照,还有,这里提示到了这个新国家的历史可以视为始于1991年,或者始于神话的古代的某一时期。

(以上两条注释是本书作者汤普逊博士提供的。——译者)

谈论“自身”、自己的特点,因为背景是大肆宣扬的“普遍性”,这一普遍性宣称要把人类从某种普遍的恶之中解救出来。

汤普逊博士著作《帝国意识》的价值就在于,她给读者提供了和俄罗斯文化、文学、俄罗斯语境保持一段距离之后得到的前景。这样,读者就能够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熟悉的、十分“亲切的”、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的作品和作者,看待历史上的蕴涵有含义的时刻。应该指出,对于本书作者来说,俄罗斯帝国主义不是摘自书本的、抽象的概念。俄罗斯帝国主义也是这位研究学者的亲身经验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本身自然而然地给这一著作带来现象学维度中的真实性面貌。汤普逊博士诞生于考纳斯(现在的立陶宛)的一个波兰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欧洲政治地图的显著变化,她的双亲被迫迁居波兰。

汤普逊博士在华沙大学求学,后来继续在美国万特比尔特大学学习,在那里完成了她的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论文中,她对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和美国新批评学派作出比较分析。她曾任教于印第安纳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万特比尔特大学,后来和任统计学教授的丈夫在休斯敦定居。现在汤普逊博士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莱斯大学任斯拉夫学研究教授。

除了《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2000)之外,汤普逊博士还有以下著作:《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文学批评》(1971)、《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1987,该书部分章节收入《萨满教:社会学中的批判概念》,2004)、《贡布洛维奇》(1979)。汤普逊博士还是学术论文集《俄国文学中对于自我意识的寻求》(1991)的主要学术编辑,《波兰评论》季刊主编,在斯拉夫研究各种刊物中发表文章。她的著作已经翻译成波兰语、汉语出版。

值得指出的是,“基础出版社”出版汤普逊博士的著作是十分适时的。可以称之为条件的巧合,也可以说是出自共同的观点。通过“基础出版社”的努力,乌克兰读者已经熟悉了爱德华·萨义德、安东尼·史密斯、罗曼·施波鲁克、安杰伊·瓦利茨基等人在著作,汤普逊博士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这些人的著作。可以说,汤普逊博士的著作完全有机地融入了“基础出版社”的编委存稿之中。

在现代乌克兰学界,后殖民研究还没有广泛展开。概括地说,迄今为止,学界在这方面的成就还不够丰富;在乌克兰,这方面的论述屈指可数;马

克·帕夫利申的文集、米科利·里雅布楚克和米罗斯拉夫·施坎德里的专著；还有不涉及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的理论著作，如上文提及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有关的材料也收入现代文学理论文选《词汇、符号、话语》之中，该书在“编年史出版社”出版，马利亚·祖布里茨卡编辑。因此，我们可以说，汤普逊博士的著作将会填补现代乌克兰人文学科里的一个重大的空白。她的著作不仅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让读者认识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的成果，而且还能够在全新的视野中考察自己的过去和自己与邻国的关系。研究的基础是分析俄罗斯帝国的语境，而乌克兰的、波兰的及其他各国的语境，作为俄罗斯帝国殖民主义者政策的不可或缺的受害者，在这里是恒定地存在的。对于对后殖民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将会有很感兴趣地看到，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理论是可以运用到斯拉夫研究的语境中的。

本书第一章谈理论，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作者在这里谈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联系到了后殖民研究的理论、民族的与国家的自我意识形成的问题、西欧诸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在这些变迁过程中的种种差异等。在西方世界，后殖民主义首先是和种族主义、海外征服方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俄罗斯帝国对邻国实施的扩张政策，学者们则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在这里也许值得提出一些术语的问题。作者遵循史密斯，使用了术语 *ethnie*（民族群体、民族性），这一术语在乌克兰学术著述中还没有推广。这个术语来源于法语，由勒内·日拉尔推广使用。*Ethnie* 这个术语实际上是指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的无意识阶段，距离国家意识还极为遥远。在这个时期，居民手里拿着狩猎工具，划定自己生存的领地，还没有考虑到创建国家。

还有一个术语值得一谈，这就是“自治领”（*dominion*），这个术语在传统上是指不列颠王国、后来的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中的、事实上的独立国家。而在这里，“自治领”只用在经典的意义上，指波兰共和国，虽然它参与了俄罗斯帝国的自治领，实际上是非独立的、附属于俄罗斯帝国的领地，却还部分地（在形式上）保存了某种自治的权利，一如波兰王国。

作者保持最大限度的客观性，对于波兰共和国针对乌克兰的殖民主义者的意图没有保持缄默。作者认为，从后殖民研究背景来分析波兰—乌克兰关系还有待时日。就总体而言，她是特殊地尊重乌克兰的语境的。然而，

汤普逊博士的研究首先是面对西方读者的，而且是依据历史事实、文献资料作出的，对于乌克兰读者来说，这也并不新奇。与此同时，理所当然和令人愉快的是，有这样的学者，不辞劳苦，向西方读者作出解释，基辅罗斯原来是什么，俄罗斯从哪里起源，则情况就不一样了。此外，汤普逊博士还揭示了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和后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悲剧和乌克兰人自己许多的现实问题。作者直接指出西方片面接受斯拉夫文化的方式，而这类方式正是俄罗斯帝国主义表现自己的话语形成的。作者认为，西方后殖民研究理论家们对于两位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或者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缺乏认识”和忽视的原因，就在于此。

作者所援引的我们的社会历史事件，在乌克兰是鲜为人知的。比如苏沃洛夫 1794 年在华沙近郊发动的屠杀事件，平民有大约两万人死亡。有多少代的苏联人受到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苏沃洛夫的英雄气概和军事天才楷模的教育，而生长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人，却很少有人对这位将军持以批判的眼光，从自己的、乌克兰人的观点、而不是从苏联—俄罗斯宣传培育的立场来看待这位大人物。

苏沃洛夫的事例是作者在自己著作中引用的许多事例之一，用以逐步揭示宣传了几十年的、得到普遍接受的历史的“同源性质”，提出每个人都有权利脱离官方宣传，研究知名人物和事件。

使得汤普逊博士的著作在研究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各种著作与众不同的重要事实之一是，作者注意到了前人常常忽视、或者只得到片面解释的民族主义的现象。和研究民族主义的其他学者不同的是，她区别了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和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扩张性的民族主义旨在把自己的民族身份强加给其他民族，这种民族主义是殖民主义带来的破坏性的力量；而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的基础则是获取自己的民族身份。

俄罗斯民族主义同时既是防御性的，又是扩张性的。在俄罗斯的话语中，在俄罗斯和西欧诸帝国的关系上，既存在着自卑情结，同时也存在着追赶、超过西方的欲望。作者详细而专注地用实例提出对于俄国古典文学的分析，展现了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产生和运作的机制，指出将二者区分开来的细微界限。

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都是作为俄国文学的荣耀进入了我们的意

识的。在中学时期,我们就熟悉他们作品中的高加索题材,却很少考虑到,在他们的浪漫主义人物形象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作者通过对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高加索人物”的细致分析,揭示了和扩张性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重要事实,这样的民族主义为俄国殖民主义者的激情打造了基础。汤普逊大概是借助于后殖民研究工具分析了普希金的《1829年远征期间阿尔兹鲁姆旅行记》的第一位学者,她揭示了这本旅行记的殖民主义底蕴。

的确,像《高加索的俘虏》、《阿尔兹鲁姆旅行记》、《当代英雄》这些作品属于帝国语境开创初期,这些事件都气势汹汹地、强硬地宣告俄罗斯帝国在高加索和其他地方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这些现象的殖民者激情昂扬地出现在读者面前。高加索战争的英雄、俄国军事史的荣誉与自豪感、叶尔莫洛夫将军,都以最大限度的确定性出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精辟的论断也说明了20世纪与高加索问题相关的事件,这些事件过去和现在都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早在本书理论部分揭示反殖民主义探索和后殖民研究探索之间的区别的时候,作者就表明,只要俄国一天不过渡到后殖民时期的立场,高加索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而且,车臣的互联网页也显示了反殖民意识的典型的增长。

对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分析是特别令人感兴趣、初看上去又是出人意表的。托尔斯泰在西方读者当中很受欢迎,因为在这位俄国古典作家作品里张扬了普遍性和“人性”。作者指出,在托尔斯泰的先驱者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赶上西欧帝国的欲望,而《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则感觉自己和他们“平起平坐”。库图佐夫不仅和拿破仑完全平等,而且被描写得足智多谋,和这位法国对手不相上下。作者对托尔斯泰的叙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极为认真地看待,同时表明,在俄国人的“普遍性”的障眼法的后面隐藏的是对于中部欧洲的弱小国家和民族、有意识地视而不见。读者当中很少有人考虑到那个奥斯特里茨到底位于什么地方,在什么人的天空下造成了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的再生,有谁会想到在19世纪初那场遥远的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紧要的大事乃是——俄罗斯帝国在这里被描写成为欧洲大国俱乐部的平等一分子,而沙皇亚历山大则是与欧洲众皇帝平起平坐的。

作家接受这种宣扬俄国人属于欧洲先进民族的既定方针是为了取得国际的平等地位,而不仅仅是作为小说的情节发展进程。在这一语境中,有摘

自托尔斯泰致诗人费特书信的引文，他在这里表达了对波兰人和波兰解放运动的态度。总之，已经表明，在把事实——信件、回忆录等用于文学的同时，汤普逊博士给研究著作带来客观性、非先见性及可信性。看待每一个现象，都是凭借广阔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环境，注意力不仅给予本文，也给予产生本文的环境。

总之，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这样的分析发人深思：1812年的战争对于乌克兰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战争的英雄们对于乌克兰人的意识来说，是否也是英雄呢？像中学文学选集指出的那样吗？几十年间，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俄国人在光荣的鲍罗金诺战役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却不得提出问题：鲍罗金诺附近的这一战役对于乌克兰人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应该对这个战役特别地敬重。与此相关的是，很少有人想到，在波兰文学和波兰人的历史意识之中，拿破仑是以“解放者”、而不是死敌的面目出现的。

同时，还可以注意到，托尔斯泰的家庭叙事完全不涉及这个主题，而是谈论人的价值、家庭、情爱、平和、人际关系。在瞩目于这种和谐、富有的阶层的同时，作者也提到了没有细说但是相当重要的细节。例如，罗斯托夫一家乃是帝国最为有钱有势的家族之一，而保障他们长久荣华富贵的庄园，却是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因为有了乌克兰殖民地，提供物质的供应，这种富有才有保障。

对于20世纪语境的分析，也出乎读者意表。例如，在“俄国文学中的中亚叙事”一章里，作者展现了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楼》中存在的俄国殖民主义言论——而这部作品早已经成为苏联几代持不同政见者的案头之书。激发出这一观点的先例是萨义德对加缪小说《局外人》和《鼠疫》的分析。作者注意到，无论是在《局外人》里，还是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本地居民都被剥夺了发言权。故事情节发生在乌兹别克，可是我们得不到一点有关乌兹别克的新闻，而小说的主要事件、最深刻的思考都首先是关于居住在苏联的这个中亚共和国中的俄国人的。

作者指出，根据叙事情况，在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无知的读者那里，很可能造成的印象是，塔什干的居民或者是俄国人，或者是俄国化的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俄国人占有了全部大大小小的重要的社会岗位，而地方居民被描写得没有话语、没有声音、没有权利。说话权利和言论权利是紧密相

连的。众所周知,和索尔仁尼琴的全部作品一样,《癌病楼》是十分著名的作品,而作者证据确凿地展示了这部小说的帝国主义者叙事,这些作品连一次也没有提出疑问,俄国人(小说“正面的”和“负面的”人物)在这里,在乌兹别克,何以都是当家做主的。

我们不由得又要提出作者所涉及的事实材料的广度:中亚各族人民历史的见证,与俄罗斯帝国交往所发生事件的过程,以及统计资料。作者依据具体的经验资料验证了帝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态度,从俄国或者苏联的本部到中亚细亚的领土。为读者揭示出丰饶的绿洲的生态学问题、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利用的态度、生活的传统结构惨遭破坏。在篇幅不太大的这一章中提出的问题,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评价,这与其说是为了揭示过渡时期几代领袖缺乏认知,不如说是为了表明帝国思维模式是何等地深入了俄国人的思维模式。

同样的问题,但是以有关对西伯利亚被征服的资料为依据,见于“苏联晚期的帝国欲望”一章。本书这一部分的基本议题是中央对边远地区的关系、边缘地区的存在问题,因为在传统上西伯利亚是和边远领土、边远文化联系在一起。对于自然资源、本地居民掠夺利用、占有本地居民代表——妇女之行为的议题重新出现,而且还不止于此。

作者分析了拉斯普京在西方受到特别欢迎的原因,引导读者注意,他的作品“地方性”爱国主义具有双重的性格。一方面,这种爱国主义宣扬对弱小兄弟的关爱,关注生态问题,另外一方面,却采取殖民主义者的立场,而且甚至毫不掩饰。作者密切注意到,在晚期的苏联,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重又得到宣扬。

俄国作家们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谈论俄罗斯性格、俄罗斯灵魂的问题。与此同时,那些时期作品的人物都觉得自己就是掠夺而来的土地上的主人,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过,西伯利亚的辽阔大地可能是不属于俄国的。本书作者一如既往地避免要弄优雅辞令,不仅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而且还提出关于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殖民化的历史证据,以及给地方居民带来的全部后果。作者还密切注意到了视西伯利亚为俄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问题——这一神话完全是俄国官方的帝国思想意识积极地、而且成功地制造的。对于俄罗斯帝国话语的多重语义的语境中的西伯利亚形象多重性形成

之过程,也给予了分析。

对于文学研究者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学术与帝国”这一章,在这一章里使用了像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和德米特里·利哈乔夫这样的文学理论家的著作资料,分析了苏联文学研究中俄罗斯思想意识的作用。本文已经提及,作者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给予了特别的注意,这也是她的论文的议题。在这一章里,作者分析了文学分析形式主义派别的基本原则的“崩溃”过程和苏醒意识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这里指的是俄国的思想意识,而不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意识。例如,在《1714—1812年的古代大师》一书中,循序渐进地维护了俄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的思想。作者注意到了他所研究的议题和问题以及他的结论。

利哈乔夫是研究古代俄国文学的最有权威的专业人员之一,可以说,他提出了关于这一文学在世界上(其中还兼并了乌克兰文化遗产的一大部分)的重要概念。在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利哈乔夫喋喋不休,而且还不无成果,创造了神话:古代俄国文学典型地近似于西欧中世纪文学,与其并驾齐驱。而汤普逊博士则绝对有理有据地指出,俄国文学和西欧文学是以绝对对立的世界观原则为基础的。

西欧的文化与文学出自对于世界建构、秩序与社会等级的绝对清醒认识——作为当时传统短暂现象的嘉年华会,仅仅是在某一个时间空隙里把一切颠倒,而在大斋期时期之前,一切又恢复正常,在上帝构思的整个世界上,一切又都各就各位。而在古代俄国文学中,作者看到了绝对相反的意向。在分析了中世纪作品之后,本书作者得出结论,这些作品里缺乏关于正确的、合乎道德的世界观的表述。凭借欺诈或者暴力坑蒙拐骗的人往往得胜,靠下流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实的人间是阴沉的、没有欢乐的,没有正义可言。至少在文集《17世纪俄国民主讽刺文学》中,人间是这样的。

在现在讨论的这一章里,作者分析了在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签订和执行条约时期俄国的自我表现。在分析了当时的大量的出版物之后,作者指出,苏联政府有效地利用了文学界来表现自己的强力,宣扬苏联全部行动的正当性。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的历史过程的意图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这些行为接受的态度所作的分析之间,是存在某种差异的。在本书这一部分,详细审读了苏俄党报,用以分析苏联对波兰的进攻的种种看法,

以及那一时期其他的重大事件。依据具体的资料,作者展现了俄国操纵某些根深蒂固的民族刻板定型的倾向,目的当然是为俄国殖民主义者过去对待波兰共和国的意图作出辩解。

大量的档案文件表明,意识形态是塑造社会意识的,时而煽动、时而压抑民族竞争和矛盾。对于历史教科书和专著等分析资料的同样的重视和研读,显示了俄国民族主义和帝国意识的成长过程。作者揭示出缺乏运用认识论理论的情况,这就造成了对于历史事件的单方面的阐释,而且,甚至当代的图书也用新式言语写作,和苏联时代的书籍相比,不是气势汹汹。

本书最后一章“解构帝国: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也是同样令人感觉兴趣的,作者在这一章里分析了取代帝国的和殖民者的话语的妇女的世界。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了性别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相结合的最典型的实例。在考察了现代俄国女作家散文作品之后,作者揭示,在俄罗斯帝国的无边无际的大地上是没有妇女的立身之地的。在这个伟大的帝国里,她们注定要忍受孤独,这个大国的全部的富饶和伟大在人性的需要方面什么也没有给予她们。没有亲情,没有爱情,得不到器重,甚至没有机会争取这一切。妇女的躯体被当做工具使用,妇女甚至被剥夺了基本的舒适。汤普逊博士在最大限度分析了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托尔斯泰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的作品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在20世纪末的妇女作家的散文作品中奠定了俄国文化中后殖民研究的机遇。与此同时,作者还指出,为了在男人独霸的国家里使自己发出的声音让人听到,女作家的声音暂时还过于微弱,因为男人们还在继续以人民的幸福为代价来强化帝国扩张。

综上,对于乌克兰的读者来说,汤普逊博士的《帝国意识》在乌克兰的出版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读者不仅可以进一步理解现代文学评论的著作,还能够隔开一段距离来看待和俄国的关系。

[乌克兰]杰丽雅娜·吉亚杰维奇

致 谢

本书研究工作得到的资助,一部分是国际研究与交流署(IREX),还有梅隆基金会、社会科学国家资助局、美国国务院提供的资金;还有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务院自主使用资助项目,1983年苏联—东欧研究与训练法案,公法98—164,第VIII章,97款,1047—1050),以及莱斯大学暑期研究奖金和休假年。对上述各机构,作者致以由衷的感谢。

本书的部分篇章最初发表在《现代》、《东斯拉夫研究》、《斯拉夫评论》杂志上:“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身份特征:重审”,《现代》第40卷,第3期,1998年夏,250—261页;“索尔仁尼琴与俄国殖民主义经验”,《东斯拉夫研究》第46卷,第4期,1997年秋,545—555页;“苏俄报刊的民族主义宣传,1939—1941”,《斯拉夫评论》第50卷,第2期,1991年秋,385—399页(得到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联合会的允许)。第2章、第5章、第6章(的一部分)曾经分别发表在以下文集中:“利哈乔夫与古代俄国文学研究”,《俄国文学与批评》(edited by Evelyn Bristol, Oakland, CA: Berkeley Slavic Specialties, 1987);“苏俄作家与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俄国文学对我定义的寻求》(edited by Ewa M. Thompson, Houston: Rice Univ. Press, 1991);“施克洛夫斯基与俄国的认知传统”,《现代俄国文学与捷克文学的诸方面》(edited by Arnold McMillin, Columbus, OH: Slavica, 1989)。谨向这些刊物和出版者致以谢忱。

感谢下列出版社允许印用其出版的资料:《现代乌兹别克:文化史》(Edward A. Allworth 著,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0)中的 Razzag Abdurashidaw 一首诗的译文;《密茨凯维奇诗选》(George R. Noyes 编辑, Polish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44)中的一首诗;以及论拉斯普京的资料,《重建规则:1980年代的俄语写作》, Arnold McMillin 编辑, 出版者是 Overseas Pub-

lishers Association, Gordon and Breach Publishers。

我衷心感谢许多同事和学生,多年来他们对与本书主题有关的研究给予了支持和提出意见,他们是:Anne Allain, Arnold Beichman, Michael Bernstam, Aleksandra Z. Boehm, Angela Brintlinger, Steven Clancy, Olga Cooke, Bogdan Czaykowski, Norman Davies, William B. Edgerton, Herman Ermolaev, John J. Garrard, Zahra Jamal, Igor Lukes, Andrej Kodjak, Alex Kurczaba, Alla Latynina, Andrzej de Lazari, Sidney Monas, Arnold McMillin, Czeslaw Milosz, Ryszald Nycz, Aleksandr M. Panchenko, Beatrice Shube, Richard F. Staar, Lucjan Suchanek, Harry Walsh, Piotr Wilczek。我要对我丈夫詹姆斯·汤普逊表示最大的谢意,感谢他的帮助和支持。

埃娃·汤普逊

目 录

中文版序	(I)
波兰文版序	(III)
破解俄国文学(代译序)	杨德友(V)
摆脱帝国	
——乌克兰文版前言	[乌克兰]杰丽雅娜·吉亚杰维奇(IX)
致 谢	(XXI)
引 论 民族主义、殖民主义、身份特征	(1)
第一章 问题	(17)
第二章 帝国生成	(62)
第三章 日益巩固的幻想:俄国民族资格的新核心神话	
——《战争与和平》	(99)
第四章 俄国文学中的中亚叙事	(127)
第五章 苏联晚期的帝国欲望	(150)
第六章 学术与帝国:苏联文学研究学术中的俄国意识形态	
——维克托·施克洛夫斯基与德米特里·利哈乔夫	(180)
第七章 解构帝国: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233)
附 录	
一 德国学者昆策尔的评论	[德]克里斯蒂娜·昆策尔(261)
二 波兰学者索瓦的评论	[波兰]卡奇米日·索瓦(264)
精选书目	(269)
索引	(293)

引 论 民族主义、殖民主义、身份特征

为了介绍俄国文学中的殖民主义这个议题,澄清术语是必要的。本书认为,在西方殖民主义中,国家的关注所在常常被包含在关于种族和海外征服之中,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国殖民主义一直依赖国家身份特征和接连不断的陆地扩张。本书还认为,必须在准备维护身份特征的防卫性的民族主义与竭力输出身份特征并且夺取他人所居住的土地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加以区别。俄国民族主义即是侵略性的、也是防卫性的,依据侵略的模式,它转化为帝国胃口,寻求直面占领与俄罗斯人居住的俄国土地连接的地域。我们可以认为,变成另外一个政治的和民族的强国的一块殖民地、一片国土不需要签署条约和承认被统治的地位,就像英国的许多殖民地那样。在俄国的案例中,跟随领土征服而来的是被兼并于俄国,或者把为俄国利益效劳的政府强加给那些领土。俄国文学传达了这一过程,把一种对俄罗斯占据局面的叙事强加给了被征服的地区,排挤本地的要事和本地的故事。

俄国殖民主义不仅征服了中亚、中欧和东欧,而且还征服了西伯利亚、高加索和远东。苏联解体之后,主权归还给了俄国所占领的欧洲土地和中亚,而在西伯利亚、高加索和远东,他们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困难。从领土和居民的观点来看,西伯利亚和高加索是独立的实体,可以比拟为英国的“白色殖民地”,如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西伯利亚和远东政权的让渡不需要完全脱离莫斯科,而对于非中央集权化该采取什么程序,本书则不予讨论。本书力求表述的是,俄国作家们如何唆使中央政权制止周边地区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叙事主体而不是中央的附属之物来表达它们自己的经验。

这篇引论就 20 世纪对民族主义研究的方法论作出概述。第一章尝试

1

2

在俄国及其国外的文本政治表达范围之内的俄国殖民自我肯定的问题。这一章指出西方的和俄国的殖民主义的区别,并且试图表明,在获得各方同意的论俄国的文学学术概念框架范围之内,俄国殖民主义从视野中淡出。英语世界关于俄国文学的学术活动的标准、规范和期许不能顺应俄国文学杰作中表达的对于自我肯定的强横寻求。以下各章说明,俄国作家如何利用他们作为日益成长的帝国代言人的特权地位压制其他论说,他们如何把自己的先定意义(*foremeaning*,借用伽达默尔的术语)^①强加给国内外的读者。作者的目的是引起对于文本表述得胜局面的注意,而不是写作百科全书式的俄国文学概述。本书最后一章尝试说明,把这数百年的积习纠正过来的机遇可能会出现。虽然纠正微弱,可能被压制下去,但是仍然是真实的和鼓舞人心的。当然,我的分析并不旨在取代以往的研究,而是加以补充:我力求到达的不是减缩含义而是使之丰富起来。

我意识到,没有一种解释能够根本性地改变对于俄国的态度和论述的结构。被称为俄国的这一松散的架构乃是一个知识的现实,其变形过程将会是缓慢的。涉及俄国文学的英语文献对于俄国殖民主义或者侵略成性的民族主义视而不见,这类的文献不会在一夜之内消失,因为目前没有激烈的政治的或者文化的利益走向这个目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后殖民时代的国家与地区已经产生了许多人物和论说,解释殖民主义画框的背面,与此不同的是,俄国以往的占领地区几乎没有形成这样的声音。在苏联红军离开中欧的时候,得到解放的各国把注意力从俄国转向其他地方,而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则忙于把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缝补起来,致力于后殖民地时期投资。俄国的远东表现出独立的躁动,但是发生这类行动的可能性还是十分有限的。^② 在1990年代的俄罗斯联邦,法律、社会习惯、语言都还不能轻易适应反殖民主义的声音。这情况依然类似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初期,在那些年代几乎没有人对于某一种族或者一批领土被另一种族或者另一批领土统治的现象。因此,我不能够像研究西方殖民地问题的后殖民时代的批评

①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Seabury, 1975), 238.

② Paul Goble, "Can Russian Diplomacy Hold Russia together?",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23 September 1998.

家那样,能够使用描述俄国在亚洲和欧洲的殖民行径的大量学术著作。^①我也不能指望有大批人士承认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那些不习惯于把俄国文学作品视为储藏帝国财产的资源 and 辅助器具的人可能显得十分陌生。维尔纳茨基(George Vernadsky)或者梁赞诺夫斯基(Nicolas Riasanovsky)被公认代表了美国对俄国史的早期研究,所以如果提及他们的同时代人库哈热夫斯基(Jan Kucharzewski)的名字,就很可能被指责与澄清俄国史的形象无关。^②从殖民主义语境出发来研究俄国文学现在还处在更为初级的阶段。迄今,在研究俄国殖民主义方面取得进展的全部学者,事实上都是政治科学家。^③

3

1988年,一位乌克兰裔美国学者施波鲁克(Roman Szporluk)发表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④他提出,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热衷把马克思提高到了一位杰出思想家的地位,而马克思的同时代人李斯特(Friedrich List)应该更恰当地提高到这样的地位,因为他的原理比马克思的论纲更好地适应了20世纪对于没有祖国、没有民族性的无产阶级的着迷。“屹立在个人和人性之间的是民族”,李斯特大声呼吁。他发挥的民族经济利己主义的理论,德国人和其他国家十分彻底地加以实施。

李斯特、施波鲁克关于民族主义的见解虽然显得很挑剔,还是触及了具有持续重要意义的问题。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有许多

① 一个例外是胡佛研究院的“苏联民族研究”系列。包括 Edward A. Allworth, *The Modern Uzbeks* (《现代乌兹别克人》,1990), Alan Fisher, *The Crimean Tatars* (《克里米亚的鞑靼人》,1978), Martha B. Olcott, *The Kazakhs* (《哈萨克人》,1987), Azabe-Ayse Rorlich, *The Volga Tatars* (《伏尔加河的鞑靼人》,1986), Andrejs Plakan, *The Latvians* (《拉脱维亚人》,1995), Audrey L. Altstadt, *The Azerbaijani Turks* (《阿塞拜疆的突厥人》,1992), 还有相关的著作,如 Rodger Swearingen,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西伯利亚和苏联的远东》,1987)。也有 Hafeez Malik 编辑, *Central Asia: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and Future Prospects* (《中亚:其战略意义和未来展望》, New York: St. Martin's, 1994); 还有 Islam Karimov, *Uzbekistan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跨入 21 世纪的乌兹别克》, New York: St. Martin's, 1998)。

② Jan Kucharzewski, *The Origins of Modern Russia* (New York: Polish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48)。

③ Uri Ra'anan, Richard Pipes, Hélène Carrère-d'Encausse, Alain Besançon。

④ Roman Szporluk,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88)。

陆地型的帝国在民族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转变成为民族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甩掉了他们国内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组成了他们自己的新国家,或者返回到以往的主权身份。^① 苏联的解体,虽然是经济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力量促成的,却加剧了俄罗斯人的这个出现裂痕的帝国中民族之间的紧张的关系。^②

1990年代,美国大学里的研究集体在对待民族问题方面,没有做到在研讨社会及其弊端的时候所采取的那种认识论上的细致入微的态度。在这个集体内部,民族大体上被规定为国籍。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提出一条论纲:在任何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中都有一套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和规范,它代表了社会凝聚力。这一条以启蒙精神为依据的解释被学界广泛接受,用以探索有如民族国家和帝国这样不同的政治实体。的确,英语几乎不能够区分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或者国籍和民族归属(citizenship and nationality)。但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大陆欧洲,一般都认为,民族归属指的是某一个人的文化习惯和各种记忆,而国籍指的是作为这个、或者那个政治实体的公民的公民条件(或者,在归化的情况下,选择)。因为这二者经常重合,所以二者永远重合的见解导致美国记者(他们都就教于学术专家)发表语焉不详的论断,例如,车臣的俄罗斯人在和其他的俄罗斯人作战,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两千万俄罗斯人牺牲。参看《休斯敦纪事报》1998年9月6日的一篇报道:

4 一家俄国通讯社报道,五名俄国水手在据认为杀害一名警卫和抓捕47名人质之后数小时被捕。全部人质都被释放,没有受到伤害,人质捕获者被联邦安全部特殊部队制服,没有受伤。水手们要求派出一架飞机送他们到南俄的达吉斯坦地区,据报道援引普京(Vladimir Putin)的话说,那是高加索山区的一个麻烦诸多的地区。人质危机显然来源于星期五在达吉斯坦首都杀死17个人的可疑汽车炸弹爆炸事件。一名水手说他有一个亲戚可能在爆炸中丧生。其他的人被描述为是出

①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Reviv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1).

② Hélène Carrère-d'Encausse, *The End of the Soviet Empire: The Triumph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自团结精神而参与其中的。

在美国学界流行的民族主义语义学之中,这条报道十分平常。但是,进一步的审察就揭示出来了这篇报道的混乱,原因就在于俄国的殖民政策,塔斯社撰写报道的格式,和美国编辑对民族主义问题缺乏敏感。从其他资料收集整理的故事的概要是:这些水手原来驻扎在新地岛,北极的一个岛屿,受到原子能废料的污染,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一直把最不妥协的反对派押送到那里去(有消息说劳尔·瓦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就死在新地岛)。^①在曝露于核设施和其他放射性废料的辐射数月之后,这些牺牲品正在走向痛苦的死亡。新地岛上的逃亡的士兵不是俄罗斯人,而是达吉斯坦人,以及造反的车臣人的亲戚和邻居。达吉斯坦的居民是非斯拉夫人的穆斯林和俄罗斯殖民移民。俄国人在19世纪征服了达吉斯坦,但是在该地区的俄罗斯化方面没有成功。达吉斯坦是俄罗斯联邦的领土之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许会分离出去。莫斯科设置的权力机构和达吉斯坦游击队在1990年代冲突频繁。达吉斯坦的几个区域想要加入车臣共和国。报道所说的爆炸是达吉斯坦人反抗俄罗斯人和偶尔的相互反抗的武装斗争的一部分(达吉斯坦居民分为不同部族,而对殖民权力机构的依赖程度又恶化了地方居民彼此的敌意)。报道中提及的士兵因为想到自己的亲属在大约两千英里以外的地方爆炸中身亡肯定痛感绝望,但是,在阅读这条消息的时候,一个普通的读者很可能会忽略更重要的事实:俄国军方把南方(倾向叛逆的)达吉斯坦的民族成员送到北极损害健康的核墓地新地岛。^②一位没有意识到这些细微的语义含义、写出这一报道的美国记者加重了美国对于俄国信息和俄国政治的误读。

在民族主义方面,启蒙主义时代形成的概念不能适用于四处出击、征服和剥削潜在的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力求保护传统和特征的防守型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民族主义”的方阵之中,一言以蔽之,

^① E. M. Thompson, "The Wallenberg Case: The Inferred Soviet Viewpoint," *Raoul Wallenberg in Perspective*, edited by K. D. Reiser and Thomas Neumann (Houston: Southwest Regional Office of 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 1986), 12-15.

^② Reuters, 20 August 1998.

在最近二百年里控制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帝国主义列强常常装模作样显得清白无辜,全然不计侵略性的掠夺,而遭受殖民的国家(包括中小型欧洲国家)的代表却因为历史进程而遭受指责,其实在那些过程之中,他们是无足轻重的。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常常归因为东欧的“火药库”,而不是欧洲几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极度贪婪的帝国主义。今天标准的做法是把法国大革命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大革命吸引了不要国王的臣民,因而唤起民族主义情绪,而不是臣民的忠诚)^①;但是,道尔贝格—埃克顿(J. E. E. Dalberg-Acton)把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推逆到波兰遭受的三次瓜分,指出了“旧式绝对君权的这个著名措施的、这个最革命的行动的”罪恶后果,“这个君权剥夺了整个一个民族的组成独立共同体的权利”。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他指责各个帝国,而不是革命,这个见解应该获得比实际上获得的更多的荣誉。^②和埃克顿观点相反,克杜里和霍布斯鲍姆(Elie Kedourie and E. J. Hobsbawn)认为,多民族的欧洲各帝国不需要分裂成为民族国家,因为它们包括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意识”是远远不能够确立的。^③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不承认,在这些多民族的国家里,一个民族不可避免地要占上风,并且迫使其他民族进入一种殖民从属的地位。克杜里的论证是特别典型的漠视一切的,除了世界上最有根基的民族主义。在援引各民族的历史特征的时候,它也是反历史的,它还倾向于以民族主义为代价免除殖民主义的罪责。克杜里代表了西方对非西方文化和政治特质的厌恶,像甘地(Leela Gandhi)所说的,这反映出认为非西方民族的某种有机体方面的不完善的信念。^④西方学者有时候以一种不赞同的眼光看待亚洲、非洲以及中欧和东欧的后殖民主义民族意识的生成,这表明:以民族性为基础的自我定位是一种可耻的疾病,其中有罪责的部分,如果没有一支军队或辞令智慧在全世界

①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2d ed.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 1967).

② John E. E. Dalberg-Acton, "Nationality,"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Liberty*, vol. 1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6), 413.

③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London: Hutchinson, 1961); E. J. Hobsbaw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2d rev.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0).

④ Leela Gandhi, *Postcolonial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 1998), 107-8.

范围内为其争辩,就应该尽快地摆脱它。在《东方主义》里,萨义德(Edward Said)指出许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辩护的学者的名字。^① 毋庸讳言,比较弱小和努力奋斗的国家没有办法对付成千上万种图书,这些出版物把它们特有的指责镂刻在发达国家的学生和学者的记忆之中。^② 这样的说辞之中隐含的设想就是:虽然弱小民族因为身份各有不同而动辄得咎,但是分类学家却是不偏不倚得出奇、摆脱了任何种类的民族感情纠葛。然而,凯诺万(Margaret Canovan)在一部基本的著作里指出:“现代自由民主理想取决于对于民族忠诚做法产生的集体力量的赞赏态度,而这类的忠诚是不符合理想本身的……总体的人文原则和设想的前提都是特殊凝聚力所支持的权力,而保存这一权力基础却和它赞同的原则本身形成矛盾。”^③ 换言之,在西方民主派在世界其他地方宣扬和支持普遍性的理想的时候,他们这样做的能力受制于对具有西方渊源的特别语言和文化的情感和偏好。凯诺万教授提示,这种不协调的思考被西方政治科学学者们忽略和掩盖。

在讨论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时候,甘地提出,受到启蒙主义影响的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和男性与男人气概有关,而这一理念,傲慢的欧洲人是很不愿意给予他们殖民化地区的人民的。英国人喜欢谈论女性化的孟加拉男人,从而巧妙地贬低孟加拉民族主义。^④ 更广泛地说,对殖民地人民民族身份的藐视一向是征服他们的办法之一,把他们划归缺乏某种气质的人,不如铸造了控制他们的力量的那些人优秀,具有女性的一些特征,因为女性是要受到男性指导的。在这样的语境之中,弱小民族是没有资格具有民族身份的,因为弱小,就和作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自我定义的组成部分的男性强盛的那种含义冲突。

①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1979)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② 在这方面,典型的是 Paul Johnson, *Modern Time: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Eisht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它实际上在重复关于中欧和东欧的负面的陈词滥调。J. A. Froude的见解是:“哪些民族没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自由,就没有享有自由的权利”——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残暴所特有的观点。Jeffrey Arx, *Progress and Pessim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1985), 205.

③ Margaret Canovan, *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6), 137.

④ Gandhi, *PT*.

本书的依据乃是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一如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国家、民族、传统和历史,而且一般人使用这个词语的通常的意义,是为某些人的意识形态的利益服务的,这些人主张,除了最强大的民族主义之外,要连根拔掉全部的民族主义。有些信心十足和稳定的民族几百年来受益于稳定的财富积累,他们的民族主义在目的和方法上不同于处在主权受到争夺的地理区域的为生存而挣扎的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上层阶层的集体特征和目不识丁的群众的特征是不同的,后者只享有作为民族主义理想之一部分的繁复神话的某些因素。实施操纵和侵略成性的民族主义都竭力把其他国家变成殖民地,当然有别于微弱的、防御性的和激发冲动的民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很容易变成其对手的军事的和话语上的占有的牺牲品,因此巩固了上文提及的形势,亦即把“民族主义的罪责”强加给在政治上弱小的民族,同时开释强者开启的权力游戏。殖民主义通常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其根源在于传统的男性霸权这一事实十分明显,不容争辩。

我们所需要的分类法应该区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知和培育自己的历史和理想化的传统的努力,另外一方面则是通过征服和压抑其他的传统的努力,这是一种自我肯定,构成了那些直截了当地表现毫不退让的男性文化霸权的特点。对于本质主义的畏惧阻碍了民族主义新分类法的发展,应该克服。^① 功能派作出了某些有益的区分,但是错过了有关民族主义的神话。德意奇(Karl Deutsch)剥去了民族主义共有的历史和记忆,把它当做一种社会变化的想象来对待。因此,一个民族将是在某种永恒的现时中运作的“交流的共同体”。^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en)在读写能力中寻找民族主义之根,提出读写能力造成了以往不曾存在的“想象中的

①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Allen & Unwin, 1948); Fran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ated by C.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1963); Philip D. Curtin, ed., *Imperialism* (New York: Walker & Co., 1971).

② Karl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1953), 143; and Katherine Verdery, "Ethnicity as Culture: Some Soviet-American Contrasts," *Canadian Review of Studies in Nationalism* 15, nos. 1-2 (1988).

共同体”。^① 这和 19 世纪与 20 世纪初期的民族理论家形成对照,这些人包括德国的浪漫派和中欧的爱国者们,还有威尔逊总统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这些人在讨论中援引了宗教、地理、习俗和历史。^② 德国生产了这些理论家中的多人(以及几种民族主义病疫,从费希特到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密茨凯维奇 (Adam Mickiewicz) 和科苏特 (Lajos Kossuth) 是来自中欧的两个声音,反对被称作帝国的民族主义之病疫;他们提出民族国家的主张,而在当时各个帝国都正在兴盛,殖民主义走上了巅峰,而在欧洲,中小民族的民族的期望显得受到镇压,不可挽回。他们被从欧洲标准的精神史中排除和剔出,尽管他们的中介作用是巨大的;如果他们顺服听从,许多流血伤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③ 密茨凯维奇和斯沃瓦茨基 (Juliusz Słowacki) 论俄国殖民主义的著述是特别珍贵的,但是都封存在中欧思想档案之中,美国的研究阐释学者们忽视他们,而偏好俄国人和德国人的阐释霸权。^④ 这样的民主观点形成的一种受欢迎的和温和的论断出现在联合国的各种公告中和像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国际机构的出版物之中。这类出版物中有一件认为,一个民族将是享有共同的历史、习俗、忠诚所向和语言(但不一定是同一血缘,这个重要的区分正确地分开了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一个群体,民族主义就在于对这一情况的意识。这一民族主义观点认为,“人类是天然地分为民族的,各民族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历史地形成的

7

^①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② 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在形成民族主义理论方面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他的《人类历史哲学思考》(1784—1791) (Frank Manuel 英译,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8); C. J. H. Hayes: 《现代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New York: Smith, 1931); Boyd A. Shafer: 《民族主义面面观》(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2) and Salo W. Baron: 《现代民族主义与宗教》(1947) (New York: Meridian, 1960)。

^③ Louis L. Snyder, *The Dynamics of Nationalism: Readings in Its Meaning and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D. Van Nostrand, 1964), 229-33.

^④ Adam Mickiewicz, “Księgi Narodu i Pielgrzymstwa Polskiego,” *Dzieta wszystkie*, edited by Konrad Górski (Wrocław and Warsaw: Ossolineum, 1969-1972); Juliusz Słowacki, *Anhelli*, translated by Dorothea Prall Radin (London: Allen & Unwin, 1930); Louis Kossuth, “Proclamation of Hungarian Independence,” in Snyder, 232; Éva Haraszti, *Kossuth as an English Journalist*, translated by Brian McLean (Boulder, CO: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 Press, 1990).

特点”。民族的自我治理是政府的自然的和合法的形式,而民族国家则是人类群体的最自然的组织形式。^① 在这里鲜明勾勒出来了接受民族身份和民族延续特征的威尔孙式的态度。

在《国家的民族起源》中,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追述了现代民族身份意识向民族群体(ethnie)发展,或者是向现代国家以前的民族集体的过程,这样的集体是一大群人在军事变迁和其他重大运动过程中形成的。^② 民族群体拥有一种神话象征情结(mythomoteur)。民族是具有一种共同民族群体和一种广泛发展的神话象征情结的实体。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个神话象征群体可能包括歌颂男性及其对待世界的方式的叙事风格,例如战争、狩猎和探险;或者可能包括女性的自卫方式,例如波兰的关于克拉科夫的万达公主的神话:她受到德国王子莱提格的追逐,为避免背叛她的身份(和一个德国王子联姻就会使克拉科夫和波兰德国化),她自杀报国。葬礼之后,她感恩的臣民为她建造了一个很大的坟墓,至今仍然见于克拉科夫近郊。万达属于传说时代,她很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就像基辅的奥尔加公主一样,她已经根植于波兰神话象征情结之中,成为其关键因素之一。

民族的身份倾向于凝结为某种雌雄同体的形式之中,如父亲之地/母亲之地的互换(在英语中,fatherland/motherland都指“祖国”——译者)。但是在日耳曼文化中,男性占主导地位(在德语中没有“母亲之地”[Mutterland]这个词语,只有“父亲之地”[Vaterland]);在俄罗斯文化中,可以看到强调女性的概念的伸延。“俄罗斯”(Rossiia)是作为一个女性的实体使用的,例如“俄罗斯母亲”(matushka Rossiia)或者“祖国”(rodina)。这最后一个词语在其他的欧洲语言里没有对等的词,大概例外是德语的Heimat。Rodina指一个人诞生的地方,或者一个人所忠顺的地方,超过对其他地方的忠顺。有意思的是,俄罗斯人身份的这个女性特征没有减少俄国民族主义的侵略性质。正如斯塔罗沃伊托娃(Galina Starovoitova)所指出的,俄罗斯的民族身

① *Minority Rights: Problems, Parameters, and Patterns in the CSC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ontext* (Washington, DC: CSCE, 1992), 1-2.

②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1986) (Oxford: Blackwell, 1993).

份和国土密切相连；一切被祝福的地方都很快被重新设计成为俄罗斯。法兰西共和国的别名是“玛丽安娜”(Marianne)，但是这是一个意义极弱的概念，不能和 *rodina* 相提并论。

民族的神话情结是在读书写字的能力还仅仅是上层阶级少数成员的特权的时候形成的。起初，只有少数人熟悉神话象征情结的历史和早期形成的情况。这一情结在现代社会里的广泛分布无疑得助于、但是不是取决于大众读写能力和技术。民族追求不同于他人的特征之意志是一种生存意志的形式，而不单纯地是一种无奈的表现，或者一种徒劳的尝试——亦即，把全世界限定在倾向于为它提供身份的一条单一的原则之中。^① 每一个这样的神话象征情结的集体性味道都是独特的，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人感觉自己是某一民族的成员的独特感受。打造临时的民族，比如南斯拉夫民族、苏联民族，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失败，就是因为这些虚假的分类群体的成员没有可以分享的某种象征的情结。大帝国制造殖民地人民对自己忠诚的做法屡屡失败，就是因为通过征服已经存在的民族而制造的国家里，缺乏一种共同的记忆整体。康纳汀(David Cannadine)、霍布斯鲍姆和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都准确地指出，大帝国的领袖们都曾竭力制造和强化这类的记忆。^②

为了形成这样的象征情结，必须有一大批人享有长时间的充分的闲暇，这一批人还必须培育出在文学里鼓吹民族神话的作家。在前工业化时代，大部分人的生命都太短促和凄惨，不能享有创造民族的很多的心理空间。这就是民族主义乃是一种现代和后现代现象的理由之一；所以近期才有这

^① Max Scheler, *Ressentiment*, translated by W. Holdhei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Leszek Kolakowski's critique of Theodore Adorno in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3, translated by P. S. Fall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358-9.

^② 在《传统的发明》中，他们指出，19世纪的德国和英国监督并且鼓励据称是古代因缘的民族主义的礼仪之兴起——实际上，那是他们发明的礼仪，旨在提高德意志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威望，强化公民对他们的感情依恋，让公民对帝国的政治目标俯首帖耳。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 by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3), 15-42, 101-164 and 263-308.

么多的新的民族兴起^①;正因为如此,那些残余的帝国大概注定要面对不稳定的局面,因为“本地人”在读写能力和物质福利上都在取得进步,造成一种传播和加强他们的经验的文学。

前现代的种族(ethnie)可以分为两类:横向的和纵向的。横向的具有一种贵族的和密集的神话象征情结,在上层阶级成员当中发展,他们享有一套的忠诚原则和记忆,这一情况在某种方式上助长了他们的自高自大和使命感。在纵向的民族意识中,单一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程度上渗透了居民的大多数的阶层。横向的民族意识在人民群众当中造成了归属和延续的情感,这类情感是民族特征的支架。民族形成的神话、记忆和象征的情结构成了他们的实质性政治神话,这一神话反过来又大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文化。^②

- 9 文学是民族同一性的主要构成板块,也是它的一种表现。对于胜利与失败的态度在各个民族那里是大不一样的,部分的是以文学中记载的方式为依据的。对于民族同一性的铸造,战争显得至关重要,不论是战胜还是战败。对于这些战争的记忆,在辞令上,是得到了民族精英的美化的。这些加工促成了横向和纵向的民族气质,因而还有民族认同感,但是它们产生的行为模式却是十分不一样的。在其全部历史中几乎一直持续地进行过侵略战争、并且以同样激情纪念胜利与失败的那些民族群体(例如俄国人),都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感也同样可以追溯到条顿人的好战历史和他们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区胜利的自高自大心理。但是,许多败北的战争看来对民族意识也形成了一种类似的持续的效果。自从18世纪以来(只有1920—1921年的波苏战争例外)波兰人在全部战争中都遭到失败,但是这一持续的民族灾难的链条并没有把波兰民族性蜕变成种族心理。乌克兰的民族认同感因为1932—1933年苏联人为的饥荒的回忆而大大地强化,在那次饥荒当中有1000万乌克兰人丧生。1993年9月,乌克兰政府组织了大饥荒纪念活动,以提高人民士气——但是,出人意表的

^① 在1978年,联合国有149个成员;1998年,数目增长到185个。《经济学人》,1998年12月19日。

^② Smith,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58.

是,这是一次对失败的纪念。乌克兰的神话情结显然十分不同于在第一世界占主导地位的那种情结。它还依然处在形成的过程之中,因为乌克兰正在获得自信心,而这样的自信心,原来俄国的、还有更早的时候的波兰殖民地主人是竭力要从他们那里夺走的。

防御性的民族主义限定认为自己受到威胁的记忆群体,或者是因为他们弱小(立陶宛人、格鲁吉亚人、车臣人),或者因为他们的扩张成性的邻国发出威胁。身受这类情况影响的民族倾向于内向,而不是外向,后果是他们不能够培育出与外部世界顺利交往的方法。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是抵御抱有敌意态度的他者侵犯自己特征的一种手段,但是常常被解释为恐外症。这样的解释本身就是殖民癖性的表现,因为他们能够把他人拉到普洛克拉斯图斯的床上去,这是代表了主要政治强权的中介人士划定的语境空间。

扩张型的民族主义不是内向,而更多地是外向,结果,很少意识到自己的沙文主义和殖民欲望。在把自己的自我感知强加给他人方面得到的现在的荣耀和成功的意识造成的特权空间里,有时候就包含了一种癖性:夺走他人的土地,在那里建立自己的一套制度,强制实施。在现代史的不同时期,有很多国家遭受殖民主义的钳制,发展受到阻碍,把本来能够用于社会建设措施和培育人才的许多能量耗尽。殖民主义能够、而且已经在世界各地发展,其对象一直不限于非白人的非欧洲人。

19世纪和20世纪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民族主义的增长并列,促进了民族主义的活力。人口密度的增长方便了本质性的政治神话和为“想象中的共同体”的成长所必需的其他神话的传播。作为人民的民族(有别于作为帝国的民族、或者作为国家的民族)吸收了过去的某些宗教特点。因为缺乏具有支持能力国家提供的方便,属于无国家的民族的个人在19世纪有很多,而且在20世纪之交继续呼吁世人予以注意,他们把自己的创造精力贡献给了民族意识的培育和歌颂,用文学和一般地写作,有时候还是在战争期间。

特征的发展需要一定尺度的社会自由。因此,防御型的民族主义代表人物把他们的资源用于反抗持镇压政策的帝国强权,因而限制了其他的许多活动。在19世纪的欧洲和在沙皇俄罗斯帝国,许多民族起义耗尽了较小国家的资源,而起义的代价之对于帝国,是容易吸收的。特劳古特(Romuald

Traugutt)对这类情况的解释很好,他是波兰 1863 年反沙皇起义的领袖。他是书生,羞怯,体质不良,但是参加了起义,被问及原因的时候,他回答:“上帝要求人具有美德,而在被奴役的条件下获得美德是比在自由中获得美德困难得多的。”他的回答的含义是,要获得自由,必须首先享有政治主权。

强烈感受到的对自由的需要在下列二者之间形成不易调解的关系:一方是建立在福柯和德里达深入讨论意见基础上的后殖民理论,另一方则是殖民地边缘地带对自我身份确立的实际斗争。这一紧张的关系尤其见于关于苏联和俄罗斯帝国的探索。从车臣到捷克斯洛伐克,对自由的呼吁的动员力量超过了对于民族、经济和言论的思考。在俄国殖民范围之内,斗争不是指向西方的认知方式或者英国人或者法国人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指向俄罗斯人的种种优先权和俄国人的“无知”。后现代主义虽然自认为受到欢迎,像斯皮瓦克这样的后殖民理论家可以取代西方的形而上学,但是它对苏联集团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贡献甚少。斯皮瓦克说:

我长大成人、第一次阅读德里达的时候,不知道他是谁。我很感兴趣,因为他实际上是从内部解释哲学传统,而不是从外部,因为,当然,我们是受到印度教育制度的培育的,在这里,哲学系统的主角乃是普通的人,我们所得到的教导是,绕过我们能够接近这样的人的国际化,那么,我们就能够成为人。^①

11 在斯皮瓦克所属于的语境之中,她的提示表达了对于普遍使用启蒙主义分类法的愤怒,这样的方法把低素质强加给了受统治的民族。但是,在苏联—俄罗斯帝国范围之内,这样的分歧的缩小原因是不存在的;西方模式无论有什么缺陷,都不是敌人。问题就在于,外来的帝国把文化特征强加给了殖民地人民感受到的防御型特征,因而他们感受到了必须从钳制他们的递给权力那里获得“自由”。

安德森正确地把民族主义和读写能力联系起来;民族主义是世俗社会和人口增长的特殊环境下的读写能力的副产品——但是意义比这一点要大

^① Gayatri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London: Routledge, 1990), 7.

得多。读写能力的传播使得贵族式的民族特质让受到教育的大众可以企及。过去一直是贵族特有的传统,现在变成了店员、小农和工厂工人的权利。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对于大量记忆的诸多解释会进行得很快,但是这个过程不会泯灭印记在文学、社会习惯和规章制度中的神话的。过去的真实的或者想象的英雄,仅仅驻守在少数的精英的记忆之中,现在却进入了大众的头脑,而在过去,对于他们来说,家庭、宗教和政治权威乃是仅有的现实。他们结合、或者取代了其他的忠诚对象,构成了每一个人的身份,是这一身份穿过后现代的密林开拓出了道路。

上文已经指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是有分歧的。萨义德尽管言辞有些模糊,但是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欺骗性的魅力的。而法农(Frantz Fanon)在《世界上受苦的人》中视民族主义为治疗殖民主义疾病必备的良药。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也给予民族主义者在反殖民斗争中一定的地位。^① 甘地(Leela Gandhi)认为,民族主义是“唯一的政治组织形式,适应现代世界的社会的和知识的条件”。她强烈争辩说,第一世界的反民族主义恐惧、及其时刻准备把沙文主义运用到没有祖国或者受到帝国统治的民族对民族身份的诉求上,反映出来黑格尔的“缺乏论”,以及除了欧洲集中最强大的民族主义之外,其他一律不存在。黑格尔认为,普鲁士国家是在他那个时期的历史发展的巅峰,这个观点包含了后殖民主义理论揭露的殖民主义偏见的萌芽。甘地说,殖民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极具特色地打造自己的普世形象,并且宣布,对于他们的任何反抗(例如提出民族主义)都是非法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乞灵于他们自己现代的社会结构,还提醒说反抗的态度是农民性质的、落后的,或者是不文明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话语上剥夺一个军事上弱小的敌人轻而易举。在甘地看来,对民族主义的“偏执性的反感”是一种躲避的形式,躲避到造成东方主义的一套认知态度和方法上去。

综上所述,我想提出,选择不是在德国人发挥出来的大众式(Voelkisch)民族概念和以启蒙运动为根据的市民概念之间进行。还有其他的选择。有人不

^① Elleke Boehmer,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95).

- 12 由得想要作出断言,有点滑稽也罢:弱者的民族主义也许是人性对后现代哲学框架的报复,因为这个框架否定连续性的存在,倾向于认为过去与现在是分割开来的、不连续的。后现代主义把历史庸俗化,殖民主义否定被统治的人民接近历史,所以民族主义声明,人民渴望了解历史,历史不能够从她们的意识中排挤出去。忽视民族主义的态度不能把它赶走,而更好地理解它可能是有助于消除、或者减低它所带来的混乱的。对于民族主义经验多样性的更多的研究将会有助于对于认同和继承的普遍的追求,同时制止帝国主义的病害。本书最关注的是这样的病害。但是,本书也承认民族主义的合法性,认为是一种自我肯定的方式和在现代与后现代时代形成个性特征的工具。

第一章 问题

15

本书的主题是有关俄国强国地位的俄国文化语境中的大规模灌输现象。这种灌输现象,因为缺乏知识探索的习惯而一直被忽视。西方文学的读者培育出来了对于作为权力中介技巧的文学作用的感受能力,而在俄国文学方面,则不存在这样的过程。在反殖民意识浮现在西方的殖民地和浮现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中间的时候,俄国被排除在考虑的范围之外,因为俄国帝国主义似乎已经是一个以往的共产主义时期的问题。后殖民时期探索的焦点是西方的原有的殖民地,以及这些殖民地 from 苏联俄罗斯得到的帮助,而不是沙皇和苏联对于类似的殖民活动的热衷。在苏联解体之后,对于一种压迫成性的制度垮台的欢欣优先于其他种种的考察,而俄国文学中沉淀的俄国殖民主义问题从视野中消失了。提供给西方读者记忆的俄国文化的非殖民形象的图书和杂志,真是汗牛充栋。本书是挑战许多文本和见证的强大权威的一本著作。

有几种因素缓和了俄国乃是一个殖民大国的感受。第一是俄国各殖民地的地理位置。在后殖民理论和批评中,一般都认为殖民地远离宗主国,征服过程要求漂洋过海。但是在俄国的案例中,殖民地和在人种上是俄罗斯人的土地连成一片。俄罗斯帝国剧烈转变为苏维埃联盟的过程更进一步模糊了俄罗斯人当权的国家的殖民性质。这个国家的扩张,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兼并和外交操纵取得的,和西欧列强的海外强取豪夺没有不同之处。但是,因为俄国的殖民地靠近人种上的俄国,所以二者之间的界线模糊、并且掩盖了俄罗斯人和外国人记忆中的宗主国和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俄国帝国领土缩减成为“俄罗斯”联邦(Rossiiska-ia),该联邦包含有寻求主权和身份的不同的边缘地区。

与领土模糊性相联系的是语言的模糊性。英语词语“俄罗斯”和“俄罗 16

斯的”是十来个俄语术语和词语的翻译。俄语中有“俄罗斯”(Rossiia)这个词,指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的《历史》器重这个词语)。俄语中还有一个更古老的词“罗斯”(Rus')——这是在13世纪蒙古人入侵以前在基辅存在过的一个国家。“罗斯”这个词有时候用在诗歌里,意义包括全部东斯拉夫人——包括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某些场合下,专指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这一情况中,“罗斯”反映出古英语词“鲁塞尼亚”(Ruthenia),该词统指现代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而不包括“莫斯科维”(Muscovy,亦称“莫斯科大公国”),以及俄罗斯。所以,把“罗斯”翻译成“俄罗斯”造成很多混淆,但是这正是美国历史学家们历来的做法。还有一个俄语术语“莫斯科国家”(Moskovskoe gosudarstvo),曾一度被翻译成英语“莫斯科公国”(Moscovy)。指的是在蒙古人入侵以后,在14世纪形成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家(莫斯科城建立于12世纪)。这个国家对土地极度贪婪,其方式是基辅罗斯所从来没有过的,到1991年它的扩张终于被制止以前,它一直在蚕食领国的土地;在那个时候,它的名称是苏联。重要的是要牢记,莫斯科公国没有自称“俄罗斯”;这个术语是到了17世纪才开始使用的,官方使用始于18世纪。同样重要的还有就是,要牢记,正像基南(Edward Keenan)近期在一篇重要文章中所指出的,在莫斯科维,没有存在过身为基辅国家后裔这样的意识。^①没有迹象表明,伊万雷帝或者他的前任们曾经把乌克兰或者白俄罗斯(当时处在波兰—立陶宛的统治之下)看做是莫斯科维的世袭领地。所以,18世纪俄国思想意识制造者们提出的“统一”三个东斯拉夫民族的理念,是17世纪晚期的一项发明,不是15世纪和16世纪莫斯科维的观念的组成部分。莫斯科维吞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不是因为它渴望统一(不可能渴望,因为从来就没有过统一),而是因为它向四面八方扩张。

相应地,16世纪的英国人弗莱契(Giles Fletcher)是驻莫斯科维、而不是驻俄罗斯的大使,他在自己的著作《论罗斯共同体》(*Of the Russe Common-*

^① Edward Keenan, "On Certain Mythical Beliefs and Russian Behaviors," *The Legacy of Histor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edited by S. Frederick Starr, vol. 1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19-40.

wealth, 1588)是这样指称它的。但是,他的莫斯科维和后来创造出来的俄罗斯帝国(*rossiiskaia imperia*,俄罗斯人统治的沙皇帝国)被那个地区的20世纪的大部分历史学家们压缩成“俄国”。这一用法转移了人们对于莫斯科维所获土地行为之性质的注意。罗斯不曾是一个殖民国家,莫斯科国家有野心成为一个殖民强国,而沙皇治下的俄国,或者俄罗斯帝国,则达到了这个目的。英国人没有称印度为“英格兰”;殖民地和自治领有自己的名称,而“联合王国”这个称谓承认了英国王室以往“内部殖民地”的身份。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莫斯科维及其继承国家俄罗斯帝国,一直向达吉斯坦、爱沙尼亚、乌克兰,或者鞑靼斯坦在扩张,而且开始把这些地方也叫做“俄罗斯”,置其相应的民族的和历史的现实于不顾。让我们复述基南的话,可以说,这种语言的挪用是欧洲文化史上的重大神秘手段之一。

17

形容词 *russkii* 可以指“俄罗斯”,“罗斯”,或者“莫斯科国家”。在每一个情况中,意义都是不同的。把局面变得更复杂的是,在18世纪,又形成了形容词 *rossiiskii*,这是当时已经成为帝国的“俄罗斯”的一个同源词。*Rossiiskii* 在礼仪演说里偶尔被当做 *russkii* 的同义词使用,但是叶卡捷琳娜一世主张用该词专指帝国的非俄罗斯人的民族。因此,*russkii* 是指俄罗斯人,而 *rossiiskii* 是指俄罗斯人和帝国的其他的臣民——因而就有“俄罗斯帝国”(*rossiiskaia imperiia*),或者,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联邦”(*Rossiiskaia Federatsiia*)。在现代俄语中,*rossiiskii* 继续指俄罗斯人和联邦中那些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而 *russkii* 单指俄罗斯人。但是,这两个词语都被翻译成英语的 *Russian*(汉语一般翻译成为“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和“俄国的”——译者)。因为这两个词语有共同的语源,所以 *rossiiskii* 可能是指“不完全的”俄罗斯人,正在形成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有某种自然的联系的人。就这样,帝国的殖民性质被语言受到的操纵所模糊。在苏俄,曾经有人试图把两个词语结合起来,提出 *rossiiskii* 是 *russkii* 的旧体形式。^①

布宁(Ivan Bunin)有一部短篇小说《阿格拉娅》,这是促成了这些同源词在外国和本国读者意识中的汇合的许多文学作品之一。一个乡下女孩卡捷琳娜给她妹妹讲俄罗斯历史的繁复变化;这是她在修道院逗留期间学到

^① *Slovar' russkogo iazyka*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57-61).

的。那篇小说的核心是“一个凄惨的故事,叙述俄罗斯(罗斯)从基辅撤退,逃避到无路可走的森林和沼泽地,躲进小村镇,受到莫斯科维王公贵族的残酷统治;俄罗斯忍受了暴乱、内战、残暴的鞑靼人兵团的压迫以及来自上帝的其他的惩戒;忍受了瘟疫和饥饿,火灾和上天的凶兆。”^①请注意在这篇从另外一方面看很可爱的故事里,“罗斯”和莫斯科维的融合,故事述说了一个人祖国的不幸遭遇,这些遭遇在像俄国这样成功的国家里可能显得过分,但是仍然是俄国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应该指出,“残暴的鞑靼人兵团”是这篇故事描写的那个时代的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对这些暴行的念念不忘并没有增进作为俄罗斯人臣民的鞑靼人的福利。

翻译成英语词语“俄罗斯”和“俄罗斯的”的这些俄语词语意义的不确定性,用作家阿尼西莫夫(Evgenii Anisimov)的话来说,方便了帝国贪婪本性和民族身份的混合。阿尼西莫夫承认,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苏联”一般就是指“俄国”。听说苏联科学院改名(从“苏联”改为“俄国”),它的副院长维利霍夫(Evgenii Velikhov)回应说:“实际上,它一直就是俄国科学院。”^②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杂志《我们的俄罗斯》(*Nasha Rossiia*, no. 11/35, 1992)的首页就推出一个口号:“罗斯—俄罗斯—苏联—我们伟大的祖国。”(Rus'-Rossiia-SSSR-Nasha Velikaia Rodina)。

18 1995年7月的《星火》杂志(no. 29/4408)刊载了《星火》主编古辛(Lev N. Gushchin)写的一篇社论,它使用了一个在18世纪形成的词语,velikorossy(大俄罗斯人)。这个词语包含了形容词“伟大的”(veliko-),一如苏联国歌中的“伟大的俄罗斯”(Velikaia Rus')。在俄语中,这个词语是指一个地理位置,但是“大”的首要意义是传达一种重要的光环,特别是因为它的反义词malorossy(“小俄罗斯人”,指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也是通用的。这些在语义上起操纵作用的语词表明,俄罗斯人是真正的“大俄罗斯人”。而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是“小俄罗斯人”(俄语词根mal-意思是“小”)。

这些区别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忽视这些区别就等于掩盖俄国殖民主义

^① I. A. Bunin,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66), 364.

^② *New York Times*, 14 December 1991.

大规模地除去民族和种族名称的行径。正如爱尔兰人虽然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是依然不是英格兰人那样,巴什基尔人和达吉斯坦人虽然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却也依然不是“俄罗斯人”。除了斯拉夫诸语言之外,其他欧洲语言都难以区分 *russkii* 和 *rossiiskii*, 或者 *Rus'*, *Rossiiia* 和 *moskovskoe gosudarstvo*。为了避免不完备的英语翻译语词造成的混乱,在原文是用 *rossiiskii* 而不是 *russkii* 的时候,我将要把英语“Russian”(“俄罗斯的”)一语用双引号(“”)标出(汉语译本里用黑体字,如**俄罗斯的**——译者)。

允许俄国殖民主义逃避后殖民时期分类法的第三个特征和宗主国与殖民地在权力和知识的分配方面的情况有关。从西方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宗主国吹嘘积累了权力和知识,而对于殖民地的统治就是以这个事实为依据的。俄国殖民统治通常仅仅以权力为基础,而不是依靠权力与知识的结合。俄罗斯帝国西侧和东南侧的民族认为,自己在文明方面比宗主国优越。作为被征服民族,他们的心理不同于英国殖民地的臣民。虽然印度人可能认为英国人是对手,还是不愿意地承认他们的文明先进。

现代捷克作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和现代爱沙尼亚作家克罗斯(Jaan Kross)提供了许多见证,指出:在俄国的统治下,殖民地人民觉得自己比殖民者优越。^① 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帝国的某些地方,曾经存在一个特殊的场面:帝国主义者得不到遭受他们发号施令的人民的尊重。在19世纪,俄国文明的低劣观感十分普遍,就连俄国的友人,由沙皇尼古拉出资游览俄国的冯·哈克斯特豪森男爵(Baron August von Haxthausen)也断言:“被俄国制伏的西部国家,大部分都享有比征服他们的这个国家更优越的文化。”他想到的是芬兰、波罗的海各省、波兰和格鲁吉亚。^② 这个硬币的反面是俄国人因为没有受到被帝国制伏的某些民族的理应给予的尊重而引起的恼怒,这一情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这些“西方人”的粗暴态度上。俄国文学中表现、解释、藐视、压制桀骜不驯的“西方人”的尝试,构成了敌视对待

^① Milan Kundera, “A Conversation with Philip Roth,” translated by Peter Kussi, in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translated by Michael Heim (New York: Penguin, 1980); and Jaan Kross, *The Czar's Madman*, translated by Anzelm Hollo (New York: Pantheon, 1993).

^② August von Haxthausen, *Studies on the Interior of Russia (1847-52)*, edited by S. Frederick Starr, translated by Eleanor L. M. Schmidt (Chicago: Chicago Univ. Press, 1972), 310.

19 他者的一个特殊门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包容了对波兰人的穷凶极恶的描写,而普希金和丘特切夫(Tiutchev)则显露出优越感遭受排斥的委屈姿态。较小的作家出言更是直截了当。1939年9月18日,或者说在纳粹与苏联联合入侵波兰之后不久,苏俄诗人阿谢耶夫(Nikolai Aseev)对波兰的失败幸灾乐祸:“波兰只剩下了碎片……波兰人不喜欢我们的风度;这些贵人认为我们行为粗鲁。”结论是现在他们罪有应得。^①

西方帝国主义是部分地起了统合作用的,而俄国帝国主义一向是明显地起离心作用的。英国人首先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英伦诸岛,后来把它变成世界的通用语言。而莫斯科,没有成功地从它统治了几代人时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几百年的土地、民族和部族中打造一个持久生存的文化实体。的确,他们涉及的是拼凑为不同的地区,从中亚到中欧,遭遇到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但是,大英帝国也是拼凑起来的。英国人施用权力的各地包含了相互敌对的文明,就像亨廷顿所说的那种意义;但是,即使是在后殖民时期,它们当中许多地方仍然使用英语。而俄语是没有这样的生存能力的。有些地区虽然采用了俄语,却没有接受俄国的国籍(类似爱尔兰),在20世纪90年代尝试返回本民族语言(并且放弃苏联人推行的希里尔字母表),进展很快。看来,不是帝国的幅度或者多样性造成宗主国的俄罗斯化最终失败,而且还有俄国帝国主义制度的某些内在的特征。

俄国帝国主义失败,也许是因为,比起西方的办法,它过多地、时间过长地依靠了士兵和大炮,没有成功地用思想代替大炮。在它推进俄国文化的时候,其方式令殖民地人民厌恶:亦即浅薄地坚持大俄罗斯的优越地位。西方帝国主义向各地的上层人物提供欧洲知识传统的财富;的确,后殖民研究也是同时起源于西方的大学和其属下的国家的。偶尔有人发出声音,表示担心宗主国因为受到自己“属国”实际做法的感染而不安全^②;但是,西方认识论和社会制度的某些优点还是超越了在国内提出的高尚理想和在国外殖民地暴力残酷现实之间的反差而保持下来。相比之下,在推进俄国文化方

^① “Ot Pol'shi ostalas samaia malost'... / Oni ne liubili povadok nashikh, / Vel'mozhnyi krivili rot.”

^② Leela Gandhi,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88), 134.

面,俄国帝国主义太过专注自身、太神经质、太过喜好操纵局面,在认识论方面,太过贫乏,不能够形成思想,培育文化领域中的拥戴者。印度保留了英国的民主制度、英国式的教育和相当程度的英语,而苏联帝国内部的非俄罗斯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则尽其可能地从自己家乡清除俄国的一切痕迹,因为俄国以沙文主义方式推行俄国事物,俄国事物令他们十分反感。

俄语曾一度在整个帝国使用,现在都被本地语言取代,只有白俄罗斯除外。在乌克兰,语言的近似性造成了某些混乱,而为摆脱俄国的沉淀而作出的意识形态上的努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得到系统的实施,这一情况不能完全归咎于乌克兰的沙文主义。在中欧,对俄国事物兴趣的戏剧般的下降,随处可见。^① 在 1997 年在喀山举行的第二次世界鞑靼人大会上,鞑靼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国内的一个民族共和国)宣布鞑靼语言使用拉丁字母。^② 这样急促宣布语言书写形式分离的做法反映出的事实是:在鞑靼人诸汗国屈服于俄国四百多年之后,俄罗斯人和鞑靼人精英们依然过着不同的生活。^③ 在中亚,经济的考量阻碍了向突厥根源的回归。高加索被迫反抗俄国军事力量的威胁;但是,甚至是在苏联时期,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也保持住了他们自己语言对俄语的优先权,成功地保卫了他们的非希里尔字母。俄语最富戏剧性的衰退也许发生在立陶宛,在这里,希里尔字母事实上已经从公共空间消失。在西欧和美国,也出现了俄语学习人数突然降低,同时对俄国事物兴趣的冷却,这是一种附加的证明:全世界范围对俄国文化的兴趣之部分的基础是对苏联武装力量的正常的尊重。^④

20

萨义德提示,西方文化的统合力量使西方及其前殖民地融合成为一个共同的文化圈,分享许多志向和观念。而在后苏联时期,不断出现的是一个

① 1993 年 8 月, *Clarinet News* 刊载一篇文章,描写索菲亚大学一位俄语专业学生的苦恼。她选择了另一门专业,因为对俄语教师的需求几近于零。1990 年,华沙大学俄语系系主任 Antoni Senczuk 为了保障入学率而开设英语。

② Rimzil Valiev, Rim Sitdikov, and Guelnar Khasanova, “1997 in Review: Tatarstan Faces Challenges,”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31 December 1997.

③ Sabirzyan Badretdinov, “Sincere Soldiers and Naïve Servants,” *Transitions* 5, no. 12 (December 1998), 98.

④ 据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语言教师协会 1993 年旧金山会议声明,1990 年代和 1980 年代比较,美国大学注册学习俄语的学生数量减少 50%。

相反的进程。北约东扩的进程也许是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帝国缺乏统合力量的最雄辩的例证。像曾经身为俄国事例范围一部分的那些民族和国家那样迫切地想要加入北约的国家是很少的。非俄罗斯人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同样努力表明,他们不是俄罗斯,他们有别于俄罗斯。正如戈布尔(Paul Goble)所说,俄罗斯联邦的每一个接续的危机,似乎都把原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更进一步地分开,使得独联体越来越缺乏实在意义。^①

出于这些原因,海希特(Michael Hechter)勾勒出来的关于西方的内部殖民地的民族建设的两种模式是不能适用于俄国的领地的。第一种模式提出宗主国向殖民地传播权力和知识;第二种认为,在民族的发展中,内部殖民主义现象频繁出现。^② 传播模式提出,强有力的社会团组靠社会渗透的办法来吸引其他人群,使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习惯最终被较弱的团组采纳。类似的是,较强团组的经济习惯做法从一个地方向另外一个传播(虽然海希特承认,这种传播的真实运作方式依然是“有些神秘的”)。事实上,劳动的分工拉平了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差别,出现了一个平衡的国家。相反,内部殖民主义认为,宗主国的文化不容易放弃它优越的地位,而倾向于剥削殖民地,而不是努力追求平等。“遭受统治的社会被宗主国判定扮演某种工具性的角色。”^③

21 这些设想中没有一个是完全适用于俄国殖民主义。传播模式是俄国历史学家们推行的,他们振振有词地断定各国人民和民族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俄国的,加入了各民族的“俄罗斯”(Rossiiskaia)的大家庭。但是,研究证明,这是不准确的。就连格鲁吉亚(俄国历史学家偏爱的例证)也不是自愿加入俄国的;它曾经谈判寻求土耳其人的保护,而不是并入俄罗斯帝国。索尔仁尼琴的名言“(沙皇)俄国……没有经历过武装分离运动”和“没有(劳改)营”,是一位大作家不应该有的幻想。^④ 和其他的帝国一样,实际上,变

① Paul Goble,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21 September 1998.

② 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③ Hechter, 30.

④ Aleksandr Solzhenitsyn, *The Mortal Danger*, translated by M. Nicholson and A. Klimoff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14-16.

成沙皇帝国和苏联的一部分的全部非俄罗斯领土都是通过武力或者外交压力获取的,因为这些手段把比较小的民族置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至于内部殖民主义的模式,则是建立在宗主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比殖民地先进的前提上的。上文已经指出,就俄罗斯帝国西部和西南部边缘地区而言,这个论断是不真实的。

这一条关于拒绝同化和崩溃的规则是有某些例外的。在俄罗斯西北部,乌戈尔—芬兰居民在19世纪大体上是已经被同化了的,而在南部和东部一定百分比的突厥居民也被包括进俄罗斯文化身份之中。^① 在别雷(Andrei Belyi)的小说《圣彼得堡》(1916)中,主要人物之一,阿布列乌霍夫议员,就是吉尔吉斯草原某一亲王的后裔,已经俄罗斯化、基督教化,但是他的这个姓氏和长相足以证明他属于那个祖先。这位议员在文化上是俄罗斯人,虽然混杂有“亚洲特征”,而这些特征对于别雷来说乃是俄罗斯文化的一种秘密而普遍存在的组成部分。大体上来说,如果地方上的人同意失去文化身份并俄罗斯化,俄罗斯人是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却混杂着对非白种人的俯就心态)。亚洲和非洲的知识分子是意识到了自己受到殖民主子小看这一事实的,和他们不同的是,中欧和东欧人如果愿意在语言和文化上认同于俄罗斯人的话,他们是受到特别热切的接受的。无须否认的是,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或者爱沙尼亚人脱离本民族获取俄罗斯人身份的做法,俄罗斯人是持欢迎态度的。这些叛离本族的分子不仅被接受为俄罗斯人(在19世纪的印度与英国的关系中,是不可想象的事),而且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的。例证有记者布尔加林(Faddei Bulgarin),冯·施塔克尔贝格将军(Gen. G. K. von Stackelberg)、政治家维特(S. Y. Witte),诗人霍达谢维奇(Vladislav Khodasevich)和拉图申斯卡亚(Irina Ratushinskaia),作家果戈理(Nikolai Gogol')和政治评论员拉齐斯(Otto Latsis)。

但是,在帝国的全部历史中,不认同俄国宗主国的居民的比例一直稳定

① N. Iu. Zograf, *Antropologicheskie issledovaniia muzhskogo velikoruskogo naseleniia Vladimirskoi, Iaroslavskoi i Kostromskoi gubernii* (Moscow, 1890); M. P. Veske, *Slaviano-finskie kulturnye otnocheniia po dannym iazyka* (Kazan': Obshchestvo Arkheologii, Istorii i Etnografii, 1890).

地保持在 50% 左右。在其余的一半中,有一定的百分比宣布自己是俄罗斯人,仅仅是为了适应社会;俄罗斯人的身份对他们不再有利的时候,他们就改变公开的身份。被征服的民族人数太多,不可能迅速俄罗斯化,而且他们也不情愿经受这样的过程;其中有些在地理位置上十分遥远,同化很不容易。俄罗斯人漫无节制的领土扩张也是同化少数民族不得成功的原因;一种发展得相对羸弱的文化不可能吸收太多的东西并将其化为己有。最要紧的是,俄国文化缺乏一种坚实的哲学基础,而这正是西方所大量享有的财富,足以拿来当作为“传播文明”而进行征服的借口。坦率地说,俄国人在 19 世纪的确积累了巨大数量的、可以比喻为爱尔金大理石残片 (Elgin Marbles) 的东西,并且生产出几个天才作家,置俄国文学于世界最受景仰文学行列之中;然而,俄国的哲学思辨依然保持在幼稚阶段,于是,这一事实对殖民地各民族对俄国文化的感受造成影响。在 20 世纪,这一情况更加恶化,是柯拉柯夫斯基所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魔幻思维方式造成的。^① 就这样,俄国缺乏权威——来自能够在殖民地人民当中取得一定程度的赞赏之文化带来的权威。

所有这些细微的权力关系躲开了西方的许多俄国问题专家的注意。西方学者所熟悉的东方主义学术赋予西方强权对于其他地区的地位优越感,认为这些地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低级。通过类比,他们把同样的分类法用于俄国及其属地。例如,肯南 (George Kennan) 在自己的地缘政治学思考中反复示意,俄罗斯帝国的臣民都有点政治的和文化的自卑感。他反对北约向中欧扩展的立场——但是,他是代表了少数派的美国政治家——的根据,就是这些经典的东方主义的假设。^② 对于肯南来说,俄国出自安全理由对中欧和东欧各国的领土提出的各种要求是合法的,这个论据十分类似于英国和法国殖民主义者提出的论据,对于他们来说,保持殖民地是英国和法国保持伟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997 年在美国举行的一次关于北约东扩的辩论上,赞同俄国在军事上维持对非俄罗斯人领土和民族的统治的学者和

^①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3, translated by P. S. Fall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95.

^② George Kennan 和 David Gergen 的谈话记录。Mac-Neil-Lehrer News Hour, 18 April 1996.

声明的殖民主义者态度,发挥了可观的作用。除了少数例外,俄国政治和文化占有中心地位的见解依然控制着美国研究东欧和中欧的学术界,这一见解巩固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亦即在过去的两代人时间之内美国大部分斯拉夫学术研究遵循的“俄国第一”方针所依据的这一观念。^① 情况就是这样,虽然支持北约东扩的人士的名单进入了美国外交《名人录》。俄国优先的局面见于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协会、或者美国斯拉夫语言与东欧语言教师协会的出版物和方针,见于其相应的学刊内容和会议专题讨论的题目:在这两个场合,俄国都被当做似乎就是唯一值得严肃而持续分析和评论的对象。周边地区被看成是多少享受到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创造的丰富知识。尽管后殖民时期的探索意见根本地改变了西方帝国列强的自我阐释,尽管有这样的事实,俄国对自己的帝国主义式的阐释仍然继续被学术界所接受。

把俄国的形象冻结在它的 19 世纪光辉的帝国主义阶段做法积累加出来的结果,造成许许多多人不假思索地、从票面上接受渗透了大部分俄国文学的谦逊无辜的声调——从果戈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拉斯普京和索尔仁尼琴。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对于殖民政策的罪行的自我意识在西方的语境中已经是随处可见。西方和俄国本国对俄国文学的阅读的认知模式掩盖了殖民剥削,强化了俄国文化研究中的一种毫无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而这样的意识有时候被错误地看做是心理学的深刻意义。以殖民地霸权为依据的民族伟大的观点也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明确表述,但是这个自鸣得意的态度的气球已经被戳破,对于他者的压迫和歧视的黑暗面也被揭露。这样的事在俄国并没有出现,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派普斯 (Richard Pipes) 在 1997 年说:“经过加工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依然有效。非殖民化是三心二意的。”^②福特 (Peter Ford) 说:“俄国对于以往殖民地态度的核心是广泛而深刻地坚持的信念,即:俄罗斯帝国给予高加索、中亚和东欧人民的

23

^① 这些主张俄国优先的人物当中为首的是 Stephen Cohen。迟至 1998 年 9 月 14 日 (MacNeil-Lehrer News Hour) 他还强调必须用一切办法帮助俄国,而不计俄国领导集团的政治如何,表现了对于俄国某些地区趋向独立的躁动的忧虑。

^② Richard Pipes, “Is Russia Still an Enemy?” *Foreign Affairs* 76,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7), 72.

是受欢迎的、嘉善的影响。”^①

西方的殖民地与日俱增地对他们往日的主人说理,和他们不同的是,俄国的殖民地一般还都保持沉默,有时候是缺少受过西方教育的民族精英,而一向缺乏的则是与他们相关的问题可能提供的西方学术的那种勇气。他们依然被放置在与俄国有关联的范例中来观察,被当做俄国人感知的对象,而不是对自己的历史、感受和利益做出反应的主体。肯南保持了帝国主义思想家特有的傲慢态度,在评论苏联政策和俄罗斯联邦在将来可能会作出什么样的事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俄罗斯人”。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的含义是,非俄罗斯人不仅不算数,而且不应该算数。^②

忍受霸权的各族人民把讨论局限在外国压迫和反压迫斗争的问题,而不是走向后殖民时期的探索和观点所提供的更为细致、但是也更为肯定的胜利。现在依然不明确的是,探索是否会被检查机构或者各种威胁(俄国文化政治学中一成不变的一个强大因素)扼杀在摇篮里,或者重新评价殖民主义问题是否难以出现,原因就是诸如俄罗斯人统治地区特有的贫困。缺乏这样的探索的情况,在西方是按照这样的一条规则解释的:如果没有探索,那就是没有问题。正如后殖民问题研究学者尖锐指出的那样,谁的地位被降低,在书刊中代表他们的就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别人。虽然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帝国的注重西方的臣民花费精力反抗俄罗斯化和苏联化,但是苏联学者和俄罗斯人却完成了大部分的著述,用俄语书刊提出关于这些桀骜不驯的臣民的公式化形象。这些书刊在西方的传播,是和苏联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合拍的。对于这些公式化形象的轨迹的细致研究著作,还有待写出。

在这方面,后殖民这一评论家的观念“历史是西方用以断定自己对于世界其他各地的霸权的语境”是不正确的。^③ 世界从来就没有分成西方与

^① Peter Ford, "The View from the Kremlin: Russia as Eternal Superpow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nline*, 29 May 1997.

^② George Kennan: "我认为我们评判他们的时候必须谨慎,因为我们必须牢记俄国军队进入欧洲心脏地区是得到了我们充分的同意的。" "A Conversation with David Gergen", *MacNeil-Lehrer NewsHour*, 18 April 1996。又见 George Kennan, "On American principles," *Foreign Affairs* 74, no. 2 (March-April 1995), 116-126。

^③ Gandhi, 170.

非西方这样的清晰的两个部分。二分法的观点漠视这样一个事实：俄国一向大规模努力制造历史，一方面是部分地反对西方创造的历史，另一方面是被俄国殖民化的那些地区的努力保护的历史。在这种努力中，俄国成功地令自己的叙事的一大部分凌驾于西方的叙事，或者把二者混为一谈，或者把它自己的声音当做得到普遍承认的知识或者注解挤压进去。因为是通过一个旁门溜进了西方的语境，所以作为第三个声音的俄罗斯不被明显察觉。

24

俄国有时候被看做是西方的“乡下表弟”：在这里，罗曼诺夫家族和温莎家族的王朝联系，就像俄国上层和西方的其他联系一样，是起了帮助作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俄国人的许多阐释、参照物和特征（以及伴随的先见、爱好和偏见）都被西方的作者内在化，到达了很高的地步，把俄国气势汹汹的自我肯定变得几乎不可察觉。甚至在后殖民时期，在西方的大学里事实上也没有对俄国帝国主义的探讨，这一事实表明俄国辞令功夫的成功程度。在后殖民时期的世界地图上，中欧和东欧、西伯利亚、中亚，以及黑海地区与里海地区实际上都是空白点，其地理情况和文化情况都被纳入“俄罗斯帝国”、“苏联”、“苏联集团”或者“俄国势力范围”之中。美国的最重要的苏联研究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的科恩（Stephen Cohen）的话有案可查，大意是：戈尔巴乔夫启动了俄国和东欧的变化，俄国必定、而且将要重新立足于它被迫放弃的那些区域。^① 俄国的属国依然自愿接受莫斯科的强权这一令人厌恶的虚构保存在像“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国家”和“俄国及其众多的民族”这样的用语之中。后殖民主义研究学者已经解构了“英联邦”，但是，关于俄国，平行的过程还没有开始。殖民地当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对殖民主义的肯定，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就像19世纪的西方殖民地那样。^②

西方殖民强国给予具有本国国籍的成员政治和经济自由，和这些国家不同的是，俄国虽然进入了欧洲帝国的圈子，却在本国依然保留着偏爱俄罗斯文化、但是不给予俄罗斯人公民权利的社会制度。由于缺少欧洲式的社

^① 对于1991年12月1日举行的乌克兰独立投票的一则评论。*MacNeil-Lehrer NewsHour*, 2 December 1991.

^② S. During, "Post-colonialism," in *Beyond the Disciplines: Papers from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Symposium*, edited by K. K. Ruthven, no. 13 (Canberra, Australia: Australia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1992), 95.

会自由,俄国的知识分子常常发出抱怨,说他们在帝国内外的地位不见得比属国人民的地位好。这样的怨言在苏联时期一直延续,索尔仁尼琴表达得最雄辩。这一现象却豁免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罪恶行径的罪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得到庞大而拥戴的读者群这一事实,却得力于苏联帝国的说辞力量和军事力量。在他以前,有很多人竭力吸引西方对古拉格群岛现象的注意,但是因为他们不能跟帝国的威望相提并论,所以没有能够留下什么印象。^①这方面的特权概念完全没有出现在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阐释者的视野,但是,这不过是宗主国享有特权和镇压属国的一个很小的事例。

在帝国空间之内,为了制造威望而战战兢兢地接触现实图景的做法达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1998年5月18日一期的《星火》杂志刊登了一批关于欧洲野牛的文章;文章告诉读者,野牛是已经绝灭的猛犸的亲属,而在波兰—白俄罗斯边界上的著名的别洛维查国家森林里的最后一头野牛,在1919年被杀死。但是,作者接着说,这个情况没有影响俄罗斯的森林,野牛在那里大量繁育。文章接着详细描写把奥卡河畔森林的野牛输送到俄国中部的良赞地区的故事。

《星火》杂志的一篇平庸杂文用野牛的故事娱乐读者的做法可以说平淡无奇,但是例外之处是这点零星的霸权细节排演了经典的殖民主义景象:宗主国中心地区对于边区的优越性,即使牺牲真实也要推进,而且是在那个初看上去幸免殖民主义干扰的区域。文章指出帝国属地的又一个失败,亦即,这种属地没有能力经营国家公园,并指出殖民中心即使在保护野牛方面,也是成功的。但是事实是,别洛维查森林的野牛一直完好生存了几代人之久:1980年有593头,1994年有662头。^②

故事的背景如下。别洛维查国家森林是欧洲一度不可逾越的林地的稀有残余之一。和良赞的森林不同的是,这片森林因野牛而闻名已经有几百年。出于这个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第二共和国政府继承了惨

^① Józef Czapski's *Inhuman Soil* [*Ziemia nieludzka*]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56 by Institut Littéraire (Paris).

^② *Mały Rocznik Statystyczny* (Warsaw: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1995), 44.

遭破坏的别洛维查地区,用动物园里繁育的野牛弥补了缺失的野牛,此后,野牛就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景点。当地的牧人极为认真地看守着野牛。^①《星火》杂志的文章的言下之意是,作为生态学的要地,别洛维查毫无价值,而良赞却恰恰相反。一如帝国与属地的情况,帝国中心办事能力高于属地的成规在这里被包括在一条信息之中,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条信息就像是一个开心笑话。正像大卫·康纳丁所指出的那样,帝国的实践做法之一就是要把帝国的优越融入并不明显涉及政治的问题的信息之中,以一种下意识的方式锤打帝国的优越感。19世纪的欧洲各个帝国都热衷于大规模的这类活动。^②在欧洲殖民主义的语境中,威望构筑者不是野牛,而是国旗、检阅队伍、学校、桥梁、政府、哲学和社会结构。在俄国的传统中,这些事物大部分阙如,所以,在国内外的形象塑造中,必须寻找代替物来代表俄国。关于野牛的文章就属于这一语境。《星火》提供的信息类型是巩固俄罗斯人优越观念的典型技巧。这一性质的暗示和启发散见于大众文化,旨在造成俄国优势地位,压低俄国邻国在文明方面的能见度。野牛问题虽小,却集中映射出这种程序的机制。后殖民研究理论称这种办法是一种文化用术语盗用另外一种文化。

俄罗斯从来没有遭受西方强国这样的盗用。把俄国人包容到西方语境的尝试是在16和17世纪作出的,在前往莫斯科维的英国旅行家和大使们的笔下,曾提这个“粗鲁而野蛮的王国”。^③随着莫斯科维的实力增长和变为俄罗斯帝国,这类的努力终止,阐释随军事的胜利而来。西方从来没有像征服世界大部分地区那样征服过俄国。俄罗斯自身变成了征服者,起初还不动声色,在文化上缺乏自信,后来,随着国土和军队的急速增长,变得日益自我肯定。

这样,在后殖民理论中,对于东方与西方的概念的特殊关注了西方没有成功盗用的文化空间。莫斯科维达到了这类盗用的边缘,但是彼得大帝和

① Peter Ford, "Crossing Europ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nline*, 19 and 31 July 1998.

② Eric Hobsbawn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3).

③ P. Putnam, ed. *Seven Britons in Imperial Russia, 1698-181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2).

叶卡捷琳娜跳出了从西方强加给世界的专有定义之外。在 1795 年吞并了西部的邻国之后,俄罗斯逐渐地接近了西方。接踵而来的是王朝和其他形式的结盟,最后是庞大殖民地欲望的满足,于是这个未经雕琢的莫斯科维演变成一个独特而神秘的俄罗斯。维多利亚女王的亲属嫁给一个印度或者非洲家族这样的事也许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的皮肤是白色的,但是俄国上层社会却乐于如此。叶卡捷琳娜是诞生在一个德意志公国的日耳曼人,但是她皈依了俄罗斯东正教,学会说俄语,尽管说得很糟;如果肤色问题发生干扰,这样的蜕变就是不太可能的。在 18 世纪末期,俄国在欧洲会议桌旁赢得一席之地。俄国统治者们的王朝纽带和发展公共关系的努力以一种新的方式确立了他们和西方的关系。俄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被载入世界历史,不是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或者遥远东方的一个部分(对这个东方可以表现出一种优越感的态度),而是和西方诸帝国几乎并列的伟大的白人强国,这个强国享有它自己衡量它非白人的亚洲征服地的他者性质。俄国在欧洲的征服者的地位不容置疑。启蒙主义作家如伏尔泰或者叶卡捷琳娜本人所设想的俄国的形象不容玷污。在 19 世纪之初,固着在西方人记忆中的俄国的形象已经远远不是英国周游世界的旅行家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的那样的“粗鲁和野蛮的王国”。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在俄国作为几乎平等的一员进入西方语境的时候,俄国作为一个殖民强国的地位却进一步被人忽视。俄国从一个落后的他者变成几乎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一事几乎没有触及西方的意识,因为西方正在忙于工业的增长和自己的殖民扩张。然而,俄国的精英们理解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他们担心关于俄国的感受在欧洲受到危险的衡量,亦即两种形象的平衡:老形象令人想起莫斯科维人被归属于野蛮人的时期,新形象许诺、而且部分地带来了与欧洲出类拔萃者的完全平等。俄国的精英们接受了表面上追随欧洲范例的教育,虽然他们只占人口的不足百分之一,却发出决定性的声音。就像普希金说的,他们什么都学过,读过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书,学会了拉丁文字母,会在书信结尾处写上 vale(再见)。在俄国,模仿西方范例的学校、学术机构、剧院及其他文化与社会组织,凭着强大的意志和努力建立起来。这些机构当中,例如芭蕾舞大剧院,或者埃尔米塔什艺术博物馆,非常成功地把俄罗斯变成为“我们队伍的一员”,抹掉

了它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形象。一种光彩耀人的新文学重新定义了俄罗斯,进一步把以往那个粗鲁无文的国家形象排除。俄罗斯的声音压过了那些要在西方保持其旧有形象的人们的声音:栖息在欧洲边缘的怨声载道的属国的人民;各种各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在为帝国贡献出恰当的辛劳之后病死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之中;还有偶尔的旅行家,如德·居斯廷侯爵(Astolphe de Custine),或者约瑟夫·德·迈斯特,他在圣彼得堡逗留结束的时候改变了对俄国的看法,发现俄国处处都是气度不凡的景象。俄国作家们担当起排挤反对派声音的任务,而西方的回应则是把俄国当成自己队伍的一员来拥抱,豁免了对它的从概念出发的细致考察——而其他的殖民地国都曾受到过这样的考察。

当然,例外总是有的。上文提到的德·居斯廷侯爵写作的俄国旅行回忆录于1839年出版,他试图把这个国家展现在西方知识阶层的眼前。虽然这本书在当时取得了名气,而且一直还有人要复活它,但是它还是没有能够关键性地影响西方对俄国的态度。^① 因此,与西方诸帝国不同的是,俄国并没有产生出对它所制造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批判的态度。

在展开关于俄国文化的谈话的时候,俄国的知识分子是遵循着众所周知的殖民主义路线。他们闭口不谈以某种方式成为俄国的对手(俄国的殖民地邻国)的文化,同时又成功地抵制要把全世界收入自己的文化语言的西方世界的贪婪胃口。俄国在塑造自己在西方的形象的行动中保持了一定尺度的独立性和优越感,而其他的世界性文化一般在这方面都不被西方认可。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关于“俄国是一个秘密”的著名评论揭示出对西方不能解密的一种文化文本的屈服,承认不可能理解隐藏了俄国故事的奇异文字字母。所以,俄国得到允许,存在于一种被“开化的”西方话语称之为奥秘的氛围之一。这种认可安抚了俄国,它的自成体系的文化空间不得入侵。丘吉尔以某种非帝国主义的方式,把决定谁是他者的权威递交给了他者。当然,在这一场合,这个他者是一个帝国,而不是一个殖民地。如此放弃解释权给俄国留下了塑造有利于它自己的形象的手段。西方被俄

^① Phyllis Penn Kohler, ed. and trans., *Journey for Our Time: The Russian Journals of the Marquis de Custine* (Washington, DC: Gateway, 1987).

国的神秘的他者特质镇住,不敢用自己提出的问题来对待俄国故事:这个帝国遏制他者的方式到底是什么?这个帝国是怎样掩盖它对待他者的细节的?在俄国的历史里,哪一部分确实是他者的历史?

28 在过去的二百年里,俄国知识分子精英们一直在协助统治阶级制造花言巧语,掩蔽帝国的种种弱点,隐藏这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家的扩张主义天性。领土巨大,人口很少。俄国文化享有特权,但是帝国各族人民没有被完全俄罗斯化。从18世纪起,俄国的精英们就一直从事寻找庞大国土上全部居民可以共处的共同立场。把建造帝国的词汇,例如 *rossiiskii* (俄国的)、*velikorussy* (大俄罗斯人),注入俄国国内语境,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同时,在帝国边界之外,西方的精英们已经深信,俄国殖民主义不是什么问题。在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里,赞同殖民主义的暗流被揭露、并且受到严厉批判,从而为非殖民化提供一种附加的激励,创造一种健康的气氛,让一度自高自大的文化反省自身。^①然而,这样的事,在俄国,一直没有出现。

俄国历史地理的故事

我对俄国殖民主义文本表述的研究的想法是在我发现一个矛盾的时候形成的:许多美国大学英语系和斯拉夫语系所讲授的俄国文学的标准解释为一方,艾伦·丘的《俄国历史地图解注:一千一百年俄国疆界的变动》^②的解释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矛盾引起我的注意。《地图》表现了一个政治的实体,其地理和行政的成长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虽然17世纪的莫斯科维是欧洲边疆地区的一个默默无闻的、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国家,但是俄罗斯帝国以及后来焊接出来的苏联,却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国,而且是号称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在数不胜数的战争、占领、国际条约、吞并、宣言、偶然的退却等等的引人入胜故事中,俄国的形象渐渐浮现,背景就是俄国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一条河接一条河、一个草原接一

^① Diana Brydon and Helen Tiffin, *Decolonizing Cultures* (Sydney, Australia: Dangaroo Press, 1993), 127.

^②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1967.

个草原地持续的强占。俄国人开启的重大政治改革,改变了他们自己,也影响了各个民族和持各种信仰的人们。这个帝国的臣民的态度和行动受到他们在帝国制度内部所占地位的限制。俄国文学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一种中介的角色。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索尔仁尼琴和雷巴科夫等引人入胜的人物,都是俄国殖民大计划的组成部分。

丘教授的《地图》所勾勒的故事就是俄国向东、西、南、北浩大而昂贵的扩张的故事。在17—19世纪之间,俄罗斯帝国以平均每天55平方英里(大约14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这样的扩张速度带来的后果是被吞并的土地不能充分地俄罗斯化,因而使帝国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在1914年以前的二百多年之中,俄国扩张的代价是要消耗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大得出奇的部分。在1720年,彼得大帝把96%的岁入用于军队。在18世纪,这个俄罗斯人统治的国家的每一百个居民养活三个士兵,而在西欧,相应数目的公民的负担只是一个士兵。^①在19世纪,俄国加强了对以往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和高加索的控制,同时从事对亚洲猎物的“大追捕”。俄国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但是保留一支不成比例的大军却强烈地影响了俄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哥萨克》(1862)中的讲述者就顺便提及,在很多情况下,在高加索,整个的村庄都被重新安置,以便控制本地居民和提供继续征服的根据地。类似的居民迁移也发生在黑海附近、波罗的海地区和西伯利亚。俄国人承受的经济牺牲是俄国殖民雄心的对应生成物,在俄国文学里,那些受难者的言谈语气之中,这种牺牲时常可见。

29

俄国的连续的陆地扩张把无穷无尽的残酷行为加诸到被征服的人民和征服者本身身上。这些粗暴行为被载入帝国的社会记忆和政治回忆之中,也记入地理的分类学之中。只要提到一件事就足够:几百年来,“西伯利亚”一直是和强制劳役集中营联系在一起的。其次,俄国贪得无厌的领土胃口,在俄罗斯帝国、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造成了一种领土贪欲。肖

^① Pipes (1974), 120. 与这样的军事优先并非无关的是,在1999年俄国的预算中,尽管国家花费全部领域都大量减缩,但是有足够的资金分配给了军队,士兵收入增加62%,军官收入增加102%。Michael Gordon, "Russia Offers 1999 Budget", *New York Times*, 11 December 1998.

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1931)表述了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与过多土地相关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沙皇俄国,多余土地的数量使得法律的执行和管理作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于土地多余的某种意识逐渐在俄国文学中成长,产生了小说的情节和对地理的解释(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西伯利亚当做一个惩罚、清洗和机遇的地方)。它可能承担了“看到俄罗斯太大、太富多样性而不能用某种‘合理的’方式来治理”这样的俄罗斯特质的一部分。因此,俄罗斯变成了一个神秘的实体,由命运来决定保持统一和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广漠也受到咎责,因为帝国的无能而恶名远扬,没有办法让它的公民达到堪与欧洲各个帝国相比的生活水平。就俄国历史的大部分而言,从莫斯科郊区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一直都像是边疆。

在俄国文学伟大作品的标准读本中,这些问题丝毫未见反映。俄国文学的人物经验都是从一般的人类经验角度来观察的,帝国主义的因素被剔除得干干净净。俄国和西方的评论家们把俄国文学文本解释为实质上没有卷入俄国的军事事务,从而屈服于这些文本的特殊能力:避开那些强调指出它们为帝国效劳的批评家的敏锐目光。俄国文学一向特别成功地为自己举行、开展和引导一种语境,避免后殖民时代批评家们对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文学的那种穷追不舍的审查。我把这样的解读称为卡夫卡风格,意思是:他们漠视俄国文学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联系,把人物放置在某种无人的境地,和卡夫卡的人物的生活环境不无相似之处。初看上去,伟大的俄国小说具有俄罗斯特征的布景,十分有别于卡夫卡人物行动所在的没有色彩、没有名称的地方。然而,这些作品和卡夫卡作品的共同之处就是存在的无辜和无奈使得阐释集中于命运,而不是帝国权力与心怀不满的臣民之间的空间。我们都希望出现一种探索,探索俄国作家如何构造他们对俄国帝国主义的支持或者反对的态度,他们如何巧言令色地获取帝国的属地,把适应于他者对事物秩序的立场的特质提供给他者。

30

和丘教授的《地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培育出美国人的俄国史观的俄国历史学家们,不是把他们的叙事集中在征服与侵略的问题上,而是关注普通俄国人为征战而付出的代价。这些历史学家当中的某些人成功兜售了这样一个观念:俄国遭受到了空前的外国入侵,而且,这类入侵乃是俄国历史

的一个不幸的常数。入侵的神话塑造了俄国人的生活观和政治行为,而且也是用来针对西方的阐释的。^① 在说英语的世界里,和对俄国的感受强烈联系起来的是遭受牺牲的形象,要想改变这一形象几乎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形象是撒播在各门学问和各种空间的图书和话语固定下来的。因为俄国的领土增长被看做理所当然,几乎就是一种定势,所以反向的过程就被解释为规模巨大的灾难。

和遭受伤害和委屈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丘教授的《地图》表明,俄国的心脏地带,像图拉和良赞这样的城市,像科斯特罗马和沃洛格达等等,从早期中世纪以来,一直也没有遭到入侵。反之,是俄罗斯人常常组织起来夺取其他民族居住的公国,建立军事设施,一旦第一批俄罗斯的卫戍营建立起来,就立即把那块地区加上俄罗斯国土的标签。比其他任何一本图书更有效的是,这本《地图》结束了俄国历遭入侵的神话。《地图》指出,俄罗斯民族的俄国在莫斯科维形成之后,实际上没有遭到外国的占领;1610年波兰入侵和1812年的法国入侵都是短暂的,不过是一队士兵在前往莫斯科的道路上穿越广漠的地区,而无数的俄国村庄和城镇依然按古老的方式活动,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外国士兵,从来没有给占领者纳税。在19世纪初期,骑马行走的平均速度大约是一小时13英里(大约20公里)。^② 波兰对莫斯科的袭击和法国人征服俄国的尝试,都是沿着一条宽度很少超过50英里的通道进行的。而德国在1941年的入侵,虽然在多方面对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都是一样,但大部分被摧毁的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正如戴维斯(Norman Davies)对于一般传扬的2000万俄罗斯人在战争中死亡的记录的著名评论那样,这些人既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2000万,更不是死于战争。^③

当然,这并不是说俄国在二战中没有遭受损失;俄国遭受了损失,而且是

① George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1961); and N. V. 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4th ed.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84).

② Jarosław Czubyty, *Rosja i świat: Wyobrażenia polityczna elity władzy imperium rosyjskiego w pocztkach XIX wieku* (Warsaw: Neriton, 1997), 61.

③ Norman Davies, "World War II: Grand Illusion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2, no. 9, 25 May 1995.

巨大的损失。在拿破仑入侵中也遭到损失,在波兰入侵中损失较小。但是,让我们再来看看《地图》对二战在苏联的局面的描绘。和被德国闪电战完全占领的其他民族和种族比较,在二战中,俄罗斯人得以把大量居民和重工业设备撤离到乌拉尔山以东,他们实际上安全度过了战争时期。俄国科学家没有因为必须和敌人生活在一起而担心。而在俄罗斯本土,德国人止步于沃罗涅日,距离新西伯利亚 1800 英里,他们没有踏进莫斯科一步。虽然被围困到弹尽粮绝的地步,列宁格勒及其建筑物和艺术财宝都保存在俄国人的手里。

31 比较一下东欧和中欧大小城市惨遭彻底摧毁的情况吧:这些城市遭受了外国军队反反复复的抢劫、屠杀以及大炮、炸弹和火器轰击之后的纵火焚烧。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是俄罗斯民族的居民的损失百分比却比邻近各民族的损失小得多。戴维斯提及的古拉格,俄国人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也应该受到注意。列宁格勒各个博物馆的财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减少,随着战利品从德国和其他国家运到那里,这些战利品直到苏联解体后依然把持在俄国人的手里。^① 德国占领俄罗斯联邦领土百分之五不足三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于俄国西部邻国来说,战争延续了六年。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症楼》里,一个学医学的学生,佐娅,和她的一家人因为从斯摩棱斯克撤退到了塔什干而度过战争时期。在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谈话中,她回顾“他们的国家”^②多么辽阔广大的时候,佐娅认为俄罗斯人为逃避危险而完成的这种单方向的流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二战后的俄国文学强化了史无前例的牺牲概念,这一点,除了少数例外,西方学者是接受了的,而且不加丝毫的疑问。

后殖民主义研究对俄国的态度

丘教授的《地图》引发出从俄国殖民经历的观点来看待俄国文学的愿望,但是只有在后殖民理论兴起的条件下,这样的研究才得以实现。西方学

^① Judith H. Dobrzynski, "Russia Pledges to Give Back Some of Its Art Looted in War," *New York Times*, 3 December 1998.

^② Aleksandr Solzhenitsyn, *Cancer Ward*, translated by Rebecca Frank (New York: Dell, 1968), 34.

者们检验欧洲殖民大国和它们在亚洲和非洲征服的土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著作作为我研究俄国文学提供了范例和独到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1994)。

《东方主义》给予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研究这二者一种以往没有得到的激励和合法身份。起初,萨义德为寻找出版社而历经困难,因为这本书的探索对于熟悉西方关于非西方问题的著作的标准方法的编辑们来说,是十分陌生的。但是,在《东方主义》出版之后,大多数书评作者反应热烈,于是这部著作获得大量的读者。萨义德创造了一种探索模式,由此催生出几百本著作。西方帝国的解体,以及对于把一己之见强加给遭受藐视和妖魔化的他者之做法的非法性质的意识正在增长,使萨义德的著作成为、或者接近学术界主要问题的核心。

《东方主义》重新解释了19世纪“帝国主义”作者们制造的一个概念,旨在名副其实地遏制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过程中被武力推进奴役状态的“弱小民族”。在原来的用法中,这个术语指的是由民族志学者、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旅行家写作的一类著作,他们分析并且“遏制了”非西方民族,把他们塞进他们所认定的西方认知方式,或者塞进启蒙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受到歪曲,一是由于分类学家们的局外人的立场,二是由于这些人的学术活动对于帝国的利益没有持以中立的态度,因为他们就是帝国的全权代表人物。作为非西方文化的意义的仅有的说明者(在当时,“本地人”没有反驳帝国)的立场,给予了他们对别人加以分类的为所欲为的自由;还允许他们建构静态的类别,“东方”本身就是一例。

东方主义者孕育的东方,是一个毫无变化的实体,它的居民只能得到整体的评价;而作为个人,他们不过是某些“典型东方”特征的具体说明而已。因此,非西方民族变成被认为在改变环境方面有效的评价性的解释的俘虏。他们都受到自己不能争辩、甚至意识不到的概括标准的定型:东方主义的探索是西方人与西方人的探索,而“东方”前现代的箴言“兼听则明”却没有出现在东方主义者面前。他们不是和东方讨论问题;他们仅仅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讨论这些问题。西方的人类学、语言学和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强化了他者在分类学上被俘获的状态,使他们不能够越狱、逃出东方主义者所制定类

别的牢房。东方主义的解释创造了一种牢笼，而非西方人似乎不可逆转地被关在里面。这是一种论述严密的牢笼，而搭建这个笼子的大手笔文章几近天衣无缝。建立在启蒙主义基础上的思维原则保证了它在近期的未来依然有效。

通过批判个别著作、而不是门类本身来解构这个牢笼，一定是一种庞大的任务；萨义德选择了整体论的办法，对付这个牢笼，而不是对付它庞杂的内容和部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作为不受利益主宰的学术，他开始解构启蒙主义创造的掩饰权力的探索模式。

萨义德最重大的贡献之一是，首先指出一个从事解释活动的群体对于它所解释的对象的影响。萨义德虽然主要谈论法国和英国的东方主义者，但是他特有的轻松的思想（亦即，仅仅流露出可以忽略不计的夹杂的愤怒）与许许多多的情况有关联。上文已经提示，英语国家对俄国文化的解释得益于学者们对帝国的同情，这些学者所给予俄国殖民地掠夺的赞扬，正是东方主义者们一度给予西方征服者的赠礼。直截了当地说，萨义德清扫了道路——亦即研究俄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迟早必定要走的道路；在我看来，走上这条道路，越快越好。

第二步是《文化与帝国主义》完成的。在这部著作中，萨义德提供了他关于帝国主义的醒目的重复性定义：

在某种十分基本的层次上，帝国主义的意思就是算计、移民、占有你本来没有的土地，远方的土地，别人居住和拥有的土地……

我要使用的这个术语，“帝国主义”的意思就是掌管一片远方领土并实行统治的宗主国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殖民主义”几乎一向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后果，就是把移民点强加在远方的领土上。就像多伊尔（Michael Doyle）说的：“帝国是一种关系，或者是正式的，或者是非正式的；依据这一关系，一个国家控制另外一个政治社会的有效政治主权。”^①

^① Said (1994), 7, 9.

《文化与帝国主义》检讨了英国和法国的作家和文化人物,这些人不能被称为侵略主义者,这些人表达了被认为无懈可击的帝国的观点。康拉德说话刻薄:他“从外部”表现非洲和亚洲,努力和帝国统治强加的等级规定保持距离。同样,奥斯丁(Jane Austen)轻微地接触了拥有海外财产的现实情况,她对于回国后的人物的行为的道德评判是不留余地的。萨义德正确地承认了康拉德对于英国帝国征服的讽刺和怀疑,他也清醒意识到了奥斯丁的“道德识别能力”。^① 他提出,虽然利普曼(Walter Lippmann)和肯南养成了某种深度的美国优越感,但是他们二人是鄙视原始的沙文主义的。然而,作为美国命运的言说者,他们被公认为反映了帝国主义思想家们特有的**向无权民族强加解释**的常备心态。^② 同样,虽然含糊不清,康拉德和奥斯丁依然是帝国的发言人。萨义德提供了对这些作家、还有其他许多作家的激进的重新阅读方法。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俄国帝国的话语没有产生这样细致的、自我批评的著述。在俄国,帝国意识在总体上没有受到**成功(并非高尚)使然**这样的认知力的触及。为帝国而使用国家的资源征服愈来愈多的领土、或者坚守非俄罗斯的、或者甚至非斯拉夫的土地——对于这样的做法的必要性或者智慧,没有一个有名气的俄国作家提出过疑问。对于殖民暴力的道德的模糊性,也没有人质疑。19世纪伟大的俄国作家在其作品中绕过他们政府发动的战争造成的种种现实,如此轻松,在西欧国家,是没有与此雷同的现象的。俄国作家或者知识分子也极少论述俄国在被征服地区实施的帝国政策的现实。关于索取赔款的消息,如果某一个俄国知识分子敢于提及,那恐怕(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就会危及这名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前途。关于对殖民地的依赖和被征服民族付出的代价的观念,从来没有深入俄国国内的探索。虽然许多俄国作家善于作出道德辨别,但是他们仅仅是从他们的帝国大厦内部书写,就像英国人对于国内是否公正花费从海外奴隶劳役榨取的收入而痛心疾首一样。俄国文学对于像阿卡吉·阿卡吉耶维奇(果戈理短篇小说《外套》中的人物——以下人物注解均为中译者所加)、或者比较近期的伊

① Said (1994), 84.

② Ibid., 285.

万·杰尼索维奇(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人物)和安德烈·古希科夫(拉斯普京小说《活着,可要记住》中的人物)表现出很大的同情,但是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悲惨的人物仍然受益于帝国,就像不幸的麦考博(英国作家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同样是这类受益者一样。^①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有感受到他写作关于道德困境的小说,而他的读者在国外却忙于暴力行径这样的啼笑皆非的境况。既然缺乏对于殖民地罪行的意识,所以几乎不能期望俄国舆论界会善意对待《文化与帝国主义》、或者接受这部著作的深刻见地,而不提出抗议。

34 还有另外一个困难。所有重新塑造和阐释的这种东方主义引发出许多不同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偏于抽象层面上的意义,这是想要见到其各种概念以平易面目出现的读者所难以接近的。后殖民理论引用了很多的后现代哲学和心理学的资料,这样的理论来源比较传统的俄国作家对它持以抗拒态度的原因。除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个别情节(从来也没有融入批判主流)之外,俄国的文学评论很少吸收新颖的思想,更偏好参照已成定型的范例。^②还有,有些知识分子拒绝走出极权压迫同样地证实了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这一观念的界限。虽然与苏联极权主义有联系的许多问题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文学研究中,这些问题应该包容在后殖民理论揭示的更广阔的文本解释之中,因为文学研究设计文本,而不是直接设计世界和社会。因为缺少揭示俄国文学在维护俄国帝国利益方面的中介作用的探索,这一情况跟19世纪西方对东方的探索有相似之处。

在培植对于俄国殖民扩张和暴力的意识的抗拒态度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遗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1932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之后的两代人的时间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俄国文学写作的必须遵从的方法。鲜有例外,依靠地下出版发行(samizdat),传播范围有限,不可能改变语言的使用和已经在俄国文化中内在化的认知方式。在本书第五章里要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制规范影响了俄国作家描写的题材范围和他们使用的词

① Ryszard Kapuściński, *Imperium* (Warsaw: Czytelnik, 1993).

② E. M. Thompson, *Russian Formalism and Anglo-American New Criticism: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Hague: Mouton, 1971). Iurii Lotman is likewise an exception.

汇。这些规范也影响了叙事方式,使得后殖民批评门类难以同化。尽管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出现了许多否认、修改和刷新,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依然是一件紧身衣,俄语语言,还有俄罗斯人的思维,都被成千上万的作家、演说家和记者强行穿上了这件控制狂人的衣服。在他们的领导下,人类经验的许多完整的领域都从语言、乃至意识与文化中消失。

在描述民族忠诚和帝国内部非俄罗斯人对俄罗斯人的感受时,俄罗斯作家和批评家们的词汇简单得惊人,虽然不能说原始。对于这些问题的原因的任何思考,事实上,任何认识论的反思都是没有的。通过歌曲、电影脚本、小说、诗歌、戏剧,还有文章,苏维埃俄国的作家在俄罗斯语言中刻印了俄国人以及他们的忠诚感的粗糙的情感面目。除了少数的例外,俄国知识分子对这种简单化的现实面目施用一种固定的解决办法。俄国政治人物在演说和发言中反复排演这种面目的现实,一再充实其声誉与权威。结果,今天的俄国读者就在塞满歌颂祖国的神话的语言和文学场景中成长,而俄国作家的民族义务观念依然滞留在领土和殖民主义的范围之内。俄罗斯语言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即排除、拒绝与对祖国(rodina, otechestvo)的热爱不相容的概念和思想。这样的爱被理解为一个良好的俄国人以不容置疑的忠诚加以对待的首要价值观。

苏维埃和后苏维埃俄国的农村作家参照这样的语言和概念的材料,创造的人物可能是18世纪爱好说教的寓言作家们孕育出来的,因为他们也颂扬俄国和俄国的魔幻的魅力。在文学讨论中,俄国知识分子仍然恪守的概念是,在俄国,无须西方开发出来的法律机制与机构的框架就可以获得自由。^①一位后苏维埃时期的知识分子,阿维林采夫(C. C. Averintsev)说,俄国人“不相信机制所保证的自由”^②;乌沙科夫(V. Ushakov)告诉读者,俄国不会作出尝试通过理性分析来理解这个道理。^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文学报》和《星火》杂志(在政治光谱的另外一端还有《文学

35

① A. Filippov, "Smysl imperii: k sotsiologii politicheskogo prostranstva," S. B. Chernyshev, ed., *Inoe. Khrestomatiia novogo rossiiskogo samosoznaniia*, vol. 3 (Moscow: Argus, 1995), 421-76.

② "Umom Rossiia ne poniat'," *Literaturnaia gazeta*, 5 April 1990; and "Otvuki velikoi frantsuzskoi revoliutsii v russkoi kul'ture," *Novyi mir*, no. 7 (July 1989), 185-87.

③ V. Ushakov, "Nemyslimaia Rossiia," in Chernyshev, ed., *Inoe*, vol. 3, 393-420.

俄罗斯》)对俄国的特征展开了漫长的讨论,还出版了谈论这个问题的许多著作。就总体而言,讨论是在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加工变得可以接受的术语范围之内进行的。^①

《东方主义》缺乏连贯性,不善于遵循——遑论创造——包容一切的后殖民研究的方法论,关于这一点的评论已经很多。^②但是,应该汲取的是,一个研究领域的创造永远是直觉的和不知不觉的;方法论还在其次。萨义德曾经反复地说,他错过了本质主义的视角,但是在他的论述中,有时候他是十分靠近了这个视角的。他对法国东方主义者的研究多于英国的东方主义者,而他对东方主义类别的构建带有本质主义的浓重色彩。这也许意味着,在真正开拓性的著作中,某种形式的本质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萨义德没有局限在民族群体之间的权力与非权力的关系上。在1994年写成的《东方主义》的后记中,他提出走出权力范例之泥沼的途径:我们大家都在斗争,要脱离促进产生帝国主义的那些问题,我们构建对于人类同伴的回应的方法是令诸如种族、民族和社会地位等的因素变得无足轻重,而文化则被通过后工业化的世界的流动知识分子提供的一种教育吸收和自由交易。这或许是空想,但是依然值得讨论一番。正如凯诺万(Margaret Canovan)所指出的,西方民主国家在他们的边界之内保持没有歧视性的法律,但是他们对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关闭了这些边界。因此,保持涉及民族背景或者种族的非歧视性的法律却是依据对于民族背景或者种族的歧视。^③在关闭的边界的内部,当然,非歧视法律被供奉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体系之中,然而,是否付诸实践还要靠个人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求助于开展这样一种斗争的中世纪基督教方法论,所以又一次触及他在别处否认的本质主义。他引用了一位12世纪修士的话,这个修士奉劝那些寻求完美的人放弃表现为对自己家乡土地之爱的自爱。这个修士说,只爱真实的邻居的那些人算是走上了推向完美的道路,而把整个大地当做自己家乡、把每一个人都当做邻居的人,才是真正完

36

① O. N. Trubachëv, *V poiskakh edinstva* (Moscow: Nauka, 1992).

② 参看 Bart Moore-Gilbert, *Postcolon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98, 34-73) 中对 Said 著作的批评。

③ Canovan, *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

美的。萨义德在放弃首先产生了东方主义的启蒙主义思维方式的同时,更多地遵从了更早期的、前笛卡儿的理性;作为一道潜流,这一理性穿越了全部的西方历史,一直抵达后现代时代。

《文化与帝国主义》是用一种挑战意味的风格写成的,对理论的贡献甚至不如《东方主义》突出。萨义德的探索超出了文学的范围,甚至涉及了威尔第的《阿依达》和美国论少数民族的著作。在这里,他发现了隐藏着一层殖民主义的设想和家长式的狂妄傲慢。他单枪匹马地尝试要改变美国文学批评的基本方向,实际上是美国人看待他者的方式,在规模上是可观的。在后殖民探索中,现在作为标准的许多批评类别都源于萨义德。

追随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作者,可以区分出注重或不注重民族出身这两类人。但是,伴随民族特征的神话与象征和导致殖民征服的侵略战争之所以见于后殖民写作,仅仅是因为这些因素令作者在“我们”和“他们”、或者在殖民者和遭受殖民待遇者之间作出某种更清晰的区分。很少强调一个民族的构成成分因素,这是一个标志:表明对于西欧的定型的民族特性和在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数量上巨大的民族的特征(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来自这两个方向)的民族主义者的兴趣已经耗尽。令后殖民作者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民族特征,不如说是种族:一种反向的种族主义。在这方面,对俄国的殖民主义的研究有所不同,因为是民族特征,而不是种族特征,在俄罗斯帝国心态的形成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扩张的过程中,俄罗斯人常常遇到自成一体的民族,而不是部落式的组织,因此俄罗斯帝国之内的反殖民斗争常常采取民族斗争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在亚洲和非洲产生的反殖民运动对民族凝聚特征采取漠视态度,因为民族特征不是马克思主义很注意的一个类别,因为在苏联时期,俄国在财政上和军事上支持反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反殖民主义者来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十分方便:作为一个国家,俄国是一向深入地从事这样的活动的,而在俄国势力范围之外,它明确否定这种活动。

对后殖民理论(就其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形成的情况而言)作出贡献的主要人物都是亚洲人、非洲人、西印度群岛人,或者,从萨义德的个例来看,还有阿拉伯人,这一事实带有它本身的理想化的正义的尺度。特别是在涉及印度和巴基斯坦方面,帝国发出强烈的反驳,不可逆转地闯进宗主国的

语境,把它改变得难以辨认。对中心予以应有的注意,因为它对给予自己的批判持欢迎的态度,显示出了欧洲文化产生的知识分子榜样的某些持久的特征。允许斯皮瓦克或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作出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西方学术的回应,就跟邀请波兰人或者立陶宛人在俄国的大学开出关于俄国帝国主义的课程一样。而后者这样的项目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昭显了西方语境的相对的开放性和俄罗斯联邦对学术的持续的、自我强加的压制。这一情况还提示,在俄国文化中存在着有待揭示的妨碍实现这样的对位(counterpoint)的因素。俄国知识分子拒绝讨论殖民主义问题的态度,显示出俄国传统中缺乏宽容和试验的气度。在俄国的文学刊物中,后苏联时代对俄国历史的争论注重的是陈旧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而不是俄罗斯人和其他人的互动。^①

理想化正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涉及后殖民探索产生的概念结构。后殖民批评家的不同文化背景使他们能够创造一大批学术著作,其概念的根源远远超过了标准英语。他们扩大英语语言的范围,有时候几乎对它施以暴力,迫使它接纳其基础结构所不习惯的概念。当然,这一过程始于德里达;在他为摧毁西方本体论所作的有意识的努力中,他采取的策略是删除意义虽然已经“无效”却还得使用的词汇。后殖民批评家同样改变词汇和短语、亦即英语句法的意义,使用新词汇和双关语。事实上,使用双关语已经成为后现代批评家的标志。现在,在论文和讲演里,不同寻常的或者不可预料的词语搭配,是可以接受的,就像一代人以前引用法规的情况一样。批评家们显然乐于把词语从习惯的词典位置中拉出来,投进以往没有被占领的空间中去。试看巴巴的文章“DissemiNation”;或者后殖民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把名词“世界”当做动词使用,例如“把第三世界的妇女世界化”^②;或者像“Re-Sitting Queen’s English”这样的标题。^③

① 在这方面,典型的是 O. N. Trubachev, *Poiskh edinstva*。

② Gandhi, 89.

③ Homi Bhabha,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and Gillian Whitlock and Helen Tiffin, eds., *Re-Sitting Queen’s English: Text and Tradition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msterdam and Atlanta: Rodopi, 1992).

这样的策略得到认真的采纳,而且后殖民批评家们还加以理论研究。《帝国回信作答》(1989)的作者们提出两种基本的策略,对于英语适应来自各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检验和见解甚为重要:其一是**废除**,其二是**占用**。废除是指“拒绝帝国文化的范畴,它的美学、它的规范或者‘正确的’用法的虚幻标准,以及它对‘刻印’在词语之中的传统固定意义的设定”。占用是指“语言被用来‘承受’一己文化经验的过程”。^①在前大英帝国,这种后殖民语言被叫做“小英语”,以区别与作为以往殖民者通行证的标准英语。继而出现的就是融合的用法,一种语言,或者几种语言的句法的或者语法的规则对另外一种的重叠。有些评论家考虑,此种融合的“小英语”出现,是因为非西方作家偏好换喻,而不是隐喻,隐喻实质上是一种西方的转义词。埃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写道,如果把文本的转义当做换喻来读,读者就变得更加容易适应于穿越其中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力量。^②而且,出现在“小英语”里的语言的重合本身就是换喻的:这就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德里达式的区分。

后殖民批评家们无视西方传统中习惯的探索分类法,名副其实地把诗歌技巧使用于对哲学要点的辩论之中,用明显的性别语言令尚未入门者震惊。后殖民小说家跟风追随。^③他们说,采取这些做法有充分的理由。殖民者常常把遭受殖民统治的人看做具有女性特征,而被受压制的男人有时候默许强加给他们的女性化形象。在东方主义者的著作中,性别的统治和政治的统治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④这里有女权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接触点之一:在殖民主义讨论中女性特征的降格遇到反抗,这就是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的兴起,这些研究解构了殖民主义者的傲慢与专横。

38

在理论家当中,巴巴似乎特别喜欢对语言施加某种权力,这是殖民地主人一度施加于巴基斯坦人头上的权力的逆转。在巴巴的写作中,几乎没有一句话不是依靠了特殊的用法的。(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样的用法是一个

① Bill Ashcroft et al. , *The Empire Writes Back* (London: Routledge, 1989) , 38-39.

② Ibid. , 52.

③ 过去在诗歌领域里常常使用:像“短小的空间”,或者“半个世界”,大量出现在散文叙事之中。Edgar Mittelholzer, *My Bones and My Flute*(London, 1953) , 43.

④ Gandhi, 99-100.

苦涩的提示:尽管它包含有思想,但是标准英语难以适应借用于其他语言和其他文明的语言结构,因而迫使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遑论非母语使用者)陷入不舒适的局面,因为不能像以往所理解的那样以帝国为中心,而必须保持小心翼翼,以防理解错误。硬币的反面是,标准英语建构了人类的经验,这种建构同时也排除了这些经验中相当可观的部分。巴巴这样定义文本的性质(textuality,后殖民讨论中的关键词汇之一):(文本的性质)“是一个有活力的方阵,它确定‘社会的因素’,将其变为行动的目标……不单纯地是二流的意识形态的表现或者事先提出的政治对象的语言表征。”^①这一情况提醒我们,曾经一度被认为普遍真理的启蒙时代的分类法,现在已经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在核心空间,亦即在语言上,对核心加以训导,也许是一种杂交文化的迹象,萨义德视其为值得欢迎的后殖民时代的前景。在这方面,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已经跟进:他们的文本力求适应那些以前被排除的空间,而这些空间是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一直想要多少表现出来的。

另一方面,来自亚洲的主要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者都清醒意识到了西方文化制度和理论实践的重量,他们有些人还意识到,这些制度和实践方式是不能够被搁置一旁或是不予理睬的。因此,斯皮瓦克制定出和西方语言学和哲学方法论交流、而不是唾弃的策略。她很善于把各种认识论系统结合起来,不回避不连贯的情况存在。她用地道的英语(还有她的令人钦佩的坦率),作出评论:后殖民探索是“对于你不可能不需要的事物的持续的批判”。^②她正确地提示,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基础在于愤怒,但是这种愤怒不是它唯一的或者甚至决定性的根源。后殖民批评家指出的启蒙主义思维中的缺陷是真实的、严肃的,值得注意。因此,后殖民主义研究纳入了对于启蒙主义的评判的更广阔的洪流,而这一评判是20世纪后期学术生活的特点。

有意思的是,甘地把浪漫主义,后来还有新批评看做是后殖民理论的源头。她指出,新批评派注重从释义学角度和“真实生活”的影响隔离开来的文本,这一态度也出现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之中,而且对文本

^①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23.

^② Gayatri Spivak, “Neocolonialism and the Secret Agent of Knowledge,” quoted in Moore-Gilbert, 78.

特点采取了某种着魔的态度。同样,浪漫派拒绝参与工业化的丑陋世界,也类似于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向文本特质的隐退。^① 文本变成了从社会萃取出来的价值观抗议栖息的避风港。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硬性切分经验领域的习惯也是启蒙主义的发明。

但是,要重复的是,这些交流是与西方及其殖民地有关系的。俄罗斯人强占的各个地区还没有产生出反驳帝国的声音:实际上,政治条件还不利于这样的声音大规模地发出。后殖民探索在俄罗斯联邦如何发展,或者,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发展,都取决于以往和现在殖民地的男女(包括联邦内部的白人移民群体)明确他们谋求特质得到承认的意志和意愿,而且这样的承认不能够重复外国压迫和本地反抗的、业已过时的定型。反对俄罗斯人的军国主义文化,最好不是通过武器的力量,而是在理论上拒绝被吸进 *rodina-otechestvo*(祖国)神话的流沙旋涡之中。

在这方面,应该注意到,有不少后殖民批评家反对把殖民概念扩大应用范围,而只限于西方的领地。还有人反对把移民文化——例如,澳大利亚和北美——视为殖民领地。^② 但是,正如提芬(Helen Tiffin)指出的,这些移民群体的特征,或者至少是感受,“部分地是被欧洲殖民主义的统领权力构成的”。^③ 后殖民批评家们抵制看待澳大利亚具有殖民地经验的态度(在非白人居民当中)来自白人享有特权地位的总体的感受,还有妇女的特权地位,她们的流动(对于殖民经验至关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愿的,所以不能和强迫黑人奴隶或者印第安人变换居住地和生活方式相比拟。还有,在征服殖民地过程中涉及的军国主义政策对移民的影响,不同于对当地人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可以总结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类型和等级的殖民地依赖性,全部都需要细察。有些白人移民是被判处发配的罪犯。海希特的《内部殖民主义》指出,英国殖民主义不仅影响了海外的领土,也影响了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有些批评家注意到,像魁北克,或者,甚至整个的加拿大,从一种观点看,可以被视为后殖民主义的,从另外一种观点看,则是新殖

① Gandhi, 160.

② Ibid., 168-69.

③ I. Adam and H. Tiffin, eds., *Past the Last Post: Theorizing Postcolonialism and Postmodernism*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1990), vii.

民地。既然加拿大的身份被淹没在英国的身份之下，则这一地区的印第安诸民族有被另外一个、或者多个遭受殖民待遇的民族的殖民待遇。^①

40 后殖民时代的“政府”对于澳大利亚白人或者不列颠列岛的非英格兰人的后殖民要求的抵制力度可以说明，在关于殖民主义的辩论中，俄国人在东欧、中欧和亚洲的殖民推进一直被忽视。出现在那里的白人对白人的殖民主义不适合像巴巴或者斯皮瓦克这样的非白人理论家构建的殖民理论。作为帝国的官员、囚犯、或者自由移民，澳大利亚人和北美人得到的安置是半自愿的，而他们也迁移了各个地区的土著居民。但是，遭受俄国军事征服的数百万非俄罗斯人白人，和亚洲与非洲的各民族一样遭受了作为传统殖民主义特征的种种强迫和压迫。他们常常按殖民主义者的意愿被迫离开祖传的土地。除非他们停止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并且开始代表莫斯科的利益，否则，在俄罗斯帝国内部和后来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部的领导职位，他们就休想获得。^②

不可思议的是，屈服于俄国或者德国（或者往昔几百年的土耳其帝国）殖民狂热的欧洲白人，绝对是最后才醒悟他们事实上曾经是殖民地臣民。他们一直把他们俄国的或者土耳其的或者德国的占领者看成在战争中打败了他们的国家。他们还没有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世界，尽管他们本民族的文化鼓励他们以堪与西方认识论比拟的方式宣讲这些问题。他们的沉默是有后果的。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殖民狂热完全离开了像甘地这样的后殖民主义评论者；甘地甚至反对把移民文化纳入后殖民主义的语境，更不用说承认现代欧洲诸帝国的白人对白人的殖民主义了。俄国在高加索、黑海地区和中亚的殖民活动被同样地漠视。上文已经提及，苏联在抨击西方殖民主义中扮演的模棱两可的角色和沙皇俄国躲避严查的本事都推迟了这样的一种认识之来临：殖民主义不仅局限于西方在亚洲和非洲的扩张，而且也在欧洲作恶。

有些作者深入研究西方帝国主义得出的见解可能会软化或者改变它，

① Moore-Gilbert, 10.

② 在玛丽亚·达布罗夫斯卡 (Maria Dabrowska) 的大河小说《黑夜与白昼》(1934) 中，有一群波兰大学生聚集在一起阅读禁书，他们知道指向社会进步的道路对他们已经封闭，因为他们是波兰人，不是俄国人。小说的情节发生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他们创造了**殖民依赖**的概念。^① 根据这一模式,对边远地区的经济剥削不限于直接的资本转移,而且也表现在殖民地和属地遭受到的种种强令,必须按照这些指令来发展他们的农业、工业、文化、民族构成模式和消费习惯。宗主国中心制造这类的殖民依赖观念,一向是俄国帝国主义的首要特征,尽管在苏联时期作出了某些意识形态的修补。由莫斯科命名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被改变成为俄罗斯纺织厂的原料生产基地,因而扫荡了乌兹别克的农业传统,化肥和杀虫剂污染了土地,把咸海变成了一个盐碱沙漠——这是教科书中有关这种依赖性的一个例证。在1922年阔尔巴西(Quorbashi)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乌兹别克丰富的农业开始被严格改变成为单一生产棉花的国营农场。地方政权大力协助,用最彻底的殖民主义的办法,从而使宗主国能够推卸责任,向全世界摆出一副无辜的脸色。乌兹别克的果园式种植园被改造成了棉花地,用该地区有限的水资源灌溉。这个模式延续了几十年。棉花的丰收足以促成在俄罗斯心脏地区(在伊万诺沃)建造巨大棉纺厂,给几万个俄罗斯人提供工作,给苏联红军提供军服。乌兹别克的棉花,只有2%到8%在本地加工。但是,原棉向俄国工厂的运输只占乌兹别克在这一巨大产业成本的一小部分。这一关系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居民迁移、农业就业减少、土壤和水的空前的污染以及以后年代里乌兹别克人的健康问题。过量而且很不妥当地使用杀虫剂和化肥,把乌兹别克的绿洲变成了污染严重的荒漠,不再适用于发展农业。到了灾难变得十分严重的时候,宗主国媒体才开始关注,一个调研使团从莫斯科派到乌兹别克,记者开始收集记录事实经过和细节。在他们的报告里,俄国驾驭和削弱领地的帝国主义积习依然被掩饰,不见踪影。俄国舆论界继续抵制引进切实针对殖民主义的术语。这场灾祸的责任推卸给了苏联时期经营不当和当时的国家制度。^②

41

^① Fran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ated by C.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1968), 101.

^② Georgii Shengeli, "Aral'skaia katastrofa," *Novyi mir*, no. 5 (May 1989), 176-181.

俄国的自我表述

现代俄国一直避免使用西方的术语,以便于自己可以对西方施加压力,不仅用军事力量,而且也通过文学和艺术。这当然不是指某种柏拉图式的条目“俄罗斯”可以发挥作用,给局外人创造一个自我形象,或者俄国是在与西方文化在文化上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然后用独特的论调攻击西方。从浪漫主义时代起,19世纪的欧洲文化潮流就进入了俄国文化,而这一情况又加强了俄国对西方消费者的吸引力。但是,有一点是不应该过分强调的:西方知识的系谱和俄国的有天壤之别,而俄国在吸收西方潮流的同时却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西方哲学的轨迹在俄国从来没被俄国精英们复制或者内在化。尽管黑格尔对俄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俄国的精英们却缺乏接受他的某种哲学上的准备。在黑格尔登上舞台的时候,两千年的哲学思考,包括中世纪的逻辑思维训练,都成为西方认同的特征;为接受黑格尔而必需的这类准备和俄国擦身而过。理性逻辑、启蒙的多样性和早期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基础,都没有能够把俄国文化推进到在西欧和中欧文化中可以观察到的那一程度。在以前的一本书里我已经谈到,有关认同和非矛盾的原则,俄国人接受得很少。另一方面,俄国的精英们得益于东正教的精神资源、萨满教和自己的本地直觉,这一切都注重悖论思维,和后续的黑格尔影响结合得很好。^① 这些认识论的基础促成了俄国自我造成的形象,这个形象把脆弱和力量、朴素和高度文明、纯洁和凶横都结合起来。^② 俄国的探索把一己大体上放置在一些概念界定的文化空间之内,这些概念就是牺牲、创造性、爱国贡献和君权的金碧辉煌。固着在西方记忆之中的归于俄国的形象是一个殉难者的形象,这个殉难者是一个具有巨大创造力的、

① Nikolai Berdiaev 是第一个观察到这一点的人。Berdiaev, *The Russian idea*, R. M. French 英译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Berdiaev, *The 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 R. M. French 英译 (London: Geoffrey Bles, 1955); G. Gorer and J. Rickman, *The People of Great Russia* (1949) (New York: Norton, 1962), 187.

② E. M. Thompson, *Understanding Russia: The Holy Fool in Russian Cultur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

辉煌的、在地理上广阔无垠的国家，遭受多种不幸，但是拥有一种可观的文化能量，以及对祖国（*motherland/fatherland*——英语中两个词语，直译为“母国/父国”）深厚的爱。

叶卡捷琳娜（她扩展了帝国边界，使俄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主角）以降，俄国做出的大规模文化努力在俄国文学中得到反响，可以和英帝国的事业成功在英国文学中造成的反响的方式相比拟。俄国对邻国的兼并带来的经济利益促使叶卡捷琳娜施展宏图，要重塑俄国文化，意图在于使俄国文化和欧洲文化并列。^① 叶卡捷琳娜取缔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希腊天主教会，她没收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天主教徒的财产，赠送给俄国国家和俄国东正教会。后来的沙皇们没收了一切与帝国西部诸省起义有联系的个人和机构的财产。波兰 1863 年起义以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全部罗马修道院和隐修院都被取缔，绝大部分天主教会的财产都被没收。数万人被投入帝国监狱，不可挽回地破坏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劫掠了千千万万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家庭，却让本地的俄罗斯人坐集战利品。近期的档案资料公布了在俄罗斯帝国西部地区迫害天主教徒的细节；各卷资料列举了几千个档案文件，记载的都是对天主教教区、修道院和隐修院的骚扰和剥夺。^② 而西顿—沃森已经指出，打败波兰人之举“提高了俄国人在欧洲的威望”。^③

俄国和外国读者是从俄国文学中简单歪曲的只言片语中得知这些事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嘲笑波兰人，言下之意是，在 1863 年起义之后，波兰人是自愿到西伯利亚去的，作为领取薪水的帝国官员，而不是政治犯和遭受放逐。其他的作家也同样语焉不详。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1862）的一个场景里，基尔萨诺夫走进他哥哥的女友费尼奇卡占用的房间，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叙事者提及：“墙边摆着后背像七弦琴

①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卷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84), 86-90; Tadeusz Borowski, *Pamiętnik mojej ojczyzny*, vol. 2 (Warsaw: Pań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 1979), 223, 441-522; Pipes (1974), 118-119。对于这些掠夺的认识表现在 Adam Mickiewicz 的《闺房》里（1832）。

② Marian Radwan, ed., *Inwentarz materiałów do dziejów Kościoła Katolickiego w Rzeczypospolitej i w Rosji* [Inventory of materials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Polish Republic and in Russia], 3 vols. (Lublin: Instytut Europy Środkowo-Wschodniej, 1997-98)。

③ Seton-Watson, 435。

形状的椅子,是已故将军在波兰战役期间带回来的。”^①已故的将军和巴扎罗夫一起,在1830年参加了镇压波兰起义的行动,在那里,俄国军队不是购买、而是抢劫东西的。我们从别处知道,巴扎罗夫参军当军医的时候是一文不名的,而在退伍的时候已经购置了小小的地产。屠格涅夫小说的英语译本模糊了这个问题,没有能够解释清楚俄国军事征战带回来的物品的来源。^②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经典的场景,即帝国把自己的话语强加给了被打败的民族,又把他们的故事从记忆的历史里剔除出去。

让我们看看基尔萨诺夫将军和巴扎罗夫医生在波兰发财的背景。1831年10月31日,波兰起义被彻底镇压,沙皇尼古拉一世发表了“关于西部省份个体农庄主和公民的敕令”。敕令允许大地主保持他们的土地和农奴,而剥夺了小贵族的房屋和农庄,把他们逼进丧失土地后的贫穷。^③就这样,许多“后背像七弦琴形状的椅子”在那个时候易手,但是条件不是自由贸易。在比较次要的作品中对这类事件的记载,在韵调上有点儿像是法农的《世界上受苦的人》。^④这些著作没有和西方后殖民主义研究合拍这一事实,昭显了俄国高度控制西方对于自己的研究的能力。肯南又说:“俄国对西欧的扩张有两个重大的时期。一个是指在叶卡捷琳娜治下,但是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那是王朝变迁的政策,并没有太多地影响人民,亦即这些国家之中的普通人民。唯一的问题是,谁是他们的宗主。”^⑤具有肯南等级身份的外交家竟然当众表达出这样的怪异的见解,这件事本身就表明,西方对俄国的研究受到思想体系的高度钳制,这一领域之内的权威

① “Vdol’ sten stoiali stul’ia s zadkami v vide lir; oni byli kupleny eshche pokoinikom generalom v Pol’she, vo vremia pokhoda.” Ivan Turgenev, *Sobranie sochinenii*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hudozhestvennoi Literatury, 1961), 149.

② Ivan Turgenev, *Fathers and Sons*, edited by Ralph E. Matlaw (New York: Norton, 1966), 27.

③ Seton-Watson, 280-88; and Andrzej Nowak, ed., *Kronika Polski* (Kraków: Kluszczyński, 1998), 431.

④ Juliusz Slowacki 的《安海利》尖锐表现了属国人民的失望和愤怒。作品是在法农作品之前一百多年写成的,使用了不同的体裁(韵文),表达遭受奴役的人民的失望。Juliusz Slowacki, *Dziela wszystkie*, 卷3 (Wrocław, Ossolineum, 1952)。Dorothea Prall Radin 英译 (London: Allen & Unwin, 1930)。

⑤ Interview with David Gergen. See n. 19.

们无视并非来自西方和俄国的资料所提供的见证。可以把肯南比拟为 19 世纪的英国东方主义者克罗默 (Lord Evelyn Baring Cromer), 对于他来说, 东方人就是必须加以治理的物料, 不是拥有自己合法安排事务和志向的臣民。

本书第四章将要指出, 俄罗斯帝国非白人地区中俄罗斯人的殖民存在也同样造成了对于非白人“本地人”在文学描写上的歪曲。巴德列基诺夫 (Sabirzyan Badretdinov) 指出, 种族程式化的印记可以在全部的俄国文学中见到。^① 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作品中的高加索本地人或者是从来不开口说话, 或者就是罪犯; 不论什么花言巧语, 也不能减轻这一控诉, 就像康拉德小说里的例子一样。气势汹汹的敌视态度随着一代代人过去, 逐渐减退, 证明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1861) 里对早已经被打败的穆斯林的温和和俯就口气的描写。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把德国人和波兰人轻易地包拢在俄国的模式中, 以实例显示了俄国人愿意吸收帝国的白种民族成员; 但是, 这些人大多数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吸收的。索尔仁尼琴在《癌症楼》里得意洋洋地宣称, 甘加尔特博士是一位具有德国血统的俄罗斯人。^② 但是小说反映出作者毫不理解的一个事实: 亚洲人可能的担心超过俄罗斯人的担心, 他们主要的担心很可能就是俄罗斯人。这样的一种意识在福斯特 (E. M. Forster) 的《印度之行》中也有反映。非白人本地人在后苏联的俄国媒体和公众舆论被表述的方式是一个广大的、事实上有待开发的领域, 但是路透社和美联社新闻节目每星期都提供大量的资料。^③

在 19 世纪, 当俄国的日益强硬的声音开始在国外被听到的时候, 俄国重要的小说家就提供出论据, 亦即, 帝国就是俄国, 帝国内部各族人民的命运就是保持自己是俄国的一部分。以文学为手段, 很大一部分的非俄罗斯人土地被剥夺了发言权, 新发明出来的言辞把帝国的边缘变得像莫斯科一样理所当然的是俄罗斯的。在俄国国内外产生了一种新观点: 俄国是没有边

① Badretdinov, 97-100.

② Solzenitsyn, *Cancer Ward*, 74.

③ “在俄国, 术语‘人权活动分子’变成了一个侮辱人的词语”, Rache Denber 在 1995 年说, 她是人权监视/赫尔辛基监视小组的驻莫斯科代表。这个小组的报告说, 和 20 世纪 90 年代比较, 1995 年俄国人权记录恶化了很多: “俄国军事力量在离心的车臣开展了一场残酷的战争, 完全无视人权法, 造成没有必要的数千平民伤亡。” Reuter (Moscow), 8 December 1995.

44 界的国家,它只致力于保卫它自己,而且俄国的扩张发挥了良好的文明开化的作用。从普希金的《高加索俘虏》(1822)和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1855—1856),到阿扎耶夫(Vasilii Azhaev)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和特里芳诺夫(Iurii Trifonov)《解渴》(1963),俄国文化告诉俄国人民群众和西方精英,从布列斯特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从卡列利亚到车臣,理所当然受到莫斯科的统治。俄罗斯化的地方上层、俄罗斯人殖民移民、苏联运动员代表队、军队歌舞团,对外国观众来说,就是一个单一的俄罗斯国家的代表。

俄国殖民活动和帝国的忧虑以及犹疑都言简意赅地(却可能是无意识地)记录在现在已成往日烟云的苏维埃联盟的国歌的第一段:

自由共和国结成牢不可破联盟,
伟大罗斯把国家永远团结起来,
各民族人民意志建造起统一
强大苏维埃联盟,万世辉煌。^①

西欧的康纳汀和其他人研究的“传统的发明”在这一段歌词中得到经典的表现。形容词“伟大”附加在**罗斯**、而不是其他的种族群体上。这就意味着,罗斯之伟大至少有一部分在于把全部这些散乱的民族联合了起来,他们都为能够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万分欣喜。这一点,当然是伤害之后又强加的侮辱:**罗斯**因为侵略邻居而受到赞扬。其次,这首国歌强词夺理,硬说联盟成员国都满足于扮演次要角色。前面已经解释过,术语“罗斯”可以指俄罗斯,也可以指全部东斯拉夫人。这首国歌让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享受到一点伟大,但是扮演的是比罗斯次要的角色。它强调联盟的终极性,其含义就是俄罗斯永远伟大。“这位女士抗议得太多了。”这段歌词的殖民教育意义是和它推出的政治体制的终极性相辅相成的。这首国歌是在1944年采用的,当时苏联做好了准备,迎接战胜纳粹德国的胜利,和攫取中欧和东欧的大片土地。苏联在1991年解体,但是这首国歌的教育

^① “Soiuz nerushimyykh respublik svobodnykh / Na veky splotila Velikaia Rus’ / Da zdravstvuet sozdanniy volei narodov / Edinyi moguchii Sovetskii Soiuz.”

作用依然有效。福特(Peter Ford)说过：“对于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一样，(俄国的)前途是藏在围绕着它的各国心里和脑子里的，这些国家一度造就了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①

拉阿南(Uri Ra'anán)提示说，俄国的国家身份是和帝国捆绑在一起的，正如英国和法国的身份是随着背景上朦胧出现的帝国发展起来的一样。^② 1999年1月15日，当时的俄国总理普里马科夫(Evgenii Primakov)在对西伯利亚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俄罗斯人)失去了苏联”，它简洁地表达了俄国历史的固定观念之一。^③ 对于帝国的这种依赖协助建立了俄国文学中的价值观等级，促使俄国文学使用帝国的政治力量当做飞跃的跳板，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有无数的二三流作家和学者参与编织了这一文本特性的经纬，亦即强化俄国文化活动的中心预设：俄国缺乏防御能力，而不是侵略成性；这个文化的深刻性；这个文化承受命运、气候和邪恶他者造成的种种伤痛和非正义的能力。

随着非殖民化的进程和对帝国主义发展过程意识的日益增长，在西方，对于帝国地位加以确定的需要降低，但是，在俄国，这一需要依然保持强盛。俄罗斯人依然喜爱历史哲学的思考，其中心就是俄罗斯。^④ 在俄国，对权力的话语反复地引证“俄国第一”的法则。政法学家帕斯图霍夫(Vladimir Pastukhov)提出，俄罗斯帝国的发展一向是革命式的，而不是进化式的，而且，在一次深度的危机之后，总有一次繁荣开始。20世纪90年代就是这样

45

^① Peter Ford, "The View from the kremlin: Russia as Eternal superpow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nline*, 29 May 1997. Ford 还指出，在1997年，凯梅罗沃的州长 Aman Tuleev 曾经说：“那些主权国家的狂欢节(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宣言)已经成为过去……独联体必须得到它的领袖——俄国——的领导。”叶利钦总统在自己著作《为俄国而斗争》的前言里写道：“我一直认为，在任何时代，俄国都应该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大国的地位是作为一项遗产留给我们的，不仅作为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的文化的基础，而且也是俄国国家结构本身的密码。”Leonid Fituni, 莫斯科策略和全球研究自由中心智囊首领，作出如下的预言：“当然，只要俄国站稳脚跟，医好创伤，在它的聚集扩张的时候，它要远望国界线外……如果俄国强大，就不可避免地从开始一个扩张的过程——起初是经济的，接着就是政治的。”

^② Uri Ra'anán, "Introduction," in Uri Ra'anán, ed., *The Soviet Empire: The Challenge of National and Democratic Movements* (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90), x.

^③ Agence France-Presse, 15 January 1999.

^④ Chernyshev, ed., *Inoe*.

的一个周期的一个部分。^① 帕斯图霍夫表示,俄罗斯将仍然是一个帝国,虽然可能采取某种不同的形式。1998年夏天,《星火》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沙皇尼古拉二世(推迟近八十年的)葬礼的报告。记者索斯诺夫(Arkadii Sosnov)奉告读者,这次葬礼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第一个重要事件”。^② 作者对一个事实感到遗憾:俄罗斯人对于一个令世界其他地方所有的人引颈顾盼的事件的关注不足。不同于俄国要人经过加工的言论,《星火》杂志的文章是一篇偶然的和未经严格审查的文章,迎合中等文化水平读者据认为共有的思想习惯。这一假定是正确的;在以后的几期刊物中没有大量的读者来信言称在非俄罗斯人的世界没有人密切注意尼古拉二世的最后行程。俄国文学正是按照索斯诺夫的这样的文章所揭示的思想习惯写作和得到阐释的。

再来看看叶利钦总统在1995年8月31日就新学年开始所作的电视讲话。讲话是对斯大林统治下死去的人们表示悼念,他是这样说的:“让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对俄国的所作所为,有多少**军官**(黑体为本书作者所加)、科学家、知识分子和农民死去了。”^③把“军官”放在理应得到追念的人们的第一类实际上是首先提及军事,这就指出了把军事事务作为社会第一优先的、俄国特有的一种分类方法。这也暗示,俄罗斯联邦继续是拥有一个国家的一支军队,而不是一个拥有一支军队的国家。叶利钦在这里强调了军事在俄国身份和他者身份构建中的作用。俄国文学中的军事事务的面目是俄国文学批评中被忽略的主题之一。假如把有军衔的人都从契诃夫的剧本中、或者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中搬走的话,剧本和小说的情节就必定塌陷。

在几乎两个世纪以前,俄国作家格列奇(N. I. Grech)写道:“我们可以凭借十足的信心肯定,我们的语言比全部现代欧洲语言优越。”^④在194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故的利哈乔夫(Dmitri Likhachev)号召创建一个浩大

① Vladimir Pastukhov, “Budushchee Rossii vyrastaet iz proshlogo. Postkommunizm kak logicheskaja faza razvitiia evrazijskoi tsivilizatsii,” *Polis*, nos. 5-6 (1992).

② “Pokhorony Nikolaia II-sobytie nomer odin vo vsem kreshchennom mire.” Arkadii Sosnov, “Neliubov’k otechestvennym grobam,” *Ogonëk*, no. 28 (13 July 1998).

③ Reported by Penny Morvant in *OMR1 Daily Digest*, 1 September 1995.

④ Davies, 1984, 89.

的文库,弘扬俄罗斯国家的辉煌创始。^① 他为这个任务贡献了很大一部分的学术生命,参与研究苏联帝国的珍宝。在 20 世纪末,他可以自豪地说达到了目的。现在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很大的文库,著作都是论证古代俄罗斯融入了莫斯科维,享有丰富的文化,是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利哈乔夫和他的追随者们出产的著作,扼杀了少数民族所强调的他们在被俄罗斯联邦索求的土地上的自己独立的来源。就像西方的东方主义这一门学问一样,利哈乔夫的行动制造了有权威性的一批学术著作和论文,向俄国人和西方的记忆输送了俄罗斯的辉煌。这样的事情,只有帝国才能做到。

46

西方学术界大概丧失了对沙皇—苏联殖民连续性的体察,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某些人的妥协,因为这些人苏维埃俄国那里看到了一种新的政治结构的典型,代表未来的潮流,这些人,就像罗曼(Jules Romains)那样,把希望寄托在东方的这一道伟大的光辉上。解构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学术界和政治家们常常对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制度表示同情。^② 他们认为沙皇俄国落后、封建、施行压迫、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不是殖民主义者,因为从表面上看,它没有渴求海外殖民地。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帝”事业所做的财政、军事和外交的贡献使得人们很难提出这样的观点:俄国一直不断地从事的活动正是它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外强力谴责的活动。诺沃德沃尔斯卡娅(Valeriia Novodvorskaia)是这样说的:“在宗主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打倒了共产主义(或者不过事搁置一旁)的时候……他们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只有少数例外,他们都认为俄国殖民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想要开始解决他们自己的独特的问题的想法是痴心妄想。”^③

不仅在文学中,而且在政治中,西方学者对俄国殖民主义的无知与盲目,大概多少还包含一点俯就的劲头。因为俄国落后的消费品经济,作为欧

① D. S. Likhachëv, review of B. D. Grekov's *Kul'tura Kievskoi Rusi in Istoricheskii zhurnal*, vol. 1/2 (137/138) (1945), 89-90.

② 不完整的名单包括 Rosa Luxemburg, J. A. Hobson, Gabriel Kolko, J. A. Schumpeter, Hannah Arendt, Paul Kennedy,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Noam Chomsky, Howard Zinn, Walter Lefebvre.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5。

③ Valeriia Novodvorskaia, “Brosajte za bort vsë, chto pakhnet kroviu,” *Novoe nremia* (September 1996). Translated by Steven Clancy, “Throw Everything Overboard That Smells of Blood.” *Sarmatian Review* 17, no. 3 (1997), 482.

洲边缘地区的一个大国的眉目不清的身份,也许它一向被人们认为没有能力作出纪律严明、长存于世的努力,来参与展开控制世界上不太好斗的民族军事和文化的斗争。在忽略作为殖民争夺中的一个主要成员的同时,西方的反帝国主义者作者们显示出来的怀疑论,乃是这个斯拉夫国家是否适合参加殖民竞赛。俄国距离那些热衷于殖民地争夺的国家显得十分遥远,所以,对于它制造出来的著作没有必要遵循解构了重要的西方文本的方法论。更容易让人信服的是,就像霍布斯鲍姆似乎已经信服了那样,现代俄国之所以生成,是因为它的臣民都愿意成为“神圣俄罗斯土地”^①的一部分。如果学者们平等看待俄国和大英帝国,那么,只有西方文明才有能力产生殖民欲望和把自己的实际的观点强加给他者这一假定将要被终止。如果承认俄国的政策之中包含了某种持续的殖民努力,那就会矮化西方,暴露出西方对并非自己制造的殖民征服的机制和方法茫然无知。^②

在1945—1989年,西方对俄国现实情况的描述几乎接近了社会主义乌托邦创造者们的言论调式,对他们作出回应,并且加以解释。俄国的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教导下——鼓励这样的错误的做法,因为它加强了他们在国内外的地位。在西方知识分子的范畴和俄国的实际的探索中存在差距——这类情况都在各种程度上引起注意,但是很少得到深入的坚持不懈的追究。^③

二战以后的时期结束了西方的帝国,但是,又耗费了五十年才动摇了俄罗斯人的帝国。这个帝国的生活事实上没有受到干扰,直到波兰的团结工会摊牌,直到它自己的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的长期无效迫使他放弃了那种

①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2d rev.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0), 65.

② 美国经济学家 Pau Marer 认为,俄国在经济上支撑了无法生存的中欧国家。Pau Marer, *Dollar GNPs of the USSR and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C: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85); Paul Marer ed., *East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East-West Trad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80); Paul Mare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Foreign Trad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72).

③ William C. Fuller Jr., *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共产经济制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个制度开始破裂,但是没有完全消亡。^① 在后苏联时代,苏联加盟共和国都脱离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这个部分的非殖民化的过程一般被认为是非共产化,这个观点使得这个宗主国中心的殖民性质溜出了世人的视野。但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联邦依然是一个帝国实体,俄国和外国舆论继续奉告本国和外国的读者,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松动。但是,正如英国的白人殖民地最后都获得了独立一样,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和地区也很可能开始要求更大份额的自治。^②

1998 年 9 月,在普里马科夫升为总理的时候,一个评论员写道:“普里马科夫是否是治理俄国的恰当人性,是一个问题。俄国能不能治理是另外一个问题。莫斯科处理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失败深化了外省分离主义的倾向,引起担心,怕俄罗斯……走上苏联在 1991 年走上的道路。”^③普里马科夫曾提出,莫斯科应该带头打造一种新的国际联盟来对付民族自决的原则;在评论他的这个建议的时候,另外一个评论员指出,“在承认俄国现在所面对的种种困难的同时,普里马科夫赞同人数日益增长的俄国政治人物的意见,这些人觉得他们国家在目前的边界之内的前途堪忧”^④。这个帝国本来是被一种对权力的追求拼凑在一起的,现在处于最后解体的危险。在构建这个帝国、保持它的完好、隐藏它的裂纹和裂缝、抗拒它的分解、以及最后承认它的终结等诸方面——作家所扮演的角色,是本书以下几章的主题。

① 在 1995 年,在从哈萨克斯坦租借二十年的拜科努尔航天基地和小镇列宁斯克周围创造出来第 90 个“自治省”。另一方面,车臣地区因为趋向独立,所以省份的数字又减少到了 89 个。

② 在 1998 年 9 月 15 日的一次采访中,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提示,联邦改组为邦联,由欧洲部分俄罗斯大陆、西伯利亚中区和远东组成。

③ Christian Caryl, “Russia’s Tough Guy,”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Online*, 21 September 1998.

④ Paul Goble, “Can Russian Diplomacy Hold Russia Together?”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23 September 1998.

第二章 帝国生成

53 开始把俄国人定义为成功的帝国主义者的文化描写的首批档案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家关于高加索的作品。这些作品所包含的对高加索本地居民的文学表述进入了俄国文学的经典,促成了俄国人的自我感知,影响了对于高加索原住民的态度。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作品中对殖民主义的浪漫化,在西欧的东方文学里是有平行事例的。但是,西方的东方主义所依据的大体上是解释性的著作,而在俄国,诗人和小说家的作用是尤为突出的。东方主义风格的解释性的著述只限于俄国外交家为了帝国利益而准备的秘密报告和备忘录。^①

俄国帝国历史中这样的文学档案建立得相对比较晚近,是因为俄国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它的领土扩张这一特殊的事实。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出现在文学舞台之前,俄国文化水平不足以把帝国经历转化为文本的权威。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莫斯科维,世俗的文学低微,文化记录多为宗教的,写作语言和字母仅仅及于这个领域之内的几百个人。那一时期几种世俗著作之一是家规,题名《家训》,专注的是单个的家族,而不是社会、或者政治。^②《家训》第一部分教导读者如何信上帝,如何敬重沙皇,而其余的部分则关注家族成员关系和家庭杂务,例如腌制冬天食用的黄瓜。^③然而,与这些毫

^① N. S. Kiniapina et al., *Kavkaz i Sredniaia Aziia vo vneshnei politike Rossii: Vtoraia polovina XVIII – 80-e gody XIX v.* (Moscow, 1984).

^② 出人意料的是,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西域和短篇小说的情节发生在苏联公寓楼狭小的空间,却在这方面映照出《家训》来,含义是未来的俄国可能放弃它的帝国野心,集中建设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的国家。

^③ *Domostroi: po spisku imperatorskogo obshchestva istorii i drevnostei rossiiskikh* (Moscow: Universitetskaia Tipografiia M. Katkova, 1882), 1-17. Quoted from a Bradda Books reprint edited by W. F. Ryan (Letchworth and Hertfordshire, England: Bradda Books Ltd., 1971).

无霸权意味的世界观并列的是,在几个沙皇统治下保存的关于征服西伯利亚的秘密档案:荷兰旅行家伊萨克·马萨(Isaac Massa)在关于俄国的著作里谈到了这个问题。^①部分地因为保守了这一秘密,所以在17世纪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没有产生成文的传说,而作家对他们国家的看法依然是孤立主义的、内向的和怯懦的。

在17世纪中期,有相当数量的一批基辅学院的作者来到莫斯科,他们精通波兰语、俄语和鲁塞尼亚语(乌克兰语),他们把西欧文学体裁引进俄语。在此以前,波兰语和拉丁文是莫斯科维人所知道的仅有的“西方语言”。在东斯拉夫人中,更不要说在全部斯拉夫人中实施领导的想法,是莫斯科维人心态所陌生的。^②1672年,在基辅受过教育的拉查尔·巴拉诺维奇(Lazar Baranovich)把自己的两部波兰语著作献给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在致沙皇的一封信里,他说:“我用波兰语写书,因为我知道您的儿子非奥多尔·阿列克塞耶维奇不仅能够阅读我们的国语,而且还能够阅读波兰语……我献出(另外一本书)给您的儿子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因为我知道陛下国务会议要员……欣然阅读波兰语。”^③在那个时期,和俄国文学比较,波兰世俗文学是丰富而完美的,虽然发达程度还肯定比不上西欧诸文学;这一文学形成了莫斯科维的作品和西欧作品之间的第一座重要的桥梁。为了抹掉对于这一依赖事实的记忆,俄国文学史学者们后来重新揭示17世纪这一过渡时期,强调18世纪和西欧的接触,压制抹杀更早时期罗斯尼亚—莫斯科维和波兰—莫斯科维的接触。^④

彼得大帝和他发动的战争导致帝国文学的出现,但是彼得大帝的俄国

^① Isaac Massa de Harlem, *Breue Description des chemins qui menent et des fleuves qui passent de la Moscouie vers le Septentrion et l'Orient dans la Sibirie* (1613), in M. Obolensky, ed., *Histoire des Guerres de la Moscouie* (Brussels: Fr. I. Olivier, 1866).

^② Edward L. Keenan, "Muscovite Perceptions of Other East Slavs before 1654: An Agenda for Historians," *Ukraine and Russia in Their Historical Encounter*, edited by P. J. Potichnyj et al. (Edmonton, Alberta: CIUS Press, 1992), 20-38.

^③ Sergei Solov'ev, *Istoriia Rossii s drevneishikh vremen* (1851-1879), vol. 5 (Moscow: Izdatel'stvo Sotsial'no-Ekonomicheskoi Literatury, 1961), 182.

^④ D. S. Likhachëv's writings o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ignore the Polish connection. See chapter 6.

没有时间从事精神事务,因为俄国的精力都花费在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以及削弱瑞典和波兰的行动中。在叶卡捷琳娜一世时期,完成了又一次向西的推进,俄国发言人以信心不足的语气强调国家的帝国身份,其姿态并不适合一种成功的建国事业。在叶卡捷琳娜及其继承者的统治下,开始形成帝国的言辞,见于她的大臣和特使们的各种报告和备忘录。^① 加强这样言辞的是一种顺利的政治努力的鲜明可见的迹象。从新近兼并的西部领土掠夺的财富,以及从西伯利亚矿山压榨出来的财富资助,把圣彼得堡改建成“北方的威尼斯”。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叶卡捷琳娜开始收集第一批欧洲素描和绘画,这些作品后来成为爱米塔什博物馆的基础。几千件欧洲艺术作品在俄国落户(叶卡捷琳娜购买的第一批收藏品,科本兹尔的一批,有四千多张西欧美术家的素描杰作)^②;彼得堡的建筑采用了欧洲风格的特征。宫廷文人恰当地寻求了一种新的身份,虽然俄语语言和帝国宫廷的气氛对这种做法都不是特别欢迎:有一次,叶卡捷琳娜含沙射影地说,宫廷里有一半的官员不会读书,三分之二不会写字。帝国的成功创造了一种无所不能的气氛,于是宫廷作家竭力推出对于俄国语境来说全新的声音。

55 产生了《家训》并且从耶稣会在乌克兰创办的波兰学校、从希腊正教会教团借用第一批文书和专门人才的这样的文化,在几代人的时间之内,是如何获得了自己乃是一个帝国这一意识的呢?在莫斯科维的文化事件和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的《俄罗斯国家史》(1818—1820)之间,站立着18世纪的韵文作者和故事编造人,俄国文学史虽然提及他们的名字,不过,他们粗糙的语言和思想上的模仿作法把他们变成了一支可怜的队伍。但是,在他们把西欧的文学体裁移植到俄语中来的尝试中,他们拨动了一根全新的韵调,就好像莫斯科维的过去根本不存在,俄国文学正在自然而然地寻求自己妥当的声音,因为它是产生了法国古典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古代欧洲传统的同伴和战友。苏马罗科夫(Sumarokov)的悲歌、海拉斯科夫(Kheraskov)的史诗型诗歌和杰尔查文(Derzhavin)的颂歌作为艺术作品本

^① 俄国外交大臣回忆录中的详细叙述见于 Jaroslaw Czubyat, *Rosja i swiat* (Warsaw: Neriton, 1997)。

^② John Russell, "Catherine, Also Great as a Collector," *New York Times*, 1 October 1998.

来是要被忘记的,但是又被托起全部的帝国船只的成功潮流托起。在那个时期的俄国文学里开始明显出现精心设计的健忘症,往日莫斯科维的习俗和鲁塞尼亚与莫斯科维的接触都被遗忘。莫斯科维的宗教的、民俗的诗歌不再流行,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表现形式却出现了。但是杰尔查文在“菲利莎”颂歌中对叶卡捷琳娜的粗俗奉承反映出了莫斯科维对这个女暴君的崇拜,而且这种崇拜后来又回响在《战争与和平》里彼嘉·罗斯托夫对皇帝的崇拜,和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i)《圣彼得堡》(1913)中社会下层的低三下四的作风。但是,古老习俗的这类偶然的表现与内容而不是与文学文本有关。18世纪和19世纪文学作品中缺少与莫斯科维文学传统在形式上的联系这一现象是突出的,标志着为创造新文学而作出的有意识的努力。帝国的明确声音从此开始发出:这是发出与俄国宏伟首都和俄国庞大领土相适应的一股新颖声调的大胆尝试。

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是迈向可以称之为文本化的帝国的重要的第一步。其内在的含义是俄国的光辉命运。这部史书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授意写作的。在前八卷完成之际,卡拉姆津被沙皇提升为国务参事,授予勋章,得到出版经费六千卢布。^①沙皇十分喜爱这部著作,卡拉姆津得以豁免,不必把《俄罗斯国家史》交付国家审查官,这在俄国政治制度中乃是罕见的例外,因为就连普希金也必须把文稿送交审查。

一些二三流诗人和叶卡捷琳娜有联系,身为当时新富人,强调和欧洲文风的关系,而不是他们自己文化产生的写作风格的关系,卡拉姆津和他们不同,信心十足地承担起把莫斯科维和俄罗斯帝国联系起来的要务。事实上,他的《俄罗斯国家史》内容没有超过17世纪初期的混乱时期,因而没有揭示莫斯科维向帝国的大跃进。卡拉姆津大力赞扬历代沙皇不择手段扩张国家边界,这就表明他很理解帝国的军事胜利和在欧洲威望上升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是把可观的天才完全贡献给了国家祭坛的第一个俄国知识分子,明确道出俄国的领土要求志向,提出了保卫俄国贪婪计划的蓝图。在这一点上,他扮演了黑格尔在普鲁士国家扮演的角色。甚至在写作《俄罗斯国

56

^① Ludwik Bazylow, *Historia nowożytnej kultury rosyjskiej* (Warsaw: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86), 196.

家史》以前,卡拉姆津在自己创办的《欧洲信使》双周刊上就已经演习了对俄国历史的赞颂。他在1802年写道:“和希腊人与罗马人不同的是,我们(俄国人)不需要编造故事和预言来提高我们的背景:荣耀才是俄国民族的摇篮,顺利就是它的信使。在我们到达罗马帝国、摧毁了罗马军团的时候,他们领教了斯拉夫人的强大。拜占庭历史学家们描写我们的祖先,说他们是优秀民族,所有的民族都向他们投降,他们具有超常的勇气和骑士般的善良心地。”^①

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第一版印数是三千套。市场包括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官员和对一部多卷本著作感兴趣的大约一千个有能力购买俄国地主。阅读卡拉姆津著作的还有被征服的各地的外族贵族,有若干套当作礼物送给了外国贵族。他的著作是在俄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问世的:在他在世期间,历史上第一次,俄国被允许加入欧洲列强的合唱。俄国主要演员的地位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确立的。俄国在维也纳会议上享受到的荣耀,也许超过其他全部的欧洲帝国。沙皇的友谊和俄国成就带来的威望促成了卡拉姆津在著作中采取的十分自信的语气,因而也促成了构成他著作特色的俄国中心论之出现。尽管缺少可资利用的证明,卡拉姆津还是宣告帝国范围之内有共同的文化存在。其他史学家紧跟其后,给予有利的思想上的支持,用一大堆的斩钉截铁、不容置疑、自给自足的论述充斥文献市场。尼古拉·波列沃伊(Nikolai Polevoi)在1829—1833年发表《俄国民族史》,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Nikolai Ustrialov)在1837—1840年发表《俄国史》。米哈伊尔·波戈金(Mikhail Pogodin)在他主办的《莫斯科人》月刊的副刊上,编辑了论俄国历史和文学的一系列文章(1841—1856)。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著作变成了官方的、征服钦定的俄国史教科书,重版多次。^② 在许多年之内,历史学家对于某种统一的帝国文化的发明的贡献,被其他作者们认为理所当然,而且在所谓的斯拉夫派(实际上的俄罗斯派)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一贡献贯穿了学校体系和文学作品,而且依然存活在后苏

^① N. Karamzin, “Oliubvi k otechestvu i narodnoi gordosti,”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2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64), 283.

^② Bazylow, 198.

联时代的历史课本和其他的政治著述之中,虽然有想象力的文学明显地停止对它的支持。20世纪初莫斯科政治家发出的对于帝国居民利益集团的数不胜数的呼吁,现在为保持独联体国家生存而作出的全部尝试,都可以追溯到卡拉姆津著作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帝国观点。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发明传统的人。

57

像卡拉姆津这样乞灵于帝国宏图伟业的作法应该被归类于侵略性民族主义的直接文本表现。正像在本书引论里所说的,这一类型的民族主义的特性不同于防御型的民族主义显示出来的特性。侵略型的民族主义不奢谈民主机制,而是大谈昭显的命运。它强调它所代表的国家的巨大,复杂的地理和历史,发现以往不为人知、没有主人、荒芜的土地的辛劳。像“多民族的”这样的词语是侵略型的民族主义所最喜爱的,因为这样的词语强调殖民活动的规模,同时也提示征服者允许全部不同的属地在帝国范围之内生存的宽广胸怀。然而,就是像卡拉姆津这样热情的忠诚于国家的言辞,对于他那一代的某些俄国人也还显得不够。在退休之后,阿列克塞·叶尔莫洛夫(Aleksei Ermolov)将军热衷于寻求“笔端热情奔放的人,来描写俄国人民从卑微走向辉煌的进步;在他看来,卡拉姆津的《国家史》还不够爱国。”^①叶尔莫洛夫寻找气魄更大的传统发明者的做法,表明了对于新设计的持续的需要,新设计要保证一个整体内部的社会凝聚力,而俄罗斯和俄罗斯人在其中从领土上看是少数派,而在民族方面是多数派。

但是,如果俄国的辉煌这一主题没有在文学里得到强化,卡拉姆津的《国家史》及其后继著作的影响也必定会是有限的。正是在这里,帝国的最后的战斗开始。在19世纪初期,军队在后来“加入”俄国的那些陌生地带表现出来的坚强、所遇到的危险和冒险得到了大量的描写。对高加索——那里的主要居民是穆斯林并且相对邻近帝国的中心——的征服,产生了大量的作品,同时还有被征服民族的定型形象,以及俄国人对此形象的看法:到蛮荒之地旅行,宣称为文明的俄国皇权所拥有。似乎是为了补足俄国帝

^① “On nedovolen Istoriei Karamzina; on zhelal by, chtoby plamennoe pero izobrazilo perekhod russkogo naroda iz nichtozhestva k slave i mogushchestvu.” A. S. Pushk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6 (Moscow: Nauka, 1966), 642.

国意识在文学中出现的迟缓,对高加索的文化剥夺伴随了时常迸发出混杂了高傲的懊恼,指向质问俄国扩张是否带来文明的好处的那些人。对于失败者们的道德评判的概要评论见于莱蒙托夫把车臣人描写为“邪恶”,以及普希金对待“被战胜的自然力量”的高傲语调。对失败者的道德谴责在新生帝国的文学里频繁出现,俄国文学也不例外。

对高加索的叙述

58 俄国关于高加索这一异国地理的著作互相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编写的图书提出的对高加索某些分类法已经被认为理所当然。吉尔南(V. G. Kiernan)说,全部现代的帝国都是互相模仿的^①;在俄国人当中,亚历山大·普希金是东方主义者接近他者方式的特别热心的学徒。就像法国和英国的帝国探险家描写他们对世界遥远地方的旅行那样,普希金使用了访问尚未开化、或者形成民族的文明欧洲人的那种粗暴方式。他摆出走遍天下的代理人的姿态,他对自己的见闻的叙述给人的观念是亚洲毫无自我知识、哑口无言(因为高加索把亚洲和欧洲分开,所以普希金从来不费心思去注意地名:对他来说,高加索就是亚洲)。他和莱蒙托夫都从来不怀疑自己的作为的正当性,虽然他们偶尔地把俄国的代言人分成有尊严的(马克辛·马克辛梅奇,苏霍鲁科夫,布尔卓夫——都是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人物)和没有尊严的(皮巧林)。他们都深信不疑,他们访问过的地方,作为穿着俄国哥萨克制服的文明的一部分,将会兴旺发达。他们都乞灵于法国和英国作家,引用他们的言论,接受他们的修辞技巧。

在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从经历旅途劳苦的俄国士兵和军官的角度来看,高加索变成了一个充满危险和知恩不报的国度。这些行动的严格的军事目的,使他们有别于西方的东方主义者的写作,因为后者通常是以学者和商人的身份到东方去的。从这样的军事观点看,本地人都必定是原始的,虽然,连随便哪一个学历史的学生都可能思考过他们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记录(例如,关于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高加索女人都很顺从、性感,而

^① V. G. Kiernan, *Marxism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1974), iii.

男人则是强横、懦弱。作为征服的结果,俄国所得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俄国的出版物中绝不提及,而俄国传播文明使命的言论则无所不在。

俄国人谈论高加索的形式是游记、诗歌、短篇小说、小说和历史。这些文本中充斥的策略是,在优越外来者提供的话语类别范围之内遏制住本地人。对于这块土地的评论荒诞而怪异,特别是在散文叙事之中。“荒野”的背景当然包含着“野蛮的”民族:作家们把这些异国他乡的现实因素放置在前景上,想要将其固着在对这一地区以往毫无接触的读者的记忆之中。他们津津乐道那些居民不讲卫生的恶习和思维的幼稚低下。就像弗莱契(Giles Fletcher)把16世纪莫斯科街道上的模样像疯子的乞丐描写成为外来的低劣人那样,普希金描写第比利斯集市的乞丐,用令人惊骇的细节来款待读者。第一篇描写的内容是在1588年,第二篇是在1835年;在两个半世纪之内,俄国从原东方主义描写的对象变成了制造东方主义描写的一个主体。

在俄国人积累了足够的力量来祝福高加索以前,这一地区居住的大部分是突厥人。在中世纪,历代王国在这里兴衰更迭,一群男女统治者留存在各民族和部族的记忆之中,保存着对于自己古代史的意识,培育建造独立国家的志向。宗教的差别和山区相互隔绝造成的特有的语言多样现象多次激励了这最后的目标。高加索险峻的山峰即使在夏天也很难通过,阻隔了交流和创造睦邻关系。

59

俄国在高加索的活动开始于彼得大帝,他利用了这里基督教和穆斯林居民混杂的局面。彼得大帝及其继承人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基督教统治者建立联盟,在方便的时候又把他们出卖给穆斯林。因为在和瑞典与波兰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彼得信心增加,决心在南方打开局面,入侵波斯,但是后来失利。在1722年,他发动南方战役,当年夺取德尔本特城,1723年夺取巴库。在战争过程中,该地区基督教国王之一瓦赫唐六世支持了彼得大帝,但是在土耳其人席卷他的王国的时候,彼得大帝没有给予他帮助。与土耳其签订的1724年条约把巴库留在俄国人手中,而瓦赫唐的王国被划归土耳其。

类似的事态出现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她利用了格鲁吉亚国王海尔库勒斯二世,在1768—1774年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当作一个盟友,但是在波斯新的强大君主阿加·穆罕默德·沙攻击俄国当时的保护国格鲁吉亚的时候,抛弃了这位国王;波斯君主屠杀了第比利斯居民,重新征服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人陷于一种只好认输的境地。他们南面的邻居是穆斯林,北面的邻居是过去曾经背叛过自己的俄国人。全靠自己,对于一个弱小的民族来说,风险太大。在18世纪后期,格鲁吉亚人决定再次和俄国结盟。这一次,他们寻求俄国人保障格鲁吉亚王室保持王位。但是保罗一世(俄国沙皇,1796—1801年在位)暂时地放弃了高加索,听凭波斯对格鲁吉亚发泄怒火。亚历山大一世提议格鲁吉亚并入俄罗斯帝国,而不同意格鲁吉亚人所寻求的保护国身份。他们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兼并决定在1891年颁布的一个宣言中公布了。格鲁吉亚国王退位,但是对手要求的不只是格鲁吉亚的王位,还有他们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与之相伴的是俄国军队频繁的镇压。1802年,齐恰诺夫(Tsitsianov)将军被派遣平息格鲁吉亚人,他在1806年遭到暗杀。^①

兼并格鲁吉亚一事标志着一个庞大帝国挑起一场针对山区小国的长达三十年的战争,而这个帝国是必定赢得战争的。拿破仑战争没有终止高加索人的敌意,这个情况指明,拿破仑对俄国这个实体造成的损失十分有限。一些俄国将军领导防御战,一直退到莫斯科,然后又把拿破仑赶回法国,而另一些将军则在南方发动进攻,签订古利斯坦条约(1813)。条约把今天的阿塞拜疆的大部分、直到波斯边界^②,划归俄罗斯帝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一个条约接着一个条约,在三十年之内,整个高加索地区和外高加索的大部分,都被划归给了俄国。

对山区各民族来说,最恶劣的是阿列克塞·叶尔莫洛夫将军的战争。^③这场战争开始于1816年,一直延续到1827年,结果是对几个民族的大屠杀。叶尔莫洛夫臭名远扬,因为他焚毁粮食、种子、家畜饲料和森林。^④他

① Seton-Watson.

② Allen F. Chew, "The Caucasus and Transcaucasia, 1763-1914", *Atlas of Russian History*, 72-3.

③ Ibid., 183.

④ Aleksei Petrovich, "kazaki i severngi Kavkaz," *Nezavisimaia gazeta*, 4 June 1994. 为叶尔莫洛夫将军征战的一篇辩护文章在1999年10月反攻车臣时期发表,对于对比悬殊的武力使用的辩护如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具有极权的道德基础……这是不容反驳的。”Aleksandr Pronin, "Tragediia Generala Ermolova," *Nezavisimoe voennoe obozrenie*, no 40 (15-21 October 1999), 5.

征服了阿瓦尔人和车臣人,为俄国夺取了整条的泰来克河。叶尔莫洛夫的五万人的军队的征战结果,作为令人敬畏、但是本质上高尚的丰功伟绩,保存在俄国人的记忆之中,从来没有被反思和重新思考。和征服西伯利亚或者 1794 年在华沙近郊普拉加地区对大约两万平民的屠杀(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将军的“丰功伟绩”之一)不同,高加索征战在文学里得到大胆的宣扬。

在一封糅合了少见的谦卑语气的书信中,普希金提议充当叶尔莫洛夫将军的秘书、编辑和出版人。他告诉这位将军,拿破仑在俄国的征战虽然以失败告终,却受到了作家们的密切注意,而叶尔莫洛夫将军的在高加索的十分成功的征战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普希金进而请求将军允许他编辑加工将军的高加索胜利回忆录:“您的荣耀属于整个俄国,您没有权利把它隐藏起来。”^①这样的奉承,后来又被倒过来送给了普希金,赠送者是叶尔莫洛夫在高加索的继承人,陆军元帅帕斯凯维奇(I. F. Paskevich)。帕斯凯维奇允许这个诗人短时间体验参加针对山区民族的战争的乐趣,然后借口国家的利益,禁止普希金服役。他说:“普希金先生,您的使命对于俄国是珍贵的,这里没有您的位置;所以我奉劝您立即离开军队。”^②普希金离开了军队,带走了足够丰富的记忆,足以造成关于高加索的官方印象,凝结成俄国文学中的高加索形象(同时也是西方的,因为西方对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揭示是遵循了俄国作家和批评家的韵调的)。

从早期诗歌《高加索的俘虏》到成熟的《1829 年远征期间前往阿尔兹卢姆旅行记》,普希金动手创造一个无声的、智力不足的高加索,在毫无疑问的战争中有勇无谋,正好该受俄国的治理。^③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为俄国文本记忆制造了俄国是这个地区严厉而正义的治理英才的形象。普希金尤其可以获得殊荣:是他首先相当成功地在艺术上打造了俄国的帝国意识。他让那些受到俄国军事胜利鼓舞的人发出了声音。通过普希金的诗歌和散文,迅速变得明确的情况是,俄罗斯帝国主义不需要粗野而残忍的外貌,俄国人不是蒙古人,他们能够把他们用来复枪和刀剑摧毁的东西幻化为美。

① Pushk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10, 430.

② Henri Troyat, *Pushkin*, translated by Nancy Amphous (New York: Minerva Press, 1975), 367.

③ *Journey to Arzum*, translated by Birgitta Ingemanson. (Ann Arbor, MI: Ardis, 1974).

普希金创造俄罗斯帝国主义具有凝聚力的图景所凭借的优雅,也是为民族服务的。他拼凑起来一个在以往的俄国文学里所没有的形象:一个注定要统治“凄惨的芬兰人”和它所征服的其他种族的俄国,一个充满了在遥远的高加索忠实地完成任务的朴实而令人钦佩的爱国者的俄国,一个其上层阶级在儒雅和教育方面和西方最有教养的阶层完全相等的俄国。

普希金的《阿尔兹卢姆旅行记》描写了陆军元帅帕斯凯维奇的军事行动,那行动就好像是一种快乐而没有终点的狩猎,而猎物永远是丰富的,“敌人”(普希金和帕斯凯维奇一直用法语谈话)是要永远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追捕的。这种追捕是自然而然的,就像起床、洗澡、吃早饭一样,在旅行见闻评论部分里是特别鲜明的。而他者则是熟悉的,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必须追捕、打伤、捕获、杀死。普希金叙事明显类似狩猎,男人们的消遣的气氛——完全缺乏对“敌人”也是人这一事实的考量,甚至连为把“狩猎”作为高超观察者高谈阔论的背景的做法的胡乱辩解都没有;这一切都为后来描写征战的作品定下了基调。^①

这部作品唯一的一个英语译本把普希金的旅行记的意义从军事冒险软化为异国旅游;这个译本为文本的战斗音调加以柔和润色,也没有把完整的副标题翻译出来。在俄语原文标题中,《阿尔兹卢姆旅行记》的前面还有定语“1829年远征期间”,这个形容短语把这部作品正式列入当时时代写作军事回忆录的传统。与《战争与和平》中在鲍罗金诺战场迷失乱走的别祖霍夫不同,普希金不是观察者,而是参战,而他在阿尔兹卢姆消遣的安排显然是得到他的同意的。他当时用炭笔画的素描自画像是他骑在马上,标枪(原文如此)瞄准就绪。^②但是,译本强调的是对俄国文学的传统式的阅读,挤掉了俄文文本的军事侧面。

全面战争的现实是透过普希金笔下神奇十足的形象浮现出来的。在普希金时代,在高加索几乎没有俄罗斯人的社区。在皮亚吉戈尔斯克、基斯洛沃茨克这样的城镇,以及第比利斯,当然居住着俄国殖民行政官员及其夫人

^① 同样随意的语调也出现在托尔斯泰早期的小说《哥萨克》里,小说描写的是征服高加索行动的靠后的一段时期。

^② Pushk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6, 685.

和家庭,这就是某种地方性“社会”的起始,但是社会交际活动多数参与者都是当地最显赫的俄罗斯人:骑手、少校、上尉和中尉,偶然有一位将军,就成了注意的焦点。这些社会交际是俄国军事生活的一个分支,是俄国文学读者常常忽视的一个事实,正如英国文学读者忽视托马斯·贝特兰爵士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奥斯丁小说《曼斯菲尔德花园》中的人物)、或者麦考博老爷和皮戈提老爷在澳大利亚的大财产一样。就这样,俄国人的聚会和谈话占领了前台,对于本地居民的生活保持了无法打破的缄默。阅读普希金对于第比利斯之行的迷人描写的读者,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个城市街道上大量的乞丐可能是和连续不断的战争状况有联系的,因为自从俄罗斯帝国认定征服高加索符合自己的利益以来,这个地区的战争就一直不断。

62

普希金的《旅行记》充满了帝国说教,提示说俄国是一个知善行善的国家,要把秩序和身份赋予原有的混乱。在某一个时刻,一队士兵前往树林里去“清扫”。^① 清扫这个比喻反复出现在涉及殖民地的东方主义文学中;比如吉普林(Rudyard Kipling)的诗作《白人之歌》(1899),诗里提及的白人“去清扫土地”(如果普希金是吉普林的同时代人的话,他必定会附和他朗读:“啊,如果白人并肩在大路上前进,那对世界有多么好!”),^②虽然看到哥萨克在杀死几个伤兵,站在旁边等待的大约五百个“土耳其人”俘虏并没有流露出恐惧;但是,这一局面被认为,与其说是勇气,不如说是冷漠中的沉默。切尔卡西亚人的尸体四处横陈。一个勇敢的俄国上校用“他们的”烟斗抽烟,很友善。有人提示说突厥人当中有“阴阳人”,这是暗指突厥人人种族低劣:我们被告知,这样的妖怪常常出现在游牧民族之中。在启程返回俄国之前,诗人参观了一个集市,遇见了一个“可怕的乞丐。他的脸苍白,毫无血色;红色的溃烂眼睛流淌着泪水。”诗人“推开了那个乞丐,厌烦之极,无法描写”,赶快回到住地。在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对于他在近东目睹的令人作呕的医疗条件的细致描写。^③

与这一张不吸引人的画面形成对照的是健壮、快乐的哥萨克们,他们为

① Pushk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 684.

② Rudyard Kipling, *Verses*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1940), 280.

③ *Flaubert in Egypt: A Sensibility on Tour*,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Francis Steegmull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65.

打仗而向前推进,经过完全没有突厥人的村庄;那些突厥人,哦,是啊,都消失了。出现在故事里的突厥人或者是俄国人的温顺仆人,或者被打败,阴沉沉地等待着命定的终结。有几个有勇无谋的家伙对俄国人开枪,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他们在街道上没有尊严的懦夫式的行为,和胜利者“聪明而诚挚的”(苏霍鲁科夫)或者“勇敢的”(布尔卓夫)的姿态形成对照。^①普希金引用了一首土耳其诗作,这首诗把虔诚的(因而当然不可战胜)阿尔兹卢姆比拟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大城市命定沦陷,因为它不遵从对古兰经的批判。这首诗的作者是错误的:阿尔兹卢姆沦陷,落入俄国人之手。对阿尔兹卢姆即将开始的进攻是俄国军队首领帕斯凯维奇将军在和高级军官一起进晚餐的时候宣布的。穆斯林的据点几乎是偶然地夺取的,没有周密计划,讨伐的部队也很小。普希金从一首充满敌意的诗歌中取出的引用语里偶尔挑出的“不可战胜”这个标签,被送回殖民强权那里,辉煌灿烂。

63 被攻陷以后,阿尔兹卢姆一片寂静;在这个十万人的城市里,没有一个人抱怨现在驻扎在那里的一万名哥萨克。王宫的宫殿被抢劫一空:沙发椅都被撕开,地毯也不见踪影。普希金言下之意是逃跑的突厥人自己造成了破坏。后宫的妃子们受命亲自接待俄国人,赞扬俄国人。这个田园生活般的形象,因为传来阿尔兹卢姆出现鼠疫的消息而遭到破坏。

在返回俄国本部的途中,普希金遇到了友人,他们正在利用地方的温泉治疗在战斗中遭受的创伤;他们带着一些刊载关于普希金诗作的不合时宜文章的杂志。《旅行记》描写的最后一个事件是对这些笨拙的文学批评的范例的大声嘲笑。普希金旅行描写的结尾反复演示了殖民优越性的要素:丰富的文化、对习俗低劣的原始人的面目的厌恶、为了积极目的(医疗创伤、建筑新房屋和公园)使用被征服地区资源的能力、为征服阿尔兹卢姆的人士的后代编写创造有关阿尔兹卢姆征战的某种回忆的能力,最后,还有就是体验适宜于享受休假的俄国军官的生活乐趣的能力。

偏袒帝国观察者的观点乃是文本帝国主义的共同策略:这就是:用征服者的笔来描写沉默的被征服者的习俗。即使征服者民族的一个成员变成了

^① *Flaubert in Egypt: A Sensibility on Tour*,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Francis Steegmull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695.

“原始人”的俘虏,情况也不会变化。在《高加索俘虏》里,一个无名的俄国人(诗人称之为“欧洲人”)被切尔卡西亚人俘虏。他“密切观察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就像一个从事增加西方人的知识之事业的东方主义者可能做的那样。^① 他喜欢他们的朴实、好客和灵活的动作;他甚至喜欢他们对争执的偏好和他们的心理强力。他们色彩斑斓的服装吸引了他的注意。切尔卡西亚人是“天生为打仗”的,在酷似战争的游戏里,他们常常砍下俘虏的头,引起切尔卡西亚儿童的强烈喜悦(原文如此)。这个俄国人看待这些活动,凭借的是一个高贵之人的尊严,这个态度引发了狱卒们的敬畏和钦佩。

俄国殖民文学的特点是强调被征服民族对俄国人的真实的、或者是捏造出来的残酷行为。往昔的不义事件都堂而皇之记录在文学和其他文本之中,从而为俄国人作出的类似行径辩护。普希金的《高加索俘虏》提醒读者,高加索桀骜不驯的土著构成了对帝国的严重危险,在他们袭击帝国领土过程中,许多俄国人丧生。另外,还有今天的车臣。^②

普希金关注范围和判断力都很狭隘的写作十分不同于约瑟夫·康拉德对黑非洲的复调描写和奥斯丁对殖民利益的受到压抑的批评。^③ 与英国人不同的是,普希金从来不持怀疑态度。他是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帝国说话,这个帝国更多地依靠的是哥萨克马刀,而不是文化的优越,这个帝国依然惧怕被囊括在他者的语境之中。在普希金时代,还不能确定俄国能够成功地战胜西方的分门别类考察的目光。像米什莱(Jules Michelet)那样的强有力的声音,其对待俄国的方式,与普希金对待高加索的态度是没有区别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在普希金去世之后很久,屠格涅夫也照样不能避免龚古尔兄弟(the Goncourt brothers)在他们的刊物上把他当作一个奇异有趣的斯拉夫人来评论时所采取的惠顾下人的语调。把高加索的卑劣掺进《阿尔兹鲁姆旅行记》、高声宣扬俄国哥萨克的优越、轻视据说一触即溃的“土耳其人”——这就是普希金回应某些欧洲知识分子在普希金时代对待俄国人的粗暴态度的做法。

① Pushkin, *Poĭ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 114.

② Agence France-Presse (Moscow), 21 September 1998 and 2 October 1998.

③ Pushkin, *Putechestvie v Arzrum*, in *Pss*, vol. 6, 683.

几代人以后,托尔斯泰以一个稳固得多的俄国国家的视野创作的《哈吉·穆拉特》(1904),是对帝国的浪漫主义的宣传家们的解构。托尔斯泰第一次记录了一向是叶尔莫洛夫和帕斯凯维奇获取成功所依据手段的焦土政策。即使《哈吉·穆拉特》是在高加索早已经稳固镶进帝国版图的时代写成的,托尔斯泰的这部作品在他去世以后才发表。托尔斯泰持强烈的反殖民态度,不可能不给俄国当权派带来危险。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统治下,完成了对高加索的征服,而托尔斯泰对这一事实的描述如此震撼人心,在他以前和以后的俄国文学的任何作品都不能比拟。《哈吉·穆拉特》包含有这场征服战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描写。叙事者勾勒出了一个车臣村庄惨遭的破坏:

(萨多)发现他的泥屋已倒塌,屋顶塌了下来,门和走廊的柱子都被焚毁,屋里十分肮脏……那儿的两堆干草被烧掉了;老头儿亲自种植、已经成活的几棵杏树和樱桃树被折断并烧焦了,主要是蜂箱和蜜蜂都被烧得一千二净……泉水被弄脏了,显然是有意不让人引用。清真寺也被弄得很脏。(《哈吉·穆拉特》,草婴译,上海远东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97,第113页)^①

托尔斯泰作品的英语译者毛德(Aylmer Maude)是这样描写叶尔莫洛夫的行径的:“‘平息’车臣和达吉斯坦的一次战役……的组成部分是摧毁村庄、盗窃家畜和财物、砍光森林、迁移居民。”^②这样的评估和《阿尔兹鲁姆旅行记》的轻松语调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和莱蒙托夫比较阴郁的描述形成对比。在阿尔兹鲁姆旅行期间,普希金是完全了解事实的真相的。他承认:“切尔卡西亚人痛恨我们。是我们强迫他们离开他们自由而广阔的牧场;他们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整个的部落遭到毁灭。”^③但是,和托尔斯泰形成对照的是,他不是揭示切尔卡西亚的境况,而是警告俄国人切尔卡西亚的危险。就

① “Hadji Murad,” *Great Short Works of Leo Tolstoy*, translated by Louise and Aylmer Maud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629.

② Leo Tolstoy, *The Kreutzer Sonata and Other Stories*, translated by Louise and Aylmer Maud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97), 472.

③ “Cherkesy nas nenavidiat. My vytesnili ikh iz privol'nykh pastbishch; auly ikh razoreny, tselye plemena unichtozheny.” English translation, *Journey to Arzrum*, 23; original in *Pss*, vol. 6, 647.

像许多殖民主义者一样，普希金把他者当成不同的人类，其需要和权利是和征服者民族根本不同的。

在征服和“蚕食”的策略中，最主要的是要制造出一种二分法：一方是高加索在被征服之前的野蛮，而另外一方则是后来得到改进的社会的和物质的实际状况。普希金画出俄国文明在几年之内带给高加索的好处呈现的一幅玫瑰色的图画。在比较格奥尔基耶夫斯克附近的温泉和他几年以前所见到的情况的时候，他记载了明显的改善：

在当时，浴池都是仓促搭建起来的棚子……现在宏伟的浴室和大厦拔地而起。两侧栽种了菩提树的一条林荫道一直通向马舒克山斜坡。到处都是保持整洁的通路、绿色椅子、长方形的花圃、小桥、亭子。温泉全都整修，镶有石块；浴池墙上挂着警察局的告示；一切都是整齐、清洁、经过美化的。^①

“土耳其人”是没有能力给人提供舒适的；必须由俄国人来实现。普希金说，“亚洲的贫穷”恰当地变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组。^② 莱蒙托夫比普希金小十五岁，又是高加索的常客，他让《当代英雄》（1840）里的俄国人称“亚洲人”为“畜生”（*bestii*）、“愚蠢之极”（*preglupye*）、“可怜”（*zhalkie*）、“恶棍”（*pluty*），都是不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东西。^③ 他们还很不可靠，贪婪成性：贝拉的兄弟因为一匹马而背叛她（皮巧林本想从卡兹比奇那里偷窃这匹马，这个行动描写得令人不安，但是同时也指明了皮巧林的勇气和本领）。本地人的贫穷得到了描写，暗示本地人没有能力超越维持活命的水平：他们狩猎，多少种些粮食，互相争吵，彼此偷盗马匹。很特别的是，马克辛·马克辛梅奇，自己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知识的傻大个儿，却针对“本地人”的精神局限状况作出特别粗野的评语。

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笔下的本地人散布在一切地方，像是令人畏惧的自然背景上十分讨厌的猴子。他们在那里，弄得俄国士兵忙碌不堪，但是让读

^① Pushkin, *Pss*, vol. 6, 644.

^② *Ibid.*, 693.

^③ M. lu. Lermontov, *Geroi nashego vremeni*, edited by B. M. Eikhenbaum (Moscow: Akad. Nauk, 1962), 8, 10.

者加强了与罗斯的团结。然而,和普希金不同,有一点像康拉德的是,莱蒙托夫的评论包含一丝讽刺;莱蒙托夫诞生在一个已经能够多少提供一些慷慨施舍的帝国。然而,广大阶层的人士报告的一连串令人轻视的特征,给俄国读者的提示就是,这些原始人需要、而且期待统治。然后,把这一切包裹在一起的是文化和战争、道德和劝告:“在脸色阴沉的帕夏原来有妻妾和无耻变童团团围住、静静抽烟的地方,现在,征服了他的人正在接受将军们的凯旋捷报,分配帕夏管辖区,对新版小说展开讨论。”^①

66 就像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作品一样,《阿尔兹鲁姆旅行记》显示出缺乏思考力,这就是:本地人拒绝服从征服者,没有必要耍滑。普希金在几处提及,他要求地方居民款待和给予马匹,认为地方居民为他服务理所当然,因为有俄国军队为他撑腰。他对他访问的城镇和居民点的官员和平民提出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地方居民关于他的想法依然没有说出来——很可能读者也从来没有想到。在关于被征服国度的一段经典式的帝国主义描写中,普希金写出了关于格鲁吉亚及其居民的下面一段文字:“格鲁吉亚在1792年归属于亚历山大皇帝权杖之下。格鲁吉亚人是一个好斗的民族。在我们的军旗之下,他们证实了他们的勇敢。他们的智慧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开发。从整体来看,他们是愉快的,爱好交往的。”^②

新近征服的城市阿尔兹鲁姆不能提供充分的物质享受来满足普希金的胃口。他想要买的货物,商店里不是立刻就有。这就提供了他吹嘘的借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词汇比这个更荒唐的了:亚洲人的奢侈……亚洲的贫穷、亚洲人的粗鄙,等等,倒是有的,但是,嘿哟,奢侈,这个词儿当然是欧洲人的特点嘛。在阿尔兹鲁姆,有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在普斯科夫省任何一个地区小镇的杂货铺子里都能买到。”^③

普斯科夫显然是精心挑选的例证:该城十分靠近帝国的波罗的海地区,属于俄国最繁荣的殖民地行列。普斯科夫的范例掩盖了俄国心脏地区的真实状况,大约在同一个时期,果戈理也发出共鸣,描写了这个地区,都是偶尔

① *Journey to Arzum*, 83.

② *Ibid.*, 40.

③ *Ibid.*, 80.

地强化了俄国就是又一个发达的欧洲国家。这样的文本在俄国人的记忆里留下了高加索是一个需要教导的地方,它们给俄国人免疫,不受感染——不必同情和理解这些民族。弱小民族为抵御俄国进攻而浪费大量资源——这些资源本来是可以用于社会建设的——这个事实对于俄国文学的读者来说,不足以构成什么问题。像普希金的《阿尔兹鲁姆旅行记》这样的文本,与一种令人惊愕的冷漠和根植于敌意之中的优越感不无联系;后苏联时期的莫斯科人对前苏联南部地区肤色较深的人们就持以这样的态度。这种敌意曾表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民意测验中,这些测验揭示出一种民意,亦即,“车臣黑手党”夺走了莫斯科人理应享有的世袭的安全。^① 这样的概念的基础根植在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对“土著”的描写之中。

激励普希金写出《阿尔兹鲁姆旅行记》的是一个法国人写作的另一篇殖民地旅行记。激励了这位俄国作家的要点是这篇法国旅行记硬说普希金在作品里讽刺了对阿尔兹鲁姆的军事行动。诗人争辩说,这完全违背事实,实际上他的旅行记是在努力尝试给俄国军事暴力添加善意的内涵。看来,普希金没有怀疑过从弱国那里夺取土地的道德合法性,无论这些民族是高加索人,还是中欧人,重要的土地要是归属俄国人或者他们的盟友(他反对土耳其帝国主义,写出热情洋溢的诗歌保卫塞尔维亚人,因为他们是掠夺土地的奥斯曼帝国的牺牲品)。在全部伟大的俄国作家中,普希金大概是最生硬的武力外交论者。

67

托尔斯泰在自己早期的短篇小说里,是补充了普希金式为帝国奋战的勇敢哥萨克的形象的,但是,他自己后来的困苦生活多方锻炼了他,所以晚期的短篇小说反映出对俄国扩张主义的某种新的理解。《哈吉·穆拉特》的叙事者谈到了俄国人袭击之后的一个车臣村庄的状况:

谁也不提起对俄国人的仇恨。全部的车臣人,从最幼小到最年长的,都比仇恨更坚强。那不是仇恨,因为他们不把俄国人看成人,而是

^① 俄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在莫斯科进行的一次调查是,让儿童画出他们看待未来的图画。一个男孩的画是他自己站在血淋淋的人体器官当中,还附有文字说明:“格鲁吉亚人和黑人少一点,莫斯科就会清洁一些。”据调查组织者认为,这并非一种非典型的回答。Vitali Vitaliev, “Projections: Remembering Galina Starovoitova,” *Transitions* 6, no. 1 (January 1999), 22.

对这些东西毫无意义的残忍感到的这样的厌恶、嫌弃和惊愕，所以要灭绝他们的欲望——就像灭绝老鼠、毒蜘蛛，或者野狼的欲望——是像保存自己的本能那样的自然本能。

但是，提出了后来外国人在俄国国内旅行观感的不是托尔斯泰，而是一个德国贵族，奥古斯特·冯·哈克斯陶森男爵，他在俄国旅行，经费由沙由尼古拉一世提供^①：

我们原来认为，俄国对待亚洲的政策是和平、而不是侵略，现在用细节展示一下。让我们从这一点开始：俄国持续地发动战争，就是说，在高加索各省。整条高加索山脉都面对俄国的平原。好战而贪婪的高地山民常常扑向缺少防卫的平原，抢劫破坏村庄，然后返回安全的山中城堡，不受惩罚。正面攻打他们据说是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们背后有整个的亚洲。后来俄国获得了格鲁吉亚。山民是俄国的重担，把俄国推进了和波斯与土耳其的血腥的战争，但是战争导致了对于高加索山脉南侧、黑海和里海之间的整个地区的征服。^②

紧接着，哈克斯陶森提出辩护：“征服是在当今皇帝登基以前完成的。他只能接受遗产。”但是他坚定支持俄国“开化使命”，呼吁有教养的读者认知国际法和国际秩序。

68 这样的权威定见，又得到了其他权威性著作和记者言论的强化，还能够加以改正吗？如果我们必须同意《2010年的俄国》（1995）的三位作者斯坦特（Angela Stent）、叶尔金（Daniel Yergin）、古斯塔夫森（Thane Gustafson）的见解，则任何改正大概都是办不到的。在标题为“一个强国的回归”一章里，作者们只承认在阿富汗问题上帝国超越界线；他们预言“因为莫斯科的中央政府还软弱，所以北高加索在未来数年会是一个病灶，但是，从长远看，

^① *Great Short Works of Leo Tolstoy*, translated by Louise and Aylmer Maud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7), 629.

^② August von Haxthausen, *Studies on the Interior of Russia*, edited by S. Frederick Starr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2), 320.

这个地区很可能依然归属俄国。”^①

在这些征服战争期间,这个地区的经济潜力显露出来:巴库城市周围夜间发出的点点神秘火光。这是该城周围丰富油气田冒出后点燃的油气造成的。对于可能利用这些资源的早期意识,也许加速了对这一山区方向的扩张的准备;而这一地区的居民,虽然宗教和民族背景不一样,却没有对帝国构成严重的威胁。扩张的决定表现出先见之明。在 20 世纪初期,俄国全部石油都产于高加索的这两块殖民地:阿塞拜疆和车臣。1913 年,俄罗斯帝国生产了 5.61 亿普特(1000 万吨)石油,其中五分之四来自巴库附近的油井,五分之一来自车臣首府格罗兹尼附近的油井。^②

1837 年,宫廷决定把俄国青年诗人莱蒙托夫送到叶尔莫洛夫所平息的高加索去。1838 年他得到原谅之后,因为和外国外交家的儿子决斗,他又被捕,被遣送回了高加索。帝国的对内政策为冒犯沙皇意志的年轻人提供了有用的职业。莱蒙托夫的任务是协助又一次的平息行动。

《当代英雄》(1840)是莱蒙托夫对这个地区两次非自愿访问的成果。由于这一背景和他作为浪漫主义者对沙皇专制很不喜欢,他提出的见解超越了普希金对俄国人行为的阐释,虽然他自己对于征服其他民族的问题依然是不敏感的。他的故事围绕着一个忧郁的俄国少尉皮巧林,这是受到自己施虐和受虐癖性损害的不幸的牺牲品,还有一个年老军官同伴,把一生奉献给了帝国的马克辛·马克辛梅奇。本地人形成的背景现出贪婪与背叛(阿扎马特)、愚蠢(切尔卡西亚人老王公)和脏乱(卡兹比奇)。对于皮巧林的眼光来说,他们的女人都远不是美丽的;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贝拉。她生为公主,好心的马克辛·马克辛梅奇从来不这么称呼她,但是,被俘之后,她的尊严和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立即消失殆尽。叙事者把她描绘成一个切尔卡西亚文盲少女,似乎示意让人抓住、奸淫、包养,用以给她的上级主人皮巧林取乐,然后再被抛弃。但是,情节的黑暗演变没有被叙事者的言辞忽略,关于“当代英雄”的人格价值,读者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许多俄国读

^① Angela Stent, Daniel Yergin and Thane Gustafson, *Russia 2010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 (New York: Vintage, 1995), 250.

^② Seton-Watson, 658.

者虽然持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们对于皮巧林的不满都是围绕着他缺乏生活目标的状况,而不是强奸未成年的切尔卡西亚人少女、并且毁掉了她的一家这样的更为具体的犯罪事件。莱蒙托夫说,他的目标是写出“一个人的心灵史”。他的兴趣不在于强奸和征服涉及的道德问题,而是在于皮巧林及其同类在俄国事务中占有的地位。

- 69 故事中的切尔卡西亚社会由于遭受失败而分裂,但是一个局外的观察者的权威性声音认为,本地人命运不佳,另外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能力形成强大的社会纽带来更好地保卫自己。他们相互的联系很差。卡兹比奇杀死了老王公,因为他错误地认为是他把女儿贝拉出卖给了皮巧林。卡兹比奇像逍遥法外者那样地生活,没有结婚、组成家庭,或者说,在切尔卡西亚社会里占有一个令人尊敬的地位;如果不是俄国人阴谋摧毁了他的人民,他的能力是能够给他赢得这样的地位的。贝拉之死,是误解和卡兹比奇谋求报复的行为造成的。

本地人的思想没有直接表现,而总是由一个俄国人来解释的。在这方面,莱蒙托夫的态度是普希金态度的复制。让我们再短暂返回《阿尔兹鲁姆旅行记》。书中有一个细节是四个俄国将军会见四个帕夏(穆斯林贵族),其中一人自认为是一个诗人。在这个俄国观察者看来,这个诗人帕夏说话太多,毫无尊严,这些特点把他降到像普希金自己这样的诗人之下好几级。我们被告知,这个诗人是一个老人(他的生命——虽然我们没有被告知——是捏在反复无常的俄国军官的手里的),发表了一段又悲又喜的演说:“祝福我们会见一位诗人的时刻。诗人是苦行僧的兄弟。他既没有祖国,也没有人间的祝福;在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为了荣耀、为了权力、为了财宝而忧虑的时候,他和人间的帝王平起平坐,他们都向他行礼。”^①这几句话引起在场的人的兴致。允许亚洲人大发诗兴(当然,他们不是“真正的”诗人,不过是小丑而已),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避免胡作非为,也就是说,不积极参加反俄斗争。但是,当然,也不能够允许他们嬉闹过度;满足了在场人的娱乐需要之后,他们就该撤走。帕夏演说后出现的苦行僧被粗暴地轰走,我们后来再也没有听说这个帕夏的命运。

① 《阿尔兹鲁姆旅行记》,76,普希金:《全集》,卷6,691。

这是两个方面之间的一种深广的裂隙：一方是描写俄国人深厚的严肃关切，另一方则是使得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优秀作品成为殖民主义者民俗志范例的、构成关于“土著”随笔特色的痴心优越感。俄国人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具有完美人性的，而外人切尔卡西亚人就像萨义德《东方主义》第一版封面上让·莱昂·热诺姆(Jean Leon Gerome)的著名肖像中那个耍蛇卖艺者。这样的技巧是在小看被征服者。老帕夏的狡黠的喋喋不休被认为是天真的野性的某种发作，而不是精心设计娱乐俘获者的表演，遭到俘虏的贝拉的行为则符合佩戴了彩色念珠和满口甜言蜜语的部族女人的刻板形象。

巴巴在论文《他者问题》中把殖民主义者对“土著”的刻板形象的依赖比拟为物神对于拜物教者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弗洛伊德的概念。^① 在某种意义上，殖民者是和“野蛮人”“对照”，因而“依赖”他们来为自己定义的。为自己定义，方法是说明自己不是什么。因此，他的身份证明比设想的更脆弱。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高加索”作品中本地人和俄国人的反复对比显示出殖民主义语境中存在着犹疑和焦虑。因为面对被征服者远远不能决定自己的地位，俄国作家表现出迫切需要再度确证他们的俄国身份，因而还有他们征服他者的强力。但是，这一身份，在他者不在场的时候、或者如果不在场的情况下，等于是某种阙如、某种损失，因而撕裂征服者装模作样的自信。在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1937)中，贡布罗维奇暗示了一个类似的关系，他谈到主人们细心注意餐桌礼仪，因为仆人在场，主人吃晚餐实际上是针对仆人的，是要表现给他们看，他们，高贵的地主，是比农民有教养、有礼貌的。^② 但是，贡布罗维奇提示，他们构建自己的身份是依赖仆人的这一事实，破坏了他们寻求的身份。这个事实使得主人的优越感和仆人的自卑感之间的关系不稳定、不纯洁，容易遭到瓦解。看来，这样的不稳定的关系也存在于殖民主义者的态度的核心之中，无论舞台是在英属印度，还是在俄属高加索。

俄国文学中把高加索平庸化的迹象是，这样的做法在俄国人心目中造

^① Bhabha, *Location of Culture*, 69; also Moore-Gilbert, 117-118.

^② *Ferdydurke* (Warsaw: Rój, 1937), in English *Ferdydurke*, translated by Eric Mosbacher (New York: Grove, 1968).

成的对高加索的情感若有似无。就俄国人而言,高加索没有培育出具有活力的纽带和对自我的忠诚。高加索只不过是一个摆设,就像文艺复兴时代画家安置女性模特的常规的背景一样。是可以取舍的,像海外度假目的地一样。莱蒙托夫这本小说里的两个俄国人的心里刻画照样可以以圣彼得堡或者莫斯科为背景,他们的心理活动没有一点和他们生活所在的地区有关。本地的人民和历史似乎不存在,或者存在也是为俄国人制造治理他们的任务。重要的是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人物要返回的俄国的土地;这些土地才是马克辛梅奇如意梦想的对象。皮巧林的习惯和观点来自城市的教育,与切尔卡西亚人及其关怀所在毫无联系。他根本不会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东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文学史家把皮巧林和俄国的其他文学人物划归一类,如叶夫盖尼·奥涅金和亚历山大·恰茨基(格里鲍耶多夫剧本《聪明的痛苦》中的人物),他们和高加索也没有关系,而是属于没有参加战争的俄国男人社会的一小部分。和其他的殖民文学一样,在高加索的俄国人人物都是互相谈话,但是不理睬本地人;他们谈论本地人,但是不和他们谈话,斯皮瓦克大概谈到了这一点。^①

71 莱蒙托夫的故事引出一大批评论,也造成关于俄国文学的几点总体见解,但是没有引出关于高加索历史、或者本地居民问题的有意义的讨论。只有少数例外,这种忽视态度一直保持至今。不仅皮巧林和马克辛梅奇,而且还有格鲁什尼茨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人物)、梅丽公主,和其他访问这一地区的俄国人,都得到了各种方式的分析和阐释,大部分是作为两种对立态度之一的代表:异化的态度(无根的皮巧林)和对祖国的忠诚(马克辛梅奇)。这一切都始于在《当代英雄》发表同一年别林斯基写的对该书的评论。^② 别林斯基开创了把“土著”从存在空间和文学空间中铲除这一传统,而这样的空间正是批评家理所当然应该感兴趣的。他是这样谈论贝拉

^① Gayatri Spivak,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Self-Representation," in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edited by S. Harasy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55-7.

^② V. G. Belinskii, "Geroi nashego vremeni-sochinenie M. Lermontova,"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1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hudozhestvennoi Literatury, 1948), 551-629.

的死亡的：

“贝拉”(这一章)给人印象深刻。令人悲伤,但是这是一种心情愉快的、亮丽的和甜蜜的悲哀;你的想象飞向这位美丽少女遥远的坟墓,而这个坟墓不是阴沉的:有阳光照耀,一道山泉为它清洗。泉水的潺潺声响,外加周围林木的沙沙风声,对你述说某种神秘而无限的事物。在她的坟墓上方,你能看到一个奇异的影像,面颊雪白,一双黑眼睛表现出谴责和谅解,双唇浮出凄婉的笑意。^①

就别林斯基而言,认知贝拉之死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写作讨论俄国读者的情感,因为他们已经成熟,有能力就大自然和事件进程向俄国人发出的信号加以哲学反思。对于本地妇女的处理就像工具一样;她的死亡被看做是俄国银幕上的一个光点,而不是社会经纬上的巨大撕裂,虽然她是该社会的一员。当然,她是原谅俘获她的俄国人的,虽然她是一个穆斯林,不受宗教义务的制约,必须表示原谅。关于莱蒙托夫自身,别林斯基说他是一个叛逆者,却没有原因,因此把莱蒙托夫读者的注意力进一步地从高加索转移到了俄国有教养的和西方化的上层。莱蒙托夫参加了一次侵略战争这个事实对于这位俄国批评家不是问题,虽然在其他场合他对社会不义和政治不义十分敏感。别林斯基的继承者之一,杜勃罗留波夫(N. A. Dobroliubov)写了一篇论俄国文学人物的著名论文,给他们定名为“多余人”,借用了屠格涅夫一篇故事的标题:站在这个链条开端的是皮巧林和奥涅金。最近美国出版的两部俄国文学史完全砍断了莱蒙托夫作品和对高加索的血腥征服之间的已若有似无的联系,因而重新确认了俄国文学对于后殖民批评的免疫力。^②

本地人的问题已经被切除,于是莱蒙托夫告诉我们,在高加索的俄国人有好有坏。与忧郁的皮巧林形成对照的是毫无光彩、但是善良的马克辛梅

^① V. G. Belinskii, "Geroi nashego vremeni-sochinenie M. Lermontova,"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1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hudozhestvennoi Literatury, 1948), 578.

^② Victor Terras, *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1991); Charles A. Mos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9).

72 奇,这个人能够感觉出来其他人尚未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需要。马克辛梅奇是俄国文学全部慈祥父亲和长者的先驱,从《父与子》中的老巴扎罗夫,到《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佐西马长老。但是,当然,他与他人的感知是次于他对军事任务的忠诚的:他对帝国忠心耿耿,从来不会考虑俄国人为什么首先需要征服高加索。皮巧林讳莫如深,马克辛梅奇开朗健谈;皮巧林在切尔卡西亚女人们的拥抱中寻求摆脱寂寞,马克辛梅奇偶尔在后悔中回想起曾经痛失良机,误了一门很好的俄罗斯女人亲事。皮巧林年轻、老练,而马克辛梅奇老而粗率,这是在俄国文学中常常引起积极共鸣的人物。皮巧林追逐一个傻气的切尔卡西亚少女,发展到犯罪;他强奸了贝拉,直接造成她的死亡,还毁坏了已经被征服、已经认命的一个平和地方长官的这个家庭。马克辛梅奇不赞成这个看法: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他当作“良好”殖民主义者的模范来歌颂吗?归根结底,他也是一个“可怜的老头”,他对皮巧林和贝拉的钟爱没有得到回报。对于一个还没有习惯于后殖民眼光的读者来说,指出马克辛梅奇献身于屠杀高加索居民可能显得粗糙和趣味低级。他是一个职业士兵,帝国雇用他就是为了杀戮外国土地上的人民。虽然对俄国专制制度十分疏异,但是莱蒙托夫还是生活在俄国人的本质精神之中,这就是对俄国帝国主义的问题视而不见;而他的批评家和读者对这一本质精神也是一直紧跟不舍的。

俄国批评家们谈论马克辛梅奇都使用光辉的词句。这个传统又是别林斯基开创的,他宣称马克辛梅奇是一个伟大的俄国英雄。在沙皇领导下,同样在人民委员领导下,马克辛梅奇都是大英雄。俄国文学强有力地、频繁地供应贫穷受苦的俄国人的固定刻板形象,又得到俄国文学批评界的强化,所以,他们隐蔽了不可比拟地更贫困、受到更多苦难的属地子民。西方批评家们心甘情愿接受俄国人在这方面的指教,也许并不仅仅是丘特切夫笔下住着俄罗斯人民的“贫困乡村”所搅动出来的“人类良知的奶水”促成的,而且还有和这些乡下天生倒霉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帝国的辉煌。

俄国殖民史因为引进“多余人”类型而被进一步排除在文学批评视野之外。^①“多余”的概念被强加在社会背景基本上互不相同的文学人物的身

^① Eikhenbaum, *Hero*, 125 ff.

上。这个概念被用在一辈子都在懒散悠闲中度过的平民奥勃洛莫夫身上，还有认为“胜利纪念品收藏”十分重要的皮巧林。苹果和橘子的混合有其自身的、掩盖了殖民过程的机制。俄国文学评论依然是避开俄国的扩张主义的，而且，创造出一种语境，使得提出这一问题都变得困难起来。有一大批权威著作都含蓄地宣布，就俄国文学而言，任何种类的后殖民观点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让我们返回对莱蒙托夫的讨论吧：贝拉之所以吸引读者，是利用了她出身背景的异国情调，这是殖民主义旅行文学反复使用的手段。她是皮巧林勾引和诱奸的牺牲品，还经历了父亲的死亡和兄弟的失踪。但是贝拉不是犹滴或者雅亿。在莱蒙托夫的版本中，她爱上了引诱她的人，却死在本族人的手里。车臣人是杀手这样的定型在谋杀贝拉者卡兹贝克身上重点显示出来。在这里，我们回忆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一个受到引诱的俄国妇女，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很快恨起了他，因为受到侮辱，所以对他作出干脆利落的报复。征服者关于被征服者使用方便的神话之一是，形成对照的是，土著妇女谦卑、顺从、缺乏头脑。作家笔下的贝拉天真、呆傻、迷人，起初还有点不高兴，后来却完完全全献身于皮巧林。根据诱奸者脑袋里构思的模式，她从内心里喜欢被人勾引。还有，她是一个蛮子，就像莱蒙托夫所全面展示的那样，这个蛮子少女只能羡慕这个优雅的俄国人主人。彼得鲁舍夫斯卡娅(Liudmila Petrushevskaya)的一篇短篇小说叙述一个“鞑靼人”妇女，被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俄国人强奸，这些强暴造成无法摆脱的梦魇；我们觉得这个情节在某种意义上是那种男性幻想的一种讽刺性反响——那幻想就是：在遭受侮辱和毁灭过程中，贝拉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皮巧林是当时俄国社会的典型吗？他在文学中的出现是不是仰仗了创造他的作者熟悉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拜伦的诗歌呢？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的俄国教育制度下，几乎没有学校可以容忍像皮巧林这样的人。1811年建立的皇村中学因为有能力对学生教导优雅风度而闻名，从来也只有五十个学生。^①俄国当时的两所大学培养少数的文科毕业生，他们一般都选择文职，而不属于军职。俄国军事学校的规

73

^① Bazylov, 191.

模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俄国的大学,是不能容忍像皮巧林这样的未来军官的,他们讲求个人主义,书卷气十足,文雅,难以适应漫长军事活动的现实生活(皮巧林的雪白衬衣属于莱蒙托夫的梦境生活,而不属于高加索战争)。莱蒙托夫自己在彼得堡军事学院逗留期间,其行为方式很难说和皮巧林的有什么共同之处。他写粗糙的情色诗,没有表现出皮巧林的那种高雅的寂寞。在莱蒙托夫时代的俄国,非军事高中毕业生有几千人,十四品级官僚制度根植于社会机制,像皮巧林这样的人是没有地位的。在外省执行军事任务过程中,生活艰苦劳累,而像皮巧林这样在高加索养尊处优惯了的人,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迅速地变形。这样一来,皮巧林就的确是一个“多余人”,但在杜勃罗留波夫(Dobroliubov)设想的那个多余的意义上。情况似乎是,作家的本能令莱蒙托夫为了解释对贝拉的引诱,而赋予皮巧林以一种不适合他的职业的精明老练。皮巧林的优越感方便了推销关于自卑的土著降服于高雅主人的一种定型的解释。皮巧林也来源于作者,这位作者拒绝把俄国社会看做是饱受政府驱使的一大群牧民,其资源都被浪费在战争之中,而不是对文化的追求方面。俄国人到高加索是为了征服,不是为了反思,征战非常紧张,不允许皮巧林类型的人在一个杀人或者被杀的环境中我行我素。在这个意义上,皮巧林是一个爱欺诈的人物,但是,他和当时其他俄国作家们构想出来的某些人物,凝结成了“历史”。在俄国人和外国人的记忆中,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高加索是通过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眼睛被看到的,而不是通过车臣人、达吉斯坦人、巴尔卡尔人或者诺盖人的眼睛。那样的历史观和本地各民族的记忆与神话很不协调,这一点可以用在莱蒙托夫时代以后高加索人民不断举行的起义的次数来衡量。^①

用言论遏制波兰

和高加索所不同,1772年、1793年和1795年对波兰一立陶宛王国的领

^① Alexandre Bennigsen, “Soviet Minority Nation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Robert Conquest, ed. *The Last Empire: 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Future*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131-150.

土的三次瓜分夺取没有产生可观的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原因有几项。对波兰的多次战争都发生在俄国文学的转变刚刚开始的时候。在 18 世纪的俄国,没有良好的期刊,没有有才华的作家。叶卡捷琳娜的检查反复无常,不像莫斯科维针对被认为对国家有害的作品施行的恐怖政策,但是,检查依然无所不在,压制创新,拉吉谢夫(Aleksander Radishchev)在极度悲哀之中发现了这一情况。另外一个原因是被夺取土地的性质。施波鲁克提出,从乌克兰的观点看,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几个部分把一个帝国主义者波兰转换成了帝俄。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领土上,原来有一个波兰人的地主阶级、一个犹太人的商人阶级和一个“本地人”的农民阶级。但是,在俄国人的眼里,住在那里的东斯拉夫人使用希里尔字母,遵循拜占庭礼拜式(波罗的海各省是一个例外)。在被并入俄国的时候,所谓的东部礼仪天主教信徒(多数是鲁塞尼亚人),原来是在 1596 年加入了天主教会,但是依然保持了拜占庭礼拜式和其他的宗教习俗,则必须再次皈依东正教,或者是听从劝告,或者是屈服与强力。因此,获取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没有被看做是征服,而不过是早已丧失的土地被归还。从这个观点出发,以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看待高加索本地人的方式看待白俄罗斯农民是不妥的。这一观点虽然道出,但是还应该强调的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从来就不是老莫斯科维的一部分,因此用不着回归俄国。莫斯科维以西的东斯拉夫土地是立陶宛人从蒙古人手里夺回来的,在立陶宛大公姚盖拉(Jogaila; 又称雅盖沃, jagiello)迎娶波兰公主雅德维嘉(Jadwiga)之后,成为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一部分。在波兰的统治下,立陶宛、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上层阶级被波兰化,所以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民族特征被弱化;但是,他们也获得了和俄国人分开的身份的机会。

他们和波兰长达四百年的联合源于波兰殖民主义,但是也促成了乌克兰既不是波兰、也不是俄罗斯这一观念。所以,叶卡捷琳娜的公共关系才子们论定,对波兰第三次瓜分不是征服,而仅仅是王朝的改组——这个论定是不值一驳的。^① 这种官方的解释的欺骗性带来的结果是国家缺乏大张旗鼓

^① 近期再次出现在 George Keenan 论东欧的言论。See *The Interview with David Gergen*, chapter 1。

地庆祝这些王朝改组的勇气;其次,对波兰土地所有者的剥夺和强令他们改宗信仰东正教的做法是遮遮掩掩的进行的。^①没有为庆祝吞并波兰—立陶宛王国被吞并而写出文学作品(除了几首欢庆波兰城市投降的歪诗)的原因就在这里。

波兰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在这个事实化作被广泛接受的现实之后,反波兰的文学才开始出现,通常都是紧跟在波兰历次起义或者波兰身份的其他形式的表现之后。1830年11月起义在欧洲引起一股同情的热潮,因而必定遭到俄国人反驳的声音,他们硬是侈谈起义非法和帝国正义。俄国文学最优秀的代表愤慨于波兰人恢复独立的意愿,也愤慨于波兰最优秀作家表达的见解: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和诺尔维德(Cyprian Kamil Norwid)认为,俄国和自己以往的蒙古人主人的共同点多于和欧洲帝国主义伙伴的共同点。因此,波兰历次起义强化了俄国人的帝国意识,给俄国作家提供了打造强词夺理辩论技巧的磨刀石。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把艺术品格和帝国傲慢结合起来的文学作品;这种傲慢在其他的殖民地社会显示得比较隐讳,例如“白人的负担”这样的念头之中。而在俄国,则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印度的婆罗门可能不喜欢或者甚至痛恨英国人,但是他们不藐视他们;而形成对照的是,俄国殖民者在帝国的某些地区,面对的是当地人轻蔑对待自己这样的非同一般的处境。当然,这一现象的一部分来源于被打败者的愤怒,但是这个现象的尺度和普遍性表明,这不仅仅是心理补偿问题。^②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之间对于这一不寻常关系的意识,在19世纪是强烈的,像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都觉得有义务反击那些对帝国没有表现出足够尊敬的人士。这样的愤怒和傲慢在西方也可以听到,但是根本

^① Norman Davies 提供了关于这些皈依的某些细节,他指出,在某一天里,叶卡捷琳娜她的大贵族和宫廷官员分配了原来属于波兰土地所有者的五十万农民。这些土地所有者的命运被包裹在周密的沉默之中。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Vol.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84), 86-90。

^② 在波兰文学中,这样的态度在 Stefan Zeromski 的小说中是特别突出的。在长篇小说《早春》(1925)中,叙事者傲慢的声调和巴雷科娃对于俄国道路的怨言表达了这一持续的观感。

原因受到了错误解释。西蒙斯(Ernest Simmons)对普希金的诗《致诽谤俄国者》的解释为后两代阐释者定下了调子。西蒙斯在普希金的愤怒中看到了“某种反应的趋势”和“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① 请注意,这完全是从某种可能存在的自卑情结竭力转移注意力。

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精英对俄国人显示出来的优越感没有引起西方的注意,因为太荒谬,所以不值得严肃对待(或者,也许这种现象生疏,西方对它不敏感),但是俄国人注意到了,他们的回应就是以特别粗暴的措施来对付被打败、但是不服输的属地子民。让殖民者在情绪上烦恼的是,还得忍受俄国人占领下的华沙城里流露出来的种种藐视,在华沙,上层家庭都避免和俄国人社会交际,更不用说通婚。普希金谴责“诽谤俄国”的人,因为他们对帝国的文明使命提出质疑,但是普希金表现出来的却是帝国心态的骄傲,破绽就是暴发户没有泰然接受批评的能力。

76

这样,普希金在《致诽谤俄国的人》、《鲍罗金诺战役周年》和《青铜骑士》这类诗里的愤怒腔调是一套在西方殖民主义中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形成的。在西方,从被打败者的文化优越观点来对帝国贪欲发出攻击的事,没有大规模出现过。在19世纪,西方对其文化和技术实力有强烈的意识和信心,使人想不出来能从哪个方向对它的成就提出疑问。俄国的情况不是这样,虽然获得了空前的军事、外交和文化的成功,这个帝国的形象依然是脆弱的,摇摇晃晃的。

背景就是这样。他们在舞台前台表演骄傲与信心,制造令人瞠目结舌的雄辩。在自己的“殖民主义”诗篇中,恼怒的普希金坚持说,俄国的命运就是统治力量较小的民族和种族。他认定,在1830年起义之后,波兰人特别得到西方对弱者的安慰和支持,于是他粗壮的帝国神经作出反应,这就是创作力的大发。普希金反波兰的诗出现在题为《攻克华沙》的小册子中,是在1831年9月华沙沦陷于陆军元帅帕斯凯维奇的军队之后立即出版的。就是那个在高加索接替了叶尔莫洛夫的帕斯凯维奇。

《致诽谤俄国者》责备同情波兰起义的西方人,如法国著名诗人德拉维

^① Ernest Simmons, *Pushkin* (New York: Vintage, 1964), 342.

纳(Casimir Delavigne)和德国“波兰歌曲”的作者们。^① 发言人高傲地告诉他们,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过去,立陶宛已经消失(注意诗人不愿意提及波兰)。想要改变历史判决的人,都应该被清扫干净。普希金用类似《青铜骑士》引论的调子,设计出帝国的伟大。他告诉读者,俄国人“用他们自己的鲜血购买了欧洲的自由、荣耀和和平”。他还威胁欧洲:“我们还必须和欧洲再次争吵吗?俄国人习惯于胜利吗?或者,我们人不够多吗?……从芬兰到小亚细亚,从克里姆林宫到中国,俄国将要崛起,它的钢铁甲冑大放光明。”请注意俄国本部和殖民地之间的混乱:普希金的诗威胁西方,其方式就像几乎一个世纪以后布洛克(Aleksandr Blok)写的《锡西厄人》一样。和这些诗比较,吉普林自信心十足的诗句就显得是一位谦虚模范人士的作品了。普希金骂骂咧咧地邀请欧洲攻打俄国,让他们的大军在无垠旷野中死亡,就像拿破仑的士兵那样(“在他们并不陌生的坟墓当中”)。俄国文学早就熟悉沙皇的愤怒,从伊万雷帝致库尔勃斯基公爵的《书信》(虽然其真实性受到质疑)开始,对俄国、俄国男女沙皇的乞灵就出现在冯维辛(Denis Fonvizin)、杰尔查文(Gavriil Derzhavin)以及18世纪其他文人的作品里。但是,对俄国大事业的欧洲对手发出愤怒威胁的俄国老爷的声调,以往还没有听到过。

77 普希金对帝国的激情跟他同时代人格林卡(Mikhail Glinka)类似,格林卡的歌剧《沙皇的生活》把历史解释成为波兰和其他西方人扼杀莫斯科维俄国的一场密谋。^② 格林卡堂兄弟写的歌剧脚本使用的构思,是指控被征服民族在享受自由的时候阴谋反对俄国,目的大概是为在征服期间和以后对他们的屠杀作出辩护。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罪恶充满了毫无隐蔽的嫉恨,因为怕溢出,反而溢出。”(《哈姆雷特》,第四幕)格林卡的歌剧在波兰起义四年之后,1836年,第一次上演;在苏联—纳粹友好时期又掸去尘土重新搬出。丘特切夫的反波兰诗歌是在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拼凑的。针对其他的遭受殖民的国家的类似倾向也可以察觉到。在1939—1941年间,抵

^① *Oeuvres complètes de Casimir Delavigne* (Paris: F. Didot, 1880), vol. 4; St. Leonhard, *Der Novemberaufstand in den Polenliedern deutscher Dichter* (Krakau: W. Potularski, 1911); also Davies, vol. 2, 328-30.

^② 在苏联时期改名《伊万·苏撒宁》。

毁波罗的海各民族人民和罗马尼亚人的运动在苏联报刊上展开,在人民内务委员部对这些民族开展逮捕和驱逐出境之前,以及整个过程之中。^①

全部的帝国都彼此相似:《鲍罗金诺周年》欢庆战胜欧洲的“凯旋甜蜜时刻”,嘲笑强加给华沙的、向不明身份“诽谤俄国者”“颁布傲慢法律条文”的欲望。但是,普希金强调:“波兰的命运已经封死。”在这首诗里,波兰被模模糊糊地和整个欧洲等同起来(“**整个欧洲**都想要征服我们”,普希金在这首诗第一段里这样说)。正如格林卡出力协助在俄国人的头脑里制造出了强大而狡猾的波兰人入侵的神话那样,普希金提出的解释后来在俄国人大众意识里成长为真实事实,亦即:1812年法国人入侵俄国,几乎摧毁了欧洲文明,正是俄国把局面逆转过来。对俄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的角色的夸张观念,是在普希金时代发展起来的帝国意识的副产品。这个副产品享有不圆满的长寿。^② 莫斯科历史学家米留科夫(P. M. Miliukov)编造出来一个讽刺性的新词“亚欧洲”(Aziopa),指的就是这类的吹嘘,并且比拟为俄罗斯帝国内部的实际状态。自从普希金引入语文学上的自由创意做法,俄国本部和帝国之间的区别的模糊性感染了俄国文学和俄国人的自我感知,而对于**整个欧洲**齐心协力摧毁俄国的恐惧已经变成一种“虚脱心态”,在危机时期,俄国人的政治意识就要陷入其中而不自拔。^③

俄国人的帝国傲气最宏大的表现就是《青铜骑士》的序诗(1833)。这首诗在艺术上十分成功,所以它的殖民主义音调和历史的高度美化没有引起注意:批评家们可能认为,考虑到音韵的艺术之美,捕捉诗作细节的不实是不甚恰当的。这首诗的确是俄语最优美的诗作之一,但是也有不太引人入胜的侧面。彼得大帝的军事威力和高瞻远瞩的才能,在这里和“悲惨的芬兰人”形成对照,这些芬兰人被证明不会在其他民族的土地上构思出

① Davies, vol. 2, 328-30.

② 在《投考大学学生用本国历史资料》(Moscow: Prostor, 1994), 337, 作者谈到“欧洲国家的解放”,指出,苏联军队单独地攻克柏林,并且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扮演了具有决斗义的角色。参见第6章。

③ Roman Szporluk, “The Ukraine and Russia,” in Robert Conquest, editor, *The Last Empire: 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Future*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151-182.

长期的设计,只泡在“茅草屋子”里混,一直等到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他们扫除干净。芬兰人的“茅屋”趴在地上,而彼得大帝挺胸直立;他们的“小船”都是“孤零零的”,而彼得大帝已经建造了海军总部大厦。事实上,这里形成对比的是两种生活方式:一种对待自己的事务、建造“茅屋”等行为比较消极,而另外一种则不满足于现存状况、或者现有的一切,奋力牺牲他人的利益来获取更多的东西。正如萨义德可能说的,这是最纯粹的帝国主义:彼得大帝摧毁芬兰人的生活方式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在芬兰人之后,彼得大帝就要收拾瑞典人(“我们要从这里威胁瑞典人”)。在普希金的诗句中,彼得大帝不是要“设计”一个面向欧洲的窗口,而是要“开凿”一个出口:俄语动词 *prorubit'* 的内涵是指猛烈的行动。

序诗是尼采式的进行式的。省略了一个人类群体含辛茹苦建造文明的过程,而歌颂超人意志带来的迅速变化:

彼得的创造,我爱你,
 我爱你庄严优雅的风仪……
 彼得的城市,集天下之美,
 巍然屹立,像俄罗斯大地!
 让被战胜的自然元素
 也服从于你,
 让芬兰的海浪
 忘记古老的敌意。
 不要用徒劳的仇恨
 搅扰彼得的长眠。^①

这首诗本身推崇卡莱尔意义上的英雄崇拜,也表明彼得大帝的终极目标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俄国的荣耀。一个国家的荣耀在这里被设想的,仅仅是从压倒他者、制伏他者的能力为出发点;列宁的“谁战胜谁”的提法危险地接近了普希金对彼得强力的乞灵。强权乃是这首诗的终极的主题:在这

① “Liubliu tebia, Petra tvoren'e, / Liubliu tvoi strogii, stroiinyi vid. . . . Krasuisia, grad Petrov, i stoi / Nekolebimo, kak Rossiia! Da umiritsia zhe s toboi / I pobezhdennaia stikhiia.” English translation in Dimitri Obolensky, ed., *The Penguin Book of Russian Verse* (1962), 113.

里其本身受到了赞扬。

在普希金为这首诗提供的注解之中,有一条涉及普希金一度的友人密茨凯维奇对彼得堡的描写。普希金意识到,几乎没有读者有机会阅读这位波兰诗人的作品,便信心十足地设想,密茨凯维奇也写作了描写该城的诗,题为“奥莱什凯维奇”(“Oleszkiewicz”),提供了普希金所删节的细节,而密茨凯维奇则是从18世纪的一个不知名诗人鲁班(V. G. Ruban)那里借用了描写。^①

普希金在这里误导读者,很不明智,或者是故意的。“奥莱什凯维奇”是密茨凯维奇在1832年写出的关于彼得堡的一组激情组诗的一个片段,标题是“散论”。里面没有提到鲁班,而是关于雷列耶夫(K. F. Ryleev)的友好评论,这个人十二月党人的领袖,在起义失败后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处以绞刑。在这些诗、或者更可以说哀叹中,密茨凯维奇描绘了圣彼得堡及其居民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图景。他把这个城市比拟为塞满建筑样品的动物园,而这些建筑是和捕获这些建筑的文化格格不入的。密茨凯维奇感叹,城里的一切都是借来的或者买来的,所用的钱都是俄国人千方百计从他人那里盗窃来的,而城市则笼罩在独裁和恐惧的阴冷空气之中。彼得大帝

79

用铁链封锁了俄国每个港口。

他组成议院;安插了密探,

制造护照,制定官衔。

……

因而俄国欢呼,惊叹:

“沙皇彼得给俄国带来文明!”

给后继沙皇留下的全部欲望

是对贪婪腐败的内阁传送谎言,

给暴君装备新的刺刀,

闯进外国杀戮抢劫,

用偷来的钱币给外国人发薪

^① Pushk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 398.

在法国和德国赢得阵阵称赞。^①

至于彼得大帝的纪念碑，密茨凯维奇把它和各国杰出领袖的纪念碑加以比较，相形之下，彼得大帝显得不怎么好。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慈爱地向他治下的人民伸出手，坐骑静静地站立在地上——与这样的皇帝比较，彼得大帝是准备向前猛冲，令他身下的马匹剧痛发狂；这四匹马准备踏平前方的一切。被这类皇帝统治的人民是惧怕他的；是他，而不是外国的敌人，代表了危险——他能够践踏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密茨凯维奇的思考在这里看来是预示了霍丁卡——那是一片土地，在那里，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庆祝活动中，有几千人被践踏致死。密茨凯维奇“散论”中的诗作之一的结尾，是通向圣彼得堡“监狱”的一个庄严的象征：一座大门、一道壕沟和一座桥梁。波兰人作出这样的答辩的能力，在俄国帝国主义上层人士当中引起对波兰整个民族的深刻的厌恶。

别林斯基对多余人的定型证明是持久的，排挤了对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创造的人物提出的其他各种可能的解释，例如这一章里提出的解释。一个异化于社会、感受绝望痛苦的人的题材，先后被很多作家描写，如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刚察洛夫，最后，还有苏俄批评家。多余人和帝国之间的联系从视野中消失。苏联文学评论界在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的俄国形式主义的迂回转弯，也没有能够改变这方面的注意力焦点。艾亨鲍姆（*B. M. Eikhenbaum*）对莱蒙托夫的研究表明，俄国形式主义没有引进对这种讨好帝国的解释的任何改正。^② 因为被皮巧林这个多余人遮蔽，切尔卡西亚人及其命运，甚至对于激进的现实主义者批评家来说，也依然是视而不见的。波兰人从视野里消失，重又出现的时候，变成了苏联—纳粹友好时期苏联的国家仇敌。俄国攻打他国行动的殖民主义者的面目，坠入记忆的黑洞。而且，在俄国文学史上，从普希金时代起，高加索虽然一向被当作“我们的”

^① George R. Noyes, ed., *Poems by Adam Mickiewicz* (New York: Polish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America, 1944), 356. Original in Adam Mickiewicz, *Poezje*, vol. 3 (Lwów: Gubrynowicz i Syn, 1929), 146.

^② B. M. Eikhenbaum, "Roman M. Iu. Lermontova *Geroi nashego vremeni*," in M. Iu. Lermontov, *Geroi nashego vremeni*, edited by B. M. Eikhenbaum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62), 125-162.

高加索对待,但是这个地方及其征服者之间的联系一直很薄弱,在苏联时期也不例外。在俄国政治和文化中,高加索依然是一个令人烦神的方,帝国内桀骜不驯的子民被发配去的地方,一个用来吹嘘“庞大俄罗斯”言论的对象,俄国可以榨取石油和生产香槟酒的地方,但是,绝对不是享有有别于帝国的声音和身份的地方。近期有一部研究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的著作可以证实这些定型。^① 同样,俄国文学对波兰和波兰人的态度也一直没有得到俄国和西方学界的更新研究。在后苏联时期,俄国人偶尔地发作起来,指控高加索居民和波兰人的重大反俄罪行;此举证明,在俄国的语境中,俄国人对原来殖民地子民的态度几乎没有得到重新评价。^②

苏联的解体和接踵而来的在高加索的“新”国家的诞生带来了变化的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庞大的苏联解体的时候,连亲俄的亚美尼亚人也没有选择和俄国结盟。在高加索以及在前帝国的西部,俄国明显地扩张过度。虽然俄国的军事资源和狡诈的外交手腕曾经征服了这些地区,把殖民依附政策强加给了他们,但是,长远的前景却显示出,在 21 世纪,在这些地区和其他的地方,俄国的作用会急剧缩减。^③ 和其他帝国的境遇一样,俄国人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过度扩张的牺牲品。转述斯大林的话:俄国人的性格之对于高加索,犹如把马鞍套在牛背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头牛虽然衰弱,却还是把这个鞍子甩了下来。然而,高加索的后殖民遗产充满了腐败、暴力和其他难以治愈的痼疾。^④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T. S. Eliot)指出,没有一篇文本是孤立的,它永远是在来自同一传统的其他的文本的背景上被感受的。与传统协同起来前进的能力(即使明显地反对也罢)是量度一位诗人的良好尺度。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作品和后来融入他们作品的态度共鸣,认为这样的态

^① Jesse and Betty Clardy, *The Superfluous Man in Russian Letters* (Lanham, MD: Univ. Press of America, 1980).

^② 1998 年秋天,俄国政府给波兰政府一个文件,硬说在 1919—1920 年波苏战争期间有 80000 名被俘苏军士兵遭到屠杀。

^③ R. Conquest, ed., 314-68; Robert Lyle, "World: Populations Shrinking in Eastern Europe, Russia,"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12 March 1999.

^④ Jeffrey Goldberg, "Getting Crude in Baku,"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5 October 1998.

度理所当然,因为和俄国的历史与文化关系密切。帝国的侵略性就是这样的一种突出的态度,充斥在各种作品之中,以至俄国人的目光视而不见。直到俄国人的民族意识使高加索战争内在化,他们才开始想到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帝国。对高加索的征服给俄国人带来了锻炼他们的殖民辞令和意识的大好机会。

- 81 萨义德指出,殖民者的话语,就是代表被征服的他者的这一文化特权。因为这一特权贯穿了外国和本国对俄国文学的评论(以及文学本身),所以高加索和其他被征服的国度的被淹没的历史就从学者记忆和大众记忆中消失了。波兰和帝国西部其他行省在世界话语语境中部分地重新获得声音,但是高加索却没有。在近期几代人的时间内,殖民主义的重大诗作和歪曲事实的干预,合伙制造出高加索的形象:混乱、分裂、罪恶、贫穷,属于俄罗斯联邦边远地带那些难以理解的和充满危险的地区之一。^① 这一观念常常推出这样的结论:还是由俄国人治理好。

^① 在后苏联时代,高加索的主要居民是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还有身为穆斯林的阿塞拜疆人,它们各自组成“联邦共和国”,除了殖民者俄罗斯人外,主要由占多数人口的民族和一些少数民族组成;但是,在高加索山脉北侧的许多民族和民族群体还依然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这些突厥民族中,至少有几个向往自己的国家资格,他们绝大部分是穆斯林。

第三章 日益巩固的幻想：俄国民族资格的新核心神话

——《战争与和平》

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国家的帝国制度的力量倾向于表现为具有想象力的小说作品。英国小说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占统治地位，而大不列颠是一个世界帝国。法兰西殖民帝国也同样刺激了法国重要小说家的出现。形成对比的是，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中，德国落败，而德国 19 世纪的小说也缺乏欧洲其他强国那样的作品；普法战争之后，德国的小说作品变得比以往重要。有人认为，表现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里的侵略态度也一向在小说里得到表现，例如，从理查德逊叙述的引诱或者密谋的引诱到狄更斯和萨克雷笔下海外商人的气势冲冲的多种诡计。^①

85

在俄国，帝国的对外扩张演变成成为艺术的资源。俄国的文化记忆点缀着献给为俄国的荣耀而战的武士的纪念碑，作家们为石柱柱脚提供了铭文。托尔斯泰的作品对帝国强力的传达方式对俄国人自我形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再次确认了这一形象的男性特质，及其与过往军事胜利的联系。

《战争与和平》是在俄罗斯帝国感觉最乐观的年代里写作和出版的。到 1860 年，俄国夺取了高加索最后的独立的山区，即西北格鲁吉亚的斯瓦尼齐亚公国，做好大规模争夺中亚的准备，争夺是成功的。在托尔斯泰一生的时间内，沙皇帝国兼并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西部各省，虽然举行多次起义，宣扬民族统一，但始终在帝国的牢固控制之中。1863 年的起义实际上确证了帝国的力量，并且因为没收了波兰、鲁塞尼亚和立陶宛贵族的几千个庄园，在经济上巩固了帝国。取缔东方礼仪天主教

^①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xiv.

和将其财产充公或转归俄国东正教这两种行为,也同样具有可观的经济和政治的意义。这些成功使对于丧权辱国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回忆相对地容易忍受。19世纪60年代,帝国消除了农奴制。还有,帝国境内的居民继续显著增长;在1850年和1897年之间,人口增长一倍。^① 社会强烈需要反映这些胜利事实的文学。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1855—1881),俄国的上层人士都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表现了一个有自信心的、欧化的、言语明晰的俄国,这个俄国目标郑重、但是声音适中,这个俄国放弃了表现在卡拉姆津的政治论坛或者普希金更加严厉的诗篇中的态度。正如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可能说过的,巩固民族的自我形象的条件是有利的。

《战争与和平》满足了俄国对帝国史诗的需求。这部作品促成了帝国本质的政治神话,构思出来适用于帝国成功的影像;在俄国文化语境范围之内,这部作品使得在言辞上反抗帝国的行动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这部小说创造的形象是,俄国作为一个国家,是十分仁慈的,没有重大的过失,住满了在“真实的”历史中行动的极为优秀的公民,所以,对它展开根本性的评判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战争与和平》的帝国主义根基提出质问,就是超越了讨论可以接受的界线。可以就帝国应该具备的政府形式进行争论、甚至争吵,但是,如果质疑这部小说里高度雄辩地描述的、称为俄国或者俄罗斯帝国的神话概念,那就超出了允许的限制。《战争与和平》表现出俄国的辉煌,打消了结束这一辉煌的任何的激进行动。俄罗斯国家显得是一个十分自信、永恒的市民集体,在和外界的对话中明确表示,对帝国合法性或者俄国民族边界的任何怀疑都是不允许的,正如在狂热的宗教仪式过程中对上帝是否存在提出问题之不合时宜。^②

《战争与和平》传递给俄国读者和外国读者的是对俄国国家地位的激情洋溢而富戏剧性的歌颂。像史密斯、哈斯廷斯、米勒和凯诺万这样很不相

^① 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Scribners, 1974), 13.

^② 对于俄国国家的基本情况持以批判态度的讨论很快变得激进、并且造成暴力革命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在这里。在俄国,为了展开批判,就必须离开能够被接受的讨论的界限,也就是一切可以接受的事务的界限。在西方,政治和经济的激进主义变成了主流的潜流之一,而在俄国,二者之间的隔绝深广,所以激进派觉得自己没有在任何的俄国的社会机构立足;因此,他们拒绝全部这些机构,想要清除它们,从头开始构建。

同的学者都提出，国家地位的观念在 21 世纪的社会扮演一种更重要、更古老的角色，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设想。本书序言中已经提出，国家一般都是凝聚在共同历史中的关键事件周围的，例如伟大领袖的生死，或者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之中的转折点。在这后一类的关系之中，战争及其损失或者收益都一向具有巨大重大意义。强化国家地位感的最有效的事件莫过于一个习惯于入侵他国的大国遭受往日盟国的入侵。《战争与和平》引用了全部这类的资料。这是一出大戏，备述盟国的变迁、惊奇、愤怒、苦涩和一次入侵后果所促成的社会总动员，这样的大戏提供了再度确立国家身份的最好的素材。不仅如此，这次的入侵还是由一个光辉的人物进行的，他征服了欧洲，变成了许多传说的原料；先是在他的手里遭受苦难，旋即又打败他，这些事实变成了一个民族史诗的首要素材。权威与真实的混合创造了俄国人那个正当感到自豪的家园形象。反抗并且打败一个欧洲强国这一史实乃是完全可以毫不羞怯地加以详细研究的成就，而且是确立俄国在欧洲的地位的成就。拿破仑的入侵提供了一次机遇，足以更新俄国的政治自我感受，并且附加了自以为是的一切合法之感——这是打败入侵者获得胜利的战争一般都会提供的感触。依靠一部伟大小说的神话语境，正好是一个强悍民族的需要。托尔斯泰把“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改编成为神话的做法给史密斯所说的一个民族的“核心政治神话”增添了光彩。在描写外国侵略和对侵略者施以惩罚之后，托尔斯泰也描述了几百个人物的宽阔场景；战争虽然造成中断和损失，这些人依然照常享受生活。这一手法给小说增添了一种附加的英雄气概。

在俄国文化内部和外部，在图书馆和教室中，《战争与和平》的在场，产生了一种超出属地文化最大胆梦想的一种“复合兴趣”。《战争与和平》告诉了无数的读者，俄国是一个人民都像卡拉塔耶夫和图申那样的善良而文雅之人的国家，不是“诽谤俄国者们”编造出来的侵略成性的庞然大物。现代精英都会看到，它的贵族“都像我们”。他们不造作、慷慨、勤奋，有无害的怪僻，比如保尔康斯基对法国派头和习俗的热衷。坦率而不羞怯的彼埃尔·别祖霍夫代表了有教养的俄国人：虽然常常有错误、也许还丢三落四，但是永远是诚挚而自然的。安德烈公爵是一个高尚的人，虽然有过知识分子化的危险，但是也有一颗高尚的心灵，而且，没有巴尔扎克、福楼拜、

莫泊桑或者萨克雷笔下人物特有的那种奸猾和双重人格。在《战争与和平》里,奸猾之辈很少,像贝尔格和库拉金这样的人,不过是托尔斯泰展现的恢宏场景上的光点而已。这篇以男人为中心的故事中的女人,都符合传统的期待,可以列入坚强的俄罗斯妇女的画廊(画廊是普希金开创的)。玛丽亚公主的完美,不比同时代西欧公主们稍差。娜塔莎·罗斯托娃高声而清晰地告诉我们,不必把她比拟成为别的人,她就是她自己,纯粹的俄国人,即使在细小的事务上有过失,比如和库拉金安排不当的往来,也是完全值得羡慕的。《战争与和平》充满阳光,又无浅薄之气,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一本伟大的小说,其中关于人性的知识毫不减少作者的乐观主义。应该重复指出,俄国政体大大地受益于托尔斯泰把深度与喜庆结合为一的能力,他的小说对帝国的再现,是作为真正史实牢固留存在读者的记忆之中的。

正如托尔斯泰所重新叙述的,法国的人侵巩固了俄国帝国清白的神话,促进了俄国帝国主义行径的合法化。《战争与和平》把反拿破仑战争的主要舞台——东欧——当作法定的俄国的东欧来对待。这部小说推迟了人们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俄罗斯帝国不同于居住了俄罗斯人的俄罗斯。托尔斯泰为普希金第一次说明的观感作出最后的润色,这就是:俄国单独地打败了法国人的皇帝,为欧洲的自由洒出自己的鲜血;还有,俄国不仅有能力保卫自己,而且也能挽救欧洲,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信念,此后一直在俄国人的民族记忆中徘徊。同样,因为有了《战争与和平》,帝国选择继续打击南方邻居、同时反抗拿破仑保卫自己这一策略从视野里消失了。一位作家,对于帝国在高加索的行径如此健忘,但是对于拿破仑对待俄国的行动却如此愤怒,显然是以帝国主义者的方式表达的。从这样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出发,托尔斯泰说服他的俄国(后来还有外国的)读者,关于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只有一个故事要讲述,这就是小说里正在讲的故事。

历史是共时的:随着时间展开。神话在永恒的现在时显现。它永远存在,像关于祖国的神话,需要保卫:神话是历时的。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用历史来强化神话,又用神话来强化历史,从而把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在这样的一番活动上,很少作家像他一样成功。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们似乎被浸沉在历史之中,小说描写内容标定在1805—1820年间,但是,同时,我们也接受了神话的创造性,这样的神话为我们把19世纪早期

的真实的俄国装扮成神话中的俄国,一个永远美丽的国家,居住着完美无瑕的人民。《战争与和平》提出俄国例外论,而同时保持了作为关于历史事件叙述的可信性。正是这种有想象装饰的关于现实的完美虚幻景象,给小说带来如此强大的面目。一位俄国评论家说,这是“当时俄国的一幅完整的图画”。托尔斯泰对此表示认可:“斯特拉霍夫把《战争与和平》置于顶端,按照社会舆论,它会保留在那里。”^①他还可以追加一句,他的个人成就成为俄国社会的成就,而且把俄国人的自尊心提高到一个以往从来没有达到的水平。

风景与稳定性

托尔斯泰的贡献始于把风景变成象征。俄国民族神话包含了丰富的、可以说是神圣的或者半神圣的地点:战场、圣城、圣河、圣湖、人造的纪念碑、俄国名人建造或者居住过的房屋、他们用过的家具、他们穿过的衣服、他们参加过的公共事件、他们写的手稿。社会学家指出,纪念碑和圣地加强某种共同身份感^②;拥有一定数量的这类地点,是一切文化的标准。一个民族要具有某种自我感,则某些地方就必须在一个民族群体的想象力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俄国人虽然也不是例外,珍重他们的圣地,或者建造纪念碑纪念他们的英雄,但是,他们不同寻常之处,是对这类活动入迷成瘾。布洛克笔下的库利科沃战场、散见于托尔斯泰长篇和短篇小说的战斗和风景、苏联对斯大林格勒的纪念活动(涅克拉索夫的小说《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都把大自然历史化,所达到的程度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们对于英国的风景、或者巴尔扎克与福楼拜对于法国的风景的描述中根本没有尝试过的。在果戈理的《死魂灵》里,乞乞科夫旅行穿过俄国大平原,这一平原后来获得了神话的地位。在小说结尾处,乞乞科夫的三套马车的形象变形:俄国突然以

89

^① N. N. Strakhov, quoted in Ernest Simmons, *Leo Tolstoy* (New York: Vintage, 1960), vol. 1, 313. Russian text of Strakhov's remark in N. N. Strakhov, *Kriticheskiia stat'i ob I. S. Turgeneve i L. N. Tolstom*. Kiev: Izd. I. P. Matchenko, 1901. Reprinted by Mouton (The Hague, 1968).

^② Smith, 213.

疯狂的三套车形象出现,奔向一个未知的目标,而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则躲到旁边,为它粗野的奔驰让路。《战争与和平》为关于圣地的记忆宝库作出重大贡献。

《战争与和平》里有几处地方,俄国的风景变成了备受尊敬的俄国的象征。广阔的平原,这里那里有丘陵起伏,但是大部分平展,有白桦树和森林点缀:这是真正的俄国,神话中的俄罗斯民族在这里度过一生的旅途。因此,彼埃尔在鲍罗金诺的经验大概是全部俄国文学中历史与神话的最强韧的结合。彼埃尔走上鲍罗金诺的山岗,俄国优美的风景令他迷醉。他看到了森林,“金黄的麦田里横陈着尸体”,科洛恰河和布满军队的斯摩棱斯克大路。^① 祖国无比美丽,但是也必须得到保卫。这一片风景催生出彼埃尔的神的降临显现。在小说中早一些时候,娜塔莎·罗斯托娃坐在奥特拉德诺耶(俄语 *otradnoe* 意指“愉快的”)庄园房屋窗户旁边,洒满月光的俄国田野尽收眼底。景色给了她飞翔的灵感,也把安德烈公爵飞升起来,因为他听到了娜塔莎的狂喜感叹。

在俄国民俗中,小白桦树象征了俄国性格,欧洲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用法。和小白桦树的邂逅是忧郁,方式却不见得不宜人。而橡树则是另外一个象征,是俄国繁育和丰富的象征,例如普希金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第一行:“海湾上屹立着一棵橡树……”安德烈返回自己在良赞的庄园的时候,看到了白桦树上的嫩叶,适时地感到忧伤,但是他和橡树的邂逅给他带来的是俄国风景提供给他的新生之感。上次他看见这棵大树的时候,大树树皮凸凹不平,枝条光秃,“巨大的、不优美的枝桠向周围伸展,很不对称,树皮伤痕累累。”几天以后,这棵大橡树就披上了“肥厚的深绿色树叶的华盖……欢快,并且……在夕阳的光线中抖动”。^② 安德烈公爵感受到了春天的喜悦和显灵,或者可以说是生命意义的揭示。

猎狼场面把集体精神和帝国式国家的特征——暴力倾向结合了起来。关于猎狼,有两篇著名的文学描写:一篇是托尔斯泰的,另外一篇是维尼

^① *War and Peace*, edited by George Gibian and translated by Aylmer Maude (New York: W. W. Norton, n. d.), 880.

^② *Ibid.*, 462.

(Alfred de Vigny)1843年的一首诗《一匹狼之死》。《战争与和平》里的猎狼仅仅是从猎人的观点被看待的,而维尼则让那匹狼说出充满生存焦虑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战争与和平》里几个最仁慈的角色都参加了猎狼:尼古拉·罗斯托夫(虽然我们都记得,他时刻准备好,皇帝一声令下,他就行动)、一位脾气很好的小贵族(娜塔莎在这位“叔叔”的住宅里表演过令人难忘的农民舞蹈)、罗斯托夫老伯爵和几个心地善良的农民。一群猎狗终于围捕了一批狼,一个农民,丹尼尔,兴奋地小声说:“把它捆起来!”于是一只脚踩住狼的脖子,把一根短棍子塞在狼嘴里,把他的爪子都绑起来,翻转一下,要放在马背上:

他们脸色兴奋、疲惫,把这匹还活着的老狼放在退缩又嘶鸣的马匹的背上,猎狗伴随着汪汪直叫;他们把这匹狼送到了他们要聚会的地方……猎人们带着捕获的猎物聚集在一起,都来观看这匹狼,它眉骨横宽的脑袋低垂,上下颚之间横着那根棍子,一双玻璃球似的眼睛瞧着周围这些狗和人。有人碰它一下,它被捆绑起来的四肢就挣扎着抖动一下,野性地、愣愣地盯着每个人。老伯爵罗斯托夫也骑马赶来,触摸了这匹狼一下。

“啊,多凶猛啊!”他说。“不是挺凶猛吗,啊?”他问站在旁边的丹尼尔。

“是的,阁下,”丹尼尔回答,赶快脱帽。

伯爵还记得溜走的一批狼,记得和丹尼尔的邂逅。

“啊,你倒是真硬朗啊,伙计!”伯爵说。

当然,丹尼尔没有说话,报以怯懦的、儿童般的、温顺的、友好的微笑。^①

在这一篇文学描写里很明显的是叙事者缺乏对动物的情感,这匹狼正在慢慢地窒息,因为被搭在马背上,头朝下,在流血,呼吸的空气不足。忽视这种细节的积习,肯定是俄国人在其历史中反复采取的帝国行动的特征。

^① *War and Peace*, edited by George Gibian and translated by Aylmer Maude (New York: W. W. Norton, n. d.), 553.

这匹狼被打败了，而猎人，从最低下的农民到贵族，关心的只有胜利的喜悦。意味深长的是，这个场景的最后的几句话说的是俄国农民温和善良的微笑，这个微笑使其成为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丘特切夫等人作品中那些温和善良百姓的近亲，而在《战争与和平》中，代表他们的则是玛丽亚公主聘请来的圣痴们。

相比之下，维尼笔下的狩猎不包含帝国的象征：这里的狩猎期待的是生存的坚韧，亦即维尼的同时代人克尔凯郭尔看待世界所依据的观念。在这里，也是一匹狼被杀死，周围都是猎人和猎犬，和《战争与和平》里一样。这匹狼连续中弹，被猎狗撕咬，被那些看着它在疲倦中倒下来的人刺伤。叙事人说，这匹狼短暂扫视一下周围，闭上了眼睛，死了，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在这匹狼死去之前，叙事者竭力观看它的眼睛，凭着它那目光重建这匹狼想要表达的内容：“你如果能够，就要学着/集中注意、多加思考/达到坚强的斯多葛观念水平/我达到了，生长在森林。/呻吟、哭泣、或者祷告，都是同样的怯懦/断然抛弃生活的负担/走上命运为你设计的道路/忍受、死去，不出一语，像我这样。”^①

亨廷顿谈到的文明之间的区别特别鲜明地表现在有关杀死一个捕获的动物的这两种景况的对比之中。在托尔斯泰那里，一个年轻的帝国及其国民在追击和消灭敌人上显示出了永不衰退的精力，他们完全不能和被他们打败的人认同。维尼显示出了体验他者的痛苦的能力，这样的品格对于帝国来说是致命的，乃是成熟的文化的特征。

对地方和行为的神话化进展得很快，但是拿破仑在俄国征战的经济原因却没有提及。法俄战争爆发，而两国同盟的失败：在1808年，这两个国家曾经秘密谈判瓜分土耳其。^② 压断同盟脊柱的那根稻草是贸易的冲突。俄国人不愿意削减他们和英国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其贸易政策有利于英国人，但是有损于法国人。拿破仑对英国的经济封锁，使得俄英贸易陷入困难和危险。1810年，亚历山大一世对陆运到俄国的商品——主要来自法国——课以重税。法国利益遭受打击之后，战争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托尔斯

^① Alfred de Vigny, "La Mort du Loup,"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66), 255-58.

^② Seton-Watson, 122-23.

泰模糊了战争的这些原因,把俄国描写成取得胜利者的牺牲品,却不是猎物和猛兽,因此,托尔斯泰变成了牺牲品身份概念的主导创建人,而这样的一个人身份,在俄国人的政治神话里扮演了实质性的角色。

他还重新确认,俄国人的牺牲品身份并不排除辉煌与成功,可以和自己乃是一个强大的民族这一自我感受并行不悖。《战争与和平》创造出一个象征的架构,俄国的帝国国家地位可以在其中安然定居。这一地位表述出容易被人接受的俄国史版本,其方式是国内外读者都容易理解的。多半因为《战争与和平》,俄国的核心神话的中心成分是外国的人侵和俄国的自卫。有人已经指出,创造这样的象征架构对于社会的自我理解和平衡是至关重要的。^①《战争与和平》确实把它所触及的一切都神话化了,同时又没有剥夺其历史真实性。它以宏伟的方式促进了有教养的俄国人的社会平衡意识,亦即一种俄国在欧洲历史中占有恰当地位的感受。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重构民族必备的政治神话以前,俄国精英们没有在自己文化范围之内展开帝国话语的经验。和西欧各国的历史长度相比,俄国的历史记忆的长度是相对短的,而这一记忆所包含的内容一向不适于通过艺术的媒介展示。虽然斯拉夫派努力通过求助鲜明的命运之理念来向俄国文化注入自信心,但是俄国充当仁慈帝国的自我宣讲,对于它自己的精英也还不完全具有说服力。问题的一部分是,如果殖民地靠近本土,帝国神话就难以确立和巩固:边界的任何的收缩,或者一个被征服民族想要获得主权的尝试,都被看做是对国家的威胁。一个大国和邻国和睦相处、开展海外传播文明的使命是一回事,一个国家不断地警戒怀有敌意的属地,是另一回事。俄国民族身份感大部分是现时的,但是这一身份的性质是有争议的。斯拉夫派运动本身就是对付帝国不稳定性和显出端倪的非持续性的手段。通过给神话添加一个据认为存在于罗斯根基之中的古代斯拉夫农村公社(mir)的办法,斯拉夫派试图对抗这种非持续性。^②他们只取得部分的成功。但是,《战争与和平》取得了成功。

91

92

^① Thomas Molnar, *Twin Powers: Politics and the Sacre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8), 135.

^② S. A. Grant 提出, mir 和 obshchina(公社)是莫斯科维的创造物,而不是古代的机构。“Obshchina and mir,” *Slavic Review* 35, no. 4 (1976).

《战争与和平》释放出一种恒定感和稳定感。就像小说所显示的，俄国文化呈现出泰然的状态。暴躁的韵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做好准备，提供出具有普遍性的行为范式，一如西欧作品过去所提供——一言以蔽之，准备充当领袖。虽然神话化成分强烈，但是小说去除了格林卡式的愤怒和那种煽动民族偏见的意图。作者把俄国表现为一个大国，满足于扮演发号施令者的角色，是普希金那一代的俄国人想要拥有的俄国。托尔斯泰的俄国已经有很多人享受现实的安全和尊严，回忆过往的动乱岁月。《战争与和平》巩固俄国人自我感受的作用类似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对英国人扮演的角色。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表现了辉煌的英国，通过它的王公贵族、武士和丑角，他们不多考虑自己的失败和成功，也不在乎他人的评判。《战争与和平》所提供的论述模式早就在世界上占有立足之地，不需要小心提防是否符合世界的接受标准。一部小说不足以令这类挥之不去的疑团消退，但是托尔斯泰的作品迈出的步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部小说所捕获的帝国荣耀使它在俄国社会一切阶层中受到持续的欢迎。列宁喜爱，索尔仁尼琴亦然。

新颖的具有感染力的韵调甚至在第一章里就已经鲜明。一位批评家曾经说过，这样一个宏伟的巨著竟然以这样的琐碎的谈话开始，而且用的还是法语，真是奇怪。但是，貌似细弱的开端决不是琐碎的：它显示出俄国社会上层在国际性的环境中活动，以同等身份对待外国贵族，在国际政治的深水里优雅地航行。安娜·舍勒客厅里的客人不再限于英国旅行者对于“粗糙野蛮王国”的描写和米什莱对俄国人残暴的诅咒。他们在欧洲权力建构中的地位不再受到猜疑。第一章是关于俄国出类拔萃之辈的声明，言下之意是他们不必再愤怒，像普希金那样。他们来了。

意味深长的是，小说的开头的几句话用法语写成，说话的人是俄国人，却用德国人的名字。晚会邀请书是用法文写的。同样，安德烈公爵和毕礼宾（模仿俄国奸猾的外交专家戈尔恰科夫亲王）在关于1805年战役的超民族主义的谈话中，用的是法语，而不是俄语。在小说第一版里，随意散布着法语段落，后来，在故事里渐渐减少，表明在反抗拿破仑战争成功过程中和以后俄国人对法语的热情降低。这样的降低的情况也出现在朱丽·卡拉金娜和玛丽亚公主的通信之中。法文段落和偶尔的德文词句表明托尔斯泰安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俄国历史某些时期，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是说外语

的。两代人以前,这个事实引起关注,促使 19 世纪早期一位海军副司令亚历山大·席什科夫创建爱护俄语协会,这个面对时髦的、广泛使用的法语提倡俄语的尝试还信心不足。在 19 世纪 60 年代,俄语通行,不少有外国背景渊源的俄国人进入社会上层。取代了对俄国文化的法国化或者德国化,俄罗斯民族这些新增加的部分带来了某种西欧的光泽,就连帝国最排外、最惧怕外国的发言人也予以接受,视其为作为征服后果而有利于帝国各实体的利益之一。《战争与和平》中的主要人物之中如果有谁像席什科夫那样保卫俄语的话,其他的人必定是大惑不解的。

让我们思考一下上述法文通信对俄国文化的含义,通信人什朱丽和玛丽亚,两个淑女,都是俄国人,有教养。这两位未来的主妇、养育上层社会儿童的妇女,在自己的语言里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少女的种种感情——这个事实是符合前普希金时期俄国的现实的。法文不限于交流青少年的思想感情:安德烈和彼埃尔也用法文通信,表明他们对 19 世纪早期的俄文里描写概念和细微差异的词汇有限感到缺乏耐心。这样的事态揭示了一种文化对自身的深刻的不满足之感。从语言学方面来说,亚历山大时代的俄国可以比拟为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在这里,英语或者法语是官方语言,也是教学语言,一直到、并且包括了 20 世纪。但是,俄国自己就是殖民地的老爷,作出姿态要削弱殖民地的原有的特征,把自己的特征强加给他们。在 19 世纪前半期的俄国文学中,在他者面前既感到自卑、又感到优越,这一情景出现过多次。但是,托尔斯泰已经不再受到它的威胁,读者也分享他的安宁之感。

第一章演习了史密斯所说的**民族特质**,表现了俄国社会上层和自己的对话。托尔斯泰笔下的这场对话是清晰的和世界主义的。安娜·舍勒是地地道道的俄国人:她完全服从于她诞生的国家。彼埃尔·别祖霍夫是一个缺乏社会风度的地产大财主,并不特别在乎社交方面的欠缺。必须具有民族自信,才能描写上层人士像一个乡下佬那样待人接物,也只有一个对俄国文化宗主地位深信不疑的作家,才能做到这一步,而不至于令帝国权威陷入险境。如果托尔斯泰是在 18 世纪写作,就不会用如此模糊的光线来表现叶卡捷琳娜的“贵人”的子孙。在叶卡捷琳娜时期和更早时期的文学中,作为文学人物,而必定“现身于大庭广众”之中的全部俄国人,都要沿袭自我膨

94 胀的传统,趾高气扬。在海拉斯科夫的悲切的《俄罗斯颂歌》中,或者苏马罗科夫的庄严的悲剧中,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像彼埃尔那样,是要令人感到难堪的,因为这些作家的目标是向全世界和俄国人自己显示,俄国是一个教养优良的国家,熟悉西欧的文学时尚。卡拉姆津的《苦命的丽莎》(1792)模仿了理查德逊的《帕美拉》(1740);苏马罗科夫的戏剧作品则是高乃依(Corneille)和拉辛(Racine)悲剧的迟到的回声。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受到欢迎,部分原因是其主角老于世故,感受寂寞无聊的时髦通病,因而是十足的欧洲人。《叶夫盖尼·奥涅金》的人物都是高度定型的,完全不是现实主义的,包括塔吉娅娜;作者告诉我们,她有一个俄国人的灵魂,但是风度却是19世纪欧洲外省教养良好少女。普希金严格遵守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规则,因为他羞怯地说到塔吉娅娜这个名字之对于一件诗歌作品来说,是不够典雅的。

托尔斯泰笔下没有这类的人物和忧虑。他深信,俄国是一个大国,用不着追随他人,只是要求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把这一信念传授给了读者。叙事者把我们从安娜·舍勒的客厅引到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的庄园时候显露出的轻松感,确认了作者面对欧洲文化时候的自信。保尔康斯基是亲法国派,一成不变,用不着辩护或者解释,不像奥涅金;奥涅金的教育过程得到了详尽的描写,以求说服读者(语气有点挖苦,也没有人介意),确实是符合欧洲的标准。在叶卡捷琳娜时代,保尔康斯基的亲法作风大概被看做是对外国习俗的奴性的模仿,是像席什科夫或者冯维辛那样的作者可能提出抗议的。到了亚历山大二世时代,俄国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容忍像老保尔康斯基这样狂热的亲法派——特别是因为,他不同于奥涅金,在内心里依然是一个俄国爱国者。俄罗斯帝国的身份现在已经牢固树立起来,所以一个个体可以既是爱国者,又是亲法派。托尔斯泰的人物现在充当什么人都随便,而且,同时,他们可以安然结识不是俄国人的女士。所谓确实可信,所指就是:在和他人的关系之中,知道自己的地位。托尔斯泰把俄国贵族描写得真实可信;在他的时代,这是在世界文学中立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所谓的世界文学的大道,两侧都是林立的帝国,其代表乃是他们最有才华的作家。

安娜·舍勒沙龙里最初的场景可以比拟为室内乐,而描写奥地利、德国

和俄国 1805 年联合抵抗拿破仑的战役的章节则是交响乐了。俄国第一次被显示为西方的一个活跃的朋友,国际游戏的参与者,与西欧列强荣誉联合的盟友。对奥地利人的描写稍微带一点放松的傲慢,这是俄国文学里以前闻所未闻的——在俄国文学里,西方或者受到崇拜,或者遭到诽谤。俄国驻维也纳外交家毕礼宾没有被看成异国的怪物,而是比欧洲上层人士高一节子的一个贵族:叙事者提示,毕礼宾的话在维也纳的沙龙里到处传播(注意:在小说原文里这句话是法文)。^① 莫拉维亚小城布尔诺(捷克语是 Brno,德国人改称 Bruenn[布伦],俄国人改称 Briunn[布留恩],整本小说都这样用),毕礼宾就驻守在这里,把这个城市称为“这个可怜的莫拉维亚黑洞”——当然是用法文表示的:ce villain trou morave。^② 毕礼宾对近期来自维也纳、并且小看布尔诺的外省气氛的俄国贵族青年这么说。他们欣赏圣彼得堡宫廷的活跃的气氛,一个中欧的中等城市在他们看来显得就是外省。当时,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都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比起巴黎或者维也纳,的确就是外省,但是却完全适合欧洲的文化标准,这是几代人以前俄国人所没有达到的。托尔斯泰把一个帝国的自信心成功地投入了拿破仑时代,而这种自信心只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很久才稳固下来。实际上,拿破仑时代的俄国军官依然是以敬畏的眼光看待外省般的西方的。一位在艺术上技巧不太熟练的观察者,纳杰日达·杜罗娃(Nadezhda Durova)在《日记》中说,她在俄国西部邻居看到了完善、物质的丰富和良好的行为方式,而这些,在国内几乎是找不到的。^③ 但是,《战争与和平》里的俄国人对待西方人是傲慢的。

在这样的语境中,托尔斯泰对历史的思考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思考是掺进小说的帝国自信心的最高表现。托尔斯泰的见解是从一个巨大的和取得胜利的国家提供的论坛上发出的。他的解释的含义就是:数百万人的行动把俄国引导到了今天的荣耀地位。毋庸置疑,满足于现状的各民族和

① *Voina i mir*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63), vol. 1, 163; *War and Peace* (Norton), 163-64.

② *Voina i mir*, vol. 1, 169; *War and Peace* (Norton), 169.

③ Nadezhda Durova, *The Cavalry Maiden: Journals of a 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 translated by Mary Fleming Ziri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89).

社会阶级一定要更多地宣告,亚历山大对拿破仑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宣告得多于在权力游戏中遭受失败的国家和阶级。托尔斯泰引证历史正义和历史逻辑,是为了支撑俄罗斯帝国;如果俄国人在拿破仑战争中失败,显然他就不会这么甜言蜜语了。他的历史观的含义是胜利者纪念碑式的、不可避免的前进,这样的前进理所当然得到一位帝国代言人的推动。

小说人物和历史人物

托尔斯泰包罗万象的叙事不限于浩大的场面。他屈尊描写俄国贵族的日常欢乐和操劳。在这方面,他的小说细微地有别于 19 世纪西方小说;西方小说主要描写的是中产阶级。区别纲要如下。

有人已经指出,每种发展良好的民族神话都产生可以称之为百姓文化的东西^①,涉及一个时期男男女女日常生活。西方小说对这一文化的贡献是关注于新的社会阶级的生活,而不是贵族的生活。19 世纪的英国小说一再向读者记忆输入可以接受的和希望达到的某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这一生活方式产生的许多习俗与礼仪。每个人都能够采用这些礼仪,比如,中产阶级风度在几代人时间之内点点滴滴地渗入英国社会的最低阶层。17 世纪的荷兰绘画走得更远:让观众接受平淡无奇的活动,例如清扫、烹调、进食、在家庭环境中享受家园氛围。在弗美尔(Jan Vermeer)的绘画《厨房女佣》(约 1660 年)中,我们不仅得知当时的一个荷兰厨房内部的样子,而且也学会赏识里面完成的简单的工作。这幅绘画赋予厨房工作某种尊严,把这里的工作从无名和无形提高到艺术再现的尊严。这是文化的民主化,意指甚至社会最低下的工作也值得得到尊重和回顾。

这样的普通家庭生活场景在俄国,在《战争与和平》中,也得到了描写。但是,是深刻有别于中产阶级接受厨房杂活儿的态度的。在某些方面,这是日常生活的波将金化(虚假矫饰化)的版本。这里借助于叶卡捷琳娜情夫

^① Peter J. Taylor, *The Way the Modern World Works* (New York: John Wiley, 1996), 193-211.

的名字,因为《战争与和平》读者喜闻乐见的罗斯托夫一家令人羡慕的家庭生活方式,其实极为单薄。奇怪的是,在这里不见餐具洗涤和清刷地板,而实施这类家务劳动的俄国人的百分比极低。《战争与和平》描写了几百个上层家庭,不是俄国城市居民,或者小土地所有者。娜塔莎·罗斯托娃的自然大方掩盖了促成这一自然大方仪态的无数仆人的辛劳。相比之下,西欧的小说包含了城乡中产和下层阶级的更多的代表人物。英国小说尤其如此。在狄更斯、萨克雷或者奥斯丁的小说里,国王和王后及其宫廷官员都不是作品人物。王室和贵族细小和难以猜测的世界对于大部分西方小说家都是封闭的,因为小说家个人的生活同样展现在乡绅或者城市中产阶级圈子之内。在俄国,情况不是这样,在俄国,实际上当时不存在中产阶级。出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家庭属于俄国社会的百分之一这样小的一部分。这些人十分接近这个独裁者,所以在小说中他出现在几个场合,和他们谈话,参加他们的活动。而在现实生活中,托尔斯泰的妻子拜见过皇帝一次,请求批准出版她丈夫的小说。但是,《战争与和平》的西方的读者感觉这些特殊的关系是典型的俄国的现实,就像狄更斯或者奥斯丁笔下的人物代表了19世纪的伦敦或者英国的乡村的典型一样。因此,斯特拉霍夫(Strakhov)认为,这部小说是“人类生活的一幅完整的图画。是当时的俄国的一幅完整的图画。”他只是部分地正确。^① 同样,皮萨列夫(Pisarev)在对《战争与和平》的评论中也没有能够区分开俄国地主和俄国贵族。^② 这样微小的疏忽被后来的批评家放大,他们制造了一种概念,说《战争与和平》反映了普通俄国人的生活,就像荷兰现实主义绘画或者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反映了荷兰或者英国的日常生活一样。这就给托尔斯泰指挥读者的感受力的能力增加了一分。

就这样,在《战争与和平》中,上层社会不仅成熟,而且变成了一般俄国人特征的象征。普希金嘲讽当日老练俄国人的口头语:“他父亲……一年开三次舞会……‘女士’(Madame)瞩目于他, / ‘先生’(Monsieur)从她手里

① Simmons, *Leo Tolstoy*, vol. 1, 313.

② Pisarev, “Old Gentry” [“Staroe barstvo”], in *War and Peace* (Norton), 1377.

97 接过孩子。”^①形成对照的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描写了贵族儿童的教育,认为符合俄国人的需要,而不管是否从西方引进。西方教育出现,但是仅仅是作为人物的俄国身份的一个补充。罗斯托夫家族排演了“家,甜蜜的家”的主题,这在以往的文学里是没有的,用的是俄国的方式,娜塔莎的第一次“不妥”出现预示,俄国贵族的家庭生活有别于西方。

《战争与和平》里有许多上层的儿童,养育他们则是俄国家庭生活新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托尔斯泰一生的时间里,俄罗斯帝国的人口增长是空前的,作者本人也遵从这一主流,养育十三个孩子。表现几代人的变化是建立信心的手段,而儿孙满堂则意味前途希望远大。托尔斯泰把各个年龄段的儿童收入小说的能力很突出,同样突出的是他表现了儿子取代父亲、女儿取代母亲。19世纪俄国小说的特点是描写几代人,似乎也是为了回应那个时代人口的增长活力。让我们引用霍尔魁斯特(Michael Holquist)的话:生儿育女的民族神话,永远包含几代人,以及儿子辈变成父亲辈的过程。^②20世纪俄国小说(以及西欧小说)中缺少这样的段落,正是符合了20世纪后期欧洲特有的人口负增长。

与此相联系的是,我们不由得要问,萨义德概括的《曼斯菲尔德公园》问题是否也存在于《战争与和平》。是不是一部分殖民地收入促成了人口令人称心如意的增长?彼埃尔·别祖霍夫这个高大的人,全部俄国文学里最可爱的人物之一,是秘密地依靠着丧失了土地的人民的血泪和汗水的吗?回答是肯定的:彼埃尔的巨大财富来源于他父亲给予他的同样巨大的财富。他父亲,别祖霍夫伯爵,是“叶卡捷琳娜时代四远驰名的大贵族”。^③别祖霍夫的土地是叶卡捷琳娜赐给的。一小部分位于莫斯科附近,大部分靠近基辅。1793年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的结果是俄罗斯帝国割去基辅以西、以北和以南的十万平方英里(26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土地(在1793年,基辅城市是在波兰一立陶宛王国和俄国的边界地区)。^④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的

① Pushkin, *Eugene Onegin*, translated by Walter Arndt (New York: Dutton, 1963), 7.

② Michael Holquist, *Dostoevsky and the Nov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7), 165.

③ *War and Peace* (Norton), 9; *Voyna i mir*, vol. 1, 12.

④ Davies, *God's Playground*, vol. 1, 537; Chew, *Atlas*, 61.

鲁塞尼亚人地主被大规模剥夺财产,从而使得叶卡捷琳娜能够把原来属于这些地主的一百万农奴分配给她的贵族们。从《战争与和平》里我们得知,彼埃尔的绝大部分农奴居住在基辅省。^①从波兰一立陶宛王国地主手里强力夺取的土地和人民在别祖霍夫的生活里扮演的角色,就是安提瓜岛上种植园的奴隶在曼斯菲尔德花园雅致整洁的环境里扮演的角色。所有权的变化给农业纳税人带来新的困苦(俄国贵族是不纳税的,他们的农民纳税)。给彼埃尔带来特权的财富来源于充满恐惧、愤怒、损失和灭亡的故事(不是托尔斯泰讲述的)。俄国征服波兰领土西乌克兰之前的暴力给失败者带来说不完的苦难。在小说里,好战的、军国主义的俄国夺取波兰和乌克兰土地开辟殖民地的行为依然是读者看不见的,正像使得曼斯菲尔德花园运转得十分顺畅的机器依然是英国读者看不见的,或者说,直到后殖民批评家的冷峻目光给奥斯丁的小说带来以往没有得到注意的一个维度。《战争与和平》未来的批评家也许会同样地注意到这部小说精心避开的空间。

俄国国家地位的神话在读者想象力中的巩固,如果不引进纵向的族群或者下层阶级的习惯和记忆,就是不完全的。在《战争与和平》中,农民扮演了次要的角色,他们大都是面目模糊、粗鲁无文的,如在波古恰罗沃的场景。但是,卡拉塔耶夫却是迥然不同。他也不同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里的农民,他完全不像普希金《叶夫盖尼·奥涅金》中那个刻板的奶娘。卡拉塔耶夫是一个智者,他恰当地促进了彼埃尔的精神的发展。他在小说里的作用是指出:俄罗斯民族没有得到歌颂的英雄们来自社会最下层。卡拉塔耶夫志愿参军,使得兄弟的家庭免于解体。他和彼埃尔分享自己一份很少的食物。在危难当头时刻,他表现得精神高昂,他注意到了彼埃尔在被俘后的无奈和孤独。他身上有汗水味,不穿袜子,用包脚布很熟练。

这些现实主义的片段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彼埃尔和卡拉塔耶夫之间的兄弟情谊是绝无仅有的。在现实生活中,伯爵与农民之间的情谊,即使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也是少见的。在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描写的监狱环境中,农民是痛恨贵族的。虽然有这些告诫,卡拉塔耶夫还是轻而

^① “Uekhal v kievsuiu gubernii, gde nakhodilas bolshaia chast ego krest'ian.” *Voina i mir*, vol. 1, 401; Norton, 409.

易举地扮演起典型俄国农民的角色,而且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评论试图把他从这个位置上拉下来。更有甚者,托尔斯泰的叙事者在说服我们,卡拉塔耶夫对彼埃尔怀恻隐之心,因为他看到,彼埃尔是一个贵族,没有准备好当战俘,忍受路途艰辛。就这样,这两个不太现实的兄弟变成了有关俄国人跨越阶级界线团结一致的神话的来源和确认的依据。

乞灵于纵向族群的另外一例,关系到娜塔莎,小说里最迷人的女主角。在这里,严格的阶级划分的现实被抹去,俄国民族地位的神话占了主导地位。在现实生活中,俄国经济的落后造成生活水平千差万别,因而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趣味与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区别。然而,娜塔莎·罗斯托娃女伯爵在她“叔叔”的茅屋中的舞蹈却是俄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最成功的文学宣言之一。叙事者问道:“这个年轻女伯爵,受到了一个移民的法国家庭女教师的教育,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怎样从她呼吸的俄国的空气中吸收了那种精神,获得了让人想到现代舞步早已经抹掉了的那种舞姿呢?”^①这个舞台没有得到回答,但是我们用不着操心,因为彼埃尔和卡拉塔耶夫之间突出的战友精神不是都能够说服我们吗?虽然没有历史事实的支持。在以前的几章里,娜塔莎第一次参加一个盛大的舞会,舞会不能容忍俄国舞蹈。娜塔莎作为一个特殊富有和细腻的人物著称的原因之一是,她可能是一个骄傲的贵族(拒绝和玛丽公主交朋友)和一个能够和农民同娱乐的朴实少女。她比其他任何一个角色都更多地象征了俄国——当然是神话的俄国,不是政治的或者社会的俄国。

托尔斯泰比初看上去更有意识地推出这些新的俄国形象,表现在他很细心的把历史和神话分配给各个不同的人物和情节。他为自己制定的任务就是把民族的神话记忆注入历史的表象中去。这涉及一种能力——构想人物的发展的方式,在他们和记忆中的历史之间创造某种想象的结合。《战争与和平》中人物的遭遇并不就是把色彩喷洒在历史事件的广阔背景上,而是轻微改变历史(有时候并不十分轻微)的、目的性明确的行动。斯密斯指出,把小说人物镶进历史的叙述之中,是增进民族政治神话的最有效的方法,而神话因此又增添了自己的生命,最后变成“现实”的一部分。托尔斯

^① *War and Peace* (Norton), 564.

泰对历史细节的注意，他塑造像别祖霍夫和卡拉塔耶夫这样的人物的能力，以及对像拿破仑和库图佐夫这样的历史人物重新勾勒，都给俄国文化语境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度。托尔斯泰协调了小说人物的生活故事和拿破仑诸事件的兴衰，令他的小说人物扩大历史的因果性。这样，个人的故事就和拿破仑时代的详细的“真实”故事成为共时的，而同时又以历时的方式表现出来，显得是随着时间展开，并且受到也是随着时间态势展开的多数事件的影响。凭借这样的做法，托尔斯泰给 19 世纪的俄国历史增添的一个神话的维度，就像吉普林把“善良的”殖民主义的神话加诸于英国对印度种种措施上一样。

让我们看看在图申上尉身上历史与神话的鲜明的交界面。他第一次出场是在安德烈公爵检阅军队的时候：他没有穿皮靴，感到难堪，肮脏、矮小、微不足道，但是他长着“一双又大、又聪明、又善良的眼睛”。我们就想到，他会变成一个英雄，在战争里扮演一个角色。自然，以下的几十页就断断续续出现了奇异的巧合会见和事件，确认了图申作为士兵的地位，和他在赢得一场战役中扮演的关键的角色。图申的上级误解了他，但是托尔斯泰排安德烈公爵救助他。图申遭受指挥官巴格拉吉昂斥责放弃了大炮的时候，安德烈解释了实际情况，功绩得到表彰。图申凝聚成为俄国士兵的定型——更概括地说，凝结为一个俄国的“小人物”，这些人的坚韧、智慧、对祖国的忠诚和常识带引俄国穿过历史的疾风暴雨。图申被描写得引发我们的同情：他很谦虚，在争取个人利益方面笨拙；我们可以把他归于同类的人物，例如果戈理的阿卡吉·阿卡吉耶维奇·巴什马奇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马卡尔·杰乌什金以及其他中下层阶级的人物，这些人受多方压迫，代表了忍受苦难的俄国。但是图申也是一个英雄，一个保卫和拯救了祖国的人；他又值得钦佩，又值得怜悯。这类的定型人物缓和了俄国给我们留下的形象，这些人强化了侵略的隐蔽性，把俄国温和和自卫的姿态推到前景。

或者来看看在从莫斯科撤离的时候娜塔莎做出来的关爱和俄国爱国主义的象征性的姿态。娜塔莎吩咐把家庭财产从载运罗斯托夫一家离开莫斯科的大车和马车卸下来；在这一时刻，她不仅把自己镶进正在临近的历史事件，而且也增进了俄国国家组成部分的神话情结，就是说，俄国人爱祖国胜过个人

财产。娜塔莎要带走的是俄国的伤兵，而不是私人财产。娜塔莎的姿态凸显了、强化了、神圣化了俄国人把俄国的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能力。

关于库图佐夫在奥斯特里茨败北中的作用，托尔斯泰显示出来的突出的审慎，是构建威望战略的另外一个事例，这战略就是：把具有创造性的小说纳入历史的表象。托尔斯泰知道，这位俄国将军是这一战役中联军的首要战略家，但是他压制了这一信息，取而代之的是提出奥斯特里茨战役败北，归咎于奥地利人。同时，在小说中，另一战役——乌尔姆战役中首席指挥官马克将军的作用得到突出描述，但是，无论从叙事者这里还是从某一个人物那里，我们都无从得知库图佐夫就是奥斯特里茨战役的首席指挥官。托尔斯泰的小说扩大了库图佐夫是一个伟人的传说，而这个神话已经成为俄国民族神话的组成部分（这一民族神话里挤满了有军衔的人士）。在现实生活中，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灾难是空前的。从数字代表的力量和所占据的位置上判断，联军似乎必胜无疑。拿破仑的军队比联军人数少得多，长途行军后疲惫不堪；原来驻扎在山谷里，地形不利，在普拉岑山脚下，普拉岑后来还是遭到了攻击。在这样的条件下打了败仗就是军事才能低下的表现。虽然讲述真实历史的著作堆满学术图书馆参考图书室，但是《战争与和平》仍然塑造了千百万人的观念，而俄国文化对于这些人是十分生疏的。单靠《战争与和平》，库图佐夫就变成了一个英雄，不仅对于俄国人，而且也是对于赞同托尔斯泰以长官式意志来表现那一历史时期的人，都是这样。拿破仑在俄国最终的失败是因为库图佐夫的光辉的计划、还是俄国的严寒、还是伟大战略家们有时候犯的难以解释的错误（造成崩溃）之一，依然是值得讨论的。至于托尔斯泰，他不允许我们怀疑库图佐夫就是一个高超的将军、一个战争英雄，拿破仑是被他打败的。应该给托尔斯泰混合历史与神话的本事再加几分。

和对于库图佐夫的光辉描写形成对照的是，《战争与和平》大概提出了文学对拿破仑的最低下的描写。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奥斯特里茨的这位英雄是一个自高自大的、愚蠢的、肥胖的侏儒，既不懂得军事战略，也不懂得生活。在《日记》里，托尔斯泰比在小说里咒骂得更凶。托尔斯泰读到的关于拿破仑的材料差不多就是俄国官方拿破仑战争史学家米哈依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A. I. Mikhailovskii-Danilevskii）的著作和迪耶尔（Adolphe Th-

iers)的《执政府与帝国的历史》,但是,他依然对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作出下列对比^①:

[拿破仑]:一个爱虚荣的法国恶棍。

全部简报故意制造出来的虚假。普赖斯堡的和平是用欺骗获得的。在阿尔戈尔桥上,他倒在水坑里,没有抓住军旗。一个糟糕的骑手。在意大利战争中卷走了绘画和雕像……看见死人和伤兵就高兴。娶了约瑟芬娜——社交成功……在圣海伦娜岛彻底发疯,健康每况愈下,鄙微低俗。谎言和伟大,因为地盘大,但是在行动地点狭小的时候,他的微不足道就变得明显。死的十分无耻!

亚历山大,一个明智、友爱、有情意的人,从高尚中寻求规模的宏大,寻求人的宏伟……为欧洲的复兴制订计划……顺利、凯旋、伟大、恢宏,都令他谨慎诚恐,寻求人的伟大——精神的伟大。^②

关于拿破仑的卑微和亚历山大宏伟的这些私人见解塑造了《战争与和平》中俄国权威的形象。取得权威的方法是贬低他人;如果不是因为有托尔斯泰的小说技巧,这样的方法会令批评家不齿的。虽然说英语的世界分担俄国人对这个法国野心家的厌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将领。奥斯特里茨战役被公认为历史上伟大战役之一,关于这一论题经典著作里都要论述的军事战略的范例。^③ 在对待士兵和将军方面,拿破仑不是一个恶人。他的行为和言语确实有好大喜功之嫌,这是当权派们的共同特点;拿破仑比一个装腔作势者重要得多。他绝对不是要摧毁欧洲文化:他的目标是自我扩张,把新的皇族强加给欧洲。他干涉这些王朝的变迁行动没有摧毁民族身份和主权;相反,开创了新王朝的他的几位将军变成了其他民族和国家备受尊崇的成员。但是,在《战争与和平》里,拿破仑被描写成了一个眼界狭小的小丑,一个呆子,专门喜好空洞的姿态,却没有能力

^① R. F. Christian, *Tolsto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9), 111.

^② *Tolstoy's Diari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 F. Christian, vol. 1 (New York: Scribners, 1985), 182-83.

^③ R. E. Dupuy and T. N. Dupuy, *The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from 3500 B. C.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7), 747-50.

捕捉军事策划的周密细致要求。先知库图佐夫和小丑拿破仑对决:拿破仑却在奥斯特里茨大胜,真是匪夷所思。库图佐夫被描写为一个沉稳的天才,而且也不免于低俗的情欲(如在和牧师妻子的在一起的场面,据说,库图佐夫在她丈夫的默许下,和她做爱),但是,他的“基本选择”是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保卫祖国。而拿破仑却是不可救药的。他给人的无能的印象因为关于拿破仑大军的错误统计而被强化:托尔斯泰说,是四十万,而不是八十万。^① 历史学家们一般都是对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但是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把库图佐夫当作拿破仑的对手,后来成为他的上级:这是对法国人的皇帝又一次细微的贬损。

102 把神话写进历史的过程也明显见于俄波关系。托尔斯泰把这一主题用于平衡思绪的方法是可观的。小说里有几个关于波兰人的细节,在拿破仑征战过程中,他们为俄国效劳。他们大部分人是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地主,俄国人的保护维持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的的稳定。而识字和半识字的波兰人居民的绝大部分是坚定的亲拿破仑的。波兰的民族记忆强调了波兰人大量加入拿破仑的军队:大约八万人,占拿破仑入侵军力的五分之一。拿破仑大军途径华沙大公国和立陶宛前往莫斯科的时候受到广泛的支持,尽管这些地区因为战争、三次瓜分和财产惨遭抢劫而十分贫穷。拿破仑选择北部的而不是南部的路线前往莫斯科,大概原因之一就是预计能够得到波兰人的热烈支持。但是这样的自发性的支持被托尔斯泰的帝国大笔从小说里删除,所以,特别是外国读者,永远不会得知事实真相;他们只知道维拉尔斯基们、普日比舍夫斯基们和克里查诺夫斯基们(注意这后两个姓氏的拼写在托尔斯泰的文本中被俄语化)依然为俄国效劳,充当将军(上列的后二人)、或者政治家(亚当·查托雷斯基和杜撰的人物维拉尔斯基伯爵)。托尔斯泰描写了俄国人在维尔纳(维尔纽斯,维尔诺)受到了热烈欢迎,但是,只字不提拿破仑在同一个城市里得到的热烈支持。因此,读者所听到的是托尔斯泰权威的声音:说在拿破仑前往莫斯科的道路上,不存在遭受殖民统治民族对俄国人统治的反抗。首先,根本就没有遭受殖民统治的民族:俄罗斯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和俄罗斯人的俄国毫无区别。排除历史信息,

^① *Voina i mir*, vol. 2, 89.

制造团结抵御外国入侵的印象。仅仅熟悉俄国人对拿破仑战争的叙事(或者说可以说完全不熟悉这个议题)的读者,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在拿破仑远征或者19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重要行动中波兰人没有扮演重大的角色,波兰人不过是边缘民族,没有可资乐道之处。

无论对波兰人、还是立陶宛人,托尔斯泰都丝毫没有同情之感,这显示在一个事实之中:1863年一次重大的波兰起义爆发,他就准备离开年轻的妻子和几个孩子(并且中断写作《战争与和平》)。在1863年致费特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波兰问题,你是怎么看的?……糟糕的很!我们……不是有义务从墙上长锈的钉子上拿下刀剑吗?”^①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写道:“波兰人正在受到镇压,这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②瓦茨瓦夫·莱德尼茨基(Wacław Lednicki)认为,托尔斯泰对波兰人的态度的特点就是俄国人对这个民族的标准偏见,而他提供了详细论据,证明的确如此。^③莱德尼茨基说:“(托尔斯泰的)嘲讽取代了更为公正的态度,亦即对遭受三次瓜分后波兰悲剧性的政治状况的理解。作为子民,波兰人不得不依赖亚历山大一世;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拿破仑能够给他们的国家带来解放。”^④遵照典型的帝国主张气势,对于从属国家人民必须选择的行动之范围十分有限的事实,托尔斯泰一直不闻不问。他只熟悉胜利的国家,而他对待他者的态度或者是藐视加嘲讽(拿破仑),或者是悉数排挤关于帝国的非俄罗斯人子民的不便使用的事实。

103

把关于波兰的叙事从记忆的历史删除的做法,得到了《战争与和平》的激励。在《战争与和平》写作期间,这样的叙事已经被认为很不切题,因为在一系列惨遭失败的起义之后,波兰的软弱是明显的。帝国从天而降,可以用强大的声音言说,压倒惨败者的声音,否定他们的文化——即使被征服的民族在文化上扮演主要角色,也在所不惜。大帝国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对于历

① “Chto vy dumaete o polskikh delakh? Ved' delo-to plokhho, ne pridetsia li nam s vami i s Borisovym snimat' opial' mech s zarhavevshego gvozdia?” Lev Tolstoi,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61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hudozhestvennoi Literatury, 1953), 17.

② Tolstoi,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61, 115.

③ Wacław Lednicki, *Tolstoy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Hague: Mouton, 1965).

④ Lednicki, 36-37.

史的歪曲,就在于一系列的这种细小的调整,到后来形成一种局面,只有受到海陆大军支持的文化才能对观众言说。在随意调整这些事务的规模上,托尔斯泰大大咧咧若无其事,就足以显示出他的帝国式自信心。托尔斯泰无视帝国身旁的这根波兰蒺藜,表现帝国,似乎帝国在西部边界已经取得了稳定。^①

《战争与和平》里对波兰人的待遇和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对某些欧洲文化事件的分析呼应。试看萨义德对威尔第歌剧《阿依达》的评论。和欧洲货主订制的其他歌剧不同,这出歌剧是一位埃及人预订的,付给威尔第优厚的报酬。在为欧洲人货主创作的时候,威尔第注意脚本中出现的各种解释(他不愿意让这些脚本脱离歌剧所表现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内在的观点),但是在展现埃及的时候,他感受不到这样的限制。因为,归根结底,这个国家属于非欧洲的世界,对这位欧洲作曲家的要求或者是最低限度的,或者没有。^② 威尔第感到可以自由表现古代埃及,就像托尔斯泰对待俄罗斯帝国的非俄罗斯人统治区一样。因此,《阿依达》在开罗的首演变成东方主义的全部偏见的牺牲品。同样,在《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给中欧和东欧的历史强加了一种符合俄国政治神话的状貌。就像《阿依达》是一出伪埃及歌剧那样,托尔斯泰所轻描淡写的、又被俄国和世界读者所内在化的东欧和中欧的状貌就是对那一地区的东方主义化的实例。帝国的威望又挣了一分。

把拿破仑贬低成一个卑微小魔鬼和美化俄罗斯帝国巧取豪夺的故事,从两方面给俄国人的记忆又一次塞进必不可少的俄国民族神话的一个重要环节——沙皇及其子民这个环节。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中,切尔尼亚夫斯基(Michael Cherniavsky)指出,这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俄国的身份至关重要。^③ 亚历山大一世在这部小说里出现过数次,每一次的出场都证实了切尔尼亚夫斯基的分析。托尔斯泰是这样强化俄国民族神话的这一因素的。

① 在后来的作品里,尤其是在《复活》(1898)里,托尔斯泰改变了看法,在这里,波兰人是俄罗斯帝国最有价值的居民,叙事者显然谴责了对两个政治犯的处决——波兰人洛津斯基和犹太人罗左夫斯基。

② Said (1994), 117.

③ Michael Cherniavsky, *Tsar and People: Studies in Russian Myth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前不久,沙皇亚历山大检阅了俄国军队。在小说里,这是他第一次的重要出场。是在战役开始之前——也就是说,在俄国人被打败之前。如果亚历山大出场迟一些,则一场败仗会降低他的威望。托尔斯泰所选择的推出他的时机没有减少他作为俄国国家之父的荣耀。在亚历山大及其儿子上场的同时,还有奥地利的皇帝和皇太子,但是,和沙皇相比,他们缺少光彩。描写俄军和奥军语言都一样普通,“精明整洁的军队……几千双靴子和刺刀……军官文雅,涂了香膏”^①。奥地利人和俄国人都是良好的战友,团结一致,互相尊重,都是同样的文明,同等的欧洲人。但是,奥地利军队对奥地利皇帝的热情表现得有节制,而俄国军团对亚历山大到场则报以震耳欲聋的“乌拉!”俄国人说起皇帝来就热情洋溢,而奥地利人对自己的皇帝则是不冷不热。或者是俄国人更爱国,或者是他们的皇帝更值得崇拜: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得分的。再看看罗斯托夫的反应。

托尔斯泰是按照自己父亲的形象来塑造罗斯托夫的:他很和蔼,但是有点呆板。他没有安德烈公爵的清高、或者彼埃尔散漫和犹疑等这些毛病。他是俄国人的普通一员。作为一个正派家庭的一个成员,后来他得到奖掖,娶了一个有钱、有智慧和贤惠的妻子。因此,罗斯托夫对沙皇的态度就是普通人的态度。普通的俄国人遇到俄国的象征沙皇,反应都和一般俄国人一样,不论阶级和官衔高低:“罗斯托夫……觉得,只要这个人说一句话,全国广大群众都会赴汤蹈火、去犯罪、去死、或者完成最崇高英雄主义的丰功伟绩,所以,既然圣言在耳,他只能全身颤抖,心跳加速。”^②丰功伟绩或者罪行累累、赴汤或者蹈火、战死或者得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受到这个作为俄国身份象征的皇帝的指挥的。俄国就是沙皇,沙皇就是俄国。上帝和荣耀似乎都不足以成为问题。叙事者提示,为了沙皇,甚至可以以及应该——去犯罪。但是罗斯托夫是一个高尚的、性情良好的人,不会使用暴力、或者去犯

① *War and Peace* (Norton), 262. “Shchegolski vychishchenye i ubrannye voiska. . . tysyachi nog i shtykov. . . pripomazhennye, rasfranchennye ofitsery.” *Voina i mir*, vol. 1, 258.

② *War and Peace* (Norton), 263. “Rostov. . . chustvoval, chto ot odnogo slova etogo che-loveka zaviselo to, chtoby vsia gromada eta (i on, sviazannyi s niei – nichtozhnaia peschinka) poshla by v ogon’ i v vodu, na prestuplenie, na smert’ ili na velichaishee geroistvo, i potomu-to on ne mog ne trepetat’ i ne zamirat’ pri vide etogo priblizhaiushchegosia slova,” *Voina i mir*, vol. 1, p. 259.

罪。在这里,道德和尊严是服从于俄国国家及其独裁的国君的。《战争与和平》所表现的俄国必不可少的政治神话的核心,不是神圣俄罗斯的救世理念(霍米亚科夫[Khomiakov]和19世纪其他史学家所讲述的),而是服从国家权力。举例来说,这是和美国不同的,美国必不可少的政治神话和书面文件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当权的人物联系在一起,而俄国的政治神话则围绕着国家权力团团转,但是国家权力体现成为国家大小官员。让我们复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沙托夫的话吧:俄国人信俄罗斯,所以他们才信上帝。以这样的核心神话为据,侵略本性就不会落后太远。罗斯托夫的狂喜有增无减:“如果皇上命令我此时此刻跳进烈火,我是何等的幸福啊。”早在拿破仑入侵俄国以前,这些思想就出现在罗斯托夫的脑际:在他为了俄国而在被奥地利人征服的另一个斯拉夫国家的土地上(奥斯特里茨位于捷克境内)。打仗的时候,他脑子里就出现了这些思想。19世纪无所不在的帝国主义态度在这一段描述里得到清晰说明,而托尔斯泰并没有因为这一段和其他段落类似的描写受到指责,这就表明,在《战争与和平》的读者当中是广泛存在着对于19世纪帝国主义行径的赞同态度的。

顶礼膜拜拜见沙皇的事继续在不同段落里出现。尼古拉的弟弟彼嘉也早就准备好充当皇帝的奴隶,像尼古拉一样。1812年,拿破仑正带领大军逼近,彼嘉因为年龄小不能入伍,但是他一定要去拜见皇帝;按计划,皇帝将要在克里姆林宫广场会见子民。彼嘉穿戴整齐,计划要求特批参军。等待亚历山大莅临的人群由社会个阶级代表组成。按照托尔斯泰的描写,那是儿童等待一个重大事件时候的态度。群众高呼:“天使!国父!皇上!”就像尼古拉一样,彼嘉准备“杀死自己和其他的人……在他两旁,其他的脸色同样凶狠的人们都向前拥挤”。^①

彼嘉努力抓住亚历山大向人群投过来的饼干。这个姿态的象征含义值得注意。群众就是俄国:他们都受到沙皇的“养育”,就像一家的成员靠家长养育一样。他养活他们;他是他们的父亲(batiushka),按俄语的用法,这个词指“父亲”和“神父”。但是,他提供的食品却是反复无常的;很可能还没有分配好呢。亚历山大投掷这些饼干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他如果不是

^① War and Peace (Norton), 747.

一时兴致提升,老百姓就得不到供给。俄国的民族神话的根基就在于接受沙皇的权力:沙皇可能满足不了人民,但是他是一个恒定的坐标,所以,反对恒定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彼嘉的愿望得到恩准:他参军,在反法战争中被杀死。事实上很方便的是,我们可以立即把他放在俄国烈士纪念堂里,因为在一个法国小丑入侵俄国的时候,烈士们保卫了国家。但是,我们早已经指出,在1812年,俄国同时进行着几场战争:高加索和中亚也是当时的战争舞台。在那些地方,俄国显然是侵略者。如果彼嘉去了南方前线、或者东部前线,那么,我们是不是还会把他称作为了正义事业而牺牲的少年纯真的英雄、为俄国政治神话作出贡献的人呢?这是一个听着不悦耳的问题,托尔斯泰奇妙地躲避了。

切尔尼亚夫斯基指出,陪伴全能沙皇神话的还有一个**谦卑**沙皇的神话。这个神话早在伊万雷帝统治期间开始得到宣扬:这个沙皇是全能的,大慈大悲的,为了执法,就要雷厉风行;但是他也随时准备放弃权利,去当一个乞丐、一个漫游的人、一个圣愚、神圣俄国的一部分;这个俄国在精神上存在于历史的俄国所占有的世俗的空间之中。这样,在俄国社会兴起一个神话:在统治末期,亚历山大一世把政权交给了兄弟尼古拉,离开皇室,秘密隐蔽起来,自愿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并且死在那里。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把这个传说描写成史实:“亚历山大一世,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且感觉到了上帝之手的触摸,突然认识到那个所谓的权力的微不足道,于是抛弃了它……只说……‘让我像普通人一样活着,想着我的灵魂和上帝。’”^①

尼古拉一世和他那张士兵的狭窄床铺是这出大戏的点缀。想象中的自我卑微的礼仪反而增添了这个沙皇权力的光泽。

如果我们把《战争与和平》看成是一部确认俄国帝国身份的作品,那么,托尔斯泰在重塑和再现历史方面的成功所具有的意义,要大于那些视帝国特权为理所当然的批评家所看到的意义。后殖民理论典型关注的就是解构特权,审查帝国叙事的黑暗面。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在许多方面,《战争与和平》显得就是一部殖民主义的小说,表达了作为一个殖民帝国的自信心,同时又压制被打败的民族的叙事话语权。在这里,让我们引用利奥塔

^① *War and Peace* (Norton), 1263.

(Lyotard)的表述,这也是促进俄国帝国地位合法化的一部宏大的叙事。它把俄国表现为一个具有高度成熟民族意识的国家,但是,它这样做,不是直接求助于这种意识,从而降低它对于外国人的魅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那样,让梅思金公爵畅谈身为俄国人的优越之处),而是通过促进民族神话发挥凝聚力量。

为了创作一部帝国小说,亦即,一部强化帝国身份的小说,作者必须再现和重塑民族记忆,既在纵向上,即跨越全部的社会阶级,也要在横向上,或者说,在上层的内部;然后再表现这个团结统一的国家面对他者。《安娜·卡列尼娜》、或者《罪与罚》结构要好得多,探索了更大的心理学深度,但是,这两部小说对于现代俄国的自我感受来说不像《战争与和平》这样具有本质意义。《战争与和平》给帝国的成功制造的俄国民族的肖像添加了最后的润色。在俄国的殖民行径及其自我形象之间,它发挥了令人信服的中介作用;这个形象就是一个宏伟的、饱受欺压的民族国家,凝结成为俄国历史的规范版本——不仅对于俄国人是这样,对全世界读者亦然。其他民族很少这样成功的、以这样的方式塑造了自己的世界形象。

第四章 俄国文学中的中亚叙事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对加缪(Albert Camus)的小说作出分析,他的分析显然脱离了对后者的标准解释,亦即加缪在没有意义的世界里寻找意义。萨义德的解释把加缪从习见的存在主义背景中抽出,把他放在法国帝国主义的语境之中。这样一来,萨义德就打乱了分类法,因为按照既有的分类法,不同的批评家,从传统主义者到解构主义者,都给加缪留出可以预见到的前途的。萨义德没有肯定加缪对人类处境的见解,没有确立他的现代反英雄的价值,却提醒我们加缪的两本小说《局外人》(1942)和《鼠疫》(1947)的情节是在阿尔及利亚展开的,主要人物都是法国殖民主义者;还有,其着眼点是法国,而不是阿尔及利亚,人物的感受是法国人的感受。叙事完全切合法国文化史的传统,而阿拉伯世界的传统依然受到压抑。萨义德说,梅尔索的确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但是,“这个阿拉伯人没有姓名,而且看样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更不用说父母了”。^① 同样,在《鼠疫》里,主要的人物法国人都有名有姓,有来历,而阿拉伯人大都是无名无姓、面目模糊的。萨义德说,这是一个标志,表明阿尔及利亚的地理被加缪政治化了,阿尔及利亚不再是阿拉伯人展现其历史的国土,而是变成了法国人应邀扮演另外一种角色的背景,胜利者占有这片没有记忆的土地,把法国的历史硬塞进去,同时把被征服人民的经历抹掉。在加缪的小说里,阿尔及利亚固有的事务的大部分都被勾销,读者实际上完全被引导到了欧洲人的概念和问题,让人觉得通过言论就可以扩展欧洲的疆界,而无须有关人民的正式的同意。

109

加缪予以典型化的那种文化表现的积累,其目的是要创造一种印象:只

110

^①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75.

有征服者的故事才值得叙述，而被征服者在文化上是又聋又哑的。萨义德论证说，这是世界很多地区文化盗用的一种经典的、迄今很成功的策略。注重扩张主义思想的国家一般都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推行这一策略，其实，我们还可以补充增加上中欧和东欧——比如《战争与和平》——为了打造帝国形象，必须扫除中欧和东欧各民族的身份特征。

萨义德对加缪的批判表明，即使是像加缪这样伟大的道德论者，也不能免除殖民主义时代特有的东方主义倾向。但是，西欧殖民经历受到了像萨义德这样的批评家的多重纠正，而作为帝国主义者的俄国人的经历却依然被遮盖着，是俄国批评家的 19 世纪的概念框架和俄国例外论的说辞把它掩盖起来的。萨义德说，在世界某些地方，殖民主义者的大量论著早就压抑了弱勢本地人的声音，所以其恢复过程必定是缓慢而痛苦的。看来，这是前苏联原有的加盟共和国的状况，也是“俄罗斯”联邦内部的许多所谓的自治共和国的状况。就其中某些共和国而言，因为重新获得了主权，任务可能来得容易一些。这一章继续论证，从思想上掩盖种种殖民行径的做法不仅仅是西方的发明，而且也被俄国作家们广泛运用。我讨论的焦点是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1968)及其思想上的先行者。^①

小说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得到的反应类似于批评家们对《局外人》的反应，亦即评论家不怀疑小说的主题和对读者所说的话。按照最初的反应，《癌症楼》是一本描写苏联劳改营种种恐怖事实的小说，也是一本关于人类的处境的小说。罗思贝格(Abraham Rothberg)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杰作》中对《癌症楼》的阐释代表了这些早期的分析。^②罗思贝格认为，小说的标题象征着影响了列宁和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社会的苏维埃制度的疾病。他选择出小说中的自传成分，充实苏维埃制度下俄国人受苦的论据——似乎一切附加的证据都是必要的。他逐一地讨论人物：“斯大林的继承人”卢萨诺夫、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舒鲁宾、慷慨而热情的俄国医生冬采娃和甘加尔特、迷人的医学大学生佐娅，最后，还有并非不重要的索尔仁尼琴的他我

^① Aleksandr Solzhenitsyn:《癌症楼》，俄文版《选集》，卷4(Paris: YMCA Press, 1979)。正文全部引文，若无其他标志，都来自这一版本。

^② Abraham Rothberg, Aleksandr Solzhenitsyn: *The Major Novels*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1971)。

(alter ego), 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个粗暴、受教育不多、令人喜欢的大高个儿因为轻微触犯政治制度而在古拉格煎熬多年。结果,在身体上、职业上和心理上,他受到损害,但是在道德上,则变得更坚强。罗思贝格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研究他所谓的“索尔仁尼琴的着魔”:他痛恨非正义,他坚信文学应该、而且正在俄国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某种主要的角色。^①一段简短的复述告诉罗思贝格的读者,《癌症楼》的情节发生在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在1955年,事件延续了四个月。

多年以后,《癌症楼》变成集中营监狱文学的一部经典,在销售方面大大超过了沙拉莫夫(Varlaam Shalamov)或查普斯基(Jozef Czapski)对集中营感受的鲜明强劲的描写。索尔仁尼琴其他作品发表后接踵而来的关于他的大量文献证实了这一观点:索尔仁尼琴为西方读者揭示了苏联政治压迫制度的本质因素。

罗思贝格的观点本质上是正确的。索尔仁尼琴的确是遭受苏维埃制度欺压的人们的代言人,这样的受迫害的人数以百万计。但是,索尔仁尼琴作品的这一明显方面有效地阻隔了他多部小说的其他要素,特别是为了俄国殖民主义的利益,在辞令上他认可苏联夺取领土。就像加缪的“法国”故事发生在一片驯服的阿拉伯土地上那样,《癌症楼》压制了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的历史的目不可见的潜流。对于意识不到这一潜流或者俄国作家以往把中亚显示成为俄国领土的意图的读者,这本小说的殖民主义的侧面必定依然是模糊的。《癌症楼》给人的印象是,塔什干大部分居民是俄国人或者俄国化的乌兹别克人,对于他们来说,俄国的统治不是问题(不同于苏联压迫带来的普遍的问题——那种压迫同样地触及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实际上,塔什干首先是一个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鞑靼人的城市,只有行政秩序才强加给它一层薄薄的俄国气息。但是,塔什干的东方主义完全被情节包摄,而情节则凸显了俄国文化在这个地区的中心地位。这样的表现方法抹掉了大部分的中亚历史。

^① Abraham Rothberg, *Aleksandr Solzhenitsyn: The Major Novels*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1971), 184-85.

中亚的殖民地化经历

让我们了解一点尚未学到的背景知识。《癌症楼》的情结展现在一个城市里,这个城市是在1865年6月17日第一次被俄国人强占的,在索尔仁尼琴诞生之前53年。在1865年,塔什干是一个永远缺水地区中的一片兴旺的绿洲,居民是混居的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① 根据俄国的资料,塔什干向俄国军队投降的时候,有十万人口。^② 1864年,俄国人攻打了塔什干,后来攻打浩罕汗国;1875年,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后,他们兼并了这个汗国,而这场战争中,俄国将军切而尼亚耶夫(Mikhail Cherniaev)以其特殊的残酷凸显了他自己。这个地区后来被重新命名为费尔干纳地区,在苏联时期一直沿用。

在浩罕和中亚诸汗国被征服以前的几十年内,俄国一直施展阴险的外交活动。俄国人对中亚的设想在1858年第一次变得明显,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派遣伊格纳齐耶夫(N. P. Ignat'ev)伯爵为驻希瓦汗国特使。伊格纳齐耶夫表面上是举行签订贸易协定谈判,但是他真实的目的是收集情报。伊格纳齐耶夫的访问以友好言辞结束,他敦请大汗相信,俄国怀有和平的诚意。1864年,依靠伊格纳齐耶夫及其继承人收集的情报,亚历山大二世开始进攻土库曼。亚历山大成功了,而塔什干的陷落构成了针对那一地区突厥人的战争的转折点。1867年,亚历山大二世指派冯·考夫曼将军为土库曼斯坦省第一任省长。1873年,对希瓦的进攻开始。在这一过程中,亚历山大派舒瓦洛夫伯爵到伦敦去安抚英国政府,说他无意占领或者兼并这个汗国——但是他出尔反尔。同年,俄国人攻打了希瓦城,夺取并宣布它是俄国的保护地。1875年,土耳其斯坦爆发起义,斯科别廖夫被派去平息。平息以后,再也谈不到什么保护地。在1876年,希瓦和浩罕都被并入了俄罗斯

① Edward A. Allworth, *The Modern Uzbeks: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0), 200-201; and Seton-Watson, 442 ff.

② M. Vakhobov, *Tashkent v period trekh revoliutsii* (Tashkent: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Uzbekskoi SSR, 1957), 8-9; and H. B. Paksoy, "Muslims in the Russian Empire: Response to Conques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9, nos. 3-4 (Autumn/Winter 1968).

帝国。^① 在政府主导下,俄罗斯人开始从俄国迁移到塔什干来。1885年,4145名俄国人搬迁到了那里,到了1905年,俄国人的人数达到18877人。^② 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切尔尼亚耶夫、斯科别廖夫、冯·考夫曼和洛马金都作为正义与廉洁的圣像进入了俄国民族主义的神话。这一政治神话的最尖锐的文学表达见于古米廖夫的诗作《土库曼斯坦的将军们》(1907)。^③

古米廖夫的诗一开始就是对于俄国上层社会生活的描写:富人宅第的私人舞会和招待会。这种“富豪生活令人窒息的畅饮”已经受到了普希金的指责,在诗里又被追忆,在它的背景上展现出老将军们的高贵形象。他们身材高大、挺直,眼睛炯炯有神,仪态平和善良。他们都被有关他们奇异功勋的“高贵传说”所笼罩。这里的言下之意不是将军们的军事才能,而是他们与俄国圣徒们的相似性;圣徒们的谦卑是众所周知的。在以后的诗句里,俄军部队的惨败受到追悼:在这里,俄国人又被表现的是遭受了损害,而不是加害于他人。最后,被征服城市的名字被说出——乌斯齐—库都克和金德利——殖民主义者凯旋得胜的话是不会缺少的:“俄国国旗在白色的希瓦城上空飘扬。”^④

最后一句话,“俄国国旗在白色的希瓦城上空飘扬”,值得再细细察看。在几百年以来入侵、兼并、摧毁世界弱小民族和群体的帝国的强词夺理言论中,我们很少看到如此简洁表达玷污人类历史的权力意志和对暴力的热衷的词句。对于古米廖夫的诗和俄国文学其他类似作品无视他人的历史这样的事实,俄国知识阶层在生活中是完全意识不到的。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得到道歉(帝国几乎从来是不会道歉的),哪怕偶尔出现一点儿暗示:在俄国

① Seton-Watson, 443-44; Richard A. Pierce, *Russian Central Asia 1867-1917: A Study in Colonial Rul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 and Robert J. Kaiser, “Ethnic Demography and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Central Asia,” in Roman Szporluk, 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230-65.

② Vakhobov, 22.

③ N. S. Gumil'ev, *Sobranie sochineni*, edited by G. P. Struve and V. Filippov (Washington, DC: V. Kamkin, 1962-68).

④ E. M. Thompson, “N. S. Gumilev and the Russian Ideology,” *Nikolaj Gumilev, 1886-1986*, edited by Sheelagh Graham (Berkeley, CA: Berkeley Slavic Specialties, 1987).

发动的战争中,有不少在道义上是含混不清的。然而,这样的暗示全付阙如。

113

俄国国旗在居住着一个中亚民族的城市上空飘扬,俄国人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这个民族和俄国人没有什么共同之点,而且建筑和俄国城乡景色也很不相同。面对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的长年的欲望都是谋求更多的土地,而在俄国,这不成其为理由,因为俄国在世界上一向属于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的行列。更何况对希瓦的征服没有给普通俄国人带来可知可感的好处。古米廖夫和其他人因为俄罗斯民族界线以外的城市对俄军投降而高兴。民族主义的标准辞令要求表达喜悦,但是国家则通常都是缓和这一情绪,发表著作和声明,其中显然不提民族主义,或者乞灵于帝国主义开发活动的道德模糊性。但是,在古米廖夫涉及俄罗斯帝国侵略中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作品中,根本找不到一点提示指出俄国的帝国主义把国家引上了错误的道路。

古米廖夫的常胜将军们是索尔仁尼琴的善良医生和护士的先驱者;这些医生和护士甚至在普通的贫穷和苦难中还照料凄惨的本地人。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俄国殖民主义者有教养、优雅、谦虚、温和,很像普希金的《1829年战役期间阿尔兹鲁姆旅行记》中那些俄国人,这些人给“亚洲的”荒野带来了铁路、公园和澡堂。在俄国文学中,一般都可以看到强调军事征战者的道德而不是强力的倾向。在《阿尔兹鲁姆旅行记》里,叶尔莫洛夫被描写成一个善良的人,在他居住的农村里安度退休后的岁月,常常看望年迈的父亲,一个纯朴而虔诚的老人。从普希金那里,我们还知道,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将军欢迎来自各方的客人,唯独拒官员于大门之外,意思就是普通农民能够接近他,而当官的不行(在俄国文学中,官员名声很坏)。普希金的叶尔莫洛夫是古米廖夫笔下的土耳其斯坦将军们的先驱、正义的楷模,给小民族送来启蒙和文明。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普希金的目的在于让他依靠未必有的美德而不是因为军事的成功而受到尊敬。^①这种民族主义的想象可以追溯

^① Pushk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卷6 (Moscow: Nauka, 1964), 641.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俄国人把军人描写得温和、并且有圣徒气质的绅士这一癖好的对象。John Fennell, *The Crisis of Medieval Russia, 1200—1304*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3), 101-21.

到卡拉姆津,他在自己的《历史》中提出莫斯科维有能力扩大征服的领地,是依靠道德的影响,而不是依靠莫斯科维精于有效运用的刀剑。

俄国和平扩张的神话一直在俄国文学里以各种形式蔓延,温文尔雅老将军(或者其他军官)的刻板定型是最普通的表现之一。在《叶夫盖尼·奥涅金》里,塔吉娅娜最后还是嫁给了一个年老的将军,按她的话说,宫廷待他不薄。给予这位老人许多恩赐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丘的《地图》所展示的那样,各方面的军事经历都可能使得塔吉娅娜的丈夫得宠于亚历山大一世或者帕维尔一世,其中包括平息高加索、镇压1794年塔杜施·科希秋什科领导的波兰起义,或者对中亚早期的进犯。但是,这位将军的过去被他的宽厚的微笑、毫不虚荣、完美的礼仪和迎接叶夫盖尼并且向他介绍内人时候的友善所遮蔽;他错误地以为他们两个人以前不认识。这个老将军诚恳善良,赢得塔吉娅娜的真诚善待。^①在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里,俄国人也同样对乌兹别克人十二分的友善。索尔仁尼琴似乎在和想象中的对手们论证,要向他们证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谈论殖民压迫的言论都是完全误导的。

古米廖夫诗作的标题《土耳其斯坦的将军们》就是被称为“掠夺外国地理”的一种练习。这个短语的思想意义,可以衡量一下:用希特勒成功征服苏联来取代俄国征服中亚来衡量,设想将来的德国诗人把古德里安和冯·保卢斯将军当做“俄国将军们”来引用的办法来衡量。标题的地理帝国主义令人想起加缪的阿尔及利亚,因为阿尔及利亚同样变成了一个荒凉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法国演员可以演出描写人类境遇的法国悲剧。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俄国在军事上在中亚得到立足之后,立即开始抢劫战利品。“从俄国入侵最早的日子开始,占领当局及其下属就运走成千上万件中亚物品,包括了一切种类、一切尺寸的物品,当成战利品或者抢劫赃物,运回彼得堡或者莫斯科,”研究这一地区的一位美国学者说。^②冯·考夫曼将军被任命为土耳其斯坦的军事总督之后,他“抢劫了中亚主

114

^① John Garrard, "Corresponding Heroines in *Don Juan* and *Eugenii Onegi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73, no. 3 (1995), 428-48.

^② Allworth, 213 f.

权的可移动的象征物,以及精神生活和历史的记录”。在掏空乌兹别克历史却丰富了俄国历史的文物中,有各位大汗的银制宝座(现在是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兵器室’的一部分展品)、大量的中世纪手抄本(包括古兰经)、清真寺里的古代器皿和其他艺术珍品。凡是不能搬动的东西,则一律销毁或者切割:陵墓、历史建筑和王家墓碑。

19世纪70年代,对土耳其斯坦艺术珍品的大规模抢劫得到抢劫活动参加者之一如下的描述:

感谢冯·考夫曼,我们许多收藏室和博物馆都丰富了起来,得到了最珍贵的文物……和……大量阿拉伯的、波斯的、中亚的和其他的东方的手抄本。在我们的科学院的亚洲博物馆里,也有许多得自中亚的珍贵手抄本;丰富的金银珠宝和骏马装饰品、货币和大汗的印章装点了皇村军械库的收藏。^①

奥尔沃思(Edward Allworth)指出,抢劫一直延续到了苏联时代。这样,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在索尔仁尼琴一生的时间之内都不断收到中亚的文物。“俄国持续的政策模式似乎意在剥夺中亚最具重大象征意义的文物——包括古代的、中世纪的和现代的。”^②在后苏联时期,抢劫减少,因为地方性的抗议波及整个中亚,包括“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考古发掘中,在“俄罗斯”联邦的阿尔泰地区与外蒙古交界的乌洛克高原发现据信是锡西厄武士的、埋葬了2500年的木乃伊。木乃伊被运到了莫斯科,但是在1995年,阿尔泰共和国立法院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掠夺民族珍宝和运到该地区之外。该共和国的代表曼泽罗夫质问:“这是我们民族的珍宝。为什么要运走?”俄国人回答说,如果本地能够保证保存好木乃伊,就归还。“没有人会盗窃他人的财物”,他们敦请“本地人”相信。我们不禁想起,埃尔金大理石雕在1816年从希腊运到英国、并且卖给了大英博物馆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说辞。^③后苏联时代另一反抗行动是1993年在安卡拉召开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中亚全部新独立国家都同意接受拉丁文字母

① Allworth, 213.

② Ibid., 216.

③ Associated Press, 10 October 1995.

表,后来,在采纳了一些变化之后,也同意用于乌兹别克语。^①

索尔仁尼琴论抢劫的说辞

在军事生涯的一段时间之内,索尔仁尼琴任列宁格勒附近一个炮台的指挥官。后来,或者也许是在他求学年代,在参观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时候他很可能目睹过中亚的财宝——这是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必定要朝拜的地方。《癌症楼》里,对于俄国在这一肮脏的殖民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没有哪怕瞬时的反思激荡起作者,要不然他就是顺应了人类的苦难的。在《癌症楼》的层层的事实求是下面,小说对俄国与土耳其斯坦的冲突表面上中立态度下面,在董采娃和甘加尔特两位医生对贫穷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鞑靼人”癌症患者的仁慈态度下面,沉睡着表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89年作家日记》中的态度:为平息土库曼尔感到高兴。^② 俄国殖民主义的说辞显然已经被俄国大作家们内在化,而遵从苏联和沙皇的法规,乌兹别克作家们的被压制下去的声音只能在学术专家阅读的图书中找到。

在小说的第一版里,从来没有提及塔什干这个地名,好像不配提起似的。作为城市,其唯一的特点是开设了一所俄国人经营的医院。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加缪把同样的埋名隐姓法运用到了遭受法国殖民待遇的地点、人民和物品上。在他的小说里,阿尔及利亚的城市往往是无名的,而奥朗则被描写成法国的一个前哨地点。同样,在前往医院的途中,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内心独白没有把塔什干当做一个受到苏俄军事占领的外国城市,或者其建筑、居民和气氛明显有别于俄国人可能熟悉的景色的城市。叙事者模糊的事实是,这个城市是一个不同的民族群体的中心,伴随有全部的记忆和神话。如果仅仅从俄国人在那里生活的种种现实来看,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列宁格勒或者沃洛格达。全书不见一个字承认,在某种方式上,像契诃夫的

^① H. B. Paksoy, "Introduction" in *Central Asia Reader: The Rediscovery of History* (Armonk, NY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4), ix. 同样,鞑靼斯坦共和国在1997年于喀山举行的第二次世界鞑靼人大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鞑靼人语言的字母。Rimzil Valiev et al., "Tatarstan faces challenges,"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31 December 1997。

^② F. M. Dostoevskii, *Dnevnik pisatelja*, vol. 3 (Paris: YMCA Press, n. d.), 602.

《三姐妹》那样怀念莫斯科那样，塔什干也令人思念，和一切民族群体的首府一样。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疾病没有充分解释漠视非俄罗斯人的现实的原因。叙事者细致入微，同时也是视而不见：在科斯托格洛托夫整个住院期间，他和两个女人打情骂俏之中，和几个男人的谈话中，最后，还有，在他作为治好癌症的少数幸运病人之一出院的前后。

116

小说中还有其他的方法也得到运用，用来抹掉塔什干的特点。塔什干的地理位置在小说全书中都被遗忘。从科斯托格洛托夫和佐娅那里我们得知，塔什干不过是“他们”广大国家里的小黑点，他们有资格随意居住，而且大受欢迎——因为这类的地点需要俄国给予的医生、需要俄国建造的医院和俄国培植的文化。情节中安排的对话表明，这样的地方数不胜数。但是，索尔仁尼琴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遥相呼应，也许不算明智的这位大臣在 1864 年 11 月 21 日致欧洲列强的一封信函中提及：“随着一个负有宣扬文明使命的强国和一个野蛮部落接触、并且为了秩序的利益而被迫制伏野蛮部落，该强国就要和该部落之外的部落接触，因而文明的氛围就不可避免地扩展。”^①戈尔恰科夫把英国在北美的扩张比拟为俄国在中亚的扩张：二者都是传播文明的使命。一百年以后，可以比较一下这两国扩张的结果。俄国征服塔什干的结果，对于想要看到的人来说，在索尔仁尼琴时代也是清晰的。在俄国的统治下，中亚变成了也许是全球最荒凉的地方，一个既看不到资本主义进取精神、也看不到“传播文明的”强国送来技术。有少数的起义，例如 20 世纪 20 年代阔尔巴契起义被迅速镇压下去。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乌兹别克斯坦某些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高于非洲撒哈拉以南某些国家，这些国家因为贫穷和缺乏医疗设备而闻名。^②有意思的是，在 1868 年，或者说，在控制了塔什干之后不久，俄国人在那里开办了一所军队医院。^③不用说，从土库曼的观点来看，这个机构不受欢迎。医院是为占领政权服务的。大概除了自己的医疗史以外，对于这所医院的回忆也给索尔仁尼琴带来灵感，把自己小说里的癌症楼设在乌兹别克的首都。

① Seton-Watson, 442.

② Grigori Reznichenko et al., “Ara!skaia katastrofa,” *Novyi mir*, no. 5 (May 1989), 182-241; *CIA World Factbook 1993* (Washington, DC, 1994).

③ Vakhobov, 27.

在索尔仁尼琴身患癌症来到塔什干的时候,这里居民有一百万,大部分是穆斯林,这里还是苏联穆斯林事务部所在地。^① 该城还是俄国人设立的乌兹别克的首都,俄国人提高乌兹别克人的地位,却牺牲了同样居住在塔什干的哈萨克人的利益。在中世纪,塔什干是突厥人的文化中心,是俄国统治下的土耳其斯坦的大城市。在20世纪,如果俄国人没有按照分而治之的格言把已经出现衰弱颓势的不同的民族分裂成块,这个大城市很可能还依然是突厥民族的一个融合之地。乌兹别克人被怂恿反对哈萨克人,而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则称本地人为“鞑靼人”。一位中亚学者指出:

沙皇政权机构千方百计隔离中亚人,把形形色色的(和花样翻新的)民族名称和法律名目使用于这些分离伎俩。在苏联统治期间,这个过程又重复发生,而且还有创新。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行政人员“发现”并且感慨确立了“新”语言,如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以及诸如此类的语言,以至中亚人为了交流,“不得不”雇用翻译人员,或者,最好还是采用俄语当做通用语。^②

在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镇压了出现在塔什干的突厥复兴运动,强化了对该城文化生活的控制。在《帝国》中,卡普希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提示,十月革命在塔什干就是一伙俄国人对另外一伙俄国人宣战。对于土库曼人来说,就意味着俄国人的统治依旧。^③ 在苏联统治下,阿拉伯字母被改成希里尔字母,有文字的纪念碑受到清洗,除去了反俄因素,强制推行新的文化法规。卡普希钦斯基又说:“英国人一度发明、被用于亚洲和非洲的间接统治制度,莫斯科接受了,使得俄国人可以为所欲为,蛮横不负责任。”^④ 相关论文连连发表,为满足俄国的需要而剪裁中亚的历史。有一篇论文竭力确立乌兹别克人对于其他民族群体的优越地位;奥尔沃思说:“因

117

①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edited by Archie Brwon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2), 136.

② Paksoy, *Central Asia Reader*, ix.

③ Ryszard Kapuściński, *Imperium*, 256-57; in English, *Imperium* (New York: Knopf, 1993).

④ Kapuściński, 225.

为文章出自一个俄国人之手,用俄语刊行,所以进一步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分量。”^①这一努力同于西方史学家,他们竭力改写被征服民族的历史,包括某些欧洲的民族。^②俄国的出版社、大学和学校得到了垄断乌兹别克—哈萨克学校和居民的优势,而这些居民的语言还依然保持在演化成为一种独立的突厥语的过程之中,所以被剥夺了形成文化、技术和科学方面的现代词汇的机会。俄语到来得太迟,没有来得及摧毁中亚的语言特征,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和歪曲了这种特征的发展。俄语刊物,例如《乌兹别克斯坦文学与艺术》和《东方真理报》,用俄语向本地人解释当地的历史和艺术。^③在每种行业中,要取得发展都必须学会俄语。文化的俄罗斯化,对于进取心强的人和感觉无望的人,都是一样近在眼前。因为双语学校很少,而且质量不如俄语学校,所以,学习俄语就要牺牲本民族的语言。^④奥尔沃思这样总结了事态:“苏联的中亚政策当局在 1922 年到 1941 年之间迫使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走过一条昂贵和曲折的道路……这个手段……明显地限制了文化遗产的普及,用一种唯命是从的文化机构取代了中亚知识分子,令居民不寒而栗。这似乎就是全部努力的目的。”^⑤

对苏联帝国西部边缘属地居民的镇压在许多英语出版物中都有记录,但是其他的镇压活动则没有被记录下来(20 世纪 20 年代的乌兹别克起义,或者,在更远的东部,绰号“血腥男爵”的冯·斯滕贝格——R. Ungern von Sternberg——屠杀了蒙古首都库伦—[今天的乌兰巴托]的普通居民)。20 世纪 20 年代对中亚精英的再教育或者强加消灭造成的恶果就是,俄国在亚洲的这些殖民地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获得让世界听到的声音。对于乌兹

① Allworth, 239-40.

② Said (1994), 179.

③ K. Iashen et al., *Istoriia uzbekskoi sovetskoi literatury, 1917-1985*, 5 vols. (Tashkent: Izdatel'stvo Fan, 1987); and A. Kh. Khaitmetov et al., *Istoriia uzbekskoi literatury s drevneishikh vremen do Velikoi Oktiabrskoi sotsialisticheskoi revoliutsii*, 2 vols. (Tashkent: Izdatel'stvo Fan, 1987).

④ Hélène Carrère-d'Encausse, *Decline of an Empire: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in Revolt* (1978); in English, translated by M. Sokolinsky and H. A. La Farge (New York: Newsweek Books 1979), 185.

⑤ Allworth, 230.

别克起义的回忆令莫斯科的意识形态领袖厌烦,所以“圣战士”(mujahid)这个词语被从苏联出版的乌兹别克语词典中删除,虽然以往的词典里是有这个词语的。^①

这些巨大的努力没有能够摧毁乌兹别克人对他们自己的身份的眷恋。迟至1979年,在乌兹别克共和国还有98.82%的乌兹别克人声明乌兹别克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②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一年之内,塔什干市摘除了苏联时期的街道、市区的名称,用本民族的儿子或者穆斯林人士取代了俄国人和社会主义英雄。因为很久以来土耳其就被乌兹别克世俗精英看做楷模,所以基洛夫大街变成凯末尔大街,利哈乔夫大街变成巴伊卡罗大街,十月大街变成谢汗塔胡尔大街。恩格斯让位给铁木尔,赫梅尔尼茨基让位给库什贝基,而古比雪夫则让位给弥尔左—乌鲁格贝克。的确,实际上全部与俄国有关的名字都被摘除。^③有些人口学家说,到2105年,乌兹别克人将会成为前苏联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甚至超过俄罗斯人。^④

118

这就是索尔仁尼琴这本小说的语境——19世纪的财物掠夺、苏维埃的清洗、消灭土耳其斯坦特征的策略努力、处处树立标志土耳其斯坦惨遭失败的纪念碑,在塔什干这类东西很多,每当“本地人”目睹之时,都感到痛苦,就像俄国人的每逢回忆纳粹的围困给列宁格勒带来的损失的时候的感受。但是,在小说里,土耳其斯坦的苦恼是一丝也看不到的。故事的本地背景被有效隔离,所以许多读者都以为《癌症楼》是一部关于俄国的小说,地点是这个辽阔国家的遥远的亚洲部分的某地,但是肯定是在俄国境内。俄国观察者的权威穿透了情节的脉络和索尔仁尼琴用以给叙事加油加醋的对生与死的思考。人物流露出来强烈的俄国意识。他们没有培育出自己对于给予他们、或者他们的父母亲躲避战争和灭亡的避难所的这片土地的忠诚。在这

① Allworth, 175.

② Ibid., 299.

③ Ministerstvo svyazi Respubliki Uzbekistan, *Telefonnyi spravochnik dlia delovogo cheloveka* (Tashkent: Ministerstvo svyazi, 1992).

④ Mikhail S. Bernstam, "The Demography of Soviet Ethnic Groups in World Perspective," in Robert Conquest, ed. *The Last Empire: 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322.

方面,董采娃医生和甘加尔特医生就像皮巧林和马克辛默·马克辛梅奇一样,因为这两个人也没有养成对高加索的忠诚。在《癌症楼》里,两个社会的冲突连一丝一毫也没有显露。这些缺失很像苏联时期经过加工的照片一样,党内失宠者被剪去,代替面容的是背景的口号,取代故事的是沉默。索尔仁尼琴完成这类涂抹,擦拭十分细致,外加他涉及道德的平凡说教,都损害了他强加给突厥人的那种沉默的真实性。科斯托格洛托夫和小说中其他一伙俄国人挤掉了真实的塔什干的声音,有点太过奸猾,而小说的叙事者却坚持认为,俄国人为本地人完成很多业绩。**女主人牢骚太多。**

在医院里,俄国人的优越感表现在谈话和情节的变化之中。巴巴坚持说,这类的殖民语境一般都会出现裂纹,是由殖民者的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产生的矛盾和忧虑造成的,但是,在索尔仁尼琴的书里,却不见这样的裂纹。俄国人都口若悬河,信心十足,鞑靼人头脑简单,随时准备接受指教。沙拉夫·西波加托夫,一个“鞑靼人”,请求科斯托格洛托夫教导他治疗癌症的方法:“你先说你起初给桦树治病吧。——请你从头开始说吧!”科斯托格洛托夫答应:“要是从头说,就从头说吧。另外一个病人跟我说了马斯连尼科夫医生的事,那是莫斯科附近亚历山大罗夫县的一个乡村老医生。”^①另外一个“鞑靼人”,阿赫马赞,问一个俄国人瓦吉姆·扎茨尔科关于叶尼塞河地区土人的事,因为扎茨尔科周游过全国,见过那里的土人:“请告诉我,那些通古斯族的人,是怎么穿衣服的。”^②和科斯托格洛托夫一样,瓦吉姆耐心述说:必须教那些土人,用最好的殖民方式。整本小说只字不提俄国人从乌兹别克人那里学到了什么。董采娃医生据说从莫斯科旅行到巴库,一路上寻找医治癌症的特效药。这一高尚的壮举正好和本地人没有办法旅行、特别是没法前往莫斯科的情况形成对照。莫斯科派人到他们这里来完成文明使命,但是他们不能到那里去:这是殖民主义环境下的通常的行为模式。而俄国殖民主义的特点是拥有阻止殖民地本地人前往和驻留京城的双料办

① “Davai Oleg, o berezovom! chto ty nachal? —prosil Sibgatov... No ty po poriadku, Oleg!... Esli s samogo nachala, Sharaf, to vot. Pro doktora Maslennikova tot prezhnii bol'noi rasskazal mne, chto eto staryi zemskii vrach Aleksandrovskogo uезда, pod Moskvoi.” *Rakovyi korpus, Sobranie sochinenii*, 139, 140, 141.

② “Skazhi, kakoe zh u etikh evenkov obmundirovanie?” *Ibid.*, 296.

法。一个阻碍是本地人要旅行没钱、也没有通行证,另外一个是没有居住证,亦即在京城逗留的证明。没有工作就不能得到居住证;没有居住证就找不到工作。苏联解体后,居住证变得非法,但是这条法律没有执行。在莫斯科,在20世纪90年代,现身莫斯科的中亚或者高加索的人士仍然被警察追捕,有时候还遭到普通市民毒打。^①

小说里医院的每一次谈话都在显示:俄国对地方居民施展权力。连贯地看,这些谈话告诉我们,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处于俄国的正确控制之下。索尔仁尼琴推出巴德列吉诺夫分析过的,也出现在俄国的其他小说中的场面:本地人天真,头脑简单,俄国人见多识广,很有耐心。^②运用这样的舆论,中亚被改造成俄国的中亚,就像西伯利亚早被变成俄国的西伯利亚,通过更久远的传统的移民办法,尽管十分稀疏,移居的有俄国将军和士兵、囚犯和流放犯人、地质学家和民族志学者,最后,还有俄国文学人物——他们在非俄国的领土上摆弄俄国的种种问题,从而为帝国抢去那块地方。作家、各种机构、政府的权威加强了征服者对殖民地的起初的表现方式,给这些方式带来权威,加以巩固。这样的专门技能和权威不是轻易可以解除的。^③

在《癌症楼》中,唯一被构想成为有教养的本地人是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他的突厥人的姓氏被硬加上个俄国人的姓氏后缀“维奇”。他是医院院长,但是,叙事者说,他不胜任。他不会关怀病人和医生,这是索尔仁尼琴赋予他的唯一的特征。他依然是一个签发文件的讨厌人物,没有人的面目,从来不参与重大的行动。他得允作出的唯一的评论表明,他是一个不敏感、事事不上心的官僚。关于抹布的短缺,他说:“如果卫生部不提供抹布,我也不能用我的钱去买。”^④大概索尔仁尼琴在塔什干的一家医院卧床的时候,听到过对于乌兹别克人的类似的评论。在小说里,当然,优秀的俄国人

① Max Ognëv, "Sorry State of Human Rights in Russia," Agence France-Presse, 30 November 1998; and Paul Goble, "North Caucasus: The Return Of A Dangerous Concept,"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6 November 1998.

② Badretdinov, 99-100.

③ Said (1978), 94.

④ "Esli ministerstvo ne predusmotrelo—neuzheli ia vam budu na svoi den'gi pokupat'?" *Rakovyi korpus*, 88.

医生和普通人员都动员起来提供缺少的物品。但是,在这里,索尔仁尼琴可能不太高明地记录了巴巴所说的拒绝服从“殖民模仿”。做法就是故意误读殖民主义者的命令,或者错误解释他们的真实目的。俄国人要求政府各部的命令必须遵守,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这个乌兹别克人的评论是不是一个讽刺呢,他所提及的痛苦的现实是,莫斯科的卫生部负责他这个国家和他这个医院里的最微不足道的事务。卡莱尔—当考萨(Helene Carrère-d'Encausse)说,^①在前苏联的非俄罗斯人的联邦共和国里,党的第一书记都是本地人,而第二书记都是俄国人,是真正的老板。在莫斯科,政府各部大致都是由俄国人、或者俄国化的其他民族成员掌管。在对于殖民者强加的规则表面的服从态度中,受到殖民待遇的本地人的恶评可能是一种有碍稳定的、讽刺的折中;这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服从,推翻殖民主义者计划的方式,拒绝促成殖民主义者想要在殖民地推行的法律和秩序。在俄国的案例中,这种秩序欲望本身就孕育了讽刺性,因为秩序一向是一条规则,而不是殖民文化的一项成就。索尔仁尼琴想要真实记录他在塔什干住院治疗期间观察到的“本地人”的行为的愿望提供的情况可能超过了他的预计。

俄国文学批评家左托夫(Igor' Zotov)说,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之后写作的小说都明显地失败,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这位作家的想象力的贫困。^②左托夫说,索尔仁尼琴的兴趣在于教导民众如何正确地解释历史。作为一名作家,他有幸见证了相当多的历史,而且在《古拉格群岛》中他捕捉到了记忆。但是,他从书本里学到的俄国历史的余下的部分,可以说,钝了他对殖民剥削问题的敏感。索尔仁尼琴从苏联教科书和沙皇时代教科书里学到的标准俄国史隐藏了另外一种历史,俄国当权派不想揭示的那种历史。左托夫论证,索尔仁尼琴确立了名作家地位之后,立即表示甘愿充当俄罗斯派思想的一个婢女。他的强烈的愿望是看到俄国繁荣富强,俄国人最终地发挥出他们的潜力——这一愿望超越了他的艺术追求。他不再写小说,而是写政论,最后推出装腔作势的大河小说般的《红轮》(1971—1993)。

^① Carrère-d'Encausse, 135.

^② Igor' Zotov, "Aleksandr Solzhenitsyn, Al'ber Kamiu i krizis voobrazheniia," *Ogonëk*, no. 29 (4408) (July 1995), 66-67.

左托夫的评论涉及《癌症楼》，尽管这本小说是在《古拉格群岛》以前写作的。甚至在《古拉格群岛》完成之前，索尔仁尼琴的说教就已经变得强烈。在《癌症楼》里，他把乌兹别克斯坦收归俄国，同时却又举出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群俄国男女，这些人达到了一种道德成熟和高尚的境界，符合他梦想中的俄国人的形象。他笔下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俄国妇女，董采娃医生和甘加尔特医生，以及奥列科夫教授，都是按照 19 世纪寓言故事人物勾勒的，木然呆板，代表了索尔仁尼琴要把高度道德标准给予俄国社会生活的愿望。无论这样的愿望有多么可贵，都因为作者屈服于权力病理学而变得无效。他塑造的俄国妇女在专业领域出类拔萃，可是依然有时间和在家里和工作上不断提高——更不必说都是挚友了。奥列申科夫是智慧的化身，他的小巧的家园完美，经过必要的变化，酷似奥斯丁小说中的曼斯菲尔德花园的完美。董采娃对西波加托夫的慷慨关爱救助的背景，却是军事暴力和为了俄国棉纺厂的利益而毁坏乌兹别克脆弱的经济。但是，和奥斯丁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似乎是有意识地让读者避开这些矛盾。因为他故意忽视民族问题，所以他不喜欢对于不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当做唯一目标的俄国实体的批评。

121

从后殖民理论看，索尔仁尼琴的说教是虚假的。他违背现实潮流，让卢萨诺娃生四个孩子，似乎是在期待盼望中的中亚人口成分的变迁，因为在他的一生时间内，穆斯林居民的数量节节上升。他肯定是熟悉现实的人口变迁潮流的，亦即，典型的俄国人公务员有一个、或者两个孩子，而乌兹别克人有三个到六个。^① 卢萨诺夫本人虽然可恶，却保持了自己不虐待人、不杀人的尊严。而鞑靼人阿赫马赞却不然，他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古拉格狱卒，令人厌倦的看守类型，他们每天每月、年复一年地犯罪，虐待犯人，从不手软，毫不心软。阿赫马赞坚持说，犯人“不是人”，他们吃得太多。^② 追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差事不是提问题：那是上边的人的事。索尔仁尼琴暗示，在上边的是贝利亚（格鲁吉亚的明格莱利亚人）和斯大林本人（又一个格鲁吉亚人）。所以读者常被误导，认为俄国人不是庞大的古拉格帝国的主人，

① Bernstam 346-49; and Carrère-d'Encausse 86.

② *Rakovyi korpus*, 530, 531.

而且,在苏联,中心在哪里已经无关紧要,都是罪行累累的边远地区干的。至少塞西尔·罗德斯(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虐待南非)没有坚持他是遭受殖民待遇民族的牺牲品。

各种癌症的分布或者癌症的不同时期,以及病人生活的条件都同样被有意地隐蔽,以便加强俄国的权威。鞑靼人西波加托夫的单间被安排在牢房外面,这样就剥夺了牢房内部的一张床能够给他带来的一点私人空间。我们几乎难以看到一个俄国人在一个非俄罗斯人共和国的一所医院里被剥夺这类的毫末的舒适,因为俄国人永远是优先的。西波加托夫的症状特别讨厌和恶臭,需要常常清洗,或者类似的处理,这些设施都是由俄国人看护看管的。所以,西波加托夫被迫处于一种全然依赖的地位,政治的、社会的和个人的依赖,接受殖民民族的一个成员的恩惠和施舍。叙事者赋予他一种天使般的秉性,像教会女士所说的,很方便的啊(美国通俗电视节目“星期六夜晚直播”中的人物):专门利人,而党的老板,卢萨诺夫,显然是作者不喜欢的,可以预见到,他的逝世会在他自己舒适的家里到来,远离把人累垮的工作;而西波加托夫正是因为干苦活受伤、得了癌症、最后死去。这类以民族背景为主导的形象的积累做法,造成一种联想效果。有些美国人熟悉这样的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模式,他们抗议媒体中对于某些少数民族的歧视性的形象。把某些族群反复表现成为失败者的做法造成一种累积的印象,这样的印象对于该少数族群的年轻人和敏感的成员是具有特殊的破坏性的。对这类成规提出抗议的人不是要求份额制;他们要求的是逐渐减少对随随便便的定型的诉求。可以设想,这不是能够轻易做到的,但是这个困难不能够否定这一抗争的价值。成功与失败的这样的分配方法也通过文学

122 来促进,这一点不足为奇;后殖民理论提出西方文学里的一系列案例,案例表明,各种非白人族群被描写得十分有失公平。在索尔仁尼琴这部小说中,鞑靼人都永远是失败者,而仅有的成功者都是俄国人,这个事实强化了强调他者低劣身份的族群类型定势。在殖民条件下,科斯托格洛托夫治好癌症恢复健康这个事实,超过了批评家赋予这一康复的普遍的伦理意义。当然,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康复是他在道义上战胜古拉格主人的一个象征,但是,实际上还不仅如此。这也是对于战无不胜的俄国人的定型的一个贡献。这一事实涉及在帝国范围之内对俄国人敞开的机遇的尺度。科斯托格洛托夫的

俄罗斯人资格是他在被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多片领土拼凑起来的广袤地面上获得某种地位的保证。身为俄罗斯人,在莫斯科,或者在塔什干,他都可以期待某种前途,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不是一个局外人。他的康复象征着俄罗斯人在苏联享有的发展和行动的机会,而西波加托夫的预计的死亡象征着本地人的衰败。生活证明了索尔仁尼琴在这方面大错特错,这是对小说的最后的、未及料到的讽刺。

《癌症楼》里点缀着“我们国家”、或者“我们大家的广阔世界”这类的说辞,都是俄罗斯人创造的,从来不是本地人。“我们的祖国辽阔广大,”佐娅说。“我这是在自己的祖国”,科斯托格洛托夫说。“世界对待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斯婕娃阿姨告诉乔木卡,一个俄罗斯人:这是那些从来没有经受过族群歧视的人们的观念。“你不爱家乡,只爱养老金,可是我是爱家乡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强调。莫斯科是一切的尺度,从幸福到歌舞。^①对于西波加托夫或者阿布杜拉希莫夫来说,言比称莫斯科“是我们的国家”是荒谬的。但是,有人问俄罗斯人医学大学生佐娅,毕业以后到哪儿工作的时候,她耸耸肩膀,说:“我们国家这么大。”言下之意就是,在苏联领地,在哪里她都会受到欢迎的。乌兹别克人没有这样脱口而出的话。在甘加尔特为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候医室的情况操劳的时候,他却不以为然:“我在这儿,我的祖国,有什么为难的?”^②但是,叙事人意识到,塔什干不是俄国:稍后,他提及科斯托格洛托夫,说他不能返回俄国。莫斯科的中心地位被反复强调,有时候并不是故意的讽刺,比如典型的俄罗斯人干部卢萨诺娃,一个自封的作家,酸溜溜地告诉她父亲,古拉格的幸存者们都群集莫斯科,“像蜜蜂扑向蜂蜜”。^③和被送往美国佐治亚的英国犯人、或者在美国的英国移民不一样,俄国人对于他们移居、并且又在那里受苦的地方没有培育出忠诚的情感。这块土地仅仅被看做是莫斯科的一个卫星国,而每一个说俄语的人都可以享有优先权。

《癌症楼》是一本确认殖民移民者在武力征服的领土上当家的小说,要

① “U nas ego eshchee he tantsuiut. V Moskve, i to mastera” (Asia, *Rakovyi korpus*, 128).

② “Ia-u sebja na rodine, kogo mne stesniat'sia?” *Rakovyi korpus*, 64.

③ “A oni v Moskvu-to i lezut teper', im tam kak medom namazano,” *Rakovyi korpus*, 272.

告诉全世界乌兹别克斯坦存在的目的:那就是,全都是为了俄国。小说还增加了俄国在中亚存在所依据的文化财富,这些财富令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国人傲然挺立,虽然饥肠辘辘、衣服里长满虱子,却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123 科斯托格洛托夫傲然昂然说:“我爱我的国家!”意思是让大家明白,他的爱拥抱了整个的苏维埃联盟,包括中心,也包括边缘地区:爱中心,因为那是俄国的核心,爱边缘,因为边缘属于中心,而且中心把活力十足的俄国特性辐射给了遥远的边缘地区。当然,谦卑的西波加托夫不会强调说他爱俄国人的土地而提出土地要求。

科斯托格洛托夫关于**祖国**的告诫,如果和一篇散文对比,就显得空洞:《如果我们梦想,是错误吗?你怎么说?》这篇文章是一位现代乌兹别克作家阿库纳瓦(Etibar Akhunava)写的:“在我们土地上播种和生长棉花和蚕丝,是妇女在劳动……但是,他们没有这些纺织品制作的头巾或者衣服。”^①这些话和一位诗人的话比较,也显得虚假了:阿卜杜拉西多(Razzaq Abdurashidaw)面对俄罗斯人摧毁土耳其斯坦文化发出庄严的控诉:

列吉斯坦,
 啊古老的大广场!
 你友爱的面容看到了多少凄凉。
 你的色彩都是痛苦的污垢和血痕。
 你的石块都是被俘美人的首级?!
 原谅我
 如果我把你的心划破,
 如果我回忆过去,此时此刻……
 我也是你的后代,并非生人,
 所以我同情你啊,列吉斯坦!^②

全部的俄罗斯人都是在不久以前凭武力夺来的一块一块的土地上的外来户和篡权者——在索尔仁尼琴小说里没有对于这一事实的意识。《癌症

^① Allworth, 317.

^② Ibid., 318.

楼》充满了活跃的、活生生的、有才能的俄罗斯人——对于他们来说土耳其斯坦的特征永远是一本打不开的书。“本地人”是二维的，有点像莫索尔（加缪小说《局外人》中的人物）在阿尔及利亚海岸上杀死的那个毫无色彩的阿拉伯行人。《局外人》的读者无法看到正在出现的阿尔及利亚民族的种种问题，和他们一样，索尔仁尼琴的读者得到的教导是，俄国在中亚草原理所当然地、一成不变地成为主人。在《癌症楼》里，兰索姆（John Crowe Ransom）所说的文学作品的“肌质”是和俄国、而不是塔什干发生共鸣。《癌症楼》不是俄国的一个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或者一个海明威的一本小说，《癌症楼》的奇异的地点不过是离家在外的俄国人活动的背景而已。就连像吉普林那样对殖民地的现实和特殊性的认识都没有。《癌症楼》是纯粹的一本殖民地小说，一本降低中亚共和国身份构成过程作用的小说。小说把俄国搬到了中亚。索尔仁尼琴不是一个天真的观察家，古拉格致命病态的牺牲品，仅仅描述他遇到的各种类型的病人和所得到帮助。他是一个作家，他的隐瞒事实的言辞遮盖了乌兹别克的悲剧，而这悲剧是比社会主义经济学和政治深重的多的。^① 他的小说一头扎进搅混突厥人自由发展之路的殖民主义者的胡言乱语；竭力把他们描写成不开化的人、需要俄国人教导的儿童、野蛮人，从来没有制造、或者想象出任何美的东西、任何“显然就是他们的、他们的天性的产品”。^② 小说竭力把俄国对中亚地理的掠夺进行到底，而且把掠夺扩大到身份和文化的领域。索尔仁尼琴大概比任何其他的现代俄国小说家都更多地显示，帝国乃是俄国民族意识的必要组成部分，帝国如何赋予这一意识以自信和自豪，即使是在古拉格群岛时代造成屈辱和缺乏证据支持的条件下，也要这样办理。

124

如果这部小说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而不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里写作的，索尔仁尼琴是否还会把塔什干当做故事发生的地点、而不顾本地人的敏感反应吗？他是否还能像在 1968 年那样压制乌兹别克本地人呢？在 20 世纪末，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莫斯科开办的一所医院会被本地居民看成是一

① Solzhenitsyn: 俄文版《癌症楼》，125—126；Rebecca Frank 英译（New York: Dell, 1968），160-161。这一段落被从 YMCA 俄文版《选集》（1978—1979）中删除；参见 138—139。这一段叙述谈到俄国人的坟墓，但是也包含对俄国人的批评。

② Adam Mickiewicz, “Ustep” (1832).

所外国医院,为俄罗斯人这个少数民族服务的,殖民统治的遗物,或者(也最有可能)俄国慈善机构建造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通过把某种俄国的状貌强加给乌兹别克人的办法,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置于收容了那些凭一股家长式的傲慢描写非洲的英法作家的、同样的帝国阵营。^①

确实值得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的主要传记作者和批评家,从梅德维杰夫(Zhores Medvedev)到斯坎梅尔(Michael Scammell)、从亚诺夫(Alexander Yanov)到穆拉夫(Harriet Murav),都完全忽视了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殖民主义方面。这种感受的缺失雄辩地证实了既定观念无所不在,不仅在福楼拜的时代,也同样在我们的时代。令人感兴趣的是,索尔仁尼琴作品的不同版本包含了删节和增补,这表明,随着亚洲政治地图的改变,这位作家、或者编辑觉得有必要修改某些段落。《癌症楼》俄文第一版,和弗朗克(Rebecca Frank)的以该版本为蓝本的英文译本都包含有把整个苏联说成是俄国领地的言论(这一言论从俄文版《选集》里删除),而本章的援引的段落都来自该《选集》。在《癌症楼》第一版,而不是在《选集》里,可以看到“在阿尔泰……和在新西伯利亚地区的……我们的许多坟墓……都可耻地被忽视……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性格的一个特征吗?”^②也许作者认为把阿尔泰算作俄国土地有风险,所以也完全删去了涉及俄国民族性格的字样。

在 1995 年的一次采访中,俄国海军少将阿列克辛解释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以后需要“俄国需要什么样的海军”。^③阿列克辛认为,俄国需要一支能够控制北极地区的海军,因为“谁控制了北极地区,就控制了世界”。其次,俄国需要的海军将会保持俄罗斯联邦的蓝图完整。阿列克辛强调说,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俄国就会“退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时代去”。这样的话使人想起密特朗在 1957 年说出的一句话:“没有非洲,就没有 21 世纪

① Said (1993), xviii.

② 俄文原文。

③ Vitalii Melik-Karamov, “Kakoi flot nuzhen Rossii?” *Ogonék*, no. 29 (4408) (July 1995), 36-8.

的法国历史。”^①阿列克辛和密特朗都是指殖民帝国的恐惧,以及殖民地的解放将会割断他们的特权和成功。虽然因为关注苏联的邪恶而值得钦佩,但是《癌症楼》也十分艺术地揭露了玷污了俄国历史的征服和保持殖民地的行径。已故的密特朗赞同发表声明之后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但是没有迹象显示,索尔仁尼琴,遑论阿列克辛,能够学样照办。

125

^① “Sans Afrique, il n’y aura pas l’histoire de France au XXI^e siècle.” François Mitterand, *Presence française et abandon* (1957), quoted in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78.

第五章 苏联晚期的帝国欲望

129

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症楼》拒绝承认必定面临分离的殖民地空间,而本章所考察的诸文本则表达出急欲包拢殖民权力依然稳定牢固的所有的空间的帝国欲望。在这样的形势下,可以辨析出三种类型的递给病理学。第一种藐视或者最大限度降低各个领地的本地居民的在场情况,这些领地迟至几代人以前大部分的居民还是非欧洲人,他们现在还居住在那里,保持着对土地的权利。西伯利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因为在俄国向太平洋挺进的过程中,西伯利亚本地人有很大一部分被毁灭,西伯利亚和远东依然还被分成民族共和国和地区,至少名义上还拥有主权,以各地区本地居民的权利为基础。可以预料,在将来,在“俄罗斯”联邦的西伯利亚部分,领土斗争将会加剧,不一定是因为当地居民会起来反抗,而是因为说俄语的白人居民将会把情感从莫斯科转移到本地。这一点把我们引向第二种帝国病理学。病理表现在作家们拒绝区分帝国中心的说俄语的人们和身处帝国边缘地区的说俄语的人们。西伯利亚是这样的地区,对于莫斯科的控制,其居民显出厌倦的迹象。在 21 世纪,他们可能尝试恢复像远东共和国(1920—1921)这样的实体和其他的实体,意在确立自己的区域权利。这样的事态前景类似于在大英帝国里“白人”殖民地最后变成独立国家的情况。但是,有些俄国作家故意无视在已经衰落的帝国之内部的离心力的作用,而继续提出统一的俄罗斯联邦的图景。第三种形式的帝国病理对于像犹太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少数民族是明显的:他们虽然没有领土要求,但是他们的利益却被顽固地忽视。在后一种情况之中,问题不在于分离主义,而在于承认他者的观点,不把他们妖魔化或者加以藐视。

130

苏联解体之后,帝国观点还继续存在的现象,见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俄国的书店里还出售歌颂帝国的图书。1992 年,在圣彼得堡,出现了一本

《俄罗斯帝国：词典与指南》。其内容大部分来自埃弗伦—勃罗克高兹（Efron-Brokgauz）的《小百科全书》（俄文版，1907—1909），但是，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为了提供卡普希钦斯基所说的“帝国”的光辉形象。这本书按字母表顺序列出沙皇俄国的全部省份和主要城市，除了华沙和赫尔辛基。几十块非俄罗斯人的领土被收入，却不指出其独特之处，因此造成一种观念，这就是，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各自的凝聚性，即使有值得讲述的故事，也没有各自的语言来讲述这些故事。在这本书里，作为各个实体，它们看不到了。作为**俄罗斯帝国**的组成部分，它们都溶化在俄国认同的大海之中，就像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领土一样，被强迫把自己的身份改变成为英国民族的附属品。但是，大英帝国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而俄罗斯帝国，正如本书所指出，甚至至今还存在，并且，明天也许还要存在，根本不顾它所囊括的各个民族的愿望。

这是俄国上层的帝国欲望，甚至在苏联晚期和后苏联时期早期的迷失和混乱之中，也很明显——我在本章里准备谈论的就是这一愿望。为这些愿望效劳的作家们把**帝国**当做俄国来描写：虽然帝国的某些部分已经脱离，其他的地方也出现裂纹，但是他们继续混淆**帝国**和俄国。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西方同行那样，这些作家把“俄罗斯”联邦、苏联和沙皇俄国的这些没有被同化的土地看成永远被捆绑在莫斯科身上，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看法抹杀了殖民地历史的背景。

这一观点特别适用于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至今依然是全世界最不为人知、得到探索最少的地区。因为在西伯利亚已经说俄语，而本地人居民的百分比已经降低到了个位数，所以，西伯利亚和俄罗斯人的俄国的分离已经得到最激烈的帝国主义者的承认，例如瓦连津·拉斯普京（Valentin Rasputin）。造成极少外国人能够访问西伯利亚这一事实，不仅是因为那里天气恶劣，首先是因为俄国的国家政策；这一政策严格守卫西伯利亚，不准外国人进入，该政策始于伊万雷帝的哥萨克穿过西伯利亚地广人稀的山峦和平原的时代——至今依然如故。在俄国人统治西伯利亚居民和开始掠夺那里的自然资源以前，那是一块神秘的土地，探险者未得前往旅行，因为庞大、气候和位置遥远等原因。在俄国征服之后，西伯利亚变成了一块封闭的土地，关于这块土地的信息变成了国家的机密。17世纪的荷兰商人马萨（Isaac

131

Massa)在莫斯科居住了七年,他写道:莫斯科维人被禁止和外国人讨论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的事;有一个莫斯科维人违背了禁令,向外国人透露了关于西伯利亚的信息而被处死。^①在层层严密外衣包裹之下,西伯利亚的毛皮和矿物被运到俄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而本地居民则遭受各种形式的灭绝。莫特(Victor Mote)说:“在1582年和1953年之间,西伯利亚这个名称是扼杀本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同义词。”^②在这一时期之内,俄国人至少消灭了75个民族和至少同样数量的语言。西伯利亚变成了为帝国公敌设立监狱的土地,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帝国中部和西部的仇敌。甚至在后苏联时代,前往西伯利亚和在那里旅行也一直很困难,原因在于那块490万平方英里(大约1274万平方公里)的行政人员的保密习惯势力,以及缺少方便旅客的基础设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伯利亚的出口占俄国的一半。^③在最近数百年之内,西伯利亚从两个方面支撑了帝国:一是换取外汇的出口商品的来源地,二是倾倒帝国反对者和普通罪犯的“垃圾场”。这两类人被贮藏在那里,无论从国际上说,还是从国内来说,都常常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鉴于这样的隐蔽政策,关于西伯利亚居民的资料一向缺乏。而西方人道听途说得来的关于西伯利亚的一个方面也是这样:西伯利亚是一个庞大的监狱系统。俄国的资料最大限度地压缩了犯人及其死亡率的数字,而同时竭力夸大自由移民的数字。和那些作为移民存活下来或者返回故乡的人比较起来,现在事实上已经找不到关于19世纪在到达之后数年之内死亡的囚犯或者流放犯人的百分比的资料。间接的证明显示,在苏联时期和沙皇时期的犯人死亡率极高,除了很小的百分比之外,事实上几乎全部都惨遭毁灭。自由移民得利于犯人的苦役和监狱的高度的死亡率。在1910年代西伯利亚大铁路建造完毕之前,被押送去监狱的普通犯人是步行走到目的地的,也就是说,旅途要延续几个月之久。在到达监狱分配中心之一,例如西西伯利亚的托波尔斯克之后,他们又被继续派遣,如果是在夏天,就必须步行,如果在初秋,就乘大平底船。政治犯也必须戴着镣铐步行,在途中不断

① E. M. Thompson, *Understanding Russia: The Holy Fool in Russian Culture* (Lanham, MD: Univ. Press of America, 1987), 101-2.

② Victor Mote, *Siberia* (Boulder, CO: Westview, 1998), 39.

③ *Ibid.*, 6.

倒下,数量可观。外国学者永远不能完全接近刑法制度的资料;因此,俄国人干预西伯利亚居民的统计资料还必须得到独立研究人士的检验。另外一方面,在经常使用的发配目的地当中的各民族人士和群体,都有自己的故事讲述,而这些故事都要缩小自由移民的数目、尽量扩大政治犯的数目。在世界上犯人被发配押送的地区之中,西伯利亚吞噬的数量肯定是最巨大的。斯沃瓦茨基的散文诗《安海利》(1837)讲述了关于这些死亡地带的的一个象征性的牺牲品的故事。《安海利》谈论了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行动造成的伤亡,这些牺牲品的命运为帝国铺平了道路,而自己在荒野中死亡。肯南在1891年写道:

在(我在阿卡图伊时候)附近某些地方埋葬着许多的波兰爱国者,他们是在1863年起义之后被押送到阿卡图伊的。但是,我找不到他们的坟墓。俄国政府不愿意费力气保留对于这些在西伯利亚监狱里被折磨致死的政治犯的记忆,也不愿意对这些遗体再费精神,所以大多数死难者连个坟头都没有。^①

132

瓦连津·拉斯普京:挤掉边缘的声音

在苏维埃俄国,就自己地区强化帝国观点的西伯利亚作家,一般都受到欢迎,作品发行量很大,与此同时本地人的声音则被挤掉,而干预西伯利亚死亡之地的记忆被从俄国文化中铲除。享受这种待遇最多的人当中有瓦连津·拉斯普京(Valentin Rasputin)。对于习惯于世界上后殖民时代地区正在出现的自我意识的读者,他在西伯利亚深处对祖国的强有力的祈祷是空洞无物的,但是却受到一大部分俄国读者公众的欢迎,而且受到国家的褒奖。拉斯普京在俄国文学中的地位可以和他同时代人、画家格拉祖诺夫相比拟,这位画家掌握的绘画策略是令俄国的艺术想象力继续占领帝国历史和地理。^②

^① George Kennan, *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 vol. 2 (London: James Osgood, 1891), 266.

^② V. S. Novikov, *Il'ia Glazunov* (Leningrad: Avrora, 1989).

便利这种帝国侵占的一个方法就是拉斯普京使用的一种类型。俄国文学的读者都熟悉这个类型,因为此前已经出现在果戈理和列斯科夫的短篇小说里。故事(skaz)叙事者头脑简单(虽然不无狡黠),贫穷,没受过教育,滑稽可笑。^①他肯定不是军人;绝对不像那些直到1995年5月胜利日还在红场受检阅的军队。即使他曾经在为数众多的军校之一就学,他也都把学校忘记了。我们不能指望这样的叙事者显露出对军事超级大国和国土贪婪扩张有什么了解。拉斯普京和阿斯塔菲耶夫(Victo Astafev)的叙事者把读者和俄国的领土难题与军事难题隔离了开来。他们使用的农村地区的比喻把读者的注意力从作为帝国恶霸的俄国引导到了俄国人十分珍视的形象,亦即,俄国是一个温顺的牺牲品。像俄国的瑞普·凡·温克尔(美国19世纪作家欧文·华盛顿的著名同名故事主角——译者)一样,这样的一个叙事者绕过他没有能力描写和解释的情况。但是他又和瑞普不一样,他竭力说服俄国读者和外国读者,他是代表着俄国的文化身份的,而不是用他的农村话语声音遮盖帝国权力。

拉斯普京是《西伯利亚,西伯利亚……》(1989)的作者,这是一部非小说叙事,以故事风格写出,集中使用西伯利亚本地人的观点和角度。这本书是一个混合体,夹杂了民间传说、游记、大自然爱好者对风景的描写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控诉(拉斯普京竭力减缓苏联工业对贝加尔湖的污染)。从最好的方面说,拉斯普京传达了对于土地的强烈的同情,这种同情是西伯利亚的许多访问者和居民的感受。西伯利亚是一片令人陶醉的土地,广阔无垠,令人惊叹,风景的丰富变化令人应接不暇——穿越西伯利亚不能戴着镣铐,而是应该享受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头等车厢的舒适,或者背着装有最高级用品行囊徒步旅行。景慕拉斯普京的美国读者正确地注意到作者对土地的眷恋。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他的叙事方式在认识论方面的愚蠢,以及十分明显地坚持西伯利亚在民族方面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是一团老牌的杂拌,掺杂了俄国人的诡辩、说教、历史和宣传、俄国人受磨难的哀怨和对

133

^① Skaz 是故事叙事的一种典型的斯拉夫叙事形式,虚构的叙事者都不如设想的一般的读者聪明、受的教育也少。这种故事的实例包括果戈理的《外套》(1842),在波兰文学中,有 Jan-Chryzostom Pasek 的《回忆录》,写作于16世纪晚期,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836年。

他者的苦难视而不见。拉斯普京书中描写贝加尔湖地区本地居民的篇章是少而又少的。叙事者形容本地人的敏感“不真实”。例如,叙事者一听到布里亚特人唱歌就感到一股不真实感突然笼罩了自己;他顽固保留在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所有权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中,所以对这一权利的挑战,哪怕是在歌声里,他也觉得一厢情愿。布里亚特人的习俗,例如火葬遗体,都用高傲的好奇心来描写,就像东方主义者们描写亚洲人和非洲人古怪而原始的习惯那样。布里亚特人而并非俄罗斯人才是贝加尔湖附近广大的、几乎无人居住的土地(包括地下的矿物资源)的原有业主这样的观念,即使是作为一个争论焦点,也显然从来没有经过叙事者的思维。

作为帝国的代表人物,拉斯普京欢迎西伯利亚财富的增加。在《活着,可要记住》(1975)中,涉及了俄国士兵在欧洲的著名的职业——抢劫。我们得知,阿塔马诺夫卡集体农庄的农民之一,在二战期间应征加入红军,按期从前线给他的妻子瓦西莉莎寄来很大的包裹。因为苏联士兵的津贴是极少的,所以我们只能设想这些东西是战利品,就像一些十分节省的士兵省吃俭用把节约下来的东西寄回家里一样。1945年1月到3月,瓦西莉莎收到五个这样的大包裹,我们在书里看到,对于这些意外的收获,瓦西莉莎是严守秘密的。^① 这些包裹从中欧邮寄到西伯利亚,一定是走了几个月的。必定是在1944年夏秋寄出的,当时苏联红军正在穿过波兰(俄国人在1944年7月21日渡过布格河,1945年1月17日占领华沙)。拉斯普京有意不说包裹里都是什么东西;他只告诉读者瓦西莉莎拿包裹当坐凳用,显然是等她丈夫回家以后一起最后享用这些财物。

萨义德说,在殖民地获取的财物“源源不断”的供应补充了奥斯丁《曼斯菲尔德花园》里的舒适而文明的生活;他又补充说,成熟的帝国不在意这类的抢劫,而是在殖民地制定某种制度、某种组织,依靠这些机制,市场、垄断资本和价格竞争创造了从海外领地获取利润的间接的办法。但是,苏联版本和沙皇版本的俄罗斯帝国都几乎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从被占领土地向俄国的中心运输财宝的过程,是一种和被征服者建立关系的由来已久的办

^① Valentin Rasputin, *Uroki frantsuzskogo. Povesti i rasskazy*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87), 73.

法。单一的抢劫,当然,很少能够带来持久的财富,而阿塔马诺夫卡村的贫苦农民从中的收益也多不了哪儿去。但是,遭到掠夺的地方却因为这样的行为忍受损失。对于帝国的这样的搅扰行径,拉斯普京视而不见,这也不能说不是典型的态度。

134 拉斯普京对西伯利亚殖民地化的叙述本质上不同于近期学者的论说。拉斯普京说,移居到那里的农民开始生产他们自己消费不了的小麦。但是没有提供数字和资料,而且,后来,拉斯普京的叙事者还不厌其烦地拿出旨在启蒙的细节。在十月革命前不久,西伯利亚的确变成了沙皇俄国生产小麦和黄油基地;但是,在更要长得多的时间之内,西伯利亚给帝国提供的主要产品是毛皮、贵金属、石油和天然气。在 1830 年到 1850 年之间,西伯利亚的黄金生产增加 250 倍。早在 17 世纪,俄国国家税收的十分之一来自大西伯利亚(包括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远东)^①的毛皮。在 20 世纪末,俄国得以生存,主要赖于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石油和矿产,而不是西伯利亚的小麦。在拉斯普京的叙事之中,这些关键的细节根本没有提及。他说到了贪婪和资源消耗殆尽、抢劫和残酷,还有——也是偶一为之——“小民族的”的消亡;虽然没有拿出具体的名称和政策,但是这种自以为是的思考却轻而易举地取代了历史记录或者修补莫斯科贪婪成性恶行造成的伤害的、现实的建议。拉斯普京痛感惋惜的事实是,对西伯利亚的剥削并不经常是以最好的方式进行的——亦即,令西伯利亚更有效、在更长的时间之内保持俄国粮肉食橱的地位的方法。他说的关于西伯利亚殖民化的言论所包括的含义是,西伯利亚没有所谓的本地居民,是俄国人进入了无人之地。尽管他偶尔提一句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鄂温克人)等等,也实在是偶一为之,而关于西伯利亚毫无人烟的大密林和英勇机智俄国人像利文斯顿博士那样穿越其中的形象,却是高大雄伟。

关于某些人,拉斯普京大体上是避而不谈的:这些人把遗骸留在了西伯利亚,有时候还有后裔(但是绝大部分没有):他们是俄国国家倾倒在荒野里面的囚犯和劳改犯,命令他们开垦西伯利亚,从他们身上榨取最大利润。关于他们,他胡乱评论了几次,但是避免提出姓名、数字、日期和历史。他对

① Mote, 59.

西伯利亚监狱制度的评论强调犯人“违规”，而不是他们入狱的政治性质。根据俄国的资料，沙俄西伯利亚的大多数犯人都是普通罪犯，但是拉斯普京没有区分政治犯和普通犯人。^① 他大谈十二月党人，其实只有几百个十二月党人被送到了西伯利亚，但是仅仅用俏皮话提起参加波兰 1831 年、1863 年和更早的起义的“造反分子”，这些人的政治“违规”从来没有得到“宽恕”。^② 苏联军队在 1939 年到 1941 年占领的中欧和东欧的公民被大规模遣送到了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之事实，从来没有被提起，但是，这些人在数目上比遭受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多六千到七千倍。当时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强迫迁移摧毁了这些弱小民族的大约百分之二十的公民。在拉斯普京关于监狱制度的叙事中，非俄罗斯历史遭受的涂抹是骇人听闻的。

下面的论断应该怎样评论呢？“托波尔斯克市（即使他从来也没有访问过）对于西伯利亚人是亲切的，一如莫斯科之对于俄国人（俄罗斯联邦的非俄罗斯人居民），或者基辅之对于斯拉夫人”。^③ 捷克人如果得知基辅应该在他们心目中引起内在的动情会感到莫明其妙的，而达吉斯坦人、或者鞑靼人如果听说莫斯科就是他们热爱向往的中心，也很可能无名火起。因为拉斯普京的读者首先是在俄国和说英语的国家，所以这种愚妄言论尽管不会引起注意，却要凝结成“真理”，这“真理”最终要扑灭帝国中非俄罗斯人的声音。或者设想一下这样的一个场面：几个外国人和拉斯普京一起在贝加尔湖附近散步，他们都得到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瑞典的萨克斯管吹奏者保尔·文克勒，演奏起“抗议之歌”；他以前就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演奏过这支歌，以抗议铀矿污染了印第安人保留地。拉斯普京的说教创造了美国与俄国之间的平行状况，两国都制造了污染。就这样，他者的存在被排挤出了拉斯普京的大作，帝国对西伯利亚的剥削被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和另外一个国家的不同程度、不同时间的错误行为并列的错误行为被创造出来。拉斯普京虽然十分详细描写了伊尔库茨克的建筑，却没有提及 19 世

135

① Kennan, vol. 1, 280.

② Rasputin, *Sibir' Sibir'...* in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3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94), 25; and Kennan Sr., vol. 1, 280.

③ Rasputin, vol. 3, 37.

纪政治犯们在那里建造的一个天主教教堂。这个教堂在 20 世纪 80 年代拉斯普京写作此书的时候乃是该市历史老城区中心的一座突出的建筑。它是伊尔库茨克新哥特式建筑、更多地还是 19 世纪石结构建筑的唯一例证。保存下来的 19 世纪的其他建筑都多是木结构,例如十二月党人之家之一,也位于老城,拉斯普京恰如其分地提及。我在 1985 年访问伊尔库茨克的时候,教堂被当做仓库使用;但是,教堂坚固的墙壁经受住了滥用,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前门被木板围住,我们还会一位这是以为正在使用中的教堂呢。拉斯普京也没有提及托波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地方的天主教教堂,这些教堂证实,有相当多的非俄罗斯人欧洲人在西伯利亚生活。^① 和对于西伯利亚本地人的家长式态度结合起来的是,这类的空白填充了干预这个地区的一种选择性很强的历史,符合帝国遗忘症,而在俄国作家之中,拉斯普京大概是这一遗忘症在 20 世纪晚期的最生动的范例。它是符合东方主义者提供的东方历史的俄国历史版本的先驱者。拉斯普京唯一一次接近讲述沙皇的苦役制度和苏联的古拉格,把新押送来的犯人比作潮水:他们来了,“过了几年之后,他们静静的消失了,似乎是渗入到了地下。然后,潮水又来,千千万万新的犯人又来了。”^② 这样笼统的叙述加强了普通俄国人不干预帝国政策的观念,这样的叙述推迟了俄国知识分子需要赶快开始的自我检查。

拉斯普京的书,不像一些评论者说的那样是保护西伯利亚不受俄国和苏联的巧取豪夺,而是保护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的存在。^③ 拉斯普京叹息俄苏管理体系给贝加尔湖造成的损害,但是他的出发点是俄国痛感莫斯科在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减少。他使用了西伯利亚民族主义的语言,就像英国殖民主义者一样,这些人热爱他们定居或者出生所在的某一外国领土,而且为这一块领土说话,把它当成大英帝国的一个部分。拉斯普京说了一个故事,彼得大帝治下的一个西伯利亚省长,加加林伯爵;彼得大帝下令把他吊死,让那遗体吊着,直到绞索烂掉。原因何在? 据说是加加林同情西伯利

① Kennan, vol. 1, 82.

② Rasputin, vol. 3, 23.

③ Kathleen Hughes, *Booklist*, 1 June 1996.

亚分离主义。关于这片装满残酷刑罚的土地，拉斯普京只讲了这样一个特殊残暴的故事，令人想到他说故事的用意大概是打消世人铤而走险、为反抗俄罗斯帝国干出一切可以设想出来的最凶恶的罪行。

拉斯普京的《西伯利亚》提供了一篇细致得恰到好处的俄罗斯帝国编年史。为伊万雷帝征服了西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们阴森逼近，而早在18世纪早期就开始被迫移民到那里的农民也是大批来临。《西伯利亚》是一首赞歌，用古米廖夫的话来说，颂扬了叶尔马克和“征服怪异地域”的其他的俄国人。拉斯普京为他们唱颂歌，把叶尔马克描绘成为了俄国大业殉难的英雄，这有一点像是古米廖夫，他提出了征服土耳其斯坦的俄国将军们的天使般的肖像。拉斯普京毫不怀疑，征服西伯利亚的人都是英雄：归根结底，他们是曝露于本地人“扎着黑色羽毛毒箭”的射程之内并且和他们短兵相接搏斗的。^①他对叶尔马克讨伐西西伯利亚的描写是：“哥萨克只有五百人，而敌人的数目高达数千；俄国勇士们如果不是得到具有出类拔萃军事和行政才能之士叶尔马克的领导，敌人是可能取得胜利的。”^②一位西方学者对时间的叙述有所不同：“1581年，或者1582年，叶尔马克的队伍膨胀成1650名武装精良的哥萨克，开赴图拉河谷攻打敌人。他们装备有滑膛枪和甲冑，轻易打败了由鞑靼人、奥斯基亚克人和沃古特人的杂牌军队，杂牌军配备的武器只有大刀、长矛和弓箭。”^③拉斯普京笔下的叙事者是个纯朴的人，所以叙事时有不准确之处似乎也有指导意义：故事叙事者是有意不求准确的。但是，这类细小不确之处积累起来，就造成了前景的巨大差异。

拉斯普京承认，俄国在征服西伯利亚方面的成功有赖于俄国人的自爱，但是，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审查征服行动（虽然他是道德家），而是为了赞扬。^④他的意思是说，俄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的自尊自爱对西伯利亚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俄国人的这种自爱，西伯利亚就不可能加入伟大优秀的俄罗斯集体——凡有俄罗斯人居住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他还表达了一个愿望：大乌斯秋格镇应该得到嘉奖，列入俄国编年史，因为它是特殊

① Rasputin, vol. 3, 16.

② Ibid., 15.

③ Mote, 41.

④ Rasputin, vol. 3, 18.

巨大数量哥萨克的家乡。他还表示,叶尔马克、哈巴罗夫(Erofei Khabarov)、波亚尔科夫(Poiarkov)和其他许多人也应该受到同样的敬重。对于这些哥萨克和其他的哥萨克在艰苦穿越西伯利亚征途中的全部野蛮残酷的行为,他却只字不提。就因为残酷,所以哈巴罗夫和波亚尔科夫的行为已经在当地人的记忆中保存了二百年之久。他们首先在亲生子女面前折磨他们的父母,然后再以同样方式把这些孩子折磨致死。这样的征服者竟然被尊为英雄,真是道德学家拉斯普京的又一个破绽。他谈论“征服堪察加半岛”的阿特拉索夫时候表现出来的那股傲气,和普希金谈到征服高加索的叶尔莫洛夫的时候一样。

137 拉斯普京比较了英国人对美洲的殖民活动和俄国人对西伯利亚的殖民活动,硬说俄国人不同于英国人,没有奴役本地居民。拉斯普京承认,有人要奴役西伯利亚人,但是立即受到政府和俄罗斯人居民的指责。读者的印象是公众舆论在俄国历史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在本地人和俄国移民逐渐发生争执的时候,据说俄国政府是站在本地人一方面的。^①地方的俄国行政人员虽然有时候野蛮对待本地人,但是俄国农民在军事力量夺取来的土地上和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很容易地建立起来友好的关系。^②拉斯普京反复说,西伯利亚的殖民是本地人自愿的、自由的,本地居民欢迎新移民到来。然而,事实上,沙皇的政策是诱导农民移居西伯利亚,目的就是把这个地区俄罗斯化。诱导措施就是包括农奴身份解除和减免税收。俄国农奴受益于政府,而政府则以本地居民为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地居民很难放开双臂欢迎俄国殖民移民。

拉斯普京明确表示,西伯利亚已经变成了俄罗斯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分离的问题毫无意义。他断言“西伯利亚比俄国本身更是俄国……西伯利亚和俄国是一家……没有俄国,西伯利亚就无法生存”。西伯利亚“早已命定成为俄国血肉的一部分”。^③

在拉斯普京的小说里,巧取豪夺的方法有了变化,但是思想意识依然如

① Rasputin, vol. 3, 21.

② Ibid.

③ Ibid., 29, 19.

故。在《活着,可要记住》(1981)中,十五岁的萨尼亚看待西伯利亚的眼光和果戈理的《迪康卡近乡夜话》(1832)一样。西伯利亚夜晚的昏暗气氛以果戈理的言辞表达,或者用另外一套殖民说辞表达(因为果戈理描写的更多的是乌克兰,而不是俄国)。果戈理的作品好像是一种溶剂,在这样的水里头,俄国和乌克兰之间的文化界限消失,因而预先掏空了地方的自我意识。这个故事不包含对西伯利亚的描写,而是把俄国的属性强加给了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里,没有说到西伯利亚的非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十分有别于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然而,实际上,在1989年,本地居民的住房只有百分之三有煤气,百分之零点四有自来水,百分之零点一有暖气。绝大多数没有排水系统,面积也只有俄罗斯人住房的一半。莫斯科政府常常下令拆除本地人的村庄,本地人被强迫迁居到更大的居民点,这一措施使得他们很难甚至不可能维持生计。^①本地人首先受到污染和财务问题的困扰。因为俄国人从冻土带和大密林中竭尽全力榨取最大限度的石油、天然气、木材和毛皮,本地人民的财源枯竭。在20世纪90年代,西伯利亚的本地居民努力确认自己的土地权利,上街游行,选出代表。在莫斯科,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彼此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喧嚣争吵之中。这些事件出现在苏联解体之后,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是隐藏在社会生活的表面之下的;作为一个注意乡土的作家,拉斯普京必定是留意这些问题的。但是,在他的书里避而不谈本地人是否拥护。拉斯普京也没有提及产权问题: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是,西伯利亚的财富属于俄国人,不管他们是莫斯科的涅姆卓夫和丘拜斯、或者是在伊尔库茨克像他本人那样的人。但是,就像莫特指出的那样,如果本地人的财富属于本地人,那么,“俄罗斯”联邦的最富的这个省就应该是西西伯利亚的汗齐亚—曼西亚;这两个小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变成大富豪。^②

拉斯普京没有区分把西伯利亚当做旅途驿站的俄国人 and 决定在那里定居的俄国人;但是,他坚持这两类人都承认作为帝国中心的莫斯科的领导地

① Mote, 174-5.

② Mote, 179.

位,而且,他们没有分离主义的梦想。在他看来,西伯利亚的问题可以通过这两部分人的对话来解决。拉斯普京从来就没有想到(即使作为一个辩论一番、不了了之的问题),莫斯科强加给西伯利亚的行政措施对于那片土地是灾难性的,而像他自己那样的西伯利亚本地人,可以和非俄罗斯人的居民联合起来,对莫斯科说不,要求某种真正的联邦制的地位。缺乏把人民的利益置于俄罗斯帝国国家的利益之上的能力,这一点是俄国民族主义的特点,也是它的致命弱点。对于拉斯普京而言,如果一定要说哪一方有罪,那就是现代化。他认为:“在沙皇统治这里的时候,西伯利亚面临的危险比较小。”^①拉斯普京后来加入俄国社会最反动的潮流,在1993年支持反叶利钦的政变、在1998年发表反犹太人声明——这样的事实,也许是和他在以西伯利亚为根据地对俄国殖民主义唱出的赞歌中所采纳的观点不无关系。

雷巴科夫:控制殖民地空间

拉斯普京并不是从事关于西伯利亚的概念操纵的苏联晚期的唯一的作家。在雷巴科夫(Anatolii Rybakov)和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里,西伯利亚也变成了俄国,而它自己的历史和各个民族都消失了。在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巴特大街的孩子们》(1988)和阿斯塔菲耶夫的短篇小说中,西伯利亚变成了一片白人殖民地,可以和英国的北美和澳大利亚相比拟,在那里的本地居民都同样地从作家的书里被剔除(但是,他们也多方出现在其他作家的书里,可以举出郎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或者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他们也音乐出现在其他作家的书里——在俄国是找不到平行的情况的)。

从19世纪以来,俄国文学就遵从一种传统,把西伯利亚描写成这样一个地方,就是说,如果在家乡求生困难,俄国人可以往那里移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霍赫拉科娃太太给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劝告是,到有黄金开采前景的亚库特地区去闯荡。德米特里发疯一样

^① Rasputin, vol. 3, 282.

找钱弄钱,想要还债,债主就是以前的未婚妻,而霍赫拉科娃太太,19世纪70年代俄国公众舆论女代言人,劝告他按照当时贫苦俄国人那样走最后一招:到殖民地去打天下。这个办法类似麦考白先生,他要去澳洲改变命运。俄国人怎样强迫亚库特人告诉他们产黄金的地段地点的细节,这样的强迫行动实际上也是亚库特黄金开采史的核心事实,都被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和从俄国人的记忆之中删除。《卡拉马佐夫兄弟》制造了一个印象:是俄国人自己在亚库特—萨哈和科雷马发现了黄金矿脉的,而亚库特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①

139

在雷巴科夫的《阿巴特大街的孩子们》里,西伯利亚同样变成了俄国风景和习俗的某种延伸之地,似乎俄国的地理和疆域可以随便东移似的。这类的描写就等于藐视西伯利亚的非俄罗斯人的诸民族。如果他们出现在雷巴科夫的小说中,他们就是处在俄罗斯化的边缘,站在帝国大厦的门口,而这座大厦才是作家的(也是读者的)注意的中心。叶尼塞河畔的各民族被边缘化,这表明,其地理位置比民族更加重要。萨沙·潘克拉托夫被流放西伯利亚后的生活,变成了他在莫斯科的生活的延续,虽然这种生活残酷而具挑战性质,但是依然是一种延续。雷巴科夫的西伯利亚居住着像他自己一样的人,亦即来自“欧洲大陆”的人,他们的文化中心是莫斯科,他们以为这一叙事轨迹之中的其他每一个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因为只是透过莫斯科人的眼光来看待事件和变化,所以只不过是俯就着间接地注意本地人,使用可以追溯到俄国人到来以前的地名:通古斯下石镇、鄂温克民族区、泰谢特。

萨沙·潘克拉托夫和他的莫斯科同学被流放到了叶尼塞河以东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居民是鄂温克人,又名通古斯人,在20世纪30年代,小说故事展开的时候,他们的人口大约在一万到一万五千。^②除了劳改营,这片地方同样是几乎没有俄国人居住的,所以,在萨沙长途跋涉走过这一区域的时候,本地人应该是时常在场的。他们不仅不在场,而且他们的身份还被和

^① W. John Cieslewicz,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Gold Mining," *Sarmatian Review* 5, no. 4 (December 1985), 1-4.

^② 鄂温克民族区在1963年居民人口是11000人,主要是鄂温克人。其他的鄂温克人(14000)居住在周围的地区。俄文版《百科词典》,1964,卷2,683。根据1970年的普查,通古斯人或者鄂温克人,人数为25000人。《剑桥俄国和苏联百科全书》(1982),72。

鞑靼人混淆起来。^① 萨沙暂时的情人琪达,被叙事者推进了“本地人”人群(不同于俄国人),在这方面,叙事者是萨沙的另外一个自我。和索尔仁尼琴的塔什干一样,本地人甚至连耳语的声音也没有;他们被迫保持百分之百地沉默。

对琪达的描写是雷巴科夫的殖民主义态度的表征。他缺乏康拉德的深度和对地方居民的受到挫折的同情心,但是他却充分地表现出来对地方历史和社会的绝对无知——这正是殖民主义者作家们的特点。向读者介绍琪达的时候,用的是她的名字和父名,似乎她是一个俄国人(俄罗斯人全名分为三段:名、父名、姓,例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只用名和父名的时候,表示亲近和礼貌——译者)她父亲的名字被歪曲,让俄国人听着生疏和可笑:这样的篡改,是西伯利亚的突厥人和乌戈尔—芬兰民族从来不能接受的。这一现象的衍生物是有关丘克奇人的笑话,这些笑话根据的事实是,这一遥远地区部落的姓名让俄国人听起来十分滑稽。

140 被征服地区的女性化在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里十分突出,在雷巴科夫的叙事中也一样明显。那里的土地存在,就是为了俄国人去旅行、打猎或者挖掘。本地的妇女被引诱和俄国人发生性关系,而被征服的男人们则不知去向,从而被象征地剥夺了他们的男性性征。在雷巴科夫的小说里,女教师琪达是得到连续在场的本地人的唯一的代表。她是萨沙的情妇、帮助他,娱乐他,但是她没有声音,没有自己的志向(除了勾引萨沙)。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又在哪里消失;这就表明,像她这样的人是没有自己的话语的:他们不过是关于俄国人的故事里陪衬而已。琪达通过叙事者的、萨沙的、俄国人的声音出现。她疯狂地爱上了萨沙,就像蝴蝶夫人(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译者)一样,但是,她却不像那个日本人女子,在萨沙抛弃了她的时候,连一句哀怨的话都没有。她完全受控于他人,像一条狗一样,在受到主人惩罚的时候,连汪汪一声都没有。叙事者说:“她永远离

^① Rybakov 谈到了萨沙所居住的村子里的一个本地人姑娘卢凯什卡脸上的“通古斯人的、鞑靼人的咧嘴笑容”(俄文原文是 *tungusskii, mongol'skii oskal*——直接从俄语也可以翻译成“通古斯人的、蒙古人的咧嘴笑容”)。《阿巴特大街的孩子们》,Harold Shukman 英译(Boston: Little, Brown, 1988), 355。其他引证摘自这一版。俄文版,Anatolii Rybakov:《阿巴特大街的孩子们》(Moscow:苏联作家出版社,1987)。其他引证出自这一俄文原文版。

了,消失了,神秘得有如她进入他的生活一样。”^①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和失去自由的危险拯救萨沙,她设想出扫除他的“罪恶”记录的方法,这就是提出和他结婚,让他用她的姓氏。而萨沙·潘克拉托夫呢,却把她的这样的诚心诚意比拟为蟑螂的丑行。

对于琪达的最后的讽刺是叙事者最后揭示了她谋生的方法。她是一名俄语教师。被征服民族的智慧和精力都被用来加强征服者的存在势力,就像她的情爱的和道德的精力都被用来提高萨沙的福利一样。全部这一切都被雷巴科夫的叙事者拿来使用,我们也想到,也被作者拿来使用,就像其他的俄国作家把西伯利亚编织在他们的叙事之中一样。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西伯利亚都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效劳的,故事也可以在莫斯科讲述,因为在故事里,是莫斯科的声音而不是那个地区的声音出现。

雷巴科夫小说中提及通古斯人和鄂温克人的段落也只是说,他们野蛮,靠土地生活,都是肥胖和没有教养的酒鬼,浑身上下都是因为不讲卫生造成的、没有救药的脏病。^②本地的一个老婆子向萨沙示意,她有办法让一个本地姑娘听他使唤,价格是一条披肩的钱。^③萨沙的伙伴鲍里斯用贬低人的词儿“野丫头”来形容这个姑娘。^④萨沙和他的俄国人同伴打猎滥捕滥杀,掠夺本地森林资源,而“本地人”则遭受冷漠,被驱赶到社会边缘,卖淫。就像莱蒙托夫的“邪恶的车巨人”一样,雷巴科夫的本地人无法自卫,没有声音。什么坏事都能堆在他们身上。叶尔莫洛夫曾经说过,车巨人是不能平息下来的,只能灭绝;雷巴科夫言下之意是,作为一种文化,西伯利亚本地人也不配更好的命运。他们应该腾出地方来交给俄国人,而且因为有机会被俄国化而感恩戴德。西伯利亚的财富是俄国人的,不是通古斯人的;不应该为莫斯科所用,而应该让本地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权力和暴力是雷巴科夫小说情节的支柱。

西伯利亚的资源有的可以再生,例如在《活着,可要记住》中,三个俄国殖民主义者为寻找野味打猎;有的不能再生,比如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

① Rybakov, *Children of the Arbat*, 139.

② Ibid., 340, 354, 356, 452; and Rybakov, *Deti Arbata*, 242-5.

③ Rybakov, *Children of the Arbat*, 357; and *Deti Arbata*, 245.

④ Rybakov, *Deti Arbata*, 244.

岛》中胡乱开采的矿物。拉斯普京的叙事者说,如果俄国人不去采集浆果,森林的野兽就要吃掉,那么浆果还有什么用?殖民地的大自然被当做殖民者的财产对待。雷巴科夫提及一个用捕兽机捕毛皮野兽的猎人,年景好的时候能够捕获、或者射杀多达两万只野兽:读者不禁要问,难道这也算能够再生的资源吗?在《西伯利亚》中,拉斯普京说了亚库特地区一个俄国人居民点的故事,在那里,肉不是在商店里买的,而是居民在想吃肉的时候去打猎弄来的。“居民点的人想吃肉了,就骑上摩托车(一个人有两三辆),到冻土地说转一圈,用望远镜找一头鹿。”^①这样的做法对拉斯普京毫无影响,虽然在别处他为贝加尔湖附近的地方生态环境的恶化叹息。

资料表明,早在18世纪,俄国猎人就已经严重地降低了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的毛皮野兽的存活数目。在1700年,大西伯利亚四分之三的毛皮资源被消耗殆尽。^②俄国人长期掠夺西伯利亚的竭泽而渔的方式表明,俄国统治者很可能没有排除一种可能性:这些土地有朝一日也许不再被迫依附莫斯科:所以必须抓紧时间,尽量抢劫,以防为时已晚。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提及,有犯人在这个地区的东北边缘某地为帝国开采贵金属。很能够说明问题的是,索尔仁尼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谈论双重的剥削。他所漠不关心的事实是,这些财富是在**殖民土地**上采掘的。看来,只要俄罗斯帝国把“免费的”农民从欧洲大陆送来,到西伯利亚的矿坑里干活,他就满意,而俄罗斯帝国在19世纪就是把整个的哥萨克人村庄的人迁移到了高加索,而给本地人造成大麻烦。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伊万·杰尼索维奇一类的人是被流放到了**殖民地**的。萨义德指出,尽管友善、而且无可奈何,遣送到澳大利亚的英国人也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的帝国特权就在于他们能够移民海外,并且在那里定居,而遭受殖民压迫的民族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在他们要求同等的机会、选择英伦三岛居住的时候,遭遇到的最好的情况是悲痛、焦急、不受欢迎,而最坏的情况则是暴力和公开的歧视性的法律条文。

在雷巴科夫小说的某处,有一句挖苦口气的话说,秘密警察某一级别

① Rasputin, vol. 3, 222.

② Mote, 58.

的一个成员长着一张爱斯基摩人的脸。虽然让人略感欣慰的是得知俄国的厄运不仅仅可以归咎于犹太人,但是,在一位具有犹太人背景的作家雷巴科夫的书里重新提出那个方便的暗示,是令人不安的,这意思就是:俄国的秘密警察局是由一个俄罗斯人领导的,似乎在一个主权国家里这样的事能够存在。另外一方面,阿巴特大街上不见爱斯基摩人的脸型,倒是理所当然,鼓励少数民族在大都市工作,从来就不是俄国、或者苏联的传统。

上面讨论过的文本都在强化帝国的姿态,继续显示出帝国观点的核心地位。我们可以按照萨义德的见解重复:在 20 世纪后期的俄国人的著述之中,俄国文化继续免除了权力的搅扰。雷巴科夫依然认为,萨沙来自帝国中心的事实,并没有给予他在西伯利亚行事的权力,他和琪达可以掉换社会位置,布里亚特人没有因为像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中的古希科夫一家人的到来而遭到排挤。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如果在阿巴特大街上,琪达必定是一张爱斯基摩人、或者高加索人的脸面,让莫斯科人看着起疑,而萨沙在西伯利亚,是不会受到来自本地人的威胁的。这就是这些表面上温和慈悲的作家们显示出来的殖民主义者态度的核心。叙事者的声音不允许多声部复调,不允许莫斯科的权力乃是建立在地方居民无权的基础让这样的见解。我们固然不能够指望政治家们对这些问题敏感,但是,艺术家竟心甘情愿热衷于模棱两可的描写,那么,他的才能在这里就似乎受到损害,令人扼腕。俄国作家们在帝国事务方面的单线条的视野,使他们有别于欧洲大陆其他的帝国作家。

142

1979 年的苏联统计资料表明,在贝加尔地区的布里亚特人有 353000 人,而拉斯普京的大部分小说和故事的情节都发生在那里。像沦为大帝国牺牲品的许多民族和部落一样,布里亚特人被苏联(当今“俄罗斯”联邦)和外蒙古分开。有理由预料,因为许多布里亚特人受到俄国人移民的排挤,所以很可能对外来户怀有怨恨,而描写西伯利亚的作家必定注意这个情感的问题。不包括拉斯普京。和那些针对印第安人曲折寻求灵魂的美人不一样,拉斯普京和其他的俄国西伯利亚作家拒绝承认这个问题,更不要说探索这个问题了。

拉斯普京的小说《活着,可要记住》说的的是一个逃兵,设法返回他不能

合法地返回的西伯利亚故乡的农村;所以他隐藏在一个破旧的澡堂子里,和他妻子秘密约会,妻子怀孕,后来在对这个逃兵的追捕中丧生。读者本来会预计,如果一个作家想要依靠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来焕发读者的爱国热情,那么,他就应该呼吁这样的制度——这个制度为了国家的权力而把像纳斯娇娜和她丈夫安德烈的牺牲制度化。但是,相反,拉斯普京告诫读者“活着”,在生物学上保存俄国,并且“记住”,保存部落的记忆。如果这里说的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受到威胁的爱沙尼亚人或者拉脱维亚人,我们当然理解这种部族方面的焦虑。但是故事指的是俄国人,他们肯定没有受到绝灭的威胁。一个俄国人作出这样的呼吁显示出作者的欲望:俄国人要不惜任何代价,在西伯利亚生存下去。拉斯普京要求读者不要造反、不要为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奋斗,而是活下去,保存部族。

上文对拉斯普京的阐释不是一位西方学者想象力的产品。这是另外一位俄国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见解,他是这样评论拉斯普京的小说的:“活着,可要记住,对呀,老弟:在悲惨和动乱之中,在最严酷的考验中,你的义务就是依然坚持国家一分子的身份。无论是衰弱还是误解造成你脱离你的国家,都会给你的祖国、因而还有你,增加了新的重担。”^①这和托尔斯泰的“为上帝和为自己的灵魂活着”的确有很大的距离。

143 这种温情帝国主义的另外一例是拉斯普京的短篇小说《火灾》(1985)。故事讲述的是一群惨遭践踏的农民,他们的祖先被迫离开俄国欧洲大陆移居西伯利亚。没有人告诉我们移居是在苏联时代还是在更早的时候完成的;农民历史的这种模糊记录是和拉斯普京对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眷恋相辅相成的。在这些移民的后裔中,有一个农民叫阿纳法西·布伦尼科夫(阿弗尼亚),在叙事者看来,这是个正派人。他和故事的主角,伊万·彼得罗维奇,住在一个叫做索斯诺夫卡的居民点;这个地方盛行丛林法则,居民受到抢劫、殴打和凌辱,但是苏俄当局袖手旁观。消极忍让是这个不神圣的地方的第一诫命。阿弗尼亚和伊万曾一度居住的叶戈罗夫卡村,当局决定

^① V. Astafev's review of *Zhivi i pomni*, quoted in Valentin Kurbatov, "V tebe i vokrug: Predislovie," Valentin Rasputin, *Uroki frantsuzskogo, povesti i rasskazy*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87), 7. This interpretation is confirmed by Christel Lane, *The Rights of Rulers: Ritual in Industrial Society: The Soviet Ca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1), 23.

放水淹没,因为要修水库。这两个人都逆来顺受,接受迁移,但是在感情上还依恋沉入水下的村子。在故事结尾处,阿弗尼亚宣告,叶戈罗夫卡曾经为“俄罗斯母亲工作”,他要纪念这个事实。^①

在这里,有两件事值得注意:第一,这个叶戈罗夫卡的集体的和不以人为本的性质——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人们,不是伊万和玛莎以及他们的家庭,而是关于“叶戈罗夫卡村”,一个有四十个家庭的集体实体,一个集体组织的单元。不是对于一个家庭庭园的眷恋,而是对一个集体实体的依赖。第二,这非人的居民点据说是为了国家工作过的——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道德理想,如上帝的诫命或者为他人的善而献身。有人问火灾之后这个村子该怎么办的时候,阿弗尼亚回到说:“我们要活下去。”从故事上下文看,提出这种要活下去的决心,既不是为了个人、或者一家老小,肯定也不是为了上帝或者自己的灵魂,而是为了一个被称为俄国的实体。如果阿弗尼亚说:“我工作,是为了以后其他人生活得更好。”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慷慨无私的人。如果他说:“我工作,是为了我的家庭。”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宣布愿意为他的灵魂工作,我们可以把他归类于托尔斯泰的在精神上活跃的农民。但是,为了一个强大的、没有受到灭亡威胁的俄国工作,又如何呢?

把边缘地区的俄国人当做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来对待,在这本书和其他的书里是明显的,而拉斯普京对于这样的待遇表现出令人吃惊的肯定。大英帝国还曾设法保留国内的自由和国外的压迫与恐怖之间的差别;而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帝国为受帝国压迫的有名无实的民族自由也没有提供。^②“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样的口号,不是拉斯普京用的。在他的故事里,国家和国土被放置在个人之前。在像拉斯普京和阿斯塔菲耶夫这样的作家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倒退的品格,对牺牲普通人的利益而达到俄国帝国主义目标的一种肯定,而不是寻求摆脱集体农庄沼泽的出路。缺乏区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能力,俄国政治文化的这个历来的盲点,广泛存在

^① Rasputin, *Poslednii srok, Proshchanie s Matëroi, Pozhar* (Moscow: Sovetskaia Rossiia, 1986), 376.

^② Bernard Semmel 和 Irfan Habib 就是这样地描写了牙买加和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的。Said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引用,130,345。

144 于出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后的一个“流派”之中。与此同时,这种消极的态度方便了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如果索斯诺夫卡的人民造反,要求返回他们地广人稀的俄国欧洲大陆去的话,他们就会削弱俄国的殖民欲望;因为这样的欲望使得俄国国家坚持把俄罗斯人保留在亚洲的辽阔土地上,以牺牲普通俄国人的利益为代价。如果他们宣布莫斯科不得干涉他们的事务,那就等于跟随美国人的步伐,因为美国人在某一个时刻的确曾对伦敦说不。但是,只要俄国人自己还在为俄国的欲望牺牲自己的福利,他们的状况就几乎好转无望。而像拉斯普京这样的作家是在强化为祖国牺牲的意愿,而不是改善俄罗斯人西伯利亚人的命运的决心。

阿斯塔菲耶夫的短篇小说《落叶》(1978)以一种更为细腻的方式推出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帝国的要求,但是,在寻找俄国人悲惨境遇的原因方面,显露出类似的浅薄。在故事里,一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走过西伯利亚的一片野营地点。他注意到,工人们曾经到过这块地方,这些人不热爱大自然。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休息一番,但是在休息的过程中,他们大肆损害森林。叙事者注意到折断的树枝、遭到践踏的草丛和被蹂躏的大树下面的草木。这些工人也许来自拉斯普京的《火灾》里描写的那样的一个农村:已经不足以被称为农村,不过是一群被从土壤里连根拔出来的人而已,他们受到的困苦扫除了他们的公民责任感。

叙事者的注意全部集中在一片正在飘落下来的白桦树叶(“小白桦树”以俄国为中心的象征意义是突出的)。这片树叶的飘落引发出的一串控诉显然从这个细节迸发出来。叙事者念念有词,不仅这片森林被毁,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下,还生存过

成千上万、成千上万……的打砸抢分子、精神病患者、聪明的骗子,全部这些人都顽固地想要改正人的“错误”,从宗教法庭的庭长托盖马达开始,他用橡木棍子砸碎顽固分子的脑袋,让他们学会信神(低级的情况),还有就是征服者、传教士、神的仆人(更低级的情况)以及形形色色的讲究“自由”和“纯洁”的善人……一路下来,直到病入膏肓的元

首和伟大的舵手。^①

在缺乏启蒙驯化的头脑所特有的联想的链条里,俄国人访问者对西伯利亚森林的践踏被放置在西班牙宗教审判官脚下。但是阿斯塔菲耶夫不需要看得这样远;本地人的践踏更是近在眼前,就在他所描写的西伯利亚。托盖马达用橡木棍子完成的业绩也许早已经出现在国家宣传员的头脑里了,阿斯塔菲耶夫没有提及这个人,但是应该可能提及远东的哥萨克人征服者哈巴罗夫的哈巴罗夫斯克(位于乌苏里江流入黑龙江之处,黑瞎子岛东端之东,原来属于中国,中文名称是伯力——译者)。有很多次,这个哥萨克一共抓捕了几百个本地人妇女和儿童,在儿童父母尸体堆上面用火烤熟幼儿大吃。^② 通过从特有的罪犯身上转移破坏罪责的办法,又不质问为了国家事业而消除大量本地人的国家的责任,阿斯塔菲耶夫强化了俄国人在西伯利亚存在的恶性循环;爱国口号骗诱工人到了西伯利亚,破坏当地的脆弱生态环境而获得高薪。

145

拉斯普京和阿斯塔菲耶夫的人物比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英雄更加阴暗,但是除此之外和他们的先驱则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关于自己国内发生的事件,他们尚且不闻不问,遑论世界大事。故事叙事者帮助这些俄国人摆脱了心理疑惑和对国家的殖民政权的认识。叙事者的天真烂漫刺激读者把注意力指向这些俄国人农民的悲惨、爱国情怀和无奈,而不是引向国家中央与边远地区的关系的问题。

帝国崇拜的礼仪

1990年的一张苏俄宣传画画面呈现的是俄国作家列昂诺夫(Leonid Leonov)正在讲话,他说:“时候到了,要大声地、毕恭毕敬地说出一颗明星的名字,这颗明星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道路,这颗明星永远不会退色,这颗明星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鼓舞我们的国家取得巨人般的业绩,提升我们多灾

① Vikyor Astafev:俄文版《中短篇小说集》(Moscow:苏联作家出版社,1984),684。

② Harmon Tupper, *To the Great Ocean* (Boston: Little, Brown, 1965), 29. Quoted in Mote, 44.

多难的祖国……所有的人,在自己的内心,都已经一直在重复这颗明星的神圣的、几乎是神秘的名称……这个名称就是——俄国。”^①

因为祖国被神话化到了这个水平,所以对个人的压制就势在必行。成功的民族的精英们都竭力打造这样的神话,在这方面他们不仅得到历史教训的引导,而且还依靠对于神话引导出来的哲学上的前后矛盾的领悟。但是,正像第一章所讨论的那样,俄国文化长期低估系统的哲学,从来没有吸收欧洲的经院哲学,也没有吸收苏格兰的启蒙哲学,而这二者,在理性思考的精致细腻方面培育了欧洲的思想家们。俄国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依然受到对祖国的关注的主导,祖国乃是社会思考和哲学思考的核心。

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 1990 年 6 月 1 日在韦勒斯利学院的演说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一个论题的机会,这就是在俄国社会受到过最好的教育和最有知识的妇女之一关于祖国的论述。这一论断并不是十分不同于拉斯普京故事里的农民、或者列昂诺夫在宣传声明中提出的“论据”。在那篇演说里,戈尔巴乔夫夫人说,爱祖国在人的全部义务之中最为重要。^② 因为俄国人在习惯上把祖国和政治上的国家等同起来,所以戈尔巴乔夫夫人的观点可以被解释为对“无论我的国家是对还是错”这个危险口号的一种表达。在这样的语境中,民族、国家、人民、种族和语言之间的区别消失,因为俄罗斯联邦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戈尔巴乔夫夫人是一个政治人物,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细致考察本来是可以预期的。这次演说表明,在苏联时期,俄语仍然是涉及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的问题僵化停滞的一个牺牲品。戈尔巴乔夫夫人还在说 19 世纪俄国神话的言语,而不是一个现代的、发展进步的国家的言语。在她的发言中,俄语语境的“过时陈旧模式”显示得淋漓尽致。

146 珀西(Walker Percy)有一次说,语言是一种活的有机体,容易感染某些系统的疾病。如果新的概念遭受强烈的抵制,语言就可能进入僵化和衰落的状态。^③ 今日俄语就没有包含在美国英语中成长起来的某些概念:机会

① I. Pechkin: 宣传画《一个永恒的词语》(Moscow: Panorama, 1990).

② < <http://www.csd.tamu.edu/bushlib/firstlady/activities/wellesley.html> > (Raisa Gorbacheva's comments).

③ Quoted from Clifton Fadiman, ed., *Living Philosophies: The Reflections of Some Eminent Men and Women of Our Time* (New York: Doubleday, 1990).

均等、少数派的参与、肯定性的行动、双语教育、思想挪用 (equal opportunity, minority participation, affirmative action, bilingu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ppropriation), 等等。更重要的是, 俄语对于道德的困境依然不敏感, 困境一方面来自对于祖国的奉献精神, 另外一方面来自对于毫不依恋俄国政治神话、但是又必须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活的人的尊重。

对祖国的偏重是如何作为密码编入语言和文学的这个问题, 虽然引人入胜, 但是没有赢得俄国学者的注意。在俄国以民族特质为方向的讨论的参加者所使用的词汇依然局限于在俄国成功的殖民史中获得了意义的词语和概念。在俄国的文学讨论中, 公民和政治道德的问题依然被归结到被理解为帝国国家的祖国的热爱。^① 这令人想起莱姆 (Carl Reim) 关于 19 世纪德国人关于德意志国家的感受的沙文主义的感召言辞: “我们的祖国是一片神圣的土地。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鲜血保存了它……这片土地浇灌了英雄的鲜血, 是我们的传家宝, 我们绝对不允许他人抢走一寸。”^② 这种殖民主义观念 (德国当时是一个帝国, 扩张到了非日耳曼人的土地) 也深深地扎进了俄国人的说辞之中。俄国人民族观念和对土地的贪图之间的紧密联系, 阻碍了俄国前势力范围之内和“俄罗斯”联邦内部的非殖民化的进程。

俄国作家的殖民主义态度应该被揭示出来, 同时这类态度并没有消除俄国文学创作的其他诸方面。就索尔仁尼琴而言, 这一点保留意见尤其重要, 因为他的作品有力地述说了一部分俄国历史, 同时却不情愿地证实了一种特殊的殖民主义干涉行为: 变殖民地为监狱和死亡营的庞大的群岛, 或者认为少数民族不配享有被给予俄国人的那种关注。在《古拉格群岛》中和别的地方, 索尔仁尼琴表现了被征服土地的道德污染, 但是, 这样的污染不是被看做中央对边缘地区的侮辱, 而是被看做对于长期含辛茹苦的俄国的又一种非正义行径。给西伯利亚编造恶劣名声, 一向是俄国殖民经验的一部分。西伯利亚本地人民族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 给世人留下的是他们自己糟蹋自己故土的记忆; 这不是因为他们特别令人厌恶, 而是征服他们的人

^① Vera Tolz, “Conflicting ‘Homeland Myths’ and Nation-State Building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Slavic Review* 57, no. 2 (Summer 1998), 267-94.

^② “On Developing a Patriotic and Monarchical Spirit” (1911), in Snyder, 167.

要这么办。显然,索尔仁尼琴从来没有想到,俄国人在西伯利亚干的事情,就是纳粹对小城奥斯维辛的所为:他们通过向没有力量的地方居民施展暴力来书写这个小镇的历史。虽然《古拉格群岛》依然是一部重要的书,但是也是一本令人感到痛苦的、未完成的书。

147 祖国崇拜不仅影响了各地的本地人,而且也影响了俄国的少数民族。这一点,在涉及犹太人方面,尤其明显;犹太人散居在俄罗斯民族居住地和帝国的其他部分。把种种解释强加给犹太人和其他几个少数民族的进展不像对乌兹别克人、或者高加索各族人民那样成功,因为犹太人善于向全世界提出他们自己的叙事。但是,如果读者从俄国作家那里得知犹太人的景况,那画面就的确是阴暗的。索尔仁尼琴的《1914年8月》(1971)也是那些丑化这一少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给俄国人和外国人记忆留下的画面的作品的补充。索尔仁尼琴这部纲领性的小说的主角是俄国人和欧洲列强;而其他人都被贬损为狡诈、或者毫无关系。索尔仁尼琴不是描写作为帝国的俄国的第一个人,但是公众是期待他表现出帝国的一个牺牲品应有的更为细腻的感受力的。这里列出索尔仁尼琴的几样技巧;这些技巧用一种东正教民族国家的外衣包装了帝制俄国,同时扫除了各个民族亚群的志向和利益。

《1914年8月》是一部枯燥乏味的大河小说,但是也还有几个引人注目的场景,其中最突出的涉及暗杀斯托雷平(Petr Stolypin)的杀手鲍格罗夫。正如常见的情况那样,恶棍比英雄容易描绘,所以鲍格罗夫成为一个比内务部长斯托雷平和小说其他正面人物更具说服力的角色。虽然索尔仁尼琴明显地不喜欢他,但是这个角色在动手暗杀之前的焦虑充满悬念,很吸引人。除此之外,叙事者还用形容词来丑化他,但是这并没有减少这个角色的生动性。鲍格罗夫被描写得**猥琐、罪恶、脾气大、浅薄、自以为是**。我们得知,他谋杀斯托雷平,因为他认定,斯托雷平对犹太人有害。“他的仇恨十足地强烈,他觉得自己能够用刀捅死这个人,手不软,心不跳。”^①索尔仁尼琴很可能在模仿托尔斯泰,但是不够聪明,因为托尔斯泰无与伦比地细腻表现了车臣人对于摧毁了自己村庄和生计的俄国人的情感。

^① Aleksandr Solzhenitsyn, *August 1914*, translated by H. Y. Willet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89), 528.

形成对照的是,在装配斯托雷平的肖像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利用了一位钦佩他的俄国观察家的权威。小说里的斯托雷平的形象表明,索尔仁尼琴对这个人的认同超过了俄国近代史上其他的任何一个人。索尔仁尼琴对斯托雷平的深厚的同情不仅表现在细致再现了谋杀的故事和想方设法掩饰他的行为,而且,首先,还有他所使用的词汇。像“明朗的、闪亮的、雪白的”这些形容词都用来优雅刻画斯托雷平,映射出了喜爱这些词语的俄国圣像描绘特点。在谋杀的场面,斯托雷平显示了优良的形象:他的意图是高尚的,他热爱俄国人民,他是为了他们的福祉工作的。他最后的手势是给沙皇的祝福。他的夏天的制服是“耀眼地雪白色的”,他“勇敢地……挺胸”站立——是现代的武士,是苏沃洛夫的和古米廖夫的土耳其斯坦的将军们的一个亲属,是俄国的救星。所以,不足为奇的是,那个杀手“像毒蛇……昏黑的鬼影……疑心大、心眼多”。^①我们已经见识过了邪恶的车臣人、矮小猥琐的拿破仑、讨人嫌的波兰人,好,现在又出来了毒蛇模样的犹太人。叙事者的看法是,“这个杀手表情敏锐的相貌已经像一颗子弹似的打伤了(斯托雷平)”。和鲍格罗夫不同的是,斯托雷平从来不恨别人,但是他很敏感,在社会不接受他的时候感到痛苦。叙事者叹息,啊啊,杀死斯托雷平的子弹也杀死了罗曼诺夫王朝和俄国本身:这是瞄准叶卡捷琳堡排射的第一个枪声。

148

斯托雷平确实是抵御了俄国历代政府瘟疫般的腐败的那种少数人物之一。他的公民意识很高,他对俄国的爱似乎是无限的。和许多同时代的俄国政客不同,斯托雷平想要在保持国家权力的同时,改善俄国农民的状况。在更大的范围上,他想要把俄罗斯民族变成一个兴旺的人民。但是,斯托雷平的恳求只涉及俄罗斯民族,而且他对人民管理自己的能力评价低下。有两位历史学家描写了斯托雷平对非俄罗斯人的少数民族和对俄国公民自由的影响:

斯托雷平确立了新的选举法,严格限制了选举权……这一行动明显破坏了甚至1906年的基本法,所以斯托雷平的全部的行动只能被视

^① Aleksandr Solzhenitsyn, *August 1914*, translated by H. Y. Willet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89), 605.

为一次政变。

这样,第三届杜马就是一次没有代表性的会议,更是一次政变和伪造的选举权的产物。^①

在1907年开幕的第三届杜马中,非俄罗斯人和社会下层的代表被最大程度地降低。许多地理区域被拒绝派遣代表,只有15%的居民有选举权。在边缘地区,维尔纳省现在必须选出两个俄罗斯人;科夫诺省必须选出一个。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代表数目缩小。俄国欧洲部分的一个代表代表250000个选民,而议会波兰的一个代表代表750000个选民……(波兰人的)怨言是被降低到了二等公民的地步,却遭到斯托雷平的责备,他告诉波兰人,充当俄国的臣民应该感到骄傲。^②

斯托雷平的政治操纵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表现出俄罗斯帝国如何牺牲殖民地人民来促进俄国的福利,同时还把暴君般的殖民主义者当做廉洁公正的楷模竖起。西方文学史已经经历了后殖民批评家们的严查,为的是寻找类似的帝国自我肯定和殖民地遭受边缘化的例证:后殖民时代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本地作家们补充了更多的范例,而索因卡(Wole Soyinka)和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在这一过程中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欧洲列强的前白人殖民地,如加拿大、新西兰、美国和澳大利亚,文学、政治和社会生活诸方面,都发出了他们自己的有特色的声音。但是,斯托雷平改革对于那些并不认为自己就属于俄罗斯民族的人的影响,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被包裹在沉默之中。这位作家没有把少数民族的故事包括在叙事之中,这一点,从下面的一个事实的角度看,尤其突出:在写作这一作品的时期,苏俄帝国已经开始解体。19世纪的英国作家的社会空间受到了包拢

① Seton-Watson, 627.

② Piotr Wandycz:《被瓜分的波兰的各地区》(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319. 和斯托雷平的名字联系起来的还有就是运送囚犯到监狱和劳役营地的铁路专用车厢。这些车厢有铁门,没有朝向外面的窗户;有窗户也是只在车厢的两端,而且装有铁棍。从外面看,这些车厢和正常旅客车厢十分相似,没有窗户的两侧设计得让不存在的窗户看起来好像有窗帘遮住。Anatoly Marchenko:《我的见证》,Michael Scammell 英译(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9), 15-16.

了他们的尚未遭到动摇的帝国的稳定保障,而索尔仁尼琴着手写作的年代,俄罗斯帝国(化身为苏联)已经颤抖、晃动,已经部分地处在内爆过程之中。

综上所述,苏联晚期和后苏联早期的俄国作家们,在对自己国家复杂的政治状况和民族状况的理解方面,还没有走出 19 世纪。英国人学会了找出必不可少的、细腻的区别,但是俄国作家继续把他们的人物放置在俄罗斯联邦的各个不同的地点,虽然无辜、却很残暴,而且把自己强加在“俄国”社会空间之上,而这空间至少是应该部分地填充上反映本地人观点的本地人的声音的。苏联帝国解体的评论家们还没有看出来俄国就是一个典型,一个顽固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国家把俄国本部的居民移民到他们几乎格格不入的、被帝国占有的地方去。为了防止“白色殖民地”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便设计出种种办法给他们灌输莫斯科维的经验,同时排挤掉本地人的面容和经验。为了确立莫斯科对这些地方的权力,像拉斯普京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逆潮流而动,编织帝国等同于俄国本土的幻景,虽然帝国只存在于文化空间的边缘。帝国中心的社会需求和权力空间向边缘地区发送行为态度准则,依据的是该中心提供的术语,例如在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中萨尼亚对西伯利亚之夜的见识。

《1914 年 8 月》剔除了帝国的优秀少数民族,这很可能就是这本小说迅速落伍的原因之一。索尔仁尼琴拒绝承认帝国的幅员和民族的多样性是事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他虽然在小说和文章里热衷于探索各种思辨性质的话题,但是他拒绝考察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棘手问题。他振振有词地质问俄国制造庞大的古拉格系统的理由,但是他没有看到帝国内部民族意识的兴起,也没有看到,如果使用不同于苏联采取的方法,就不可能把这么多的民族团结在一起。他谈到某些少数民族的背弃行为,却避而不谈他们追求自由的愿望。像拉斯普京这样的作家当然在见识上是不如索尔仁尼琴的,而且他们的语言和观念视野也完全被**帝国**的口号和制造出来的传统完全圈定。所以读者不会为他们表示惋惜——但是索尔仁尼琴本来是可能做得好一些的。

为了取得俄罗斯人的俄国与其白人殖民地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而多多少少有意识地展开的运动，是晚期苏联时期的俄国文学的一个保留特点。那些把西伯利亚当做俄国本部的粮肉仓库而予以注目的俄国作家，其写作的经典帝国主义者方式是西方作家们制造出来的，这些作家曾一度把亚洲与非洲看成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接待室和贮藏室。西伯利亚本地居民从视野中消失，不仅现在如此，而且过去一向如此，而说俄语的移民被剥夺了争取自主生存的想象力和勇气。犹太人依然是通过帝国的眼光来看待的。苏联晚期和后苏联时代早期的俄国文学表明，它没有能力承认、遑论讨论列入西方知识分子工作日程已经半个世纪之久的问题。

俄国作家拒绝对待帝国诸问题的现象涉及苏联时期的俄语在概念方面的匮乏。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家简单的说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他们使用的面向农村的比喻，因为在19世纪被过度使用而失去力量。农村题材作家吸引除了生物学上的和部族的忠诚之外别无其他的俄国读者，从而强化了这类的态度，而不是打开新的视野。这些作家推崇的这种民族主义对作为个人的俄国人没有益处，但是有利于俄罗斯国家。

俄国文学中使用的权力说辞还伴随有对被征服片片土地仁慈宽厚的说辞。因为俄国领土争夺而遭受损失和痛苦的不是本地人，而是俄国人，在对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居民点的描写中，拉斯普京提出这样的见解。这是一种天真的帝国主义无害论，缺乏对于自身的错误行为的认知。如果说康拉德笔下的黑人和东方人保持沉默，则叙事者的语气至少还显示出他们可能有话要说。而在拉斯普京或者雷巴科夫、阿斯塔菲耶夫或者索尔仁尼琴那里，这样的暗示连丝毫也没有。在涉及俄国帝国的属地方面，今日俄国读者面对的是被对自己没有意识的权力独白控制的、语言的和文学的场面。俄语现在所处的阶段是排斥、有机地铲除和与完全接受作为**帝国**的俄国之做法不符合的概念和理念。其含义就是“俄罗斯”联邦之内的全部重要行动和生活的源泉是俄罗斯，而少数民族的文化应该感激俄罗斯，因为这些文化从它那里受益颇多。有一个概念——俄罗斯——其恒定性和不可动摇的地位，在晚期苏联的作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作家告诉我们，俄罗斯是一块磁石，吸引着其他民族的成员。霍米·巴巴也许会说，长期坚持使用这一论据的现象本身显露了帝国安全出现了裂纹。在高声宣告团结的后面隐藏

着一种意识：在民主和文化普及的条件下，如此极为庞大的、居民远非同源的领土，是不可能保持成为一个单元的国家。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这种团结的愿望和制造旨在防止或者推迟其崩溃的文本，很可能就是来自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醒悟。

第六章 学术与帝国:苏联文学研究学术中的俄国意识形态

——维克托·施克洛夫斯基与德米特里·利哈乔夫

153 我们注意到,权威一旦获得,就必定能够找到某种稳固的和有用的、过去的依据。^① 帝国统治的持久性不仅需要军事力量的保护,而且也需要历史学和追忆的保护。在沙皇俄国,保护帝国的主要是军事力量、文学和艺术,而不是逻辑推理的论述。但是,这后一种方法并没有被忽视。在苏俄时代,对帝国有用的出版物的制造在史学和文学评论家的论说中推进了、突出了、阐释了、更加以重新阐释了俄国的过去和现在。尤其是俄国的莫斯科维那一段的过去,得到了充满自信心的新型阐释;而这样的自信是以往的俄国评论家所不具备的。

这些阐释帝国的第一个研究个案涉及施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ii),他是著名的形式主义评论家,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清洗形式主义运动的幸存者。和形式主义理论变得在政治上不再正确的时候就转向从事其他视野的批评家同行不一样,施克洛夫斯基没有放弃本行。他的取代办法是改变自己主张的形式主义理论,使之适应政权的愿望。^② 他利用了重新阐释俄国的过去、以便适应国家超级强国的地位的需求,发挥了自己可观的才能,创造出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国技术的崭新面貌。故事原委如下。

1963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元老季莫菲耶夫(L. I. Timofeev)这样的定义了苏俄语境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目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① John H.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0), 41.

^② E. M. Thompson, "V. B. Shklovskii and the Russi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in Arnold McMillin, ed., *Aspects of Russian and Czech Literature: Selected Papers of the Third World Congress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Columbus, OH: Slavica, 1989), 11-21.

的方法,首先表现在参照今天和我们有关系的那些问题来阐释过去的事件:表现在对于我们今天必须意识到的那些事件的**选择**(黑体为本书作者添加)上。”^①施克洛夫斯基说到做到。在《古代大师:1714—1812》(1951)中,他提供了对于俄国兵器工业发展史的小说化的叙述。他指出,兵器工业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这位大帝在图拉建造了冶金工厂。还应该补充说,彼得的军械厂十分兴旺,在数年之内就开始生产武器,供应全部俄国的军队。彼得大帝还建设了其他的军备生产中心,还把管理权交付给外国人,倒不是因为他重视外国人,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俄国的技术没有能力和西方的工程工艺竞争。有些外国人经理最后得罪了沙皇或者他的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办公厅,或者被关进监狱,或者千方百计逃到俄国国外。^②

施克洛夫斯基在自己的书里竭力表明,图拉工厂出类拔萃,不是得益于进口的经理,而是依靠了本土的俄国人的天才。他争辩说,一个英国人,约翰·琼斯,曾经得到发明机械和在图拉组建竞争力强的工厂的美名,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雅科夫·巴吉谢夫、安德烈·纳尔托夫、和列夫·萨巴金等人,全部的俄国人,他们都充满爱国热情,为了俄国的伟大,准备接受沙皇的无理欺压。为了维护这样的阐释,施克洛夫斯基竭力贬低关于图拉工厂的一部经典之作,加梅利(I. Camel')的《图拉军工厂的历史描述和技术描述》(1826)。加梅利是一位同行咨询员,也是一位各种民族主义机构的官员(因此,他不太可能贬低俄国人对图拉工厂的贡献)。他这本书是尼古拉一世授命编写的,所以,在荣誉归于俄国人的时候,也不太可能赞扬外国人。然而,是时间的流逝创造了条件,可以竭力改善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形象了。施克洛夫斯基想要揭示,加梅利和沙皇尼古拉都低估了俄国人对世界技术的贡献。

他的论据如下。他说,在1770年代,被派往英国学习工艺的俄国人之一实际上是给英国人授课讲解如何成为优秀车工的。施克洛夫斯基得出如此结论的根据是,有记录显示某一个俄国人工匠向伦敦皇家学士院做过一

① L. I. Timofeev, *Osnovy teorii literatury* (Moscow, 1974), 737.

② Alex de Jonge, *Fire and Water: A Life of Peter the Great* (New York: Coward McCann, 1980), 99-101, 242.

次汇报。施克洛夫斯基还引证了俄国驻英国大使沃伦卓夫的一封信，信中说，有一个姓苏尔宁的人“一年能够挣到二百多几尼(金币)”。施克洛夫斯基还补充说，发明家瓦特(James Watt)一年才挣二百镑，有一个姓任尼的工程师一年才挣四十八几尼，以此来支撑苏尔宁在英国受到的评价高于瓦特的断言。

155 这其中有什么。 “能够挣到”不同于“常常挣了”。这是一种模糊加吹牛的方法，用来评价苏尔宁。从这封致沙皇的书信可以看出，沃伦卓夫伯爵急于正面评价俄国学徒，因为在国外如果表现不好就导致在国内自己的土地被没收。所以，沃伦卓夫加诸苏尔宁的潜力一直没有受到真正的检验。施克洛夫斯基把这样的很有争议的潜力当成事实，还下结论说，英国人的工业技术有一大部分都是从俄国人那里学到的。^① 这是一个典型的情景，帝国就利用这样的情景为它自己的居民、最终也为世界其他的人制造传统和对这些传统的阐释。施克洛夫斯基原本辛勤耕耘的那个领域促成他的书籍在国外的销售和找到读者。事实上也是这样：施克洛夫斯基的《选集》的俄文版(上列引证就摘自这一版本)被美国的许多研究型图书馆收藏。这样的阐释没有受到追究，反复出现，在本国和外国人的记忆中给往昔的俄国增添了光彩。

采取有利于帝国的方法揭示历史的另外一例，是施克洛夫斯基对于涉及图拉展览馆里的机械的知识的巧妙操纵。施克洛夫斯基说，在20世纪40年代，他在那里看到了英国经理及其匠人到来之前的军工生产设备。这话的含义就是，生产的设备和程序甚至在英国人到场之前，就已经令人满意。这个解释自然引发出一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请外国人来。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图拉工厂的运作状况就保守秘密，有关工厂的一切事物都不外传。如果俄国人善于令人满意地管理这些工厂，为什么彼得大帝、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还允许外国人带来生产程序？施克洛夫斯基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更不必说拿出答案。

图拉的俄国工人无疑是有才能的，但是，不是俄国工业和技术当时状况

^① V. B. Shklovskii,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1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74), 737-8.

的典型。为了夸大俄国历史的威望,《论往昔大师》提出可以的见证,还把多有奇想的话堆在历史人物身上(例如,有一个工人说,自己是“为了俄国的光荣”而工作,有点像拉斯普京短篇小说《火灾》里的阿弗尼亚)。利用这样的障眼法,施克洛夫斯基制造的印象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俄国的技术不比任何国家差。^①在俄国上层人士开始看到自己国家具有在军事上上升到和其他国家水平的能力,和内在的社会首创精神与文化文本的匮乏这二者之间的不协调的现实之后,俄国语境下的这类思维程序便流行起来。我们沿用戈尔顿—里德(Annete Gordon-Reed)对研究杰斐逊的历史学家极力否认杰斐逊与莎丽·希明斯有关系(直到DNA证据现实这种关系几近真实)这一做法的评论方式,可以说,俄国的历史学家仅仅注意到了那些适用于作为世界强国的他们国家的形象的历史事件。^②

作为一位文学学者,利哈乔夫(Dmitri Likhachev)十分有别于施克洛夫斯基,在多方面是他的对手。施克洛夫斯基主要是一位文学批评家,而利哈乔夫则是一个历史学家。与令自己适应苏联国家的施克洛夫斯基不同,利哈乔夫珍惜自己作为反对派的名声;事实上,他曾在古拉格服刑。施克洛夫斯基属于政治色谱的左侧,而利哈乔夫是偏向俄国政治色谱的右侧的。但是,他们共有的俄国民族和帝国身份的这种特殊的混乱,允许利哈乔夫和国家合作,目的就是在俄国人当中、进而在外国人当中推进俄国光荣的形象。在这里,我们来见识见识利哈乔夫对17世纪几种俄国文学作品的重新的阐释。

和施克洛夫斯基不同,利哈乔夫一开始就要表明俄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平等的,而不是比西方文化优越。特别是,他要证实西方和莫斯科维的文化的发展都是沿着同样的一种轨迹进行的。后者稍微落后于前者,但是基本点是一样的。

他举出的个案是17世纪莫斯科维的幽默文学。他说,在西方的中世纪,社会对于娱乐的反应和期待和稍后在莫斯科维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

^① V. B. Shklovskii,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1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74), 688.

^② Annette Gordon-Reed, “Why Jefferson Scholars Were the Last to Know,” *Houston Chronicle*, 4 November 1998.

洛维奇统治下的反应和期待是一样的。在《古代俄国的幽默》(1976)中,利哈乔夫强调,这两种幽默都根植于同样的社会期待之中:“古代俄国的幽默属于(欧洲的)中世纪幽默一类。”^①利哈乔夫的纲领性的著作《古代俄国文学诗学》(1967)把这一相似性推广到了一切范围的文学作品:“如果从最概括的意义上定义古代俄国文学,那就要承认,从结构上看,俄国古代文学属于中世纪文学类(亦即在早些时候的西方的那些文学)。”^②

如果用于17世纪的莫斯科维的幽默(在《古代俄国的幽默》中,只有一个例证出自这个世纪),在最好的情况下,利哈乔夫的评论是误导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虚假的。利哈乔夫把在一种文化中孕育的概念用于例外一种,留给我们的莫斯科维社会行为方式的歪曲的图像。利哈乔夫为什么要把俄国文化所没有的特征给予它呢?原因之一可能是想要看到俄国欧化,看到俄国一劳永逸地落户于欧洲文化集体之中。另外一个原因是热衷于大帝国所特有的强烈的自我放大的欲望:俄国必须表明“不亚于”使用拉丁字母的欧洲各国。他尝试使用自己可观的威望制造关于17世纪俄国民间文学一个令人起疑的个案的做法值得注意。我们先来看看欧洲使用拉丁字母的部分的情况,因为中世纪是在那里出现的。

中世纪幽默具有特点的表现之一是嘉年华会及其产生的庆祝活动和习俗。法国的狂欢节(Mardi Gras)和巴伐利亚的狂欢节(Fasching)是四旬斋前夕喜庆活动时期的同一时间的残余,在这一时期之内,习惯上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等级戒律都暂时搁置,他们的对立面暂时得到承认。研究嘉年华会庆祝活动的历史学家维尔斯福特(Enid Welsford)指出,“在这一时期,有钱有势有名的人物都谦卑起来,圣物被亵渎起来,律法条文松动起来,民族理想颠倒过来,皆因有了愚人的宗主教、教皇或者主教的领导”^③。在12世纪的法国,是大规模庆祝愚人节的,在此期间,一般的习俗都被完全颠倒过来。大教堂最底层的助祭被宣布成为主教、或者教皇、或者国王——依地区而定——并且带领助祭同仁进入更高级神职人员的座位。接着演奏滑

① D. S. Likhachëv:《古代罗斯的“可笑的世界”》(Leningrad: Nauka, 1976), 9.

② D. S. Likhachëv:《古代俄罗斯文学诗学》(Leningrad: Nauka, 1976), 16.

③ Enid Welsford, *The Fool: His Social and Literary History* (London: Faber & Faber, 1935), 199.

稽的弥撒曲:祭坛上冒出的不是燃香气味,而是布丁和香肠气味,大呼小叫的喧嚣代替了作弥撒时笃信者的通常应答。偶尔还表演主教滑稽圣职授任。在1498年,法国图尔纳伊的市民抓住巴黎圣母院的几个神职人员,“授予他们圣职”。在其他地方,“修道院长十字架”授予在一年里做出最愚蠢之事的市民。类似的装模作样的仪式也涉及政治事务,只提及嘉年华会国王和王后的传统即可。这对于现实的君主显然是大不敬,一个平头百姓被一群享受狂欢节的乌合之众“选举”成国王。

深层心理学教导我们以一种揭示这些表现之歧义的方式来阐释这些娱乐表现。对于宗教规范和清规戒律的厌恶和抗议当然是这种表演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成分。对于这些滑稽的小戏,公民的和宗教的当局,无论多么违心,也都表现出可观的容忍。只说明一点就足够:在作为中世纪世人态度气压计的大学里,学生在嘉年华会会期放假的天数比在圣诞节或者复活节的天数多。^①考虑到中世纪社会的独裁习惯,如此的宽容看来是高度不同寻常的。应该怎样解释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在中世纪欧洲幽默和法律之间的关系的某些方面。

嘉年华会的把戏和滑稽模仿庆祝活动,在中世纪城镇市民看来显得可笑,因为这些活动包含了规范的暂时的松弛,一个颠倒的世界,一种虚假的颠倒普通人所知道的真实的世道的秩序。正如科尔修斯(Ernest Curtius)所指出的,在中世纪欧洲,存在着“上下颠倒的世界”这一传统的主题,是中世纪幽默的主要手段之一。^②这一冲突主题引发欢笑的原因,康德后来作出定义,见于他对幽默的思考:把一种紧张的期待突然化作虚无。^③

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的《巨人传》就产生于这一传统。这部作品满载的范例,都属于中世纪上下颠倒的世界的幽默主题:卡冈都亚与庞大固埃诞生与受教育的情况和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件,庞大固埃访问萨丹的领地,以及他创建泰来默修道院的经过。修道院代表了对于中世纪修道院理念的完全的颠倒。修道院接受男修士和女修士,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来去,只收长

① Will Durant, *The Age of Faith*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0), 929.

② Ernst R. Curtius, *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Bern: Francke Verlag, 1948), 106.

③ Immanuel Kant, *Werke*, vol. 5 (Wiesbaden: Im Insel Verlag, 1957), 437-8.

得好看的青年男女,每个人都受到了可能出现的场面和机会的控制。修道院的座右铭是:为所欲为。这样的故事在拉伯雷的读者看来是滑稽的,因为这些故事描写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发出笑声的人没有认真对待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被和一般信以为真的规则相反的规则治理。如果我们同意康德关于幽默的观感,就可以想到,法律的概念必定是稳定地植入、并且被欧洲人的智慧所接受的,因为脱离法律显得是不真实的,因而是滑稽的。另外一点应该强调的是,中世纪的这些笑闹没有引发出宗教裁判所对于参与者可能具有的异教倾向进行调查,虽然第一眼看上去这些笑闹造成了对于占主导地位的理论的严重侵犯。这个情况反过来也表现出了中世纪当权派对于当时的普通男女的信任程度很高。这样的颠倒妥善的事物可能造成对于正确事物的扬弃吗?这一担心不曾足以促使当局取缔嘉年华会的活动和这些活动形成的想象力十足的游戏。科尔修斯在表达中世纪典型的男人和女人的世界观的时候,采取了这一立场。

现在我们来看看 17 世纪俄国幽默作品,看一下类似的过程在那里是否明显。中世纪幽默的核心,亦即上下颠倒的世界的传统主题,在莫斯科维引发出笑声了吗?据利哈乔夫认为,叙事故事《卡利亚金的请愿书》是莫斯科维幽默的一个典型范例。说到是关于修士大祭司加夫里伊尔的故事,这个人把“不同寻常的”习俗和规矩引进自己的修道院:他命令修士们早起,到教堂去祷告;他强迫他们斋戒,穿破旧的衣服;他把钱花费在燃香和蜡烛上,而舍不得花在饮食上。修士们向主教提出对于这些革新措施的怨言,要求恢复旧制。

像对于泰来默修道院的描写那样,“请愿书”也旨在写得滑稽。但是,在前一个个案中,要求我们嘲笑脱离规矩的做法,而在后一个案例中,是请我们笑话规矩本身。“请愿书”的叙事语气不是传达对流氓修士们的敌意或者谴责。除非结论是说,如果有机会,就应该置规矩于不顾,否则,从这个故事里是得不出教训的。如果我们必须依据这个故事来评价 17 世纪的俄国幽默,我们就不得不说,在古代的莫斯科维,幽默是和漠视法律的作用联系在一起。通过笑话某一个遵循规矩的优秀而注重理性的修道院长,“请愿书”的读者表现出的态度是藐视规矩和“应有的世界”(中世纪的规范),接受作为规范的“上下颠倒的世界”。在《卡利亚金请愿书》里,嘲笑的

对象是合乎规矩的世界,理想的世界。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幽默传统主题是否的确反复出现在古代俄国文学之中。《舒适和欢乐生活的故事》的叙事描写一个理想的世界,那里物资丰富,河里流着牛奶和蜂蜜。总之,这是奥维德对黄金时代描写的俄国版。然而,不同的是,“故事”旨在滑稽。这一点表现在结尾出混乱不堪的“路标”:

走向这些欢乐的直达道路从克拉科夫开始,穿过阿尔沙瓦,然后穿过莫左夫沙,从那里走向里加和列托兰,再走向基辅和波多列茨克,从那里走向斯捷克利尼亚和卡列拉,然后走向尤利耶夫和布列斯特,然后又走向贝霍夫,进入切尔尼哥夫和佩列亚斯拉夫,接着进入切尔卡西亚人、奇吉里安人和卡非姆人的地方。凡是穿过多瑙河的人,都不回家。^①

这些道路的方向很不真实,因为城市和地区名称的俗气和句子节奏荒诞,而越加不真实。再有,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是黄金时代,而不是这个不完美的和变形的世界,扮演了幽默传统主题的角色。良好和舒适的生活是被嘲笑的对象,而不是向往的对象。法制的世界是遭受嘲笑的主题,而没有法制的世界被看成规范。从这两篇叙事中滋生出明显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两篇叙事都否认作为这些故事目标听众的人们能够享受良好的生活。我们倾向于得出的结论是:在17世纪的莫斯科维,普通人的世界观包含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舒适和欢乐是王公贵族的事,把舒适和快乐与政治权力分开是可笑的。

再看看别的文本:《舍米亚卡判决的故事》在19世纪以前和期间都曾再版多次,很受欢迎。^②从前,有两个兄弟,一个很富,一个很穷。穷的敲诈富的多年,富的终于丧失了耐心,状告兄弟虐待借用的一匹马。在前往法庭的路上,贫穷的兄弟因为不谨慎而造成两个人的死亡。现在,他面临的是三项指控,而不是一项。到了法庭,他给法官看包在一块布里的石头。法官以为那是一块贿赂他的宝石,在三项指控上都作出对他有利的判决。到了送

① 《17世纪俄国具有民主精神的讽刺作品》,edited by V. P. Adrianova-Peretts (Moscow: Nauka, 1977), 33.

② Wiktor Jakubowski, “Pismienictwo zjednoczonego państwa moskiewskiego,” *Literatura rosyjska*, vol. 1, edited by M. Jakóbiec (Warsaw: PWN, 1970), 140.

来贿赂财宝的时候,贫穷兄弟告诉法官,如果判决对他不利,他本来是要杀死法官的。法官因为避免这样的下场,所以放走了贫穷的兄弟。这个贫穷的兄弟又从遇难者家里勒索了钱财(外加法官的偏袒判决),在回家路上欢天喜地,连连赞美上帝。

当然可以坚持说,这个故事站在穷人一方反对富人:就以这样的资格,故事出现在一本《17世纪的俄国民主讽刺文学》(1977)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贫穷卑微者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对有钱有势者的胜利,我们必然是要哈哈大笑的。然而,这就成了牵强附会。这个故事透露的是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不是面对穷人的命运感受到的义愤填膺。这个人残酷、自私、不诚实。他干活粗心大意。他在故事里的成功强调了无法无天就是规范,这就是世道法则,人人应该遵守这样的观念。这个故事说的是恶棍得胜,而正派人——他的兄弟、神父、自己父亲被杀死的那个洗澡人、还有法律本身——遭到了嘲笑。笑声又一次与对规则和规范的蔑视联系起来。

另外一个例证:《一个农民儿子的故事》的叙事,一个贼人抢了一个农民的住宅。抢劫的时候,他轻声道出听着像是虔诚的话语(后来证明是诽谤),而这个农民心里想到有一个天使来访问过他,于是放走了贼人和赃物。给人留下的“教训”是,巧妙使用诽谤乃是发财致富最有把握的道路。还有,这个故事透露出,在古代莫斯科维,对规范、规则和理想的贬低是幽默故事的常见组成部分,大笑和嘲笑针对的是遵守法律的人,而拒不遵守的人成了令人钦佩的对象。

160 同样的评论也可以用于17世纪最著名的幽默作品《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一个聪明的恶棍战胜不幸的正派的人们。事实上,英国学者斯托克斯(Anthony Stokes)已经说过:“这个故事甚至没有借口描写丑陋的行为,把这样的行为当成对于罪人的一项可怕的警告。这个流氓和贼人,一直被人叫弗罗尔,倒是挺兴旺,给人留下的可能的教训就是:引诱他人乃是最保险的成功之路。”^①斯托克斯还可能说,稍加适当的变更,这就是17世纪莫斯科维幽默的绝大部分的作品。全部这些作品的含义就是,“合乎规范

^① Anthony Stokes,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John Fennell and Anthony Stokes, eds., *Early Russian Literature* (London: Faber & Faber, 1974), 258.

世界”要受到嘲笑、或者没人信赖,“上下颠倒的世界”被当做常规来接受。在西方中世纪的文学中,无论幽默与否,有一条信念占主要地位:世界“应该”是有尊严的,人民“应该”生活得好,而他们的不幸和灾难,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规范”的背离,而在古代俄国文学中,这样的定理是不明显的。情况正好相反:欺骗和盗窃是正常的,应该赞扬流氓而不是老实人,因为流氓会变得成功,而老实人都事事不如意。

历史学家们证实了俄国文学中明显缺少法律和规范的概念。派普斯(Richard Pipes)写道:

研究俄国农民生活的学者注意到,俄国农民缺乏法律意识是一种经常的、永恒的现象,是某种根植在某种更高的理由之中的东西。他所敏锐感知的是有活力的法律,也就是某种条令、后者规定。农民受命必须做某事、又无法避免的时候,就会执行命令。但是,他们从来看不到这些指令的底层的逻辑,他们服从,乃是因为被迫。一位写作关于农民生活的优秀散文作家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写道,农民甚至不理解每年必须上税,尽管在以往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农民每年都预计有新法令颁发,命令他们上税;如果没有法令,他们就不上税。与西方的法律观念对比,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①

利哈乔夫是一位研究俄国农民事务的博学学者,肯定不是不熟悉派普斯描写的现象的。但是,面对历史和文学的证实,他争辩说,在莫斯科维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在社会行为和政治文化等方面,没有根本的区别。作为一种宏大努力的一部分,利哈乔夫的解释是有意义的;这种努力的目的就是在俄国人和研究俄国文化的外国学者当中把帝国的概念提高到欧洲的标准。但是,明明是无法维护的观点,利哈乔夫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样反反复复贬低理想的行为规则的做法是从哪里来的,而“合乎规则的世界”的传统主题为什么在莫斯科维的文学中添加了强烈的幽默色调呢?为什么相反的秩序出现在西欧和中欧?这一现象的理由,至少可

^① Richard Pipes, “Diplomacy and Culture: Negotiation Styles,” in *Arms Control: Myth versus Reality*, edited by Richard F. Staar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156.

以部分地归纳如下。^①

161 首先,上文援引的叙事(以及见于《17世纪俄国民主讽刺文学》中的其他的诗体叙事作品)表明,在古代俄国存在着一个社会潮流,这个潮流把幽默和对法律的贬低或者幽默和罪恶联系在一起(不用说,在古代莫斯科维教会和国家是不分离的)。符合法律的事物受到嘲笑,而对于倾听“民主讽刺文学”叙事的人来说就显得滑稽可笑。在这样的语境下,幽默作品就倾向于嘲笑法律,而不是提倡。在使用拉丁字母的欧洲,可以发觉到相反的状况:中世纪的幽默所依据的前提是:明显的违法行为是可笑的。莫斯科维的状况可能来源于和西方传统对立的、完全没有幽默感的拜占庭传统;西方传统允许对法律戏耍、挖苦、暂时的和有节制的颠倒。拜占庭基督教厌恶娱乐和幽默,其程度大大的高于西部教会。俄国正教会所尊重的两个圣徒,约翰·克里索斯托和叙利亚的埃弗拉伊姆,曾撰写告诫,反对笑闹和娱乐。埃弗拉伊姆的教导是针对僧侣而不是俗人的,但是被理解为针对二者。^② 16世纪前往莫斯科维的旅行者都因为那个国家日常生活缺乏娱乐而诧异。^③ 埃弗拉伊姆可能是俄国16世纪家训推崇的寡淡无味的生活的间接来源。这本家训告诉我们,演奏班多拉琴、笑容、跳舞,都是通向地狱的道路。该书告诫父亲们不要对自己的儿子们露出笑容,应该对他们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阴沉的仪态。^④ 相反,在西方受到欢迎的圣徒都倾向于容忍、甚至赞同欢乐:本尼迪克默认适度的笑容,安东尼的言论伴有神性的机智,而马丁习惯于说率真的笑话。同样,经院哲学家总体上赞成发笑和玩笑。^⑤

这样,拜占庭的严厉态度促成了莫斯科维社会习俗中对嬉笑的敌意。到后来,这些习惯被收入了法律。1648年,十来岁的少年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颁发了几个敕令,规定对如下行为的人施以鞭答刑罚:嬉笑,

^① Iurii Lotman, "O dvukh tipakh orientirovannosti kul'tury," in *Stati'i po tipologii kul'tury* (Tartu: Univ. of Tartu Press, 1970), 86-98.

^② 感谢安特为普大学 F. J. Thomson 教授向我指出这一点。

^③ "The Account of George Turberville," in *Rude and Barbarous Kingdom*, edited by L. E. Berry and R. O. Crummey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1968), 76.

^④ *Domostroi* (Moscow: 1882). Quoted from Bradda Books Reprints (1971), 57-62, 68.

^⑤ Curtius, 421-423.

说笑话,当众或者私下唱歌、打牌或者玩其他游戏,甚至包括荡秋千。^① 这些敕令不仅针对巡行的演艺艺人,也针对私人家庭。1672年,沙皇阿列克塞背反自己制定的敕令,吩咐莫斯科教士格特弗里德·格列高里组建了一个剧团,到皇宫里演出。格列高里照办,组织了俄国的第一个宫廷剧团,剧团在莫斯科的皇宫演出了几个高度定型的圣经题材剧和历史剧。因为自己违规,阿列克塞十分忧虑,咨询忏悔神父,神父立即消除了敕令对他的限制。莫斯科剧院只存在了四年。阿列克塞死后,新沙皇非奥多尔关闭了剧院。

1551年,教会规则集《百条宗教令》颁发,专门有一章用于谴责巡行艺人。《宗教百条令》猛烈抨击婚礼和教堂邀请行吟诗人。规则集哀叹神父热衷允许戏子陪伴婚礼主宾前往教堂,禁止这类做法。^② 兹古达(Russell Zguda)在研究这一题目的著作中指出,教会和国家权力机构对这些行吟诗人或多或少持以有效的敌对态度。^③ 看来,这一敌对态度扩展到了其他形式的娱乐。

162

《百条宗教令》一直延伸到17世纪中期,而巡行艺人实际上被从莫斯科维的生活中排除。在1657年的敕令中,沙皇阿列克塞禁止了他们的活动,教会把他们逐出教门。

旧教派也同样谴责嬉笑和娱乐。旧教派领袖阿瓦库姆在自传里说,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巡行艺人班子,就叫人砸了他们的行头、乐器,把狗熊放跑。对那些狗熊当然是仁慈的事,可是巡行艺人砸了饭碗。

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是,伊万雷帝的晚年虽然有暴力和独裁的特点,这位沙皇却有很多时间由巡行艺人们陪伴^④。有一次,他还强迫比门大主教在行吟诗人的陪伴下检阅城市。暴君和娱乐的联系必定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习惯观念,亦即罪恶和娱乐之间存在某种的关系。

① A. M. Skabichevskii, "Asketicheskie nedugi v nashei sovremennoi peredovoi intelligentsii," *Russkaia mysl'* 21 (October-November 1900), 24.

② *Stoglav*, edited by D. E. Kozhanchikov (St. Petersburg: Akademiia Nauk, 1863), 135-6.

③ Russell Zguda, *Russian Minstrels: A History of the "Skomorokhi"*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8), 45-80.

④ N. M. Karamzin, *Istoriia gosudarsva rossiiskogo*, vol. 9 (St. Petersburg: Evdokhimov, 1892). Reprinted by Mouton (The Hague, 1969), 105.

看来,幽默和对于“世界应有的面貌”的否定**乃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这样的假设对古代俄国幽默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俄国文学有别于西欧和中欧的文学。因为嬉笑而造成嬉笑有罪这一观念从来没有在西方社会生根,西方社会年年举办嘉年华会,保持自发娱乐的长期传统,对于这些,教会和国家都从来不加以猛烈反对。这个情况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俄国发展起来的讽刺文学嘲笑法律和“合乎法理的世界”。在莫斯科维的俄国,幽默具有了禁果的味道,**和违反法律联系起来**。正因为这样,对于“世界应有的面貌”的嘲笑和对于“合乎法律的世界”或者“理想的世界”的否定变成了古代恶棍幽默文学里反复出现的传统主题。这是幽默作家对规则和习俗的报复,因为这些戒律否认他们公开实践自己技艺的权利。他攻击全部的法律,刀枪并用,嘲笑那些没有设法对他们作梗的人。

幽默和娱乐看来属于人的基本的需要和行为模式。在幽默和没有法制之间创造的某种联系所起的作用,是阻碍了在莫斯科维发展以法的身份对法的尊重,很可能强化了社会对于独裁、尤其是法律和统治者高于国家法律的状况的容忍。古代莫斯科维的幽默文学示意,一个人如果不是生来享有特权,则取得特权的唯一方法就是违反法律。

163 根据对于这一特别个案的研究,可以说,莫斯科维的文学和中世纪欧洲的文学是根本不同的。后者在笑话规则的行动本身中确立了规则,而前者则否定规则,并且加以嘲笑。因此,古代俄国文学和西方中世纪文学代表了世界幽默文学的不同类别。利哈乔夫试图把这两种文学说成来源于同样的社会习俗的尝试,凸显了在各个时代,俄国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的打造威望的积习。虽然全部的大帝国都从事这样的活动,但是俄罗斯帝国的特殊之点是,在争夺文化领先权的打斗中,这个帝国的代言人很少感到有充分的信心,不再拿其他的手对手为准绳。利哈乔夫承认某种时间的差异,却不承认社会价值观和规范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过程。他无视专制严酷的莫斯科维和怀有自信心的、“落后的”中世纪欧洲之间,在社会习俗和期待上是有区别的。在帝国欲求的推动下,他又一次表达了俄国上层社会频繁表达的和西方平起平坐的愿望。像以往的施克洛夫斯基和其他人一样,他准备满足这个愿望,而置历史的准确性于不顾。

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期间的自我解释

施克洛夫斯基和利哈乔夫都是建造帝国的人,使用他们的辩才再现出帝国远古时代的一幅美好画面,以求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但是,他们两个人所在居住和写作的这个苏俄,一触及当代史,就现出帝国的原形,要求学者品格较差的人效劳,强调这个国家的机构和权威合法,还要灌输种种信念和行为常规。在军事干涉造成的变化发展迅速的时期,需要即刻的评论,以便在集体的记忆中留下关于所发生事件有实效的概念。这个做法包括使用形形色色辞令谩骂敌人,同时激励歌颂所向无敌的苏联。为了迅速推行新的思想,就得要求比施克洛夫斯基和利哈乔夫品格差的文人效劳。为数颇大的俄国知识分子和记者全力为苏联帝国目标服务,利用敌人失利事件,尽兴用文字耍赖。苏联顽强使用花言巧语,来巩固帝国所得到的好处。这个策略的例证出现在1939—1941年苏联—纳粹友谊年代的苏俄报刊之中。在那一段时期,许多报纸和刊物对待被苏联强占民族和国家的态度,是紧跟了1939年8月23日纳粹—苏联互不侵犯条约(也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或者斯大林—希特勒条约闻名)的,依据这个条约,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了中欧和东欧。

应该强调指出,对于俄国这一时期的历史,美国人的解释一般都躲避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苏联占领了波罗的海的三个共和国、芬兰的一部分(最后兼并到了“俄罗斯”联邦)、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以及波兰本部的部分)、罗马尼亚的部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最终被兼并给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一切都没有被从殖民主义方面来考察;这些行为倒被认为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在境外传播共产主义的行为。据说,俄国帝国主义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即使不是可以忽视的,也是微小的。据乌拉木(Adam Ulam)认为:

1939年各项决议的主要因素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虽然结果苏联收回了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定所失去的大部分领土,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吸收了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而竭力收回沙皇在芬兰的遗产、和实现俄国在海峡上的雄心都不太成功。也不能够把这样的决

定看做是戏剧般的抛弃共产主义的思想前提……民族主义的志向和共产主义的分析性的框架变得简单地淹没在极权制度的利益之中。^①

和乌拉木一样,多林(Alexander Dallin)完全绕过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见于他的《苏联外交政策与内政:一个分析参照系》,就像科恩(Stephen Cohen)对致使苏联社会强大的各种力量的不合时宜(1985年出版)的研究著作一样。^②在结合了“极权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方法的一部较早的著作里,费因索德(Merle Fainsod)说,在斯大林领导下,虽然有俄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压力,党还是一直遵循了表现在斯大林格言中的政策的,这就是:形式上是民族主义的,内容上是共产主义的。费因索德说:“斯大林预见到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在本质上依然是共产主义的一块巨大的独石。”^③这就意味着,在实践上,民族的凝聚性是得到了容忍的,甚至得到了鼓励,可以用于娱乐,表现在民间艺术、舞蹈、音乐上,但是民族主义的起分裂作用的方面,无论根源如何,都受到压制。费因索德论证说,把民族主义当做脱离帝国过程的一股动员力量来使用的任何尝试,都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

165 1939—1941年的苏联历史事件频繁发生,而在美国的苏联研究以及后苏联时期的俄国研究活动中对这一时期的注意相对粗略,这是一个不够谐调的局面。在这一段时间以前,苏联从来没有如此成功地扩张和兼并整个

^① Adam Ulam, *The New Face of Soviet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1963), 138; Walter Laqueur, *Russia and German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65); and Mikhail Heller and Aleksandr Nekrich, *Utopia in Power* (New York: Summit, 1986). 关于研究学者对苏联民族问题视而不见的论断,见 Alexander J. Motyl:《一个国家的苏联研究,还是比较民族学研究?》,《斯拉夫评论》,48(Spring 1989), 83-88。

^② Alexander Dallin:《苏联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分析框架》,见《苏联外交政策的运作》,edited by Erik P. Hoffmann and Frederic J. Fléron, Jr. (New York: Aldine-Atherton, 1971), 36-49; Stephen ,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Politics and History since 1917*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85), 65-6, 155-6. 关于俄国外交事务的老旧的、但是依然根深蒂固的观点,参见 George Keenan, *Rus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Mentor, 1960),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Terror and Progress in the USSR: Some Sources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54), 在这里,对于与苏联民族有关的问题的讨论仅限于不同民族背景成员知识分子中间的集团形成的考察,而完全不顾殖民主义。同样的方法也见于 David Lan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USSR*, 2d ed. (New York: New York Univ. Press, 1979)。

^③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65), 363.

的民族和国家,而以后也不会再一次这样令人瞠目结舌地成功了。从领土封面来看,和纳粹德国不一样的是,德国不得不放弃战时的利益,而苏俄参保存下来大部分的利益。1939—1941年期间,完成了整个俄国史上最成功的殖民地扩张。那一时期的兼并结果是获得了五个新的联盟共和国莫尔达维亚、卡列利亚—芬兰(1956年降格为“俄罗斯”联邦范围内的自治共和国,很可能是为了预先排除芬兰将来可能提出的领土要求)、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扩大了两个现存的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①这七个受到影响的共和国所包括的人民说九种不同的语言,其中没有一个是俄语。1940年8月1日,莫洛托夫吹嘘,苏联的人口在一年之内增长了2300万。^②被兼并的土地有一段时间落进德国的手里,但是很快就变成了主要的战场,阻挡了烧杀抢掠的德军及其大炮炮火直接打击俄国本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这些土地提出了领土要求,除了微小的变更,都依然是苏维埃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苏联解体(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谋求独立的过程)。虽然名义上享有独立,但是中欧同样不得不在莫斯科强加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限制下运作。在战争期间,中亚和高加索苏联诸共和国也发生了相当的变化:1940年,这些国家使用的字母从拉丁文或者阿拉伯文改成希里尔字母。^③改变字母表本身构成了对于俄国东部和南部边界上没有被同化的民族的文化的重大的、殖民主义的侵占,而对于新的共和国和中欧的军事统治,则是帝国自我肯定地把“老”沙皇俄国和“新”苏俄联系起来的行动。对于那一时期报刊舆论的浏览可以得出上面的结论,在舆论中,首先提出的是对于俄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帝国意识,而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诉求。

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秘密条款规定了在欧洲的各方面的利益范围。这些范围代表了内部殖民主义的经典个案,这样的殖民主义把小国和中等

① “法律”文件对这些兼并的辩护见于“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规定”,《党的建设》,no. 14 (July 1940), 39-41.

② “Vneshniaia politika Sovetskogo Soiuza,”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8-9, no. 4 (1940).

③ 《消息报》,1940年1月11日,论吉尔吉斯文字母表从阿拉伯文变成希里尔字母;《真理报》,1940年3月29日,论鞑靼文字母表从拉丁文字母变成希里尔字母表。

国家边缘化,强塞给他们泽潘泰克(Totosy de Zepentek)的术语:“中间边缘性”(in-between peripherality)。根据那些条款,苏俄即将统治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领土;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还有纳莱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以东的第二波兰共和国。^① 苏俄在1939—1940年夺取的土地是各民族的群体杂居的地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以后的苏俄引发的“民族清洗”^②的标准来看,他们生活在可观的和谐之中。在苏俄接管之后,这些民族不同的人民,按照苏俄的计划,被遣送到了不同的方向,但是,这一过程被复杂化,原因是苏芬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各民族军事胜利上面必须附加的一层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的光泽;这样的胜利,是俄国国家在苏联出现之前很久就日夜渴求的。这些复杂的情况,和所涉及的民族利益的多样性,使得被征服的地区的治理工作很困难。^③ 目的是制造一种观念,亦即,马克思主义才是对待被征服者的唯一的要素和指针。^④ 实际上,气势汹汹的民族主义扮演了主导的角色,以暴虐和破坏性的方式发挥爆炸性的作用。

在1940年5月,党的刊物《党的建设》的社论强调,关于国家政策的信息应该通过新闻界,而不是党委书记的备忘录来传达。“报纸上的活生生的语言,比任何数量的备忘录和指示要不可比拟地更有力量、更有效,而地方党委书记们常常在这些东西上浪费很多时间。”社论接着还教导编辑们怎样写作才能取得预计的效果,怎样有效地表述一个观点。那年,关于管理与论界的文章实际上每个月都出现在《党的建设》上。这些文章反映了统治阶级认真关注舆论界对于迅速变化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解释,关注舆论

① 苏芬战争之后,只有芬兰的一部分被并入苏联。

② Joseph Rothschild,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72, 369.

③ 在这些兼并之后,三分之一的苏联居民的俄语不够好,所以俄语出版物对他们发挥不了作用。这一部分居民可以阅读其他语言的报纸,这些报纸要摘编自俄语报刊。参见《红旗》中的讨论, Gross, xx, 66, 75, 85, 189, 191, 217. Also Adam Ulam, “Russian Nationalism,” in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Seweryn Bialer (Boulder, CO: Westview, 1981), 3-17.

④ Peter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5), 224, 51-69.

界在制造有利于帝国的阐释方面的用途。

1939—1941年,《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和俄国其他主要的日报和周刊都报道了有关被征服国家的正确的态度和意见。对事实的反复篡改显然旨在使其内在化,变成为宗主国中央效劳的一个模式的组成部分。报刊使用文章、诗歌、报告、见证和口号煽动仇恨。格罗斯(J. T. Gross)指出,在那一段动荡的时期,报刊上鼓励对不受欢迎的社会二等公民施以虐待,就等于给社会犯罪集团颁发狩猎许可证。^①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受到挑拨反对波兰人。在苏芬战争期间,报刊努力制造对“芬兰白匪”的仇恨,胡说什么芬兰社会已经分裂成为两半,一半同情苏俄,准备加入苏联,另外一半对苏俄怀有敌意。挑拨卡列利亚人反对芬兰人的阴谋——宣布芬兰语、而不是卡列利亚语是新制造的卡列利亚—芬兰共和国的语言,是这种运作的组成部分。在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被兼并以后,发起了仇恨罗马尼亚人的煽动,而“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也受到攻击。在纳粹入侵苏联之后,德国文化和日耳曼人得到了自己的一份蔑视和辱骂。唯一没有受到辱骂的民族是俄罗斯人,而针对波兰人的煽动为时最持久。报刊的这些煽动大量地证明了这一时期的俄国人的殖民战略。

在苏联入侵波兰之后的大约一个月之内,苏联的每种大报纸的每一期都名副其实地至少刊载对波兰和波兰人表示敌意的文章或者诗歌,在1939年9月19日达到高峰——一共39篇。波兰被涂抹成了一个人民愚笨而残暴的国家,不过是夹在两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德国和俄国之间、凑合着苟且偷生的民族而已。报刊鼓励仇恨“贵族的波兰”(panskaia Pol'sha),波兰贵族(pol'skie pany)、“老爷”(pany),或者,干脆“波兰人”(在波兰语里,“pan”意思是“先生”、“老爷”、“您”,“pani”意思是“女士”,女性的“您”,动词用第三人称,表示尊重、客气。连大学老师对学生都用这样的词和学生谈话。类似德语里的Sie,西班牙语里的Usted,但是意思更多,大写的“Pan”可以指“上帝”。俄国人是在用这个词挖苦波兰人。——译者),而不顾波兰第二共和国已经取缔了全部贵族头衔这个事实。在俄语里,pan这个词的含义显示,报刊所指不仅是社会阶级,而且,首先是指民族和波兰的社会礼

^① Gross, 35.

仪——这些礼仪,传统上被俄国人视为装腔作势,过度根植于上层阶级的行为(参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 pan 这个词语的使用)。^① 为适应对波兰的目标加以这样的分类,在文章、诗歌和短篇小说里使用了骂骂咧咧的词汇,而作者们,在其他的方面,在名誉上,都还是无懈可击的。谩骂波兰人的方式,在美国人看来可能显得无效和天真,但是,在战争和贫穷的条件下,却的确是刺激情绪的。波兰被丑化成为这样一个地方:一小撮波兰贵族虐待千百万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在《真理报》和其他报纸读者中间制造的一种印象是,波兰的居民主要是欢迎解放的非波兰人。波兰统治造成的触目惊心现象的见证人为国内外报纸提供证词,还以赞同的口气引用希特勒关于波兰的信口开河和胡言乱语。

报刊还就向西伯利亚和中亚强迫移民的传言提出解释。俄国的外省地方报纸做到了从这些大报纸刊物的“拾人牙慧”。某一天出现在《真理报》上的一些什么东西,必定在次日或者第三日出现在《消息报》上,又一两天之后,又出现在地区的和专业的报纸和杂志里。各地的真理报转载莫斯科《真理报》的前一天的文章。如果在四周期间就同一个问题写出许多文章,这个问题就被认为是重要的:一个观点正在被提出、受到重视。关于一个特别的问题的孤立的文表明,这个问题在一段时间之内不予优先考虑。

和苏联—纳粹合作时期形成对照的是,从1937年1月到1939年9月,苏俄报刊分给波兰人、芬兰人、或者罗马尼亚人的版面很少。的确,没有文章表明编辑意识到存在着吸收这些民族居住的领土的计划。即使党的高层干部偶尔讨论这类的计划,也没有作出激发公众体验兼并的必要性的尝试。^②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从文化上来说,苏联主要报刊的编辑们是把东部中欧看做是西方的一部分的。偶尔有文章形容这个地区为“西方”。在综述西方报刊消息时候,列入了捷克和波兰的报纸;这些国家的文学被说成是西方的。例如,1938年5月5日的《文学报》载波日亚尔斯基(N. Pozharskii)文章“苏联文学在西方”就引用了苏联作家作品的波兰语译本、

① Michal Heller, “Polskie pany,” *Kultura*, no. 421 (October 1982).

② Jonathan Haslam, *Struggle for Collective Secur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197-8.

捷克语译本,以及英语、法语和德语的译本。波日亚尔斯基说,在翻译苏联作家作品方面,德国在西欧领先,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紧随其后,法国第三。

从表面上看,党的出版物没有预料到和希特勒的结盟,还发表了对德国人不友好的文章。但是,俄国人宣告预计纳粹要攻打俄国人近期想要占领的国家时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态度,却另有所指。1939年1月,《党的建设》开辟针对德国的“反法西斯和战争的斗争”专栏。在这个双周刊的国际版,维克托罗夫抱怨,“罗马尼亚和波兰已经被划定为法西斯侵略最近的目标……法西斯正在准备攻打罗马尼亚、波兰和立陶宛。”^①1939年6月20日的《文学报》和1939年8月1日的《列宁格勒真理报》都严厉评论德国,而在签署条约几天以前,《真理报》还谈论“德国对波兰人的迫害”,“格但斯克(但泽)的反波游行”,“法西斯占领下的捷克斯洛伐克”(8月20日)和“德国反波运动的继续”(8月21日)。几百年来,俄国人一直和德国结盟,目的是分享殖民地战利品:包括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苏联长期的计划中,这样的结盟行动是可能的,几乎不能排除。

168

1939年8月23日,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消除了对纳粹德国的任何的进一步的批评。“法西斯”这个词消失,在关于欧洲的事务方面,苏联报刊名副其实地在一夜之间采取了亲纳粹的观点。接踵而来的就是一场反波兰、反芬兰、反罗马尼亚的宣传运动。

从8月24日起,波德边界上的事件,都是从纳粹的观点报道的。再也没有对波兰报刊的援引,而德国的《人民观察家报》则常被引用。8月27日,《真理报》说,德国报纸谈论“日益增长的德波军事冲突危险”;意指双方都在煽动敌意的增长,而这篇报道就这样发出一种公开的反波兰变化。

8月31日,《真理报》末版最后的五行说,波兰已经宣布了总动员,波兰和德国之间全部铁路交通已经中断。几天以后,纳粹入侵波兰一事被报道成为“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军事行动”。对波兰市民遭受的战时困苦和不便的描写,出现在9月5日的《真理报》上。同日,《真理报》说,波兰当局逮捕了两个德国外交家,意思是德国人会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作出反应。次日,《真理报》报道,为报复波兰的行动,两名波兰外交家在柏林被捕。据

^① Ia. Viktorov, "Mezhdunarodnyi obzor," *Partiinoe stroitel'stvo*, 1 January 1939, 62.

《真理报》说,波兰人也偷越了苏联边界:在苏联入侵波兰四天以前,波兰飞机未得允许侵入苏联——该报在9月14日报道。9月15日,《财务报》重复这条消息。9月13日,《真理报》宣布“东加利西亚”莫须有的反波兰起义,四天以后,苏军入侵了这个地区。

苏联文艺界同样热衷于为苏联在波兰的图谋辩解。全国性的仇恨煽动活动在苏联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于苏联入侵波兰当天的会议上开始,次日在《真理报》上报道。主持会议的是格拉德科夫(Fedor Gladkov)。超过二百名苏联作家出席。可以预期的是,他们都决定支持这次入侵,并且上书斯大林,信里说:

169

波兰国家是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制造出来的,依靠的是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波兰化,旨在彻底消灭他们的文化……这个国家面对第一次严厉的考验就已经分崩离析……我们向被压迫人民的保护者、苏联国家的光荣和骄傲——苏联红军致以敬礼……苏维埃联盟的全部自由、平等和幸福的民族……都支持伟大列宁和斯大林的党和政府。^①

签名者当中有:阿利戈尔、波格丹诺夫、格拉德科夫、谢尔文斯基(Margarita Aliger, Aleksandr Bogdanov, Fedor Gladkov, Il'ia Servinskii),乌克兰作家切尔尼亚夫斯基(Mykola Cherniavskii),他后来死于古拉格群岛。

就这样,一个谩骂的时期开始了:谩骂一切波兰事物,把波兰描写成一个少数波兰贵族(pany)压迫一大群少数民族的地方。有的文章标题是“神圣的仇恨”,大量印刷,煽动民情,鼓励杀戮波兰人。^②9月19日的《真理报》发表了阿里戈尔充满仇恨的诗,标题是《1939年9月17日》,这是入侵波兰的日子。即使是在当时撕咬波兰人的表演中,这首诗也是突出的:

突然,时间分裂,
新鲜的空气来临——
周围听到一个声音,

① 《真理报》,18 September 1939.

② *Literaturnaia gazeta*, 26 September 1939.

.....

是正义向世界言说
用伟大的俄罗斯语言。
是我们的诚恳呼喊，
我们的真理道出的语言，

.....

心灵将永远牢记这一天，
同志们，不要忘记！
在这一天，我们苏联的军人
开始了伟大的行军

.....

部队进入的国家一片苦难。^①

这不是一个千方百计设法生活下去的人写出的一首对斯大林的颂歌，而是表达了一个深藏心中的信念，这就是，波兰必须灭亡，必须被说“伟大的俄罗斯语言”的“军人”征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诗里，形容词“伟大的”都用在俄国的、并非苏维埃的事物上。在苏联帝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条件下，阿里戈尔对俄语的赞扬和纳粹对德国文化优越性的赞扬并无不同之处。

阿里戈尔的愤怒部分原因来源于她的政治信念。她相信政治小说，这些小说即使是在她的时代也已经变得严重错误，而且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对个人和文化造成了难以形容的伤害之后垮台。但是，这首诗的根子就是更古老的俄国帝国的殖民传统，这一传统庆祝“俄国国旗飘扬在白色的希瓦河上”，要求高加索在大将军叶尔莫洛夫面前低声下气，祝贺苏沃洛夫将军屠杀华沙平民、祝贺斯科别廖夫将军屠杀中亚格奥克一杰别要塞的平民。在所有这些场合下胜利的辞令都很明显，为俄罗斯帝国耗费资源和生命的行为辩护，把这样的耗费描写成为俄国的或者苏联的传播文明使命的投资。

170

^①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Pravda* on 17 September 1939. E. M. Thompson, ed., *The Search for Self-Definition in Russian Literature* (Houston, TX: Rice Univ. Press, 1991), 203-4.

同一期《真理报》刊载附加的关于苏联入侵波兰的 38 篇文章、诗歌、故事和见证。为解释性的辩护作出如此重大的努力表明,《真理报》摆出姿态,要抹掉苏联人口中说俄语的这部分人当中对入侵的恰当性的质疑。看来,纳粹—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给报刊主编们带来自信:把一个邻国遭受入侵当作和平与正义的胜利来报道,是需要很大的自信心的。

1939 年 10 月 15 日,《文学报》报道,对波兰的军事入侵的后续是文化占领。红军开进波兰之后不久,作家和记者就抵达,“召开会议,给报纸发送传单和文章,参加地方政府”。这就表明,俄国作家和记者接管了波兰出版机构的编辑办公室。当时没有报道波兰记者的命运,但是某些其他的资料表明,被俄国人取代的那些人被解雇、处决或者押送到了古拉格群岛。^①

1939 年 9 月 30 日,《真理报》发表了两首诗,一首是马尔夏克(Samuil Marshak)的,例外一首是古谢夫(Viktor Gusev)的。马尔夏克的《在这些日子里》描写了红军进入西乌克兰的小镇莫洛杰奇诺。在这里,“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男女老幼”“十分友好地”欢迎苏联人。士兵抱起小孩,许诺他们都有远大前程。古谢夫的诗《幸福》开篇就描写一个波兰贵族的盾徽遭到践踏。一个白俄罗斯农民告诉苏俄士兵在“贵族老爷波兰”(panskaia pol'sha)生活有多么可怕,他见到苏联“兄弟”有多么高兴。在同一期的《真理报》中,卡塔耶夫(Valentin Kataev)的《旅行札记》画出了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可怕的生活画面,描写了农民高高兴兴地欢迎苏联官兵的情景。卡塔耶夫在《真理报》上还发表了另外五篇对入侵的歌功颂德的文字。^②卡塔耶夫也用谎言为煽动民族敌意作出贡献:他在 10 月 18 日的《真理报》上胡说什么在“贵族的波兰”犹太人没有选举权。事实是,犹太人的各个政党都长期地努力选出议会代表,而在其他的政党和团体里也都有犹太人背景的人士。^③在 10 月 22 日,卡塔耶夫发表了文章,描写了一个“被波兰人枪杀的共产党员”的妻子现在成为苏联公民而感受到的悲喜

①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197-206.

② *Pravda*, 26 September and 6, 18, 22, and 29 October 1939.

③ *The History of Poland since 1863*, edited by R. F. Leslie (London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7), 153-4, 168-9, 175-6, 198.

交加。

苏联人的殖民主义倾向还表现在专门展现波兰人的同类倾向;波兰人对西部乌克兰和西部白俄罗斯的控制是历代王朝推动的,也是典型的殖民主义的。在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波兰人所享受的语言和社会特权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所没有的。苏联人利用了这一情况造成的怨恨,使用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来对付波兰人,为自己火中取栗,还要加高额利息。

171

10月10日,《文学报》刊登了一封诗体来信,是一组自称“共青团诗人”的人写的。这封信是写给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工人的,谈到属于战前波兰的两个城市:维尔纽斯(维尔诺)和普舍梅希尔(维尔纽斯现在是立陶宛的首都,普舍梅希尔在波兰东南部)。文章断言,这两个城市分别是白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这封信还谈到波兰统治下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苦难,表达了红军结束了苦难而感到的喜悦。

11月26日的《文学报》刊载了多尔马托夫斯基(Evgrnii Dolmatovskii)的诗作《午夜》,描写了一个古老的大宅门,往日归一个波兰贵族所有,现在被哥萨克占领。在描写一个剥夺在这个地区居住了几百年的一个波兰家族从财产的行为的同时,多尔马托夫斯基在重重怀念中谈到莫斯科,就像契诃夫的《三姐妹》一样。在关于驱逐和谋杀在乌克兰的波兰人的一首诗的语境中,对莫斯科——对其街道、林荫道、少女和行人的追忆,造成一种怪诞的印象。类似的思想灌输也彰显了科尔年科(P. Kornienko)在同一期《文学报》上的文章。《千百年悲剧结束》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属于同一个民族,而“波兰地主”是两个民族的敌人。文章包括了引文,引文来自一部所谓的《波兰、立陶宛和鲁塞尼亚史》,据说该书于1879年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兰贝格出版(该城在波兰语里称“利沃夫”,在乌克兰语里称“利维夫”)。这部书硬把全部斯拉夫人划分为“古代波兰人、波兰人和贵族统治者”。关于波兰人独霸早期斯拉夫人历史的这种胡言乱语,在那动乱的年代,只能煽动暴力来反对波兰人。

在1939年9月和10月,苏联报刊刊登了异常多的文章,颂扬俄国的事物,提醒俄国人记取16世纪和17世纪的数次波俄战争。文章、诗歌、故事都提示,俄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享有同一种民族性。在10月10日的

《文学报》上,别尔卓夫(V. Pertsov)谈到“俄国民族过去的军事荣耀”。在9月26日的同一周刊上,出现了作为苏联一部分的东部白俄罗斯的诗人格拉布卡(Piatro Glabka)的一首诗。有诗句说,白俄罗斯和俄国被阴险的“波兰贵族”分离:“我们都诞生在同一个国家/但是彼此的命运不一样/全世界都羡慕我们的成长/而你们一直受到欺压。”^①

日沃夫(Mikhail Zhivov)在10月10日《文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波兰文学的见证》描绘出一幅劳动人民在“贵族们的波兰”生活的凄惨画面。文章说,一小撮“波兰贵族”压迫非波兰人的城市和农村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和这一见解形成矛盾的是,苏联法学月刊《苏联司法》在1940年承认,必须为172 西白俄罗斯城镇的法庭寻找波兰语—俄语翻译,因为地方居民只懂波兰语。^②

雷尔斯基(Maksim Ryl'skii)发表了两首反波诗歌,分别发表在《真理报》(1940年3月24日)和《消息报》(1940年9月17日)上。在第二首诗里,他回忆苏联统治西乌克兰一周年,说“这一周年伟大”。“(波兰)贵族的痕迹正在消失”;雷尔斯基声称:“打造皮鞭的贵族们”已经不复存在。然而,随着历史风向的改变,雷尔斯基也改变了语调,在1941年8月13日《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亲波兰的文章。希特勒的进攻震惊了斯大林,他允许古拉格的波兰人重新入伍参加波兰军队。雷尔斯基也应声赞扬“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肖邦和哥白尼的国家”,要求波兰人通过勇敢战斗“洗刷”纳粹占领带来的“耻辱”。雷尔斯基的个案表明,帝国在摆布被迫沉默的二等公民有很多实施操纵他们的手段。

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波兰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开放的季节。在波兰东部和白俄罗斯西部被占领的城镇,“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开会。一成不变的是,知识分子宣布自己赞成苏联的做法。出现这样场面的有明斯克和比亚威斯托克(《真理报》,1939年10月1日),维尔纽斯(《真理报》,1939年10月2日)和斯洛尼姆(《真理报》,1939年9月26日)。10月9日,《真理报》

① “Nas kraina odna porodila / Da neravnoe schzst'e dala / My росли vsemu svetu na divo / Vas nevolia vezde steregla.”

② *Sovietskaia iustitsiia*, no. 7 (1940), 23.

报道,在“贵族波兰”失业的 6500 名知识分子成员在“白俄罗斯”城市维尔纽斯找到了工作。文章断言,“贵族的波兰扼杀了白俄罗斯文化”。

1939 年 9 月 27 日的《真理报》表达了同样的情感,见于伊萨可夫斯基(Mikhail Isakovskii)的诗《日出》。和阿里戈尔与卡塔耶夫一样,伊萨可夫斯基在那个时候咒骂波兰事物方面也是特别活跃的。在 10 月 6 日和 11 月 5 日的《真理报》上,他发表了其他的反对波兰的诗作。10 月 15 日,《文学报》发表了他为《兄弟》一书写的书评,这是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诗集,似乎都是为儿童写的反对波兰的诗作。出版和评论的快捷表明,至少有一部分材料诗在苏军入侵之前四个星期就已经准备好。据评论作者介绍,这本书开篇就描写红军战士拆毁波苏边界的标志。

伊萨可夫斯基有意把俄国的事物和乌克兰的和白俄罗斯的事物混淆起来。在刊登于《真理报》的诗作《在这些日子里》之中,他谈到和波兰人战斗,消灭他们,还说什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居民都是热爱俄国故乡的、“纯朴的俄国孩子们”(prostye russkie rebiata)。“俄国的、俄罗斯的”(russkii,参见第一章的讨论)的模糊词义给伊萨可夫斯基完成任务带来方便。在这首诗里,一个白俄罗斯的农民表示钦佩苏联红军对待西部白俄罗斯的私有财产所报有的纪律和关切的态度。他对红军所说的话是:“你们和波兰贵族进行了生死的战斗/但是你们没有弄脏我们的水井/甚至没有摘走我们果园的一个苹果/也没有践踏一畦菜田。”^①哎哟,这样的语言早就超过了诗歌的界限了。而来自西部白俄罗斯农村和城镇的报告却提供了不同的画面。^②

173

在 1939 年 10 月 10 日《真理报》发表的一首诗里,基尔萨诺夫(Semen Kirsanov)斥责说,在“老爷们的波兰……贵族、神父和警察强迫每个人工作,一直到他们彻底累垮。”基尔萨诺夫又在 1939 年 11 月 15 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类似的见解。1940 年 7 月 23 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一首诗,描写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如何自愿加入苏联,诗人把苏联比喻称一块磁

① “So shliakhtoiu vy na smert' voevali / A nam ne zamutili i vody / Ni iabloka ni razu ne sorvali, / Ne zatoptali ni odnoi griady.”

② The Anders Archive, the Mikolajczyk Archive, and Poland. Ministerstwo Spraw Zagranicznych Archive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石。基尔萨诺夫说,最伟大的一块磁石就是斯大林本人:所有不同的民族都不可阻拦地被吸引到他的身边。他强调:“因为我们接纳了苏维埃爱沙尼亚、苏维埃立陶宛和苏维埃拉脱维亚,那个旧世界就变得小了一分。”这最后的半句话是对上文引用过的莫洛托夫在一篇演说里说过的话的重复:他吹嘘说,旧世界必须挤一挤,给扩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腾出地方。

特瓦尔多夫斯基(Aleksandr Tvardovskii)在1960年代是反斯大林阵营里的领导人物之一,但是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年代里的写作则十分不同。1939年10月10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诗作,描写红军攻打波兰:“波兰人狼奔豕突,逃避红军战士,逃避自由人的歌曲,逃避伟大的真理。”1939年10月21日,他在《真理报》发表了另外一首诗,题为《大地的话》,在诗里,集体发言人表达了他对波兰老爷们(pany)的仇恨,称波兰人的“政权非法、受到了诅咒”。特瓦尔多夫斯基谴责道:“我们为可恨的波兰贵族干活/但是不得不恳求他们施舍一块面包。”在这么一首短诗里,pan这个词及其派生词使用了七次,一直和“我们”形成对照,也就是“人民”,意思是包括俄国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标题中Ziemia这个俄语词(可以翻译成“土地、国土”)的含义是,这土地仅仅是俄国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虽然波兰人也在这块多民族的区域生活和劳动。在俄语里,这个词具有丰富的和积极的意义,所以“我们完成正义的事业……善良的人们、要夺回自己的土地”强化了读者的一个信念:俄国人发动侵略战争是正确的。

用文章、诗歌和声明赞扬苏联入侵行动的作者还有布伦科夫(M. Bronkov, 1939年9月26日《文学报》)、科涅楚克(Aleksandr Korneichuk, 1939年9月26日《真理报》)、库帕拉(Ianka Kupala, 1939年10月6日《真理报》)、列别杰夫—库马契和利多夫(Vasilii Lebedev-Kumach and P. Lidov, 1939年10月8日《真理报》)、波诺马连科(P. Ponomarenko, 1940年6月3日《真理报》)、波塔波夫(K. Potapov, 1939年10月2日《真理报》)、普罗科菲耶夫(Aleksandr Prokof'ev, 1939年9月22日《列宁格勒真理报》)、西特科夫斯基(A. Sitkovskii, 1939年9月17日《文学报》)、斯杰潘诺夫(E. Stepanov, 1939年10月4日《真理报》)、吉洪诺夫(Nikolai Tikhonov, 1939年11月29日《真理报》)、特鲁多夫和瓦西列夫斯卡娅(Stepan Trudov and Van-

da Vasilevskaia, 1939年10月27日和11月7日《真理报》)、文尼科夫(Viktor Vinnikov, 1939年11月6日《真理报》)和乌特金(Iosif Utkin, 1939年10月15日《文学报》)。1939年9月到11月连篇累牍刊登反对波兰的文章凸显了国家领导的舆论制造活动,旨在散布反对波兰的情绪,以便在把新的土地并入苏联的时候得到被征服的居民的支持。这样的行动还表明,苏俄的殖民地欲望,虽然是老俄国贪图俄国本部西侧土地欲望的延续,却和苏联的意识形态汇合为一,把民族仇恨煽动到比沙皇俄国时代更高的程度。

174

9月18日的《真理报》发表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广播讲演稿,声明“事态表明,波兰国家没有能力自立”。报纸接着引用了苏联政府递交波兰驻莫斯科大使的照会,宣布苏联已经决定“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收拢到自己的羽翼之下”。这样一来,接管事实上已经变成苏俄殖民地的地方的行为,按照国际法,就可以被接受了。在面对最高苏维埃所做的一篇外交演说(全文刊载于《苏联国家与法制》)中,莫洛托夫宣告,被征服土地的居民热烈欢迎红军,这些居民已经做好准备,抛弃“pany的桎梏”。^①

在9月19日的《真理报》上,雅罗斯拉夫斯基(Em. Iaroslavskii)揭露波兰政府压迫人民,十分残暴。同日的《真理报》还发表了下列文章:《白俄罗斯西部农村的欢庆》、《我们的兄弟们将要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红军是我们最值得信赖的保护人》、《苏联人民及其光荣的红军完成了他们神圣的任务》。9月25日《真理报》说,在美国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甚至波兰人,在听说红军在波兰东部的多次成功的时候,都欢欣雀跃(《真理报》说,这一条新闻来源于《每日工人报》)。10月15日《真理报》刊载《西部乌克兰的农业》一文,文章作者科兹洛夫(A. Kozlov)宣布,“红军的来临,结束了民族压迫和警察暴力;红军带来了新生活的开端,同时带来了土地、自由、物质福利和文化的繁荣。”9月26日,波诺马廖夫(Boris Ponomarev)在《真理报》上谈到了“波兰贵族实行的血腥的恐怖”。10月10日,列兹维赫(A. Rezvykh)上尉描写他和战友如何击落一架波兰飞机,并且打败了“残余的波兰军队”。苏联历史学家们利用这种大规模的努力来制造传统,

^① V. Molotov, “O vneshnei politike Sovetskogo Soiuz,”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5 (1939), 6.

在半个世纪之内大谈特谈什么苏联对波兰的侵略是为了“从波兰的奴役下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① 在后苏联时代,这种帝国立场的解释变化极为有限,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变化。

同样,对芬兰的战争被说成是芬兰的“挑衅”引起的,而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兼并被描写成这些领土“回归”苏联。^② 格里高连科(Petr Grigorenko)将军的《回忆录》表明,就连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是毫无疑问地接受这样的观点的。格里高连科 500 页的大书只有一页叙述苏芬战争和对芬兰领土的兼并,而关于苏联侵略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事实,则只字不提。^③ 兰堡(Alfred Rambaud)的《俄国的扩张:东方问题和远东问题》(19 世纪晚期一部颇受欢迎的论俄国史的法语著作),大部分是以俄国的帝国史学为依据的,倾向于藐视俄国的竞争对手^④;同样,有些 20 世纪的西方史学家也是专门依赖俄国的材料,差不多完全漠视以华沙、克拉科夫、维尔纽斯、基辅、塔林、或者里加为基地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十足典型的“东方主义”情景,一种帝国权力把自己对于自己殖民地属地的解释强加给全世界。

1939 年 9 月和 10 月,《真理报》和其他报纸的许多报告,报道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据说工人自发举行的集会,他们要求“解放我们的兄弟,让他们摆脱波兰老爷的压迫”;声明支持“苏联政府”入侵波兰的“英明决定”。9 月 18 日的《真理报》说,“得到解放的地区,城镇到处喜气洋洋”。9 月 30 日《财务报》报道,在比亚威斯托克市的庆祝活动中,“一个曾经在波兰老爷集中营里服役的、20 岁的装修油漆匠戈尔德科尔……提议给斯大林同志发一封致谢电报。”9 月 20 日《真理报》描写了在白俄罗斯西部小镇斯沃尼姆举行的“知识分子会议”。在这个居民不到两万人的小镇,地方知识分子有 750 人到会,其中有“威斯博士和科瓦尔斯基博士”,他们都发表了反对波兰

① F. G. Zuev et al., *Istoriia Pol'shi*, 2 vols.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58), 456-7.

② M. P. Kim, ed., *Istoriia SSSR: Epokha sotsializma* (Moscow, 1958), 534-542.

③ P. Grigorenko, *Memoirs*, translated by Thomas Whitney (New York: Norton, 1982), 92.

④ Alfred Rambaud,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Problems of the East and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Burlington, VT: The International Monthly, 1900; also Piotr Wilczek, “Jesuits in Poland according to A. F. Pollard,” *Sarmatian Review*, 19, no. 1 (January 1999), 593-596.

的演说。10月13日《真理报》载,雷克林嘲笑了比亚威斯托克市前工会主席卡比图科,仅仅是因为卡比图科是波兰人。在10月20日《真理报》上,埃利赫谈到“一直被波兰人折磨的白俄罗斯西部”。1939年9月29日,《真理报》发表了一位姓普拉吉尔的先生的见证,因为他曾被关在一个“波兰集中营”里。1940年3月10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来信》,文章说,在纽约用意第绪语出版的、没有公布名称的犹太人的报纸,出版了专门的副刊,发表了从被苏联占领的波兰地区的来信。据说,格罗德诺的一个居民给在美国的兄弟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亲爱的弟弟:现在我们自由了。我们有工作,尽量忘记过去在波兰的那种可怕的生活。”另外一个人显然是从纳粹占领的波兰逃过来的,说:“亲爱的珍妮,你忘不了苏联人的善良。我们来的时候衣衫褴褛,又饿又累,悲惨得很呢。他们给我们饭吃,给我们水喝。啊,苏联真正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家乡啊。”苏联报刊在这些见证中凸显犹太人的姓氏不是偶然的,也不可能逃过编辑们的眼睛,因为时候一到这就会在波兰人当中煽起反犹主义来。^①关于美籍犹太人对待波兰第二共和国的态度的这些言论的影响不能低估。

分而治之的技术也被用于制作往昔的形象,以此来提醒俄国居民,在那些时代,是那些是波兰人、而不是俄国人,享受国运上升。格林卡的歌剧《沙皇治下的生活》在莫斯科上演,得到广泛的评论,描写的就是俄国历史上所谓的动荡时代,因为波兰一瑞典王储伏瓦迪斯瓦夫·瓦萨(Wladyslaw Vasa)窥视莫斯科的宝座(在后苏联的俄国,临时国歌取自这个歌剧,这表明,俄国上层认为俄波关系对于俄国人的自我形象具有重大的心理意义)。^②1939年10月和11月,苏联刊物发表对《米宁与波日亚尔斯基》的评论,这是一部关于1610年波兰占领莫斯科的电影。1939年10月26日,评论员施托尔姆这样描述波兰对莫斯科的远征:“波兰人抢走大牲畜,屠杀农民,烧毁农村和城镇……马蜂在人的头盖骨里搭窝。”在同一天的同一张报

176

^① 对于这一结论的详细评论,见 Gross, 29, 32-33.

^② 1999年3月10日,俄国杜马以307票对35票通过决议,重新使用苏联国歌曲调,取代格林卡的乐曲。Agence France-Presse 同日报道,苏联时代的歌词也用新歌词取代。为最终回归苏联时代曲调,还需要两轮投票。

纸上，帕甫连科(P. Pavlenko)指责“波兰”在利沃夫(利维夫,利乌夫)进行“书报检查”。在1939年12月18日的《真理报》上,索洛多夫尼科夫(A. Solodovnikov)谴责说,少数民族艺术家在“贵族的波兰”遭受压迫。11月3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马列维奇责骂在白俄罗斯的波兰人,其用语显然预谋煽动情绪:“就像黑乌鸦一样,波兰贵族老爷们把他们的锐利的爪子插入我们的心脏。”11月13日,波兰东部已经落进苏联的魔爪,《真理报》却还依然谈论什么“贵族波兰的桎梏”。

那一时期的苏联报刊充斥了对波兰 pany 的描写,说他们堕落、不道德。来自各个“解放区”城镇的报告描写了这些 pany 据说享有的豪华奢侈,还报告说,劳动人民搬进了他们的住宅。1940年10月,《真理报》报告说,仅仅在利沃夫,就有两千多个无产阶级家庭被重新安置在这些豪华的公寓和住宅里。而这些住宅原有的居民情况的消息,可以从其他的来源收集。

就这样,一大批重要的和次要的苏联作家和政客庆贺对波兰的入侵,并且将其表现为从枷锁下解放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义举,虽然,以任何的尺度来衡量,苏联的入侵实际上恶化了、而不是改善了他们的处境。作家们支持入侵,其含义是,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是作出了这样的规划的。在评价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苏联文学的时候,这一个事实也许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评论家对这一时期的作家的讨论常常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不过是屈服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法规,而没有注意他们的感知世界早已经深深陷入帝国侵略积习所造成的虚伪。特瓦尔多夫斯基要说服自己的读者,苏联入侵波兰是完成了一件高尚的事,而阿里戈尔把苏联在摧毁波兰行动中做的那部分坏事描写成为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像他们这样的作家都是远离真实的。这样的作家还不仅对那个社会制度阿谀奉承;他们还把俄国文学的语言拉低到了说谎的水平,而且很难克服这样的说谎癖。这些事态对俄国文学和对在俄国文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概念和观念——或者,更广泛地说,对于俄国公共话语的“虚脱心态”的影响,迄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

报刊也被用来错误表达美国对苏联—纳粹条约的态度。1939年9月8日《真理报》报道,美国总统罗斯福赞扬德国遵守国际法,禁止潜艇攻击商

船。1939年8月31日和9月23日,《真理报》报道,纽约股票市场牛市;9月17日,即苏联入侵波兰那天,《真理报》报道,日本股市牛市。以前,《真理报》版面事实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股市浮动的消息。1939年9月19日,《真理报》报道《人民观察家报》以赞同语气谈论苏联入侵波兰。《真理报》所提及的文章同日出现在纳粹报纸的柏林版;因此,《真理报》的编辑必定是在文章发表以前就得到了它。^①9月30日,《真理报》报道塔斯社记者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的采访。报纸的社论结论是“现在,德苏友谊已经永远确立……双方都希望英国和法国停止绝对没有意义的、反对德国的战争……如果英国和法国不能这样做,则德国和苏联将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177

1939—1940年,苏联报刊广泛引用希特勒的演说,而且评论都很积极。9月2日,《真理报》以要闻版面介绍希特勒在国会的演说,叫嚣什么是波兰人——而不是德国人——发动了战争。9月21日,《真理报》转载了希特勒9月19日的格但斯克(但泽)演说的几个部分,在演说里,希特勒在民主问题上教训波兰人,10月7日,该报引用了另外一次的国会演说,希特勒宣称波兰国家没有权利存在,因为是建立在“德国人和俄国人的白骨和鲜血之上的”。1939年11月10日,《列宁格勒真理报》重点发表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说,1940年2月1日,《消息报》转载了希特勒论纳粹取得政权的一次演说的几个片段。

莫洛托夫论苏联外交的演说显著刊载于1939年11月1日《真理报》,演说为希特勒辩护,谴责西方民主国家。莫洛托夫把英国和法国描写成侵略者,用希特勒主义取代法西斯主义。他说,“可以接受、或者抛弃希特勒的思想,这是一个政治观点问题。但是……一种思想是不能强行摧毁的……打着‘为民主而战斗’的虚假口号进行‘消灭希特勒主义’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是罪恶的。”莫洛托夫谴责英国人和法国人出自殖民地欲望而进行战争:他辩论说,这两个国家想要保持自己的殖民地属地,所以参战。还有,在波兰国家破碎之后,苏联政府“向我们的兄弟乌克兰人和另一组兄弟白俄罗斯人伸出了援助之手”。1939年9月29日,《真理报》重点发表论

177

^① “Einvernehmen zwischen Berlin und Moskau über Polen,” *Völkischer Beobachter*, northern edition, 19 September 1939.

纳粹—苏联友谊的文章,谈论“在前波兰国家解体之后……的苏联德国友好和边界的德苏协定”。1940年3月3日,维克多罗夫说,战争“是英法帝国主义者阴谋策划的,因为他们要维护在欧洲的地位。”

配合反波兰运动的是亲乌克兰和亲白俄罗斯的宣传。但是,这亲乌和亲白的运动比反波兰运动短暂,看来不过是在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煽动反波兰情绪的手段,而不是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实行积极的政策的因素。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字之后不久,这两个运动就寿终正寝。

1939年8月后半月,《文学报》发表文章,鼓吹乌克兰民族自豪和乌克兰对波兰人的愤怒。有人颂扬乌克兰红军指挥官肖尔斯(Nikolai Shchors),
178 因为他曾经反击皮乌苏茨基(Pilsudski)的盟友佩特卢拉(Semen Petlura)。当时宣布,在基辅将有肖尔斯博物馆开馆,还有,关于他的歌剧正在创作之中。9月19日,《真理报》报道,基辅国家剧院三百名演职人员欢迎“自己的兄弟从波兰贵族压迫下得到解放”。10月27日,《真理报》刊登文章,论“1648—1653年乌克兰反抗波兰的解放战争”。1940年1月15日,《文学报》发表专论文章,谈表现乌克兰起义领袖赫梅尔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的几个戏剧。1939年9月和10月,《真理报》和其他报纸反复刊登被瓜分的波兰的地图,在这些地图里,维斯瓦和以东的领土都被标定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俄国史学界的一个传统看法是,在斯拉夫方面,波兰是一根刺(因为信仰天主教),而波兰的身份不过是对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身份特征的一种歪曲而已。这样的观点在19世纪被竭力推崇,当时波兰在政治上被剥夺了独立生存权;这样的观点也严重影响了西方对俄国和波兰的见解。^①在1939—1941年,这些观点重又浮现在苏俄的宣传活动中。

1939年9月、10月和11月,《真理报》刊登了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的诗歌和短篇小说(据我所知,这是仅有的例外,因为规则是,《真理报》刊登的全部文章必须用俄语)。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东斯拉夫民族

^① Alfred Rambaud, *L'Histoire de la Russie* (18?), as referred to in A. F. Pollard, *The Jesuits in Poland* (1892), reprinted by Haskell House Publishers Ltd. (New York, 1971).

的联盟,显然正在被努力推动。11月15日,《文学报》刊登的白俄罗斯诗人布罗夫科(Piatrus Brovko)的诗作谈到“波兰老爷的鞭子”和“波兰老爷的枷锁”不再威胁白俄罗斯人。诗人宣布,他的人民盼望加入“红色莫斯科”。“让那波兰老爷灭亡吧”是诗作的最后一行。1939年9月,“白俄罗斯艺术十年展”在莫斯科开幕。1940年9月17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黑列姆斯基(Iakov Khelemkii)的诗作《在九月》,描写一个白俄罗斯的孤儿,在苏联接管后,能够在一所白俄罗斯语学校学习。《真理报》和其他报纸刊登关于“高尔基的挚友”、乌克兰诗人科丘宾斯基的文章,还有关于乌克兰小说家斯杰法努克与马尔托维奇(Stefanuk and Martovich)的文章(1939年9月17日和10月4日《真理报》)。

在入侵后数日,有28个编辑组被从苏联派到白俄罗斯西部去接管当地的报纸和杂志。^① 这些说俄语的“工作队”队员都会本地语言,能够翻译俄文报刊宣传材料,又协助表达为莫斯科利益服务的观点和见解。与此同时,为西乌克兰的学校印刷了七百万册新教科书。仅仅在利沃夫,就有12000名党的积极分子被派到俄语学校去开展再教育活动(1939年10月11日和12月4日《真理报》)。10月26日《文学报》报道,因为波兰在利沃夫进行书报检查,书店里原来以不能够出售公正的社会科学教科书的,但是现在苏联人取消了这个障碍,这类书籍又能够买到。同一篇文章还报道,该城开办一家出售儿童书籍的俄文书店。1940年8月8日,《真理报》报道,比亚威斯托克在波兰统治下,只有22000本波兰语书籍,而现在有6万本“俄文、波兰文、白俄罗斯文、犹太文和其他语文的”书籍。应该注意的是,在苏联入侵的时候,比亚威斯托克省有波兰人1004370人、波兰犹太人162912人和白俄罗斯人119392人。而比亚威斯托克市有犹太人39602人、波兰人

179

^① 1939年10月2日《真理报》。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西部,波兰人主要居住在城镇,而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多数住在乡下。在利维夫(利沃夫)、塔尔努夫、比亚威斯托克、诺沃格鲁戴克和维尔纽斯(维尔纳)省,波兰人占多数,乌克兰人或者白俄罗斯人占居民的20%—45%。在斯塔夫斯拉夫、沃尔黑尼亚和波莱谢省,波兰人是少数,乌克兰人或者白俄罗斯人占人口的55%—65%。Aleksander Gieysztor et al.:《波兰史》(Warsaw: PWN, 1968), 685, 714-16.

35832 人和其他背景人士 1358 人。^①

阿夫杰因科和舒赫明在 1940 年 2 月 6 日《真理报》上著文谈论波兰工人,他们被选入白俄罗斯的工厂苏维埃,可是却拒绝雇用新工人,因为他们不愿意雇用白俄罗斯人。结论就是:波兰人难缠、民族主义意识太凶。2 月 19 日,这两个作者又发表文章揭露,“就利沃夫的垃圾——好几千店员,都变成了狂热黑市分子……但是,为时不长。”3 月 24 日《真理报》描写“被解放的白俄罗斯民族庆祝自己的胜利”。3 月 27 日,“被解放民族狂欢日”在利沃夫举行。

1939 年 10 月 28 日《真理报》报道:“六百年来,西乌克兰一直在波兰贵族……和刽子手的枷锁下呻吟”,言下之意是,算总账的时候到了。在自己的论苏联入侵的著作里,格罗斯揭露,助长暴力是苏联在被占领地区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个办法有利于苏联巩固在那一地区的权力。^②

苏联舆论界利用了波兰由政府开办的乌克兰语、意第绪语和白俄罗斯语学校数量很小这一事实。苏联人开进来以后不久,就开办了这类的学校,但是,正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很快发现的那样,这些学校不是为乌克兰化作出真正努力的一部分。波兰的统治被铲除、苏联政权感觉牢靠之后,重点就变成俄国民族主义。^③ 在 1939 年 9 月、10 月和 11 月,苏联的俄语出版界鼓励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的正当地位,但是也报道了俄语图书和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增加。因为实际上在这个地区没有俄国人居住,所以这些书显然是用于在非俄语居民当中增加使用宗主国的语言,也是为了便于对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实行非民族化。不仅如此,苏联报刊还一再混淆俄语和乌克兰语与白俄罗斯语,还时不时示意,这后两种语言是俄语的两种方言。在 10 月 10 日《真理报》上,利多夫抱怨说,在贵族的波兰,“别尔斯克—波德拉斯基县(在当时和在 20 世纪初,主要是波兰领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都是波兰的一部分)连一所俄语学校或者白俄

① Teresa Toranska, *Them: Stalin's Polish Puppet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209.

② Gross, 35.

③ Gerhard Simon, *Nationalismus und Nationalitätenpolitik in der Sowjetunion* (Baden-Baden: Nomos, 1986), 171-9; Hélène Carrère-d'Encausse, *Decline of an Empire* (New York: Newsweek Books, 1982), and *Confiscated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罗斯语学校都没有。”对于白俄罗斯人来说,这一怨言不无道理,但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区域,几乎没有俄国人居住。《真理报》频繁提及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之间的“兄弟血缘关系”,但是不把十足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包括进去。显然,对于涉及苏俄国家政策的那些人来说,“血缘”远远不如帝国利益重要。题为波兰人面向西方,所以被排除在所谓的斯拉夫人“兄弟血缘关系”之外。《真理报》抱怨,沙皇政府和“贵族波兰”都没有尽力把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分开。11月16日,《真理报》号召“消灭波兰贵族政策制造的民族主义矛盾”。事实上,沙皇政府和波兰政府都不鼓励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波兰也试图实行帝国主义,所以竭力阻止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分离主义,因而在自己的少数民族当中培植民族主义不是其政策的组成部分。

1939年,推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宣传还是相对缓和的,主要是因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还没有被完全压制下去,而且波兰人少数民族的权利还得到保证。苏勃京论述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重建司法制度,承认在法庭用白俄罗斯语或者俄语审讯的时候,必须在城市里寻找波兰语翻译。^①10月26日,帕甫连科在《文学报》宣布,一家俄语书店在利沃夫开张,特别供应儿童书籍。1940年8月8日,特列古勃在《真理报》上谈论“波兰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白俄罗斯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4月16日,利多夫在《真理报》上谈论“波兰占领格罗德诺”,而在1940年9月17日(苏联入侵一周年),他称格罗德诺是“一个古代俄国城市”——又一次故意混淆白俄罗斯语和俄语。1944年7月17日,在《真理报》上,托尔古诺夫在谈“解放”格罗德诺的文章里,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1940年11月28日,塔尔多夫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谈基辅的俄语话剧院。

1939年后半年,开始出现警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文化分离思想的文章。1939年12月1日,图多尔在《真理报》上谴责乌克兰独立。他批评说,乌克兰人为了达到目的,使用了“肉体的和精神的恐怖主义”,包括暗杀、工作骗局、社会抵制。他们和波兰警察勾结,迫害左翼领导人的子女,从学校

^① *Sovietskaia iustitsiia*, 7 (1940), 23. Subotin assumed that Russian and Belarusian were interchangeable.

和图书馆搬走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这些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据说是出版物“通报”(Vestnik, 注意, 是一个俄语名词), 及其为青年读者刊印的“前夜”, 还有华沙机关报“我们”, 还有其天主教分支“钟声”。有一批乌克兰作家据说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 他们是: 莫拉纽克、奥尔日奇、克拉夫斯托夫、利波夫、克连、莫先兹、格姆津、萨姆求克、科萨奇、凯德罗 (Evgen Molaniuk, O. Olzhich, B. Kravstov, Iu. Lipov, Iu. Klen, L. Mosendz, B. Gomzin, I. Samchuk, Iu. Kosach, P. Kedro)。

胡佛研究院档案馆保存了千百份幸存者的文件和见证, 指出, 报刊反波兰宣传得到了预计的效果。这些见证有些被翻译成英语。有一个这样的文件是一个姓昆吉奇的十来岁男孩写的一封信, 他被遣送到了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 被迫干有害健康的工作。信上说: “有些俄国人男孩被分配修锁和开车床, 但是他们不叫我干, 因为我是波兰人。我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泡在水里。”另外一个文件说, “苏联当局……认定, 凡是波兰的事物, 都很讨厌。”^①贝特海姆 (Bruno Bettelheim) 这样描写那个时期: “俄国……故意集中精力摧毁波兰社会现存的肌质, 用外来的一套取代。”^②

另外一场宣传运动是针对芬兰人的, 在 1939—1940 年间苏芬战争以前、期间和以后。甚至在二战以前, 作为一个选项, 苏联就很可能考虑发动一场针对芬兰的战争。像波兰一样, 芬兰领土也是和苏俄毗邻接壤, 所以是潜在的战利品。而布尔什维克对待世界革命的热情又巩固了帝国传统。应该凭借这样的语境来解释莫洛托夫的话: 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容忍一个独立的芬兰距离列宁格勒这么近。^③ 但是, 普遍的舆论对芬兰问题默不作声, 直到敌对行动爆发。接着就展开了一个谩骂运动。

1939 年 11 月 28 日, 在苏联指责芬兰政府炮击越过边界两天之后, 《真理报》发表一张漫画, 表现一条芬兰狗对着苏联狂吠, 还有已故的波兰总统

① *Sarmatian Review* 9, no. 1 (January 1989).

② Bruno Bettelheim, “Foreword,” *War through Children's Eyes*, edited by I. G. Gross and J. T. Gros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5), xiv.

③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May 1939, 8. For a Finnish perception of the Soviet-Finnish war, see Hjalmar J. Procope, *Finland Reveals Her Secret Documents: On Soviet Policy March 1940-June 1941* (New York: Funk, 1941).

莫希奇茨基和外长贝茨克从阴间观望这个场面。标题是：“战争是昏了头的芬兰好战统治者挑起的。让他们记住：他们的命运一定跟波兰悲惨的统治者的命运一样可悲。”附加的注解告诉读者，评语摘自莫斯科工人群众大会上的发言。在同一天报纸上别处，《真理报》威胁说“寻求冒险的芬兰人……将会被消灭、碾碎，像虫子一样。”《真理报》还报道，“对于罪恶的战争贩子的愤怒和痛恨”充满了利沃夫巧克力工厂工人的心，列宁格勒基洛夫肉类加工厂的工人要求“把芬兰恶棍们从地球表面扫除干净。”显然是要把苏联描写成遭受侵略的一方，而芬兰则是侵略者。

11月28日，《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二十篇反对芬兰的文章。文章标题表现了这场运动的情绪基调：“罪恶的阴谋家”、“绝对不饶恕”、“我们的回答是毁灭性的打击”、“战争贩子必须付出代价”、“扼制挑衅者”、“敌人不清醒，我们就消灭他”以及“造孽者自毙”。

11月30日，《财务报》报道，两天以前，苏联抗议芬兰针对列宁格勒的计谋，要求芬兰军队从边界撤退二十五公里。芬兰拒绝了，立即遭到舆论界的攻击。12月1日，《真理报》指责他们计划攻打列宁格勒。《文学报》上描写芬兰人的用语是“爬行动物”、“匪帮”和“战争贩子”。1939年12月1日，《文学报》说，“波兰贵族的命运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1939年11月30日，《真理报》说，“芬兰猪就是不敢把猪鼻子拱进苏联的菜园子。”但是，12月3日，《真理报》却宣布“苏联和芬兰牢不可破的友谊”：莫洛托夫和芬兰共产党人奥托·库西宁同意建立一个芬兰人民共和国。这个协议寿命不长，“白色芬兰”又遭到痛骂。1939年12月26日，《财务报》谈到“曼纳海姆匪帮的野蛮”，这些人强迫农民迁居，行动得像“对工人阶级行刑的刽子手”（曼纳海姆是一位芬兰将军和总指挥官）。1940年1月30日，《消息报》报道，在芬兰“发生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杀爱好和平的公民”。《消息报》宣称，“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捕，几百人被枪杀……曼纳海姆匪徒纵火烧毁住宅、杀死工人、令居民陷入恐怖，真是难以置信。”（这个笔调让人想起施托姆在17世纪对波兰的行为的描写。显然，两位作者都学习过同一本课本的修辞艺术）。2月23日，《真理报》宣称“普通的芬兰人肯定都记得塞满犯人的芬兰监狱、恐怖和野蛮的监狱服刑判决：面对这一切，整个芬兰都在呻吟。”就像在反对波兰的运动中那样，苏俄的报刊为了煽动对芬兰人的愤怒情绪，用语

早就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范围。芬兰人被描写成沙文主义者，痛恨一切俄国事物。^① 根据上文的记载，这其中的含义就是，苏联帝国兼并芬兰一事，正在受到严肃的考虑。

敌意行动结束以后，俄语刊物又制造出苏维埃的事业是公理这样一个概念。1940年11月，《苏联国家与法制》提出战争的法律依据：芬兰在1939年11月攻击了苏联，但是，军事冒险只带来了悲伤，他们在1940年3月12日签订了和约，把接近穆尔曼斯克铁路的和接近列宁格勒郊区的部分芬兰土地割让给苏联。^② 1940年5月21日，《共青团真理报》表扬了托伊沃·安提凯宁，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他参加过“1920年打败芬兰白匪”的战斗。他曾在“资产阶级芬兰”的“酷刑斗室”里服刑，现在准备“对选民讲述贫穷困苦的芬兰世界”。1940年5月22日，《共青团真理报》描写了一个名叫瓦连津·普尔金的人，一个苏联英雄，在1939—1940年参加了反芬兰的战役。普尔金和六个伙伴面对九个芬兰人，伙伴之一投出一个手榴弹，炸死两个芬兰人和两个俄国人。普尔金活了下来，和两个受伤的芬兰人分享食物和水。他从死去的芬兰人身上扒下衣服，给生者裹伤，但是，在芬兰人中间，他担心睡着，因为，这些芬兰人，说到底，都是普通的匪帮嘛。最后，他用伏特加酒当引子，烧起篝火，被一架苏联飞机发现，把他救起，也带走了两个受伤的芬兰人。

1940年6月3日，《消息报》揭露了芬兰人关于战争损失的统计数字。芬兰人宣布损失19576人；事实上，据《消息报》认为，他们损失了7万人，15000人死于受伤。这张报纸又说，25万人的芬兰军队，几乎有一半人受伤。芬兰政府正在编造“可笑的谎言”。《消息报》的数字有别于莫洛托夫提出的数字；莫洛托夫说有六万芬兰人死亡。^③ 6月16日，《真理报》胡诌什么，在19世纪以前，根本不存在芬兰文化，还指责芬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助长芬兰沙文主义和对一切俄罗斯事物的厌恶，这种沙文主义挑动芬兰人发动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迟至1941年9月18日（在6月22日纳粹德

① *Pravda*, 16 June 1940; and *Izvestiia*, 2 July 1940.

②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11 (November 1940), 59.

③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3 (March 1940), 11.

国开始进攻苏联三个月之后),《消息报》的一个作者还驳斥一位芬兰移民作者,这位作者说,即使是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后,苏联还毫无必要地轰炸了芬兰二十四小时。在《党的建设》上,库普里扬诺夫竭力把在芬兰的芬兰民族和被苏联兼并的芬兰领土上的居民分离开来。他把“卡列利亚—芬兰民族”和居住在芬兰的“白芬兰人”对立起来,还建议在卡列利亚—芬兰的学校里讲授芬兰语和俄语。^①

在被兼并的芬兰土地上,曾试图建立俄芬联盟,牺牲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卡列利亚居民。《党的建设》首先奉劝读者把芬兰语和俄语引进学校,把卡列利亚人忘记,但是,后来又建立了一个卡列利亚—芬兰共和国,却在不到二十年之内被俄罗斯共和国吸收。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很类似 1939 年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应用的政策相似。

剩下的波罗的海三国被强迫拉进苏联。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议会表示愿意加入苏联以前,也有一批类似的文章乞灵于和俄国的联系,出现在俄国的报刊上。^② 在 1940 年 10 月 2 日的演说里,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Mikhail Kalinin)宣称,沙皇俄国的所有的民族是被吸引到了俄国人这里的,和俄国人形成“有机的联系”。这样的宣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依然被继续作出。^③ 但是,波罗的海各国不像斯拉夫民族那样屈服于这一类的舆论宣传。取而代之的是,波罗的海各民族居民被简单地迁移,根本不说明被迁移的理由;同时有俄罗斯人迁入。但是,在德国人撤退以后,苏联在报刊上确认了波罗的海各国领土被兼并的事实。1944 年 7 月,许多文章强调指出,红军正在准备解放苏维埃立陶宛、苏维埃拉脱维亚、苏维埃爱沙尼亚。1944 年 7 月 10 日,《真理报》宣布“已经开始解放苏维埃立陶宛”。1944 年 7 月 21 日,《真理报》欢庆,“自由的黎明降临于波罗的海苏维

① V. Gudkov, “Kul'tura vozrozhdennoi strany,” *Pravda*, 16 June 1940; “Antisovetskaia belofinskaia fal'shivka,” *Izvestiia*, 18 September 1941; *Partinoe stroitel'stvo*, no. 10 (May 1940), 20-21.

② *Pravda*, 14 January 1940; and *Izvestiia*, 2 July 1940.

③ *Komsomol'skaia pravda*, 20 October 1940; P. Fedoseev, “Sotsializm i patriotizm,” *Kommunist*, no. 9 (June 1953), 13; S. Iakubovskaia, “Obrazovanie i rastsvet sotsialisticheskikh natsii v SSSR,” *Kommunist*, no. 9 (June 1953), 42-45; and *Sotsialisticheskie natsii SSSR*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55), 142.

埃诸国”。

1940年,苏联兼并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于是苏联报刊开始揭发罗马尼亚人,说他们是乌克兰人和摩尔多瓦人的压迫者,在这几个民族之间煽动敌意。硬说在比萨拉比亚,俄罗斯人一直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罗马尼亚的博雅尔(大贵族地主)变成了一个歧视性词汇,像波兰贵族^①一样。然而,摩尔多瓦人变成了一个更困难的任务,因为他们不要求独立于罗马尼亚和波兰的西乌克兰的乌克兰人不同。

1940年7月1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说,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居民说俄语,并且痛恨罗马尼亚人。1940年7月4日,《真理报》公布了一个士兵的见证:他遇到了布科维纳的一个俄罗斯人居民。这个农民说,地主逃到了罗马尼亚,留下了像他这样的人。所以,这篇文章的含义是,布科维纳的居民大都是俄罗斯人或者乌克兰人,而罗马尼亚人在这个地区是外来户。7月11日《消息报》的社论描写摩尔多瓦民族饱受“罗马尼亚博雅尔和宪兵”铁蹄的蹂躏,他们把摩尔多瓦居民看成“卑鄙的奴隶”。同日,《真理报》叹息“罗马尼亚占领者使用野蛮的治理方法”。罗马尼亚人也受到谩骂和语言侵害。1940年7月25日,《消息报》嘲笑的事实有:基希纳乌大学的神学系和农学系设立在同一个大楼里,两个系都有小教堂,神学系比农学系大。8月13日,《真理报》讨论罗马尼亚向保加利亚“归还”南多布卢查的义务。六天以后,报纸告诉读者,一位商务委员从莫斯科来到比萨拉比亚,这是经济整合即将开始的迹象。

1940年7月底,反对罗马尼亚的运动开始。此后,每隔几个星期,就有文章见报,揭发罗马尼亚博雅尔和他们对摩尔多瓦农民的剥削。纳粹入侵苏联以后,试图把领导人和人民分开,1941年8月15日《消息报》说:“罗马尼亚一伙图财害命的强盗,拱手把国家交给了希特勒。”

摩尔多瓦民族主义延续的时间很短,就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一样,因为被俄罗斯化取代。即使是在摩尔多瓦国家宣告成立的时候,报纸还是刊登文章,强调在比萨拉比亚有很多俄罗斯人居住。1940年6月29日的《消息报》文章说,“比萨拉比亚是俄罗斯的一块古老的领土,遭受到罗

^① *Izvestiia*, 29 June 1940; and *Pravda*, 1 September 1940.

马尼亚的占领……本来是俄国的一个行省……在经济上,和俄国其他部分结成一体。”文章还说,1897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这一地区76%的居民是乌克兰人、摩尔多瓦人或者俄罗斯人。这类的混乱统计的目的看来就是要排除罗马尼亚人。7月6日《消息报》宣布,乌克兰科学院组织了一系列关于被兼并地区的历史的讲座,这是另外一个提示,即:是东斯拉夫人、而不是罗马尼亚人应该要求得到这一个地区。1941年,《苏联国家与法制》发表托尔斯泰署名(P. Tolstoi)的文章,硬说罗马尼亚博雅尔们需要实施对比萨拉比亚农民的“罗马尼亚化”,就像波兰贵族想要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民实施波兰化一样。托尔斯泰在愤怒中使用了三个动词:romanizirovat'(罗马尼亚化),polonizirovat'(波兰化)和 opoliachit'(波兰化)。请注意,他创造了两个表示“波兰化”的动词,而在这篇谈论“罗马尼亚化”的文章里,只满足于一个表示“罗马尼亚化”的动词。^①

在战争结束以前,反对罗马尼亚的运动就已经完全结束。1944年9月14日,《真理报》宣布,两天以前,苏联、美国和罗马尼亚签订停战协定,罗马尼亚同意向苏联付出30万美元战争赔款。文章说,这个“痛苦的教训”应该帮助罗马尼亚人得出恰当结论,知道和苏联开战的下场。不久以后,罗马尼亚改变了参战立场,所以报纸上也就不再提及什么罗马尼亚的博雅尔了。事实上,二战后边界的重新划分是针对特兰斯瓦尼亚的匈牙利人的,对罗马尼亚有利。比萨拉比亚仍然留在苏联,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

就这样,从1939年到1941年,民族主义宣传在苏联的政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苏联的政策决策者求助于千百年的民族仇恨,因而令其绵延不断。媒介的工作偏向俄罗斯人,牺牲非俄罗斯人的利益,竭力在苏联控制下的社会里散播不和。这些政策在性质上显然是帝国主义的。事实上,二战以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每一个非俄罗斯人的民族群组,在某一点上,都被报刊的宣传贬低。在使苏联的征服活动合法化和在苏联—纳粹条约时代里被苏联控制的各个社会里编造团结景象方面,俄国民族主义看来扮演了重大的角色。虽然在国外推出了苏联社会坚如磐石的形象,但是党的领袖是

185

^①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3 (1941), 35.

使用了民族主义操纵法统合新获得的领土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得力于沙皇俄罗斯帝国的殖民方法，而这些办法他们曾经是装模作样地取缔和废除了的。

1939—1941年期间俄国宣传的精确效果是难以评估的，因为缺乏民意调查记录和自由的新闻报道。但是，有证据表明，把纳粹入侵者赶回德国的同时，入侵了东欧和中欧的说俄语的军队的行为，和关于他们穿越的国土的大规模负面宣传不无关系。苏俄舆论和文学后来对“伟大卫国战争”的歌颂确认了这些追忆，在俄罗斯帝国神话系统中赋予它以一定的地位。这样，俄语、子民、核心地区和非俄罗斯人的边远地区之间的结构性的体制关系，又一次得到确认。

在俄国统治地区行之有效的文化和政治力量有利于宗主国对边远地区的文化阐释，但是，除了给社会的上层人士，这些解释没有给别的人带来可观的好处。然而，这些解释阻碍了西方世界认识和研讨俄国，因为如果事先没有俄国人的参与和同意，就做不到。1939—1941年的成功的自我阐释被提供给了西方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并且被他们接受和吸收。

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如何编写历史

后殖民研究的基础是对启蒙主义的即使不是有意识的放弃，也是可观的修正，而俄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形成对自己含混的认识论基础的某种意识，更不用说考虑对它的修正了。在俄国的文化活动的全部各个领域里，哲学一向是最羸弱的——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认识论都没有多深入论纲的理论探索；事实上，相同的和成为学科的理论探索大体上是不存在的。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国军事部门就已经吸收了西方的技术，而且偶尔还有改进，但是，哲学的出现却基本上局限于文学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宗教著作。在苏联时期，这个空白更被扩大，这要归咎于原始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而宣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或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据说这本党史是斯大林撰写的。这些被广为阅读和讨论的著作在概念上的贫困，拖延了可以被称为俄国人的认识论

身份的发展。在西方人对于俄国人身份的各种构想中,这些问题大体上被忽略了。在西方关于俄国的探索中,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彼得宫殿、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被认为是全部人文进步作为的、具有深度的保证。

后苏联时期俄国对待历史的态度,最好就是在这种缺乏认识论理论的框架之内加以研讨。我拒绝了1991年不成功的反戈尔巴乔夫政变之后出版的多种历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包括大学用书和高中用书。初看上去,这些教科书显得给人鼓舞。语调不像在苏联时期那么强横。苏维埃词语也几乎完全消失,马克思主义语汇消退,装潢新颖而令人感兴趣。这些课本避免了苏联教科书特有的沉闷叙事。^①和苏联政治家的大话相比,这些课本显示出对于当时计划中的北约东扩的自由主义的态度。

但是,积极的因素就此告终。这些课本的最突出的特点也许就是缺少对于思想史的兴趣。这些课本没有表现出对于欧洲思想发展过程的理解,遑论世界其他地区:欧洲人是怎样观察社会、个人自由、人类对意义的寻求如何贯穿了历史,又和其他地方发展出来的观点有什么不同。这并不是说这些课本有意识地排除了欧洲中心论;这些课本是强调忠实于欧洲的。然而,这些课本的作者,简单地讲,没有意识到欧洲主要哲学家所思考过、并且受其影响的诸种认识论见解。俄国的作者们有一种极为强烈的静态的世界观,看待世界依据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原理,或者一个强人对付另外一个强人、一支军队对付另外一支军队的原理,而没有思想的中介,没有繁复的价值记载,几乎不理解现代的关键问题,亦即,个人于他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似乎没有听说过贯穿了西方和非西方历史著作的许多历史理论。这些课

^① 浏览了下列教科书:A. Romanenko:《20世纪俄国历史参考资料:中学毕业和投考大学学生使用》(St. Petersburg: Triton, 1996); C. Riabikin:《俄国当代史,1991—1997:教师、高年级学生、即将毕业生和大学生参考书》(St. Petersburg: Neva, 1997); S. G. Smirnov:《俄国史习题集》,2d rev. ed. (Moscow: 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 A. Orlov et al.:《本国史参考资料,报考大学学生用书》(Moscow: Prostor, 1994); M. I. Glavatskii:《我们所不了解的俄国:1939—1993》(Cheliabinsk: 南乌拉尔图书出版社,1995);《中学和高等学校历史文选》(Moscow, 1997). Also S. B. Chernyshev, editor:《另外一类:俄国新自我意识文选》,3 vols. (Moscow: Argus, 1995). 在《俄国返回学校》中,Albert Weeks 只读过两本1997年的教科书:《20世纪的世界》和《20世纪俄国史》(《过渡》6, no. 1, January 1999)就得出积极的结论。David Mendeloff 不同意 Weeks 在《热衷赞赏》(《过渡》6, no. 3, March 1999)。

187 本提示,在历史上,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和技术进步。唯一反复拿出的智慧思想是俄国人对祖国的忠实。这些课本都收入了赖莎·戈尔巴乔夫给韦勒斯利学院的学生提出的建议(见第5章),亦即,最高的义务是对祖国的忠诚。如果说提及了帝国主义,也是出现在苏联旧时的马克思主义乔装打扮之中,这样的打扮洗净了俄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对于俄国的殖民贪婪毫无理解,这个特点倒是随处可见。这些教科书的编写者也不熟悉解构批判,或者依据一种早期的理性主义重新构建他们的世界观的机会;这里提及的理性主义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基督教,而并非启蒙运动的理性。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契约概念,也没有得到讨论,国家之间的协定,也没有被视为契约。欧洲封建主义本身乃是一种庄园之间的契约,而这种封建主义和俄国的国有制制度之间的区别,也没有得到解释。这其中的含义是,莫斯科维的独裁和西方的绝对君权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在很高的程度上和俄国一样,不同点不过是西方国家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和施行资本主义方面也许比俄国先进。

虽然思想史得不到善待,但是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军事事务和武器的发展。俄国教科书一般都对战争的技术方面给予大量的注意。在包含有联系和试题的教科书里,学生被反复提问这方面进展的细节。在一本高中课本的问答部分,作者让学生回答下列问题:“大钟和大炮的制造有什么不同?和大钟相比,为了制造大炮需要什么附加的冶金技术?俄国人在哪里取得制造大炮和大钟所需要的金属?俄国人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火器,怎样称呼使用火器的士兵,最初的火器和现代火器有什么区别?”或者:“指出依靠大炮取得胜利的第一次战役。指出因为使用火器而取得胜利的第一次战役。”^①“俄国海军在哪里建立、为什么?”^②“17世纪70年代的俄国来复枪射手和‘外国方阵’士兵有什么区别?”这是向普通高中学生提出的问题,不少对军事学院士官生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提高对于军事在俄国国

① Smirnov, 73.

② Ibid., 94.

务中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因而强化这一角色。^①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俄国邻国历史语境下的俄国历史。而关于俄国邻国所写的有关这些地区的、可以对比的历史,则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敏感。在“俄罗斯”联邦之内,也不承认涉及民族性的问题的存在。

但是,有一个例外:我们参看过的全部的教科书都断言,俄国的历史始于基辅,而且是连续不断的。这个观点当然是一个正统的选择;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类的断言本应该得到独立的乌克兰的承认,或者提示,乌克兰也有同样的诉求。然而,可以看到,俄国人依然抓住老旧的思维模式不放,根据这一模式,俄国的版图和民族的多样性不必再进一步细究。在一本教科书里,莫斯科维在1649年对乌克兰队兼并,被描写成为乌克兰和俄国的“统一”,虽然事实上莫斯科维和乌克兰从来就没有统一过。^②

缺乏讨论乌克兰国家身份这一问题的意愿,乃是这些作者普遍缺乏改正俄国历史观之意愿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因为这一历史观忽视他者,后者将其描述为仇敌。这些作者显然更愿意龟缩在沙皇和苏联历史学家们制造的概念避风港里面,却不顾在前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出现的后殖民时期的独立国家。在这一语境下,一方面是俄国对兼并他国领土的描写,另一方面是他国对此的描写,或者曾一度是俄罗斯帝国一部分的民族的独立宣言,在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可以看到的。用语不同,很有戏剧性。在描写俄国损失的时候,用的是“夺取”(ottorgnutyi)^③,在描写俄国的收获的时候,就用“回归”(vozvrashchenie)或者“通向波罗的海”。^④一本教科书把伊万雷帝挑起的立陶宛—莫斯科维战争说成是争取“古代白俄罗斯土地回归、争取在波罗的海打开出海口”的战争。使用这样的模糊语言制造出的概念是,在一个不限定的历史时期内,波罗的海各国的领土上有斯拉夫人的部落居住,而白俄

188

① 1998年12月,俄国杜马接受了1999年的俄国预算,按当年12月中旬汇率计算,大约290亿美元。其中60亿拨给军人。军官薪俸提升百分之百,士兵提升百分之六十。这一举措的含义是,教师、医务人员、公务员没有提升,因为预算中没有关于他们的薪金的条款。Michael Gordon, "Russia Offers 1999 budget," *New York Times*, 11 December 1998.

② A. S. Orlov et al., 112.

③ Ibid., 111.

④ "Vozvrashchenie drevnikh zemel' Belorussii, za vykhod k Baltike." S. G. Smirnov, 60.

罗斯,在一个不限定的历史时期内,曾经是莫斯科维俄国的一部分。因此,普希金的用词通过芬兰的土地“让我们凿开(vyrubit')一个面向欧洲的窗口”,就变成了“在归还给我们的斯拉夫人自己的土地打开面向欧洲的一个窗口”。

对于苏联的观察,是凭据它为俄罗斯人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而定,而不管非俄罗斯人的苏联其他各民族的利益的。苏联乃是旨在解决民族隔阂的新型国家的观点,已经一去不返。后苏联时代的教科书把苏联看做是俄罗斯帝国的寿命的延续。有一位作者指出,苏联的领土符合“(前)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接着又按照第二章里讨论的苏联国歌的措辞,强调(苏联)“是大俄罗斯人民(velikorussikii narod)创造的”。^① 有一个课本是一本文集,对于“俄国”和“苏联”不加区分,断言苏联就是“苏维埃俄国”(Sovetskaia Rossiia)。^② 虽然实际用法如此,官方的观点是苏联乃是各民族的联盟。因此,这个国家的殖民主义性质得到不明智的认可。

高加索各国之间的冲突被单独地归咎于直接的参与者,却只字不提帝国的中心。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成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的仅有的祸首,虽然实际上是莫斯科把亚美尼亚人居住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交给了阿塞拜疆,造成引发冲突的根源。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领袖宣布独立一事,被哀叹为中央当局没有能够解决的“宪法危机”。没有人提及,按照国际法来说,1940年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兼并不合法的,甚至在后苏联时期对于这样的承认态度也是一直有期待的。1989年在第比利斯、1990年在巴库、1991年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军事干涉,都受到指责,归咎于苏联当局的无能,就像1991年莫斯科未遂的事变那样。^③ 自由的问题没有提出。这些源于苏联的解释没有预计到俄国学生以十分同情的态度对待拉脱维亚人或者爱沙尼亚人、或者形成对于对于人民意志所关注事项的理解。即使是为了反驳的目的,也没有一本教科书作出努力、尝试分析出那些疏离莫斯科、或者表示想要疏离的民族团体的观点。有一本教科书依然以苏联时代的方式

① “Vozvrashchenie drevnikh zemel' Belorussii, za vykhod k Baltike.” S. G. Smirnov, 6.

② Glavatskii, ed., *Rossiia, kotoruiu my ne znali*.

③ Ibid., 401-2.

谈论“俄罗斯”各民族：这是苏联的辞令发明，把读者引向这样的—个见解，亦即：只有国家才是独立国家的恰当的候选者，而国民族依然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俄罗斯联邦拥有许多民族”这句口头禅是苏联时期的一句套话，情况变化之后还强化这一观点，是不能够促进俄国宗主国和边缘地区的相互理解的。

不愿意重审苏联时期编造的历史，尤其是在涉及 20 世纪的时候，是特别明显的。关于斯大林—希特勒条约，也只涉及字面，而不是精神。这一个条约使得暴力和战争不可避免，因为可以预计，在苏联和德国之间分割主权国家会招致军事行动和反抗。但是，对于 1939 年对波罗的海国家的侵略得到的描述是这样的：“1939 年秋天，苏联和波罗的海国家签订了互助协定，为了实施这一协定，红军进入这些国家。”^①1939 年 9 月德国对波兰的侵略，被和苏联在同一个月对波兰的侵略区分开来。对于苏联侵略波兰事件的解释类似于 1939 年 9 月 17 日、亦即苏联入侵之日莫洛托夫的广播演说：“我们承担保护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居民的生命财产。”^②其他的教科书维护二战后的雅尔达协定，胡说西方把自己认为不是自己的那一部分欧洲“送给”了俄国。^③另外一本教科书把苏联—纳粹侵略描写成“把原来俄罗斯帝国的西部各省归还（俄国怀抱）”。^④1939 年 9 月 28 日的苏联—纳粹协定的核心议题是消灭波兰国家，提及这个协定是在“恢复以往波兰国家的”土地上的“和平和秩序”的上下文之中提及的。没有人承认卡廷森林的罪恶。战争的前两年被跳过，似乎苏联制造、或者扩大七个联邦共和国一事与二战期间的事件毫无关系。对战争的观察仅限于 1941 年 6 月 24 日德国进攻以后东部战线的情况。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印象：苏联独自赢得了战争，不存在什么重要的西部战线，全部重要的战役都是在俄罗斯民族的土地上进行的。

有几部用英语写作的俄国史反映出了有关二战时期的极为类似的健忘

① Romanenko, 118.

② Glavatskii, 12.

③ “Stalin v lalte poluchil rovno to, chto zapadni mir v litse ego liderov ne schital s uverenost'iu svoim.” V. Tsymburskii, “Ostrov Rossiia,” in Chernyshev, ed., *Inoe*, vol. 2, 213.

④ Romanenko, 118.

症。在这些著作里,1939—1941年几乎没有被提及。维尔纳茨基(George Vernadsky)的《俄国史》把苏联对波兰的侵略描写成“调整西部战线”。据维尔纳茨基认为,兼并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是“外交活动”的结果。维尔纳茨基是这样描写对罗马尼亚的侵略的:“向罗马尼亚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期限过后,苏联军队占领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①同样,梁赞诺夫斯基(Nicolas V. Riasanovsky)的《俄罗斯史》强调,斯大林—希特勒条约是一个“严格中立”的条约,努力保护布尔什维克,还说布尔什维克们“痛恨”纳粹,对于条约的价值“不抱幻想”。^②但是,正如本章第二节所示,苏联媒体没有表现出对于二战中盟国最终重新组合的远见。梁赞诺夫斯基说,希特勒“攻打波兰”,而红军不过是“占领了东部波兰”。同样,他还说,苏联“利用和德国的协定,通过一个最后通牒,要从罗马尼亚哪里收回有争议的(黑体是本书作者所加)比萨拉比亚地区和北布科维纳。”梁赞诺夫斯基的《俄罗斯史》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复了出现在1940年6月29日文章和后来苏俄报刊上的观点的。这些文章说,遵照罗马尼亚政府同意的苏联的一项要求,红军进入了基什尼奥夫、切尔诺夫奇和阿克曼。罗马尼亚军队逃跑,罗马尼亚的博雅尔们和资本家也逃之夭夭。报纸还说,红军到来,乌克兰人和摩尔多瓦人欢天喜地,而罗马尼亚人倒给跑了。

美国的其他的史学家同样对1939—1941年庞大的帝国冲撞轻描淡写。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沙皇和苏联的外交政策,1814—1974》(1974)中,杰拉维奇(Barbara Jelavich)只拿出一段文章谈论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秘密协定。杰拉维奇的书典型地显示出不予承认对东欧和中欧的殖民主义所扮演的角色。沃什(W. B. Wash)一部冗长的研究著作(虽然索引也很冗长),七百页的《俄国和苏联:现代史》^③只用两页谈这个条约,根本不提所牵扯到的民族问题。埃克顿(Edward Acton)的《俄国》事实上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意识,其派生的结论使这种缺失定型。^④毕灵顿(James Billington)的

①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420, 423.

② Nicholas V. 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4th ed.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84), 516-17.

③ Ann Arbor: Univ. of Michigan Press, 1968, 505-6.

④ Edward Acton, *Russia* (London: Longman, 1996), 245-7.

《圣像与斧头》在许多方面都令人钦佩,但是它没有改正这些错误。^① 夏伊勒(Wiiliam L.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②给予这个条约、和给予这个条约影响中欧和东欧各国的方式的关注,比我所知道的、无论是英文的、还是俄文的俄国史所给予的更多。看来,苏联—纳粹友好时期是被故意从俄国的历史记忆中剔除出去,而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则用一种密封粘胶把这一批事件封死。后苏联时期的俄国历史课本使得对于历史的这样的篡改永久化。

在这些课本里,帝国所渴求的邻国之所以突出,是因为这些国家不在场。波兰司令官儒尔凯夫斯基(Stefan Zolkiewski)1610年长途跋涉前往莫斯科和他与博雅尔们的谈判被删除,因为这是“波兰恶棍”的一次不成功的冒险。对波兰的三次瓜分被轻描淡写,有化为无,尔叶卡捷琳娜在其中的作用始终无人提起。一本教科书认为,在对波兰“所谓的”三次瓜分中,俄国不过是“解放了”现今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③ 在引用中央政治局的一个文件的时候,另外一本教科书说,“应该强化宣传,让每一个波兰人都知道他们的国家是何等地依赖苏联的帮助和支持”^④。这个论断被引用,不是为了说明苏联宣传的细节,而是论述波兰这个卫星国的的确是依赖俄国的,绝对不允许波兰存在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

针对俄国邻国的军事行动被矮化到了若有似无的尺度。全部教科书都没有对于莫斯科维变成俄罗斯帝国所凭借的历史事件的概述。靠殖民地发财致富的系统政策,在英国的历史著作中得到自由的论述,而俄国的这样的政策,却从来没有在俄国的教科书里得到讨论。显然,这些教科书设想,没有必要唤醒俄国学生对于俄国国土扩张的方法和目的的意识。

191

有几部教科书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的俄国外交政策,但是一直是片段的,似乎是要避免学生对宏观的局面进行批判性的评估。叶利钦总统语焉不详的关于可能把千岛群岛归还给日本的谈话,被评价为一个错误,而俄国社会对这一谈话的消极反应则是理所当然的。民意调查的结果没有公

①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6.

② Ibid., 1960, pp. 513-44.

③ V. Makhnach, “Imperii v mirovoi istorii,” Chernyshev, ed., *Inoe*, vol. 2, 123.

④ Minutes of Politburo meeting, 23 April 1981, in Glavatskii, ed., 252.

布。俄国政府讨论千岛群岛问题一事被说成是“屈服于外国压力”。^① 意味深长的是,俄国伊塔尔—塔斯社和日本朝日新闻共同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大部分(55%)的俄国人反对在千岛群岛问题上对日本作出任何妥协,而在日本,反对者的百分比降低,接近这个数字^②。

描述1994—1996年的车臣战争的语言是法治国家(俄国)和威胁公众安全的匪帮的战争。有一篇文章说,俄国不过是在回应车臣罪犯们的挑衅。^③ 车臣争取独立的尝试被说成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爆发”。^④ 车臣黑手党受到模糊的指责,杜达耶夫(Dzhokhar Dudaev)被说成“使战斗员对非车臣人的财产的盗窃合法化”,并且批准“对俄国人居民的屠杀”。

这些课本表示关注要为“俄罗斯人”居民提供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制造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乃是国家的事务,这一点被认为理所当然。有一本教科书说,“没有意识形态,一个社会就不能存在……1996年,叶利钦总统谈到,有必要明确规定出一套能够把俄罗斯联邦全体居民团结起来的全俄的意识形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下令组建一个特殊的委员会……文化既是这样的民族思想的领导的力量,也是核心,而国家对它的支持是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的。”^⑤

接踵而来的国家控制的电视频道的建立,则是达到这些目的的行动。按照叶利钦的指令,1997年创建了以莫斯科为根据地的全国性的频道“文化”。维特莫尔(Brian Whitmore)说:“叶利钦(关于创建这样一个频道)的指令,看来就是操纵手段整体的一部分,克里姆林宫正在试图重新确立对于俄国全国国家电视台的控制。”^⑥ 看来,这样一个频道是和美国公共电视频道对应的。但是,更密切的观察,就现出重大的区别,至少在开始的阶段。首先,叶利钦本人指定什维德科伊(Mikhail Shvidkoi)为主任。^⑦ 第二,这个

① Riabikin, 204.

② Agence France-Presse (Moscow), 31 October 1998.

③ Riabikin, 142.

④ Ibid., 141.

⑤ Ibid., 247.

⑥ Brian Whitmore, “Russia: Yeltsin Launches New TV Channel To Control Information,”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29 August 1997.

⑦ Agence France-Presse, 28 August 1997.

频道有国家直接资助,从而排除了竞争者们的影响。叶利钦总统说过,他要求这个新频道“扩大学校教学科目的规模,向青年人解释如何取得成功,给老年人放出歌曲,放映他们青年时期的电影。”(黑体是本书作者所加)

一项相关的进展是后苏联时代的俄国国家努力向各邻国的俄罗斯人居民施展某种思想影响。1997年,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说,莫斯科市政府计划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俄语学校和乌克兰的塞瓦斯托波尔市赠送教科书。^① 在一本由叶罗非耶夫编辑的、标题为《俄罗斯的恶之花》的书中,有几位现代作者断定,以往的俄罗斯帝国乃是全部俄国人的遗产,全部失地都应该夺取回来。^② 这样的教科书和政策在俄国人的心里强化了受损伤的感觉,损伤必须纠正。这里评论的教科书不像利莫诺夫一向表现出那样的好战,但是这些书籍对于得到接受的全部苏联时代思想也不质疑,或者也不缓和俄国殖民欲望的现代表达。

这样,必然得出的结论就是,20世纪90年代为中小学和大学使用出版和经过国家审定的俄国历史课本(这里所评论过的全部得到审核)中的至少几部所培育出的观点和给予的解释,都有可能变成俄国和邻国和平共处的障碍,也同样成为取得俄罗斯联邦内部稳定的障碍。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不甘心“内在帝国”的丧失。俄国的邻居是:乌克兰人、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人、中亚人、格鲁吉亚人、车臣人、等等;对于这些人,教科书的作者们看来是不能够给予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历史和宣告自己各自的身份的权利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国对千岛群岛的夺取,依然被看做是合法的。还有人盼望乌克兰和俄国统一。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被视为既成事实,虽然在这些教科书写作的时候,这样的结果最多不过是许多选择之一。波罗的海国家或者甚至独联体的成员也要求加入北约这样的一个见解,被说成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和政府的声明

① Agence France-Presse, 14 October 1997.

② Viktor Erofeev, ed., *Russkie tsvety zla* (Moscow: Izdate'stvo Dom Podkova 出版社, 1997)。文章作者有: Varlam Shalamov, Andrei Siniavskii, Viktor Astafev, Iurii Mamleev, Venedikt Erofeev, Eduard Limonov, Viacheslav P'etsukh, Valerii Popov, Sasha Sokolov, Evgenii Kharitonov, Tatiana Tolstaia, Anatolii Gavrilov, Vladimir Sorokin, Dmitrii Prigov, Lev Rubinshtein, Iuliia Kisina, Igor' Arkevich, and Viktor Pelevin.

形成对照的是,在教科书里没有那种惊骇的语调。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承认,北大西洋公约是一个防备俄国的手段,它不会计划入侵俄国。对于俄国来说,所提及的唯一的真实的负面影响是丧失了中欧这个武器出口市场。

在巴塔涅利社会科学研究所 1997 年 8 月 11—14 日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中,有六千名俄国人参加,其中只有 16% 的人说他们曾支持叶利钦和 1991 年末遂政变中俄国议会的保卫者,而 21% 的人说他们同情政变参加者。^① 1991 年,经济改革的困难还没有显现,却只有一万名莫斯科人——亦即莫斯科居民的百分之一的十分之一,参加一次集会支持叶利钦;叶利钦爬上一辆坦克,发表了一篇煽动群众的演说。从全部迹象上看,苏联的解体依然被看做是俄国的失败。1997 年 10 月,沃罗涅日区杜马建议教师不用萨拉托夫大学的教授克列杰尔(Aleksandr Kreder)编写、索罗斯(George Soros)文化启动基金会资助出版的一本欧洲历史教科书。代表们谴责这本书藐视和歪曲俄国历史。^② 过去作出的解释很可能还要保留很长时间,虽然在俄国存在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准备重审俄罗斯帝国的历史。^③ 在 21 世纪到来之时,后苏联时代的论著继续表现得十分缺乏对他者的形象塑造的敏感心理。他者或者狡猾、是俄国敌人,或者根本不存在,在历史舞台上根本不发挥作用。

① 给接受调查者的问题是:“六年以前,1991 年 8 月,国家紧急事变委员会发动未遂政变。如果事件发生在今天,你站在哪一方?” Agence France-Presse, 21 August 1997。

② *Kommersant*, 31 October 1998。

③ Andrei Grachëv, “Gorit Vostok zareiu novoi,” *Moskovskie novosti*, 3-10 August 1997。

第七章 解构帝国: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后殖民时代理论的依据是这样一条假定:除了其他的功能,文本还是帝国权威的载体。具有想象力的文学支持帝国的权威,其方法是使用象征系统和他者的解释,以此来放大中心,给它带来美誉。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帝国文学中包罗了征服者英雄、成功的执行官和在公共空间能够发挥领袖作用的土地所有者,还包罗具有文化和政治潜力的其他的叙事。这些做法为殖民主义者清理了他们所占据的文化地面。普希金呼唤俄国文明出现在高加索,索尔仁尼琴凸显了在原来毫无色彩的塔什干开办的一所俄国医院,拉斯普京重申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存在,托尔斯泰创造了和俄国式的驯顺相一致的罗斯托夫一家人的迷人的驯顺。在某种更有政治色彩的方式上,苏俄的学者和作家们都抓紧机会赞颂在过去几百年和现在的俄国取得的成就,从而进一步地淹没不和谐的感受和形象。 199

为了摧毁这种权威和揭露它在认识论上的缺陷,对立的声言就不得不开展一种不同的讨论,对抗为帝国歌功颂德的吹鼓手,允许受压抑的个人、空间、传统、事件和形象浮出水面。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作家表达的见解根本不同于浸透迄今讨论的文本里那种肯定帝国万物的态度。这些作家似乎认识到,俄国国家的帝国身份正在经历一种变形。俄国女作家当中,有几位站在从言辞上揭穿帝国空间的前列。她们用现时的褴褛取代往日的辉煌,用俄国遭受失败的画面颠覆帝国形象的辉煌。像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和托尔斯泰娅(Liudmila Petrushevskaia and Tatiana Tolstaia)这样的作家,通过揭示妇女与国家、妇女与帝国之间缺乏联系的状况,引导俄国的读者走进新的环境。而政论作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Valeriia Novodvorskaia)则更加直言不讳:她呼吁俄国人放弃帝国的规划,允许弱小民族升起自己的旗帜,书写自 200

己的历史,自己犯错误自己改正,总之,放弃殖民主义。

女权主义的发现之一是,妇女是本质的他者。在某些方面,妇女依然是一个局外人,甚至在帝国权力的条件下。除了少数例外,妇女都被排除在帝国运行的许多资格称谓之外。^① 保卫和代表帝国的工作是男人的特权,与此同时还有就是随特权而来的大部分职能权力。男人拥有了帝国规则的优先权和福利,而妇女必须承担为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个人或者家庭的优先权付出劳动。特别是在俄国,妇女承担劳动,但是没有发言权,虽然苏联的制度宣称表面上存在着男女平等,和沙皇俄国时代上层妇女一样享有合法的继承权。数字可以作证:和西欧比较,在沙皇时代和苏联时代,政界和艺术界的杰出妇女很少。同时,帝国是拼凑在一起的,这耗尽了男人的精力,而这些精力本来是可以用于家庭生活和协助妇女养育子女和管理家务的。这一情况造成了异化的条件。

在建造帝国的叙事中,例如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叙事,妇女都被局限在叙事意识的模糊的边缘。她们都是装点门面的摆设,或者让男人的生活辛劳减少一些的工具。贝拉淡化出局,让皮巧林和马克辛·马克辛梅奇继续完成征服高加索和观察本地“野蛮人”的任务。塔吉娅娜变成一位在帝国侵略战争中功绩卓著的将军的战利品妻子。作为马克辛·马克辛梅奇梦境中对象的原型的俄国妇女,是没有权力参与公众生活的。甚至《战争与和平》中的妇女,虽然与众不同、很有力量,但是依然是拿破仑战争和男人进行改革尝试的沉默的旁观者。俄国帝国主义的浩大的计划在她们周围展开,却不触及她们。在俄国文学中尽管存在着关于女强人(通常用来对抗所谓的多余人)的叙事,而在关乎帝国的事务中,妇女却一向是柔弱的、只为男人权力欲望效劳。

当然,在某些方面,俄国妇女是帝国计划的受益者。帝国的边界远离俄罗斯人居住的土地,为贤妻良母们施展她们料理家务当好贤内助的本能。这样的好处不应该受到指责:俄国妇女能够轻易得到的家庭安全乃是一种重大的价值,这种安全感强化了俄国的家庭,和英国人家庭的感受相似,但

^① P. Barr, *The Memsahibs: The Women of Victorian India*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76).

是车臣、乌兹别克、或者乌克兰的家庭却不可能享有。帝国制造的“权力空间”不能低估;俄国的一切事务都得益于俄国的权力,而公共生活中的少数妇女属于受益者。吉皮乌斯(Zinaida Gippius)在俄国国外受到的欢迎,是帝国造成的,这是指她的外国的仰慕者和传记作者把她看待成了一个权力锻造的大企业的一部分;如果她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或者阿尔巴尼亚人的话,则仰慕者的人数必定直线减缩。俄国为数不多的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样,都是在培育帝国伟大恢宏的模式之中活动的。^①

但是,绝大部分的妇女没有这样的活动。就苏俄而言,这一点更为真切,因为在那里的妇女很快发现,大肆宣称的自由却化作了家务和上班这双重的任务。苏联妇女的命运在莫斯科街道上的那支小队的工作中简洁表述出来:在一个男人视察员的敏锐目光下,几个妇女用铁锹铲雪。苏联司法机构中的妇女一直占有的不过是个位数的百分比。福尔采娃(Ekaterina Furtseva)是唯一进入成员为十四名的政治局的妇女。在斯大林时代及以后,公民有资格得到的住房生活空间使用面积是人均6平方米;就像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剧本《音乐课》所说的,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有幸有资格得到。成百万的俄国男人在军队中立业,军队给予他们住在军队宿舍、甚至出国旅行的机会,而妇女则大多被圈在城镇的生活空间里。妇女执行官、医生、外交家和党的工作者的玻璃天花板是真实存在、一成不变的,而苏联的统计资料反应出了苏联社会中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性别歧视。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所要表述的正是在一个十分成功的帝国中的一个妇女命运的鲜明的类似情况。她的短篇小说和剧本和男性作家们展现的俄国城乡的广阔场景截然不同。她也不同于像阿赫马托娃(Anna Akhmatova)这样的作家;阿赫马托娃的抒情诗歌颂亲密的关系,但是她的政治诗歌实际上性别是中性的。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女性的人物对于帝国强权地理、或者这样的地理提供的种种情况一无所知。政治在她们的常识之外。和科斯托格洛托夫不同,她们看不到“广阔的家乡”——欢迎每一个有教养的俄国人、给他们提供应该完成的许多的工作和任务的“家乡”。在世界上这个最

^① Catriona Kelly, *A History of Russian Women's Writing, 1820-199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庞大的国家里,男人的空间可能是无限的,但是妇女永远遭受缺少互动空间的苦恼。像科斯托格洛托夫一样,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笔下的妇女都是十分聪明的,但是,他们被家务、被贫穷、被谋求发展连遭失败带来的摧残性的疲惫压倒。她们没有及于雷巴科夫的和索尔仁尼琴的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能量,而且,她们发挥主动精神和抓住机会的能力,甚至不如拉斯普京的农村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男性人物。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文本实际上没有男性俄国作家特有的那种帝国肌质。批评家们注意到,她的作品中浸透了一种厄运来临之感。^①她笔下的女人被限制在苏式宿舍楼里:公用厨房、洗澡间、走廊和门庭。她们的生活连一点帝国的意味都没有:她们最大的美梦就是拥有自己的一间房屋,这个美梦和她们的男人们所征服的土地的辽阔广大形成痛苦的对照。她们一再陷入毫无出路的困境。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让人相信,她关于妇女的这些故事都是片段的,没有开端与结尾,就像雷巴科夫的《阿巴特大街的孩子们》里的萨沙·潘克拉托夫的情人琪达的生活一样。她们不会遇到什么重大的事,谁也不知道她们来自何方,又在何方消失。她们的见识狭窄,她们生活在狭窄的世界里。她们的生活正在崩溃。她们关注的唯一的斗争是,家庭成员为了一点点额外的空间而你争我夺,无论那是物理的空间,还是心理的空间。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妇女人物一般都是二十多岁或者三十多岁,已婚或者未婚,没有小孩,或者,更多的情况是孩子的母亲,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一般都只有一个孩子。有时候她们感到过度绝望和过度贫穷,养不起孩子:在《音乐课》里,怀孕的纳佳想要自杀,生了一个残疾婴儿(“没有脑袋”)。当然,没有人注意这一切。丈夫或者男朋友,是一个远在天边的人物。他或者是抛弃了家庭,对自己的义务三心二意,或者在别的地方又有了一个“真正的”家庭,就像《三个穿蓝色服装的少女》里边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那样。一个女人,即使有母亲或者岳母、兄弟姐妹或者朋友在身旁,也

^① Helena Goscilo, “Paradigm Lost?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 in *Women Writers in Russian Literature*, edited by Toby W. Clyman and Diana Greene (Westport, CT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4), 220.

还是孤独的。苏联制度下的妇女的孤独，是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反复地、内行地写作的一个主题。《半熟的羊腿，或者朋友的会见》中的娜塔莎，《三个穿蓝色服装的少女》中的伊拉，都生活在难以忍受的孤独之中。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笔下的妇女都忍受贫穷、抛弃和能够把人摧毁的狭小空间，在这里她们不能伸展四肢，夜里不能躺下，如果出了事，也无处躲藏。她们常常是名副其实地无处夜宿。母亲的公寓住房拥挤不堪，还得十分优先对待家里的男人，不管是丈夫还是儿子。她们的男朋友不提供居住的地方；他们只关心在性生活方面占有妇女，但是无意决心开始共同的生活。

缺少成长和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这一令人窒息的情况得到了反复的表现，从而揭穿了俄国文化所珍惜的纪念碑风格的神话。点缀着俄国城乡的俄国战争英雄纪念碑通常都是由比真人大的形体组成，挺胸抬头，都是近期的武士和永恒的胜利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都要给他们让路，就像果戈理《死魂灵》最后一章描写的那个耳熟能详的场景一样。俄国和苏联的建筑都讲究纪念碑风格。彼得大帝用金箔把冬宫包装起来，显示帝国精神，而斯大林则热衷建造最大、“最不得了的”建筑物、剧院和水坝。

在苏联时期，穿越圣彼得堡或者莫斯科的一条街道或者广场，都像是徒步旅行。俄国这两个京城的街道，一点也不像欧洲其他城市的便利的十字路口及其市区居住的舒适。在西方的这些无论大小的城市里，很少有地方的交通灯会指示行人冒险穿过街道走到另外一侧，很少有广场妨碍快速穿过。市中心的土地十分昂贵，不便在政府各部和其他的大楼前面开辟足以组织检阅的规模的广场。欧洲人的空间意识本身带有对于中世纪城市广场的回忆，这个广场必须保证从所有的方向都容易到达。而圣彼得堡或者莫斯科是没有这类空间回忆萦绕脑际的。彼得堡是在中世纪建城格式不复使用以后很久的时期建造的，而克里姆林宫作为意大利人构建的一个军事要塞的起源，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设计里是过于显眼的。在圣彼得堡，冬宫的一侧面的一个巨大的广场，很适合举行军事检阅——也确实举行过一次。还有另外一个军事检阅广场——马尔索沃广场就在附近，不必多虑。如果有人沿着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走向聂瓦河，从冬宫附近出发，她就必须大胆穿过几个危险的十字路口，才能够到达那座桥梁。然后，在走完大约 1.5 公里的中看不中用的路以后，还得再走十五分钟，才能到达普希金之家档案馆，

而这个景点可能被描述为“过了聂瓦河就到”。莫斯科城市建筑大师们清除了许多街道十字路口,请行人使用隧道。在苏联时代,莫斯科的街道都努力拥有比美国高速公路更多的车道。这些街道对行人很不利,而且有碍与社区集体感。莫斯科的中心区还有很多大景点,让不幸的旅游者感到不亲切,丧失了亲近感的市民精神。过往的使用方式是这种崇尚宏大规模的原因;在苏联时代,目的则显然是给到访者留下难忘的印象,而不顾如下的代价:不仅给行人带来不便,而且也给在这一区域工作、却想要到街道对面小吃店进午餐的带来不便(倒也不是说小吃店想要有就有的)。就社区精神和家庭生活来说,美国的城市介于俄国和欧洲的城市景观之间,但是美国城市取代相对来说不太舒适的市中心的是近郊区,在这里,自成一体的单个家庭房屋离开了有树木隔离开的道路,因而让人忘记布满高楼大厦的市中心。而俄国人对郊区概念的回答则是一排一排的巨大公寓建筑。

纪念碑风格的对等平行物或者一种刺激物,就是俄国的地理上的广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及了西伯利亚,使人设想到巨大的机遇。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提出也许会把他送到亚库特地区的金矿去的建议,而这一建议的想象因素又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小说补加了某种神秘而闻所未闻的空间,让呼吸困难的人退却其中,找到某种新的生活。对于《罪与罚》里的拉斯科利尼科夫来说,这种潜在的新的开端,变成了在西伯利亚的现实。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歌唱“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shiroka strana moia rodnaia)。辽阔广大是一种商品,俄国人已经把它内化,如果是一个俄国人,就可以凭空占有。就像在下面要讨论的一篇文章中诺沃德沃尔斯卡娅所说的那样,俄国人永远有“大量的地理资源”。^① 1998年7月28日,俄国前中小商务部部长伊丽娜·哈哈马达(Irina Khakhmada)给沃尔库塔罢工矿工出主意,可以在俄国北方更大的森林里采摘浆果、蘑菇和其他能吃的东西,补充食物的供应。^② 在后苏联时期,这虽然是一个十分低下的经济建议,但是,作为关于控制全球大约六分之一陆地面积的好处的声明,却是很

204

^① Valeriia Novodvorskaia, “Throw Everything Overboard That Smells of Blood,” *Novoe vremia*, September 1996. Translated by Steven Clancy, *Sarmatian Review*, 17, no. 3 (September 1997), 480. Subsequent quotations are taken from this translation.

^② *Russia Today*, 28 July 1998.

高明的。这个建议信心十足地提醒贫穷的工人们，即使贫穷到了极点，他们也还可以依靠土地活命，不仅在森林里采集，而且还可以开垦小片地，这是城市居民或者集体农庄农民可以得到的，全部免费。在“俄罗斯”联邦，人均森林英亩数目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1998年7月30日，路透社报道说，“俄国可以靠别墅活命，所谓别墅，就是在乡下的简易房屋，几个月没发工资的工人在那里度过周末，种土豆，渡过难关，等公司发给拖欠的工资，等经济在五六年危机之后好转起来。”这样面对经济危机的方法虽然不能向前推动俄国的工业机器，却能够防止饥荒和社会的彻底崩溃。

俄国土地辽阔，给该国稀疏的人口带来许多便利。俄国的男性艺术家一般都利用国土广大造成的艺术方面的机会。建筑的纪念碑风格在文学里得到回应，见于浪漫主义短篇小说和象征主义诗歌与长篇小说，例如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布洛克的《锡西厄人》、或者别雷的《圣彼得堡》。在这些作家构想的宏伟大厦之中，能够上演大戏——也的确上演了。

因此，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作品中，帝国空间收缩的速度是很可观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女主角生活所在的狭小公寓单元，和早期俄国的主角们宏伟的室外和室内的活动形成鲜明对照。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和剧本里没有纪念碑，没有俄国男作家们习惯用以突出俄国民族特性的神圣领土，没有什么用以令读者记取俄国历史荣耀的东西。俄国人的想象力在传统上是为“辽阔广大的罗斯”而欢欣的，例如古米廖夫的诗作《农夫》；从普希金到索尔仁尼琴，俄国人都对他们国土的广大深感自豪，正像别的国家为自己的工业产品自豪一样。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那里，这种豪气荡然无存。在她的世界里看不到“辽阔广大的罗斯”。她的女主角们都被永远地圈在从二房东那里租来的狭小房间之中。她们的想象力已经停止发挥作用，不能把广大的国土为我所用。“天涯海角”，远东、西伯利亚或者堪察加，给女主角们带来的是个人的灾难，例如《地网与陷阱》，而让人更想得到的波罗的海附近的外域空间，在实现其许诺方面很是吝啬。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传达的信息就是，俄国妇女从俄国男人们为帝国完成的丰功伟绩中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收益。

俄国的帝国传统包括检阅、旗帜，和莫斯科乃是炽烈之爱之焦点的神话，俄国人一直被灌输对祖国要怀有这样的爱。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作

品里,这一象征主义被猥琐和滑稽抵消。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种种话语意义进行了重塑。妇女不再像契诃夫剧本里的女主角那样向往莫斯科;她们许多人就居住在那里,她们受到教育,找到工作,而这是契诃夫笔下的妇女的梦想。但是,她们的生活甚至比契诃夫的三姐妹的生活更加灰暗。她们早已放弃了美丽的希望。她们从来就不参加公众活动。苏联的宣传想要把每一个个人变成一个政治造物——这种宣传的全面的失败被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女主角们解释得淋漓尽致。有关帝国首都的神话她们根本不予理睬;在她的作品中找不到什么莫斯科生活的魅力。首都干脆就是一个居住的地方,一个人人都必须挣饭吃的地方,而且每个人的亲友熟人的生活状况也是大同小异的。还有,莫斯科的梦境没有被其他什么地方的梦境取代: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笔下的妇女没有到国外去旅行的念头,也不幻想搬迁到生活可能轻松一点、容易一点的其他城市去。这样的梦境简直就是超出她们的“梦想范围”的。如果说到了什么远处的地方,也是缺乏细节的;面目不清,有点像月亮上的景色,容不得人类的生活;或者就是地图上的小圆点,有人从那儿来,或者什么人去的地方,一点好处也没得到,像《半熟的羊腿》里面的那个奥而加,带着幼小的女儿维鲁尼亚到了北极圈附近的沃尔库塔。俄国作家们以往常常用来在帝国地图遥远地点发挥的富于想象力的控制,现在已经一去不返。再也没有什么浩大的希望陪伴对于这些地方的记忆。与这些地方相联系的回忆是阴暗的主题,带来一系列的悲惨与灾难。在这些遥远的地方根本实现不了许诺,到那里去的人们都是空手而归,就像奥而加那样。在《音乐课》里,一个叫伊万的,喝得酩酊大醉,在绝望中呼叫,要“入伍北伐”。在《地网与陷阱》里,女主角的父母亲没办法帮助他,因为她们住在远东。在《潘尼娅枯竭的心灵》里,潘尼娅在打胎之后到北方去,象征着劳动者潘尼娅的命运里没有希望。沙皇和苏联政府,都牺牲俄罗斯人本土的利益,花费巨大力气把俄罗斯人移民到亚洲去,这样的措施造成家庭的分裂和相互接济纽带的中断——这类情节常常出现在这样的故事里。

帝国景象的优点之一是可以提供巨大尺度。帝国的眼睛看得比高加索、中亚、或者还有同类的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小公国的居民的眼睛看得远。所以,世界的历史一般都是由其家园就是帝国的个人写出来的。虽然俄罗斯帝国没有产生法兰西、英吉利、西班牙、或者德意志帝国的那样的深

远的眼光，但是它的受过教育的居民却有机会把握世界政治和经济的脉搏。在《战争与和平》、甚至在《癌症楼》里，俄国人都参与历史。所以，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世界里的眼界的狭小就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在这里对于什么帝国的优越，是一无所知的。她笔下的俄国一丁点的帝国的样子也没有，虽然她写作的时候这个帝国还没有进入明显的衰落。不仅眼界狭小，而且对于特权和远景也是毫无意识的。

在《战争与和平》的一个场景里，罗斯托夫的孩子和他们的伙伴奔跑着进了客厅，又笑又嚷。而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和剧本里，孩子们不跑，更不用说笑了，但愿仅仅是因为公寓楼小单元没有提供必要的空间。在《时间正值午夜》里，小男孩吉马摸进了别人家的房间，触及的物件引起他的兴趣。他自己的房间他已经很熟悉，到了单调的程度。他因为这样好奇而挨骂，得到的命令是安安静静地坐着。在《三个穿蓝色服装的少女》里，别墅的相对宽敞的空间刺激起孩子们打架的欲望，而不是一起探索周围的环境。

206

就这样，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地理意识是有别于俄国男性的作家们的。它包括俄国本部的一小部分：一个城市、一个小镇、其中的几条街道，也许还有一个杂货店，还有每天都要花费很多钟点反复奔走途径的路线——然后返回自己的小单元——紧紧地贴近他人单元的那个单元。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奢侈物件：小汽车、皮大衣、大饭店、剧院都是超出这些在其他方面还称得上是中产阶级女主角的经验范围的（另外一种杜撰遭到解构：苏联人民都是剧院常客和古典文学的贪婪读者）。坐一次出租汽车就是一个值得牢记和值得纪念的大事，例如《半熟的羊腿》里的描写。和一个拥有一辆小汽车的男人出游一次，就是一番足以改变生活的经历，例如《三个穿蓝色服装的少女》里的描写。就连地下铁道，莫斯科全体居民都能够承担得起的奢侈享受，所起的作用也是可以忽略的；乘地铁游览，游客们喜好的这一个项目，也没有引发这位作家笔下的妇女的热情。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对小说艺术空间的标记是和俄国文学的习惯与预期相反的。她的女主角之中虽然有几个拥有可以居住的别墅，但是大部分没有，或者至少我们没听说他们有。我们听说的是防雨防寒的窄小的棚子，从来没有一间备用的房间，更不用说第二个卫生间了，居民在沙发上、沙发床

上、地板上、或者在厨房里的折叠床上睡觉，例如《生活中的诗歌》里的怀孕的米洛契卡。这样的拥挤境地，却不妨碍再多安排一两个人住下：在《音乐课》里，一套两室的住宅里住着一对夫妇、他们的儿子、还有岳母，这个情况让儿子的女朋友看着很羡慕，把这样的奢侈居住条件看成是决定结婚的唯一的诱因。某种收藏，例如一套茶具，是被禁止的享乐；根本没有玩这样的奢侈品的空间，在《这样一个女孩，世界的良知》中，叙事者把一块捷克水晶保存在厨房里。普通俄国人，即使经济条件允许购买，但是他们的居住面积没有放置第二套盘子的空间。这样的形象积累起来，就拆散了对于苏联的纪念碑和沙皇宫殿、红场和亚历山大广场、无数田野和森林的记忆；从俄国妇女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都是华而不实的、虚假的装饰。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世界的窄小表明，在她的短篇小说里事实上没有广大人群的场面存在。存在的是各种人际关系，大多数是个人之间的、破裂的关系。这一点打破了苏联作家对描写政治大事件、“人民的大成就”等等、等等的偏爱。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作品里，没有战斗英雄，也没有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令人感觉到，好像她在有意地竭力把自己的写作强加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的写作之上，也强加在不同政见者作家的写作之上，同时她又不顾任何类型、规范和习惯的社会期待。在她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对于俄国政治领导阶级的宏伟计划的藐视。她的每一篇故事都是又一次承认帝国的失败。她在显示，俄国妇女活着，就好像是某一个模模糊糊公国的子民，那个公国被一个没有人性的暴君统治，而这个暴君的名字是不能说出来的，那样做实在太危险。她们无奈，只好认命成长的恶性循环：找个丈夫（或者不找）、要一个孩子、挣扎着干好工作和家务、送孩子日托、摆脱或者容忍一个凶狠而又没用丈夫、同居的丈夫、或者亲戚、然后在最终的困苦和屈辱中死去，就像《时间正值午夜》里的安娜·安德里安诺夫娜那样。

在剧本《隔离病房》中，两个妇女在医院晚期病房里谈话。她们都因患癌症而面临死亡。她们互相不认识，但是共同的孤独感迫使他们互相倾诉一生的遭遇。其中一位述说，她未婚的女儿刚刚埋葬了一个未婚生的女儿，就到波罗的海各个共和国去寻求丈夫，白跑一趟；她的贫穷寒酸也陪伴了她，妨碍她吸引一个男人。但是，她买了些在莫斯科买不到的东西。读者可以注意到，虽然波罗的海各国都是由俄国人统治，但是这些国家没用给普通

的俄国妇女带来什么大好处。另外一位妇女有一个十四岁的儿子——万尼亚，但是没有其他近亲。岁数大一点的妇女建议她给自己的雇主写一封信，要求收万尼亚当学徒。原来，万尼亚的母亲是被自己的父母抛弃的。接着，万尼亚的母亲回忆起一个住在一间屋子里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在那间屋子里目击了两次死亡：一个五十岁的母亲，和她二十一岁的儿子。万尼亚的母亲表达了对未成年儿子的忧虑，因为他很快要变成孤儿了，于是年长的妇女提醒她：“可是你我是怎么长大的呢？”这个感叹闪现出贫穷的延续，和父母比较，孩子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善。苏联上层竭力推出被开垦的荒地的宏伟景色，但是，实际上，苏联妇女是在破裂的家庭里长大的，在这样的家庭里，在国家分配给他们的窄小的使用面积上，一家人看着彼此忍受痛苦和死亡。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空间的特性没有留下疑问。这不是殖民地的空间，像她同时代人雷巴科夫、拉斯普京、和索尔仁尼琴的叙事那样。也不是对沙皇帝国的令人怀念向往的空间，像在皮库利(Valentin Pikul)的《邪恶势力》(1989)这样的历史小说里那样。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空间更像贝克特(Samuel Beckett)剧本里的封闭空间；这些空间没用出口。她的女主角生活在悲哀和孤独之中，俄国的伟大没有带给她们什么好处。她们缺乏空间，和第一世界拥挤的城市居民缺乏空间的情况不一样：她们没有地方睡觉、做爱、或者进行私密的谈话。在《生活的诗意》里，女主角几夜反抗丈夫的强攻之后失去贞洁，而她的婆婆就在这个窄小的房间里一二尺远的地方睡觉呢。在连连几夜听见屋里有动静、但是早上不能发现血迹之后，这个婆婆断定，儿媳妇不是处女；在这少女终于屈服而有血迹出现的时候，这个婆婆却说这是这个女孩的月经。这个故事和契诃夫的故事呼应，也就是说，二者都表现了年轻少妇的温和(真是很像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的乡下的女主角)和掐死这种感情在幼芽状态之中的那种野蛮和残暴。这也是一个提示，帝国的伟大没有能够保护俄国妇女免于就连附属地区的二等公民也经常可能豁免的屈辱。在《凄惨的遭遇》中，一个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女人，和母亲一起在一个小套间里生活。她从来没用过男朋友，因为从来没用一个自己的地方可以和一个男人独处哪怕很短的时间。他羡慕结婚的妇女和有情人的妇女，无论那情人多么丑陋、多么会利用别人。她要实现自己的出路，急欲找一个男人单独约会，便作出安排，让他母亲在外面过夜，自己请来

一个上了年纪的、已婚的男人。这个男人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愿意满足她不言自明的欲望。为了强调这个吉庆的约会，她买了一个蛋糕和一瓶酒。这个男人狼吞虎咽地吃，接着就脱光衣裳，做了应邀来做的事，又逗留一会儿，就走了，都迈开了步子还不忘又抓走一块蛋糕。

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的女性进入成年和老年，带有严重的心理混乱。在《通行证》里，一个叫丽玛的女人为找工作，得到一个姓塔拉索夫的人的面试。她没有得到这个工作，但是却被塔拉索夫迷住，并且偷偷地接近他。进入政府机关，必须得有特别的通行证，丽玛没用，可是塔拉索夫周围的人却看穿了她的意图，故意不给她，于是她开始打电话纠缠他。她要求通行证，还说塔拉索夫骚扰她。她对塔拉索夫的迷恋是一种单相思的爱情，是一种对于人际交往的需要的绝望的表现；她放弃了工作，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追逐塔拉索夫，结果弄得穷困不堪。最后，她完全被幻觉笼罩，在地铁乘一个车厢而没有注意到塔拉索夫。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笔下的妇女偶然表现出来的对男人的迷恋，也在托尔斯泰娅有讽刺意味和诙谐的散文中得到反响。这种迷恋的原因至少来源于苏俄妇女缺乏亲密交往的机会。她们可能遭受强奸，但是她们很少有机会受到男人的追求。在《诗人与缪斯》中，一位头脑清醒的女医生爱上了一个头发蓬乱的诗人，诗人靠给人看大门打杂维生，穷得不得了，住在一间堆放破烂东西的房间里。女医生把她收拢在自己的翅膀下面，和他结婚，让他搬进自己舒适的公寓单元，还努力诱导他写出在政治上正确的诗歌。他从善意的、用心良苦的妻子身边逃跑，和跟他一样的“垃圾”胡混在一起，最后死亡，把自己的遗体骷髅送给了他妻子所在的教学医院。骷髅展示出来，让这位遗孀每天都从自己已故丈夫的遗体旁边走过。

评论直接突出了这篇故事幽默批判苏联的基调，也注意到了妇女的占有欲望^①；但是，除了这些特征，托尔斯泰娅触及了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作品里占据中心位置的一个主题：在苏俄制度下，妇女们没有能力以双方都感到满意的方式和男人建立关系。帝国解构的性质虽然显得是托尔斯泰娅作

^① Helena Goscilo, *The Explosive World of Tatyana N. Tolstaya's Fic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品的一个边缘的因素,但是她对痛感失望的妇女的命运的反反复复却使她接近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发现:俄国妇女的他者特质并不就是苏式贫穷的一种功能,而且也是帝国不均衡状况的一种功能。两位女作家都承认帝国剥夺了妇女的能力。女人们无论是必须离家外出“闯荡江湖”、或者在莫斯科寻求足够的衣食的同时,男人们都忙于维持和扩大祖国的边界;但是女人必须承担难以忍受的重担,而所得到的奖掖几近于无。所以出现了与帝国的异化、各种行为的病态、和充斥了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世界的、令人崩溃的无奈。

遭受帝国损害的妇女的孩子们,是附带的牺牲品。在剧本《我为瑞典心痛》中,吉马的继母卡丽亚刚刚埋葬了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的丈夫。他和这个非亲生的儿子都痛感内疚,因为在那命定的一天,父亲一回家就听他们说吉马已经被学校开除;而且,卡丽亚还是大呼小叫怒吼着向他告状的。与此同时,电话铃一直在响。起初,卡丽亚或者吉马拿起听筒的时候,里面都没有人说话;他们都猜测是吉马的同学在戏弄这个被开除的朋友。后来,打电话的人终于说要找一个叫安妮娅的,后来才知道电话是吉马的奶奶打来的,她刚刚从凯梅罗沃来到本地。最后弄清楚,在吉马父亲心脏病发作之前,吉马的姥姥(已故父亲的岳母)一直在反反复复的打电话问她女儿死亡的事,把她死亡的罪责归于不幸的婚姻。而这个女儿安娜·沃伦卓娃自杀,事实上是因为她丈夫和卡丽亚有奸情。在听了这个姥姥的倾诉之后,卡丽亚和吉马各自的愧疚感减轻;但是,在孩子们(吉马和卡丽亚亲生的儿子萨沙)长大了、而且再也用不着自己的时候,卡丽亚下决心一死了之。

似乎这一家人的悲惨还没有到头,原来这位姥姥过去一个星期是在火车站睡觉的,因为讨嫌,她被儿子从在凯梅罗沃的家里赶了出来;还有,萨沙也住在托儿所,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吉马说他爸他妈“正在像狗一样死去”,这话听着特别刺耳,就跟他的预言说他姥姥和全家都要“像狗一样死去”那样。甚至从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标准看,这也是一个特别凄惨的故事。这表明,迁移到遥远的、半殖民地地区(凯梅罗沃是西伯利亚一个煤矿矿区小镇)定居也解决不了贫穷的俄国人的居住面积问题,而且,事实上,这些家庭一起住在俄罗斯中部要好得多。在莫斯科或者沃洛格达周围人口

比较稠密的地区,比在凯梅罗沃给这些公民提供食品和住房要节省得多。但是,俄国上层人士的决策是另外一个样子,而代价却要像卡丽亚、吉马和沃伦卓娃姥姥这样的人们来付出。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突出的独特性在这个剧本里表现得最好。她准确地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俄国的政治实力、俄国西伯利亚的资源和大城市的艺术中心、宫殿、广场、歌舞团、高大纪念碑,对于普通人民丝毫也不重要,而从多方面来说,人民才是社会里仅有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个政体陷入病态,它竭力抬高军事力量和对文化事务的领导,以牺牲人民作为代价。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揭开了帝国的空间,不是通过展现莫斯科对于阿塞拜疆或者哈萨克斯坦、对于远东后者拉脱维亚提出的要求荒唐无理,不是建议以最高价码拍卖爱米塔什博物馆的珍藏艺术瑰宝,而是揭示出帝国行使权力行动的后遗症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她是一位描写家庭生活的优秀女作家,她独树一帜,对于俄国当权派政策侧重所在作出严厉的评判;索尔仁尼琴虽然痛斥当权派,要求他们为俄国人的凄惨境遇负责,但是也不能和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相比。俄国的边界和俄国的国际威望对于她来说无关紧要,可是对于索尔仁尼琴却是大事。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保卫的是个人的隐私权,不是什么对祖国的忠诚,正是在这里,她有别于俄国散文的传统。

她也意识到了俄国及其非俄罗斯人子民的关系问题。在《这样一个女孩,世界的良知》(1968)中,女主角赖莎·拉维丽亚,是一个鞑靼人,她现在的处境和以往的处境一样地无奈和可怕。赖莎从五岁就开始工作,干的活儿是糊小药盒。她和母亲就靠在窄小的家里干这种活维生:她的父亲是个酒鬼,根本不管他们(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协助拆散苏联妇女都有满意的工作这样的神话)。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开始在和女儿共用的房间里招待女人,而赖莎虽然违心、却又不得不常常目睹色情场面,这不仅剥夺了他良好的童年回忆,而且枯竭了她的意志。她变成了性病的牺牲品,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许多女主角的特征。作为一个少女,她不会做饭、吃东西、整理房间、或者照料自己。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好像是在监狱里一样,她不会出去散散步,或者去找工作。由于命运的这种反常的安排,这样的特殊的赖莎却让男人更觉得要占有她。这些男人当中有一个娶了她,但是其他的男人在发现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继续侵犯她——这些男人不仅仅有朋友和熟人,而

且还有陌生人,例如邮差、修理工、或者偶尔到公寓访问的人。倒也不是说赖莎是一个妓女:她瞪着眼睛盯着要强暴她的人,似乎是命令他走开,但是效果却恰恰相反。这样的反反复复的奸淫到后来把赖莎和奸淫她的男人之一的妻子离间开来;这个女人也是叙事人。就像常常出现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作品里的情况那样,故事叙事者比读者知道得少;她没有能力看到自己所叙述的故事的全部的含义。在发现丈夫和赖莎发生了性关系之后,她完全忘记了她,虽然赖莎曾经挽救她死于自杀,并且怀着同情心倾听她说心里话。在彼得罗娃(叙事者)得知自己丈夫欺辱了赖莎之后,就开始蔑视她,不理她。

对于俄国人百姓的良知来说,这是一个阴冷的比喻,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帝国内部被欺辱的非俄罗斯人。叙事者切除赖莎所依据的非自我意识的简单逻辑——“就好比她死了,对于我来说,她已经没有意义,也许,她真的死了”——是和一种清醒的意识并列的,而俄国文化正是凭借这样的意识摒弃了殖民主义问题,和沙皇与政委们强加给异族民族的压迫性的意识形态的紧身衣的。^①《这样的一个少女,世界的良知》象征着俄国统治下的本地诸民族的解体。在这个故事里,帝国没有作出反馈,完全不同于在亚洲和非洲写作、却在西方出版的许多后殖民内容的出版物。它甚至连一句话都不说。在整个故事里,赖莎一直保持沉默。她仅有的话是:“咱们一起来,一起来,等我一会”,因为这个叙事者自己要投缳。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自己确定了1996年出的五卷集的作品排列。她挑选《这样的一个少女》作标题故事。因此,可以正确的认为,赖莎的鞑靼人背景不是一个偶然的细节。认真地说,全部其他的故事,谈的都是俄罗斯人背景的女主角。赖莎来自赤贫和家庭生活崩溃的背景,这是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作品里常见的,但是她的命运比那些本地俄罗斯人的女主角的命运要悲惨得多多了。这样,她丧失了自我保存的本能,谁欺负她都不担心什么后果。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作品里,赖莎之落魄,比任何人都严重。叙

^① “Teper' ona kak by dlia menia umerla, a mozhnet byt', ona i na samom dele umerla, khotia za etot mesiatz nikogo v nashem dome ne khoronili.” Liudmila Petrushevskaia,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1 (Khar'kov and Moscow: Folio and TKO Ast, 1996), 7. Subsequent quotations are from this edition.

事者指出,赖莎的彻底的无助勾起了俄国男人们的猎取本能。这很难使人想不到,她代表的俄国所强奸的一块块的土地,而娶了她的谢夫卡却归纳了鞑靼斯坦和俄国之间的“婚姻”——这是俄国人欲望中的婚姻,而在鞑靼斯坦看来确实没有必要的。

212 打胎问题是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故事里反复出现的另外一个主题,作者表明,这个问题和帝国的种种问题都有关系。苏联国家具有相当高的堕胎率,而避孕则是一种心理上的和经济上的奢侈。但是,在苏联的全部的共和国之中,却不是以一致的频繁程度进行的。穆斯林共和国比率相对较低,而俄国心脏地区则领先,有一个妇女进行八次堕胎的记录。迟至1997年,在俄罗斯联邦进行了250万例堕胎。^① 人口统计表明,在1990年代中期,俄国人口开始缩减,虽然俄罗斯人从原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迁回率很高。1991年,俄国人口是1.48689亿人,而到了1999年则缩减到1.455亿。^② 其次,三个女人中间有两个由于堕胎造成的对健康的损害而受苦。^③ 人口和医疗的缩减是俄国殖民力量衰减的表象之一:处在这样的衰弱状态的国家,面对的是劳动力短缺,遑论征召入伍青年的不足。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明确认定这样的堕胎率有损于所涉及的妇女。她几乎是强迫自己把一个婴儿放置在她笔下的妇女的生活轨迹的某处的,似乎是要提醒读者,在现代的俄国,婴儿太少。婴儿常常流产,或者被丢弃,或者被奶奶或者姥姥养育;的确,在她的故事里,婴儿都享受不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婴儿的在场提醒读者,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女主角居住的私人的世界里,渴望婴儿是常常出现的人之常情,婴儿少与男人远走、与使用面积窄小有关。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最强有力的剧本之一——《会晤》,以轻声耳语开幕,但是随着心理活动的增强而加大音量,一直到真情浮现。这个戏剧只有三个人物:母亲、儿子和一个一言未发的监狱看守。母亲来看在监狱服刑的

① Agence France-Presse, 29 November 1998.

② “Russia: A Country Study,” Library of Congress site at <http://lcweb2.loc.gov/frd/cs/ru-toc.html#ru0064>; *Statisticheskoe obozrenie: ezhekvartal'nyi zhurnal*, no. 1/28 (1999); and Paul Gobl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2 August 1999.

③ Agence France-Presse, 29 November 1998.

儿子，叮嘱他多吃自己给他准备的好吃的东西。她特别嘱咐他多喝她很得意地烹调出来的果汁。她说，既然“他们”允许她来访，“他们”也会释放他的。没什么可担心的。儿子的回答也是不必担心，而且赌咒发誓。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打造出来一个罪犯的负面的形象，让听众较好地经受结局的震撼。

儿子打问自己女朋友的情况。现在轮到了母亲赌咒发誓。她大发牢骚，说，就是他的女朋友，列尔卡，把他给弄到了如今的这个地步。实情一步一步地揭示出来，原来列尔卡已经生了一个孩子，虽然有人一直有求她把孩子打掉。这个囚犯越说越急：列尔卡现在在哪儿？她需要帮助；那个孩子呢？母亲支支吾吾的。这个儿子一五一十地追忆，列尔卡的父母、她妹妹、还有两个朋友，都强烈要求她打胎。这两个朋友是护士，他说，一般每天打胎多达三十个。接着是对一次怀孕后期的堕胎的细致如实的描写。这个儿子吼叫：“他们都是杀人犯，杀人犯！”“所以我把他们都杀死了！”原来这个疯癫的儿子杀死了主张打胎的这五个人，自己也被判处死刑。这个母亲明知无望，还依然希望“想个办法”，但是，用帕斯捷尔纳克论《汉姆来拖》的话来说，“场景的顺序已经构想完毕，道路的尽头不可避免。”话剧结束，看不到希望。

在这样的文本中，对帝国妇女的侮辱达到了极点，虽然这些文本充满了令女权主义者愤怒的材料。在《潘尼娅的可怜的心灵》里，一个四十七岁的女人，健康很不好，而当地毯工人的丈夫又是残疾人；可是这个女人面临完全是不需要的怀孕。虽然怀孕已经第七个月，她还是坚持堕胎；她拿着必要的许可证和文件，毫不动摇地相信，“对母亲健康有危险”的证明就是请医生实施堕胎的充足的理由。医生佯装堕胎，却助产接生一个婴儿。婴儿被秘密抱走，潘尼娅得以离开，去了遥远的北方某地。她根本就没有问一下堕胎的事。她满脑子都是赶快恢复健康的思想，因为要回家她必须先乘火车，再步行十二公里，到一个居民点，她在那儿有一份当看守的工作（一个发电厂，苏联设计人员的产品，受到纪念碑风格和帝国气派的影响）。江河截流发电大工程发电厂缺少资本，不能保证在那里工作的俄国人享受体面的生活水平；资金只能保证俄罗斯帝国从这个企业榨取赢利。而在西欧，除了国际的声誉之外，殖民地还给西欧人提供特权的生活标准；与此不同的是，彼

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女主角们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和在莫斯科一样,都是过着凄惨的生活。潘妮娅迁居到了遥远的企业,在俄罗斯人居住的边缘地区,但是福利没有增加。帝国把她和其他的劳动力迁移到了远方,是“为了事业”,但是这不是她们的事业。帝国项目展现的生活,和提供给俄国妇女的生活截然不同。

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及其一以贯之的讽喻出现之前,俄国作家们一般都是把帝国的伟大和个人的凄惨分离开来的。凄惨被归咎于制度,无论是苏联的制度还是沙皇的制度,而不是归咎于源于治理帝国在经济上的侧重所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郑重拒绝谴责制度(和那些把俄国的困境罪责都堆在苏联制度的暴虐和后苏联时代的腐败等问题上的人士明显不同)揭示出以往的作家都没用完成的发现。在俄国,病疫远远超过了政治制度:帝国就是病疫。在政治的比喻出现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文本中的少见的场合,这些比喻是被用于强调,就俄国的妇女而言,政治生活乃是一种微末细节。在《时间正值午夜》中,绝望的阿辽娜在母亲的公寓单元露面,说:“我要求政治避难。”和她那个犯罪成性、性生活放荡的伴侣的生活比较起来,她动辄争吵的母亲的房间相对是可以忍受的。阿辽娜选择的语句表明,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注意之点离开普通俄国妇女的操心的内容是有十万八千里的。

像《音乐课》里的安娜这样的女主角的母亲和祖母,长时间在狭窄、屈辱的条件下生活大半辈子,是不愿意“搬走”,给下一代腾出空间的。她们狠命抓住床铺、房间不放,即使搬走,也是违心的。在《时间正值午夜》中,祖母操心费力,不能为了小房间里自己的一点空间斗争,因为她孙女要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搬进来住。她女儿安娜·安德里安诺夫娜(阿辽娜的母亲)把她送进老年人库房,一个根本不配称为退休之家的地方。那意思就是说,老太太活不了几个星期了;她女儿的愧疚之感是真实而深厚的。这篇故事发表在1992年,反映的家庭生活的全面解体概括了国家正在解体;而这个国家正在用被压垮的生命来为宏伟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成就付出代价。

这些凄惨处境也不限于工人家庭。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大部分女主角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她们偶尔还听莫扎特的音乐,例如《圈子》里的描

写。社会中受教育的阶层是在宿舍房间里进入青年时期的，那里的家俱是四张床，中间是一张桌子，而梳妆小桌上摆满了化妆品的小瓶（《音乐课》）。在《圈里人》中，实际上全部的人物都有大学学位。她们居住在狭窄的公寓单元里，孙子孙女和祖父祖母争空间，一个患不治之症的母亲当着朋友们的面打孩子，引发对孩子的同情。她希望自己死后，前夫（现在是熟人）收留这个儿子。显然，即使和过度拥挤的公寓宿舍的恶劣条件相比，苏式孤儿院——儿童之家，也并不是选择对象。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含蓄陈述的艺术在一篇不到两页长的、标题为《国家》的短篇小说里达到了极点。在这里，一个沉思的叙事者在思索一个单身母亲的生活，她虽然酗酒，但是每天夜里还是整整齐齐地叠好女儿的衣服，以便早晨去日托托儿所去。她结过一次婚，但是现在她原来的既成事实婚姻的丈夫有了一个新的妻子，而且这对夫妇的全部的朋友也都承认他。这个母亲设想，她可以用自己可以支配的一份钱买酒，不买食品——而且，女儿是在日托托儿所吃饭。为了节省电费开销，她九点钟睡觉，早晨赶着上班；一天的工作一结束，她就在随便一个店里买一瓶酒，接回女儿。周而复始。这位母亲的孤独不同于俄国文学里对于孤独的标准的表现：连像拉斯科利尼科夫这样的孤独而遭受折磨的灵魂到后来也能够加入更大的人群。这篇故事的标题表明，在 20 世纪的俄国，人被暴露于这样一种孤独：不能指望家庭、朋友、国家、或者命运给予帮助，面对这样的孤独，俄国的妇女只有认命。这位酗酒母亲的逆来顺受态度乃是俄国社会的特征：万亿卢布巨额花费在军事和军备上，而一代又一代的俄国人在恶劣环境下生活，对此，这个社会从来没有提出抗议。

在这些故事里，世界几乎完全是由功能出现障碍的家庭组成，女孩想要逃离蛮横和淫乱的父母，例如《父亲母亲》里的丹尼娅，或者佩服自己更有冲劲的同事的勇猛作为的孤独的妇女（例如《圈子》里面的纳佳·罗曼诺娃）。如果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用这类的乱象给文本加油加醋，而不让这些现象残酷地再现，就等于她没有脱离前苏联的和后苏联的作家队伍。在拉斯普京和索尔仁尼琴的文本中，也有不少家庭发生功能障碍和无可奈何的境况。但是把国家造成的这种悲剧作为自己作品的中心，而不去追究共产党或者其他制度的错误，这一做法表达的是一种有意识的倾向：揭露纪念碑

式的大门面和帝国一天天烂下去的现实生活二者之间缺乏协调。

215 托尔斯泰娅比较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笔调轻快、喜欢双关语,在关于单身和没有孩子的妇女的故事(《月亮升起》)中、在关于单身母亲的故事(《夜》)中,创造出了类似的气氛。和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相比,托尔斯泰娅更有诗人气质,《夜》特别显得出自更老一代的作家之手。故事发生在苏俄。一个退休的女工带着天生迟钝的儿子住在公寓楼里。她没有挨饿,从她 130 公斤的体重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们也弄不清楚她是肥胖还是浮肿。她老了,没有丈夫。她尽其可能地保护儿子阿列克塞·彼得罗维奇,但是他又一次跑到街上,差点被车撞死。也算他命大,被抬回和母亲伙住的这个家。他母亲在公用厨房里做饭。他看着母亲脱衣服,从嘴里拿出假牙。她为他以后的日子忧虑:她迟早要死的,那儿子怎么办?和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作品反映的情况一样,没有社会保险网络(这个故事拆散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险的神话,西方的许多学者却信以为真),也不存在家庭的援助。但是,和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不同的是,托尔斯泰娅让她没有魅力的女主角给儿子朗读普希金的诗歌,于是那个儿子也表示要当作家。上层社会这类浅薄的做法是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柴米油盐的世界感到陌生的,在那里,妇女们虽然有大学文凭、在大学宿舍住过数年,现在却也勉强维持生活。托尔斯泰娅当然是出身名门:她祖父是苏联作家阿列克塞·托尔斯泰(温和的威廉·哈金斯^①说他是机会主义者)。

在《这样的女孩》里,捷克玻璃器皿是和奢侈、愉快、节日气氛联系在一起的。同样,在《特别的角落》里,匈牙利裤袜是给女主角们枯燥生活添加一点色彩的为数不多的物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虽然是苏联集团的一部分,一般人却感觉这两个国家是“西方”,能够制造令人愉快兴奋的产品,而中欧产品出现在莫斯科商店里的时候,莫斯科的妇女就感到兴奋。西方的产品都比俄国的好:这是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作品里的殖民主义意识令人羞愧的形式的另外一个标志。倒不是因为这一形式的意识仅仅局限于她的作品:早在布尔嘉科夫的《大师与玛佳丽塔》

^① W. E. Harkins, *Dictiona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Patterson, NJ: Littlefield, Adams & Co., 1959), 385.

(1940)中,这种对西方的敬畏态度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亦即:帝国的语境结构是虚假的、早晚要崩溃。对比之下,西欧人的殖民地意识规定,在外在的空间,事情完成得不是比在宗主国完成得更好、或者更有效,外在的空间更是一个贮藏室、或者乡下的房产,是放置“次要物品”的地方。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那里,对于帝国的自豪感早已经完全消亡,而京城的生活,从人们对其向往的程度和舒适上来看,都属末流。

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作品里,与这样消亡的自豪感相关的是躯体功能和排泄物重新出现。中世纪以来,在叙事中还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的人体气味、尿尿、和人类肉体功能的其他描述。但是,在乔叟那里,这些东西是和消遣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这里,则标志出损害尊严和降低人格。这样的主题几乎完全从19世纪的帝俄文学中消失,一如从维多利亚文学中消失。就像帝国主义的黑暗面一样,排泄物被列为不可提及之物,刚一出现就被大队的仆人清除;或者,像萨义德指出的那样,这是二等人的领域,见于对肮脏的阿拉伯人的描写:他们的淫荡只能和他们缺少清洁的状况相匹配。在《时间是午夜》里,这样的环境随着崩溃的帝国的景象,重新出现。在叙事者的女儿阿辽娜怀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和母亲正在乘一辆出租车旅行,那后面的座位“打个比喻,涂满了粪便”。^①而阿辽娜把汽车里发现的这个脏乱现象弄得更加难以忍受。曾祖母绰号叫老婆子,而不是老奶奶(这是一个更友好的词儿),而女儿叫她屎疙瘩。她在床上大便——实际上到哪儿都拉,因为她没有个人卫生(不是说她能够容忍),所以被送到苏式退休之家。她在冰霜寒夜露天失禁的事,被详细地描写:她首先感受到了一股热流,但是那股尿水很快就变得冰冷,弄得两条腿凉飕飕的。

与此同时,叙事者的女儿,阿辽娜,在编织自己的故事——用斜体字向读者言说,以便有别于她母亲的故事。阿辽娜的秘密日记记录了对第一次被强奸的痛苦回忆。这篇描写中肉体 and 流血的刺激性和受害者无助的悲哀语调,使得这段文章包含十足的女权主义性质。这个惨不忍睹的场面在第二次被强奸中变本加厉,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强奸犯是另外一个男人。孩子就这么生出来了:母亲(依然是一个中年的、好看的妇女,还很有潜力)告诉

^① Petrushevskaia,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1, 338.

阿辽娜,她最小的婴儿,柯利亚,本来应该“刮出来”。她说,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拿出、并且还有继续拿出最后的一个戈比来养活阿辽娜已经生下的三个小崽儿。她是为了这些外孙子外孙女才把她的亲妈打发走的,老妈得了老年痴呆症,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病。

在《三个穿蓝色服装的少女》里,“少女们”操心的问题之一是厕所。伊丽娜的情人为她在乡下的别墅建造了一个厕所,算是给她的礼物;问题是别的少女和她们的孩子把厕所弄脏。房事同样失去了神秘的亲密特质,无法变成乐趣。在《生活的诗意》里,女主角的第一次是在夜间,地点是和少女婆婆伙住的一间房子;婆婆伸出的手很容易摸到这个情人的私处。

《时间正值午夜》表现了三代女人的命运,命运的悲惨各有不同,却又惊人地相似。曾祖母给小女儿(现在是三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祖母)的劝告类似叙事者给阿辽娜的劝告,也被类似地当成耳旁风。安娜·安德里安诺夫娜婚姻很不顺利,像她女儿一样;她有两个孩子(阿辽娜有三个)。她的儿子安德烈在监狱里服过刑;回家的时候吓坏了全家的人,还偷走了母亲的钱。(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作品里,成年的儿子都典型地榨取、或者偷走母亲的钱;例如《半熟的羊腿》)。同时,阿辽娜和疯疯癫癫的母亲保持了一种又爱又恨的关系,却又显得变态,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免遭强奸。整个一套房子又臊又臭:祖母照常地尿床。安娜是一个诗人,在工厂和学校朗诵诗歌(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大概是唯一一位让诗人清洗祖母屎尿的作家)。一天,安娜回家,因为自己要把亲妈送到老人院去的决定而惊恐,却又发现阿辽娜已经带着三个孩子走了。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作品描写的是匮乏和没有出路,而不是胜利和光明的未来。无助也出现在《圈子》里: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一个有教养的妇女去看望一个熟人,要听听她的情色经历故事。除了去看无聊的电影,没有别的事可做——没有令人向往的地平线,没有必须面对的挑战。没有一点公众生活的影子,不能指望什么范围更广阔的思想——而正是这样的思想收容和激越了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许多孤独的人物。见识的狭窄,在索尔仁尼琴和拉斯普京那里已经明显,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达到极点。她笔下的妇女缺乏公民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意识:这是对于苏联时代政治和“文化”教育粗笨沉重的讽刺评论。在她们谈到国家大事的少有的时刻,例如

《圣母颂,妈妈》中克格勃的告密者,她们占据的是阶梯的最低的一格,没有能力理解时事,却很容易返回她们在童年时代从笃信宗教的(或者干脆就是迷信的)亲戚那里接受的世界观。

小说空间的缩减和后殖民时代的悲哀之感得到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所喜爱的技巧的表达,这是一个聪明才智为中等的妇女的内心独白,她用说故事的方式讲述自己和朋友的各种思考。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故事和剧本都很短小,和帝俄大量生产的冗长的长篇小说形成对比。和农村作家毫无共同之处,那些作家的民族主义狂热和说教,和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对公共广场故意冷落距离很大。就像一个外科手术医生要从病人的躯体仔细切除一个瘤子的全部痕迹一样,她要从自己的叙事作品中切除拉斯普京、别洛夫、索尔仁尼琴、和阿斯塔菲耶夫所集中注意的那些问题。她的女主角们根本不注意什么俄罗斯母亲、祖国、家国、部落的生存、诸如此类的,更不必说什么苏联国家的宣传了。从叙事意识中彻底清除这些主题的做法,是作家的现实公民勇气的行动:俄国国家在传统上是奖励那些把对祖国的崇拜注入自己作品的作家的,而对于不作如此注入的作家,则给予压制。和有些才能较差的俄国作家不同,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没有多次获奖,作品也没有得到国营出版社的大量发行。^①

在他者们被推向(或者自我奔向)舞台中心的时候,或者在他们从遭受忽视、或者误读的阴影中浮现出来的时候,帝国的衰败变得明显。俄国妇女从潜在的亲帝国力量退出、进入和强力国家完全失去接触的一个群体——通过表现这一过程,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第一个解构罗伯特·孔凯斯特(Robert Conquest)所说的“最后一个帝国”。^② 为了生存,帝国需要热情、乐观主义、自信心和对于自己不可战胜和永恒的信心。普希金诗歌或者托尔斯泰散文的读者大剂量地吸收了这类的态度,这是塑造他们对于19世纪的俄国的观念的条件。甚至那些歌颂苏联之伟大的、失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也提供了在合理的高水平上保持接受苏联国家所必不

218

^① Goscilo, 219-21.

^② Robert Conquest, ed., *The Last Empire: 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Future*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可少的燃料。但是,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小型作品的读者得到教导,把俄国人的特质和政治权力分离开来,接受没有权力的俄国人特质,这是在她以前没有一个俄国作家提出的偏方。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作品在艺术上终止俄罗斯帝国的凶狂行为。这些作品轻描淡写了陪伴非殖民化的困苦和失望。

1995年,在一篇试图解构所谓的“苏联话语”的文章中,俄国语义学家梅德维杰夫(S. Medvedev)指出,权力的话语是许多文化所特有的,而在俄国,为了政治目的而夺取话语权却一向是无所不在的、多层次的。随着苏联权力的衰落,俄语中残留了大量的、失去了和现实的联系的概念与短语。现在,在苏联用语的废墟上,必须发明出一种新式的言说方式。一些大而空的词语因为误用而破碎;返回言语十分原本的和基础的使用方法,正当其时。^①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严格拒绝关注苏联语境的假惺惺的套话格式,看来似乎是遵循了梅德维杰夫的实话实说的告诫。

在摒弃俄罗斯帝国的自我意识方面,诺沃德沃尔斯卡娅甚至比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更为大胆明确。她在1996年俄国双周刊《新时代》里写道:

我们从来就不理解他们,也永远不会理解他们,因为饱食者理解不了饥肠辘辘的人……我们一直拥有大量的地理边界……我们一直拥有过多的人民、土地、矿物燃料、士兵、特殊服务机关、官僚、警察……但是,他们朝思暮想的是他们那一小块天地。他们梦想在那里插上一面国旗,自己掌管他们自己的经济。^②

他们是车臣人和组成俄罗斯联邦的其他民族,他们希望得到充分的自治。一个俄国作家竟然能够这样慷慨而雄辩的回应他们的要求,真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因为在后苏联时代,有相当多的俄国作家又返回到了普希金那一代人充分表现过的不成熟的帝国所特有的那种神经质的心态。像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和托尔斯泰娅一样,诺沃德沃尔斯卡娅是一位开路先锋。像

^① S. Medvedev, “SSSR: Dekonstruksiia teksta (k 77-letiiu sovetского diskursa),” Chernyshev, *Inoe*, vol. 3, 321.

^② Novodvorskaia, “Throw Everything Overboard That Smells of Blood,” 480-84; also V. Kaganiskii, “Sovetskoe prostranstvo: konstruksiia i destruksiia,” in Chernyshev, *Inoe*, vol. 1, 89-130.

大部分开路先锋一样,她用词不太斟酌推敲,常常选择某种豪放的风格,令比较沉着认真的俄国人一再头疼。上面例举的引用语是号召不要关注帝国的事务,这是让任何一个政府都会皱起眉头来的,而且,要依照其政治文化来惩罚作家。诺沃德沃尔斯卡娅没有因为那篇诗体论文而被捕入狱,生命没有受到威胁。在1996年的莫斯科,一个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不会引起当权派的兴趣。

但是,就像彼得鲁舍夫斯卡娅那样,对于有影响的文学界和政界而言,诺沃德沃尔斯卡娅也不是一名受欢迎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她几次被捕,被关进精神病监狱。这样的监禁是沙皇俄国和苏联的习惯做法。在彼得·恰达耶夫提出对与俄国历史的评判的时候,沙皇立即宣布他患精神病。在列夫·托尔斯泰开始宣讲非正统的政治理论的时候,国家也同样设法说他有精神病。苏联人建造关押“想法不同者”(inakomyshlischenie)的医院。在这种“虚脱心态”的环境下,对诺沃德沃尔斯卡娅的惩罚包括在精神病监狱的拘留,这一情况表明,晚期苏联国家认为她那种品牌的政治偏离是少见而危险的。但是,在后苏联时代的俄国,只要她不法实施自己的思想,她就可以畅所欲言。

在20世纪90年代,诺沃德沃尔斯卡娅是后苏俄时代俄国初建政党之一的民主联盟的领袖。她的著作《在绝望的此岸》(1993)是一本政治自传;除了叙述自己的生活故事之外,该书还记录了她参加争取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政治自由的斗争的情况;一个俄罗斯人帮助他人维护主权权利,纯属罕见。因为积极地、经常地推进每一个民族的自由,所以诺沃德沃尔斯卡娅和俄国民主派大众发生龃龉。她的书卖不出去,她一直处于俄国政治生活的边缘。她不多的出版物明显地不同于俄国主流政客的套话。她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高调的文章活跃了这个杂志的版面。这也反映了俄国民主派的绝望感,他们有时候丧失了改善国家状况的希望。

诺沃德沃尔斯卡娅谈高加索的文章激烈维护“俄罗斯”联邦各族人民退出的权利。诺沃德沃尔斯卡娅指出,“当苏联大都会持不同政见者摧毁了苏联制度(或者放在一旁)的时候,他们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除了少数例外,他们认为俄国殖民地的持不同政见者要开始解决他们自己特殊的问题”。

题简直是发疯。”^①

220 在诺沃德沃尔斯卡娅以前和以后,没有一个俄国人胆敢这样公开地提出联邦的关键问题: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民族和领土还依然被禁锢在“俄罗斯”联邦之内,这是违背他们的意愿的,这样的状况无异于殖民俘获。就像彼得·恰达耶夫和亚历山大·赫尔岑的某些著作一样,诺沃德沃尔斯卡娅的文章同样被认为属于标志着俄国民族意识发生变化的里程碑。

对于帝国对待高加索子民的种种行为,诺沃德沃尔斯卡娅表现出十分了解。她尊重车臣神话和车臣文化标志和经验,正像全世界都学会了尊敬俄国文化的标志和经验那样。她谴责莫斯科对兹维亚德·加姆萨朱尔迪亚(Zviad Gamsachurdia)的偏颇措施,这个人是一位格鲁吉亚爱国者,苏联解体后成为自由格鲁吉亚的第一届总统。她几乎接近于指责 KSK(联邦反侦查局,克格勃的继承者)对他的谋杀。她指出,车臣的穆斯林领袖和格鲁吉亚的基督教领袖是好朋友,因而对帝国制造的高加索弥漫宗教仇恨的观点提出挑战。她写道:“无论是生是死,杜达耶夫和加姆萨朱尔迪亚都是莫斯科知识分子的不可遏制的愤怒的根源,也是克格勃、FSK、FSB、叶利钦总统政府和其他政权机构的愤怒根源。”他们的友谊给了莫斯科的宣传一记耳光,莫斯科指责穆斯林国家实行极端主义,就像帝国制造的贫穷和困苦把这些民族投入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怀抱之中一样。诺沃德沃尔斯卡娅警告说,称这些分离主义者为“匪帮”的人正在冒险,会陷入斯大林的道路:“那就有必要杀死每一个人,甚至妇女和儿童,用斯大林的话来说,不能让‘为父亲报仇的人’长大。”她认识到,俄国的政治文化还不能接受对国家政策的激烈扭转,所以他转向诗歌,特别是符拉基米尔·维索茨基(Vladimir Vysotskii)的歌曲,提出她的要点:“把那血腥味的东西都抛到海里去,/要理解这代价不是太高。”对于这个柔弱的合唱,1998年被杀害的佳丽娜·斯塔罗沃伊托娃(Galina Starovoitova)添加了自己的政治见地和信念;她相信,用亚当·米赫尼克(Adam Michnik)的话来说,“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由的”。^②

① Conquest.

②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4 January 1999.

诺沃德沃尔斯卡娅的故事的结尾都不快乐。她十分热衷于促进变化,又由于她总喜欢夸张,所以她越过了把辩论和极端主义分离开来的界限。在她发表关于俄国少数民族的光辉的文章刚刚过去两年、和在1989年8月俄国经济崩溃的几个月之内,她所站的立场就是不赞同沃尔库塔矿工为取得拖欠工资和提议关闭无利可图的煤矿而罢工。关闭赔钱的矿井固然是俄国为了启动增长必须采取的经济改组的痛苦过程的一部分,但是,从工人的角度看,关闭矿井就等于饥饿。在接近北极圈的沃尔库塔没有其他的工作,而把工人送回欧洲部分重新安排一事,政府旨一直在考虑之中的。因为没有有效的领导,沃尔库塔的矿工们在生存斗争中一直是孤军奋斗。

在关于这个主题的《新时代》文章中,诺沃德沃尔斯卡娅提示,大概那些不能适应新环境的人都应该被枪毙,以便让剩下的人(即使是少数)能够在一个崭新的、光辉的、和民主的俄国生活。^①不用说,她并不是名副其实地主张枪毙工人,她的辞令是在抨击旧时代俄国的极端主义,这一主义可以追溯到德米特里·皮萨列夫(Dmitrii Pisarev)、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i Nechaev,特别是他1869年写的《革命者学说问答》)和列宁。这一篇和其他的棱角分明的文章没有令任何一个政治团组认可诺沃德沃尔斯卡娅,所以她的政治和学理的前途依然未卜。

221

像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以及上述的危险警告)诺沃德沃尔斯卡娅这样的作家认为,为了莫斯科的利益而征服和保持外国领土的做法应该废除。俄国人民再也不能保持这一传统。实际上,他们自己已经分裂为俄国本土和西伯利亚与远东等“白人殖民地”。俄罗斯联邦横跨欧亚,包拢了太多的民族和土地群体,他们是太多的不同历史、文化、经济、记忆和利益的继承人。没有一个俄国男性作家斗胆明说,“俄罗斯”联邦太过广大、具有太大的多样性,设立在莫斯科的一个政府是无法管理好的。像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这样地为反对帝国而写作、和拆散帝国的想象中的控制,是联邦内部自信心滑落的一部分,而这个联邦是从来就不是对自己的身份怀有充足的信心的。女作家们的声音还太微弱,在一个被男性的声音统治的社会里、一个还

^① *Novoe vremia*, 30 November 1998. I thank my colleague Michael Bernstam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for pointing this out to me.

不很愿意揭示自己殖民主义维度的社会里，还不能够发挥即时的作用。后殖民时代的意识在俄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但是，“本质的他者们”、俄国妇女作家们已经从文学的定势局面中获得、或者说夺得叙事的权利。通过表述帝国如何愧对妇女一事，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特别值得被称为俄国第一位后殖民时代作家。

附录

一 德国学者昆策尔的评论

[德]克里斯蒂娜·昆策尔(Krisitna Kuntzel)

美国休斯敦市赖斯大学斯拉夫文学研究者汤普逊,在她最新专著中为自己提出俄国文学、亦即精神史中的俄国帝国主义这一困难的研究题目。在详尽的引论中,汤普逊尝试把赛义德以“西方的东方主义”为对象的思想模式用于俄国和苏联文学以及这一文学与从高加索到西伯利亚的被掠夺地区的关系。近年来,在《斯拉夫评论》(参见 *Slavic Review*, 2000, 第 729—731 页)中,汤普逊和奈特(Nathaniel Knight)之间,就萨义德思想模式是否可以用于俄国的问题进行了一场简短的辩论。在此之后,奈特在一篇论俄国东方主义者格里高里耶夫(*Slavic Review*, 2000, 第 74—100 页;此处指第 98—100 页)的文章中,对于把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用于俄国方向的作法表现出极为保守的态度。对此,汤普逊提出了一个论纲,即:运用萨义德的思想模式是能够富有成效的,虽然这一模式必须部分地修改。

在德语文献中,迈歇尔(Johann Meichel)在其著作《“一切屈服于俄国之剑”: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作家的民族爱国主义》(汉堡,1998)中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把研究重点放在俄国作家爱国思想的延续性上,这些作家虽然反对沙皇制度,但是对俄国帝国主义扩张的要求从来不予质疑。迈歇尔论述的是爱国主义,汤普逊却使用了“帝国主义”这个术语,而且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问题,即:对于自己的帝国主义倾向,俄国文学家们大概能有多少自我意识。她抓住了赛义德的思考模式,但是在严格的程度上有别于今年出版的萨尼的研究著作《把东方钉上十字架:俄国殖民主义与对高加索和中亚的殖民》(Kalpana Sahni, *Crucifying the Orient: Russian Orientalism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奥斯陆,1997)。两部著作

的共同特点是,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研究工作的范围,两部著作对俄国精神史愈来愈关注,虽然多数事例来源于文学。除此之外,萨尼特别关注俄国和苏联对于高加索和中亚的掠夺,而汤普逊则讨论俄国、苏联对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政策。

汤普逊的著作,按时间顺序分为七章。在叙述了研究状况之后,提出了论争的问题,对俄国帝国主义进行了明确而具有充分挑战性的评论。在第二章(“帝国话语的产生”)中,汤普逊探索了文学中的俄国帝国主义的发生。首要的例证取自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她证明,这两位诗人对俄国掠夺政策表达了不假思索的歌颂。同时,她还明确指出,这两个“经典作家”的思想榜样给以后大约二百年的俄国文学对被掠夺地区和民族的态度打上了烙印。

第三章讨论了托尔斯泰及其纪念碑式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并且突出了俄国独裁政权与西欧的关系。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时代,对于沙皇征服地区的掠夺显得还是新的现象,还没有十分巩固,而在托尔斯泰的时代,这一事态显然得到加强。汤普逊指出,俄国的一种完全自觉性的、掠夺周边国家的强烈欲望已经出现,这一点表现在有如古米廖夫这样的文学家们所作的、对于掠夺中亚之行为的歌颂之中。

第四章集中讨论索尔仁尼琴。汤普逊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对社会帝国主义的任何批判距离或者反思。相反,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存在的资格受到这位批评家的质疑,而且,地区的多样性也首先需要得到承认。

第五章的重点是俄国文学家与西伯利亚的关系。对于汤普逊来说,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瓦连津·拉斯普京的作品;这位作家谴责苏联时代对西伯利亚自然环境的破坏,但是他的谴责的焦点是俄罗斯人的痛苦,而本地原住民被一笔带过,在他的小说里没有给予恰当的声音和地位。这些人依然是消极的,继续依赖占统治地位的俄罗斯人。

接着,汤普逊又以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和德米特里·利哈切夫的著作为例,指出他们如何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限定了俄国的历史写作,认为,与西欧相比,俄国的发展并不落后,但是两位作者属于互相对立的政治营垒。在一个相当长的段落中,汤普逊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新闻界(第163—185页),提出为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条约辩护的许多例证、

反对波兰的言论,等等。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为什么在二战期间和以后,俄波关系如此沉重,一直表现为两国之间的实际争端,由过往时代造成的、显而易见的相互理解的困难一目了然。

在最后一章里,作者展现了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亚作品的全新视角。作者认为,这位女作家准确地解构着俄罗斯帝国。在彼特鲁舍夫斯卡亚笔下,短篇与中篇小说故事总是在狭小的空间、在莫斯科、彼得堡、或者另外某一个城市郊区残破低矮住宅中展开。人物都不能够摆脱空间的狭小,逃离的机会不复存在:在多处被提及、引述的国土的辽阔广大,在彼特鲁舍夫斯卡亚的作品里已经被无情地非神话化。

这部专著有详尽的参考书目和索引,但是遗憾的是索引中没有给出各章的标题。我们已经知道波兰语译本正在出版过程之中,但是,至今还没有一家俄国出版社表明将要出版俄语译本。

汤普逊提出了一个棘手的论题,公开拨动了俄国人自我意识中的一个伤口。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在德国能够得到活跃的讨论。

(原文见 Krisitna Kuntzel, Osteuropa, Zeitschrift Gegenwartsfragen
des Ostens, Februar 2002)

二 波兰学者索瓦的评论

[波兰]卡奇米日·索瓦

在这部著作(指波兰语版——译者)的封底,出版者写道,汤普逊的这部著作“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开拓者的成就,它不仅揭示了最杰出文学名作和作家姿态迄今没有受到注意的方面,而且还颇具启发性地展现了其他的方面,发现了对文学、文学在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以及文学在社会与民族生活中的政治意义加以思索的新的天地”。这的确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认为,这位波兰—立陶宛裔的美国优秀学者的著作的最大价值,首先是新颖的、在西方文学研究中独特的、对俄国的观察,在和西方诸帝国的比较中,把俄国当作一个特殊的殖民帝国。我刚刚提及作者的文化属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渊源,就不太可能形成对俄国的这种观感。把俄国称为殖民帝国的作法并不多见;有一些作者偶尔提及俄国殖民主义(例如,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华沙,1971),但是只限于作为世界性现象的19世纪殖民主义的语境,完全没有注意到俄国扩张的特点。

殖民主义对于现代世界造成的后果这一议题,在最近几十年深入了世界思想界,作为“后殖民时代话语”记入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学说”,是这一学说重要载体之一。正是对于遭受殖民之苦的民族来说是梦魇般的经历,也尤其是对于殖民主义者来说是噩梦般的非殖民化的经历,在西方思想界培育出对文化多元论及其社会后果的较为深刻的理解。这种较为深刻的理解之所以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原来的殖民地、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的代表对后殖民时代话语研究的积极参与。遗憾的是,在现代波兰思想界这一问题基本上还没有得到研究。

但是汤普逊承认,正是这些启发促成她对俄国文学的总体研究。在这样的语境中,她特别提出两位作者;他们都是旧殖民地的代表,共同创造了

欧洲文学研究的范例,促成了对欧洲文学法则和欧洲文化的全新的(后殖民时代的)观点:他们是赛义德和加雅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向东方国家殖民扩张没有料到的后果之一是,在欧洲文化的传统范围之外,还出现了一批对西方文化的杰出批评家;这些批评家有能力对于自己的殖民主义者貌似封闭的哲学体系尝试予以解构。汤普森注意到,这种情况能够出现,是因为,简单地说,西方帝国主义向诸殖民地的文化不仅显示了物质力量,而且还有精神力量;不仅有强力,而且还有种种确立的思想。正是这种确立的思想、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法等的这种“输出”,从结果上看,是远比伴随这种“输出”的强横力量更具有深远影响的。

长期的俄国殖民主义并没有带来任何思想智慧的话语。我们最多也只能谈论俄国民族主义的独白;这种独白在思想上是贫瘠的,虽然在艺术上转瞬即逝。我们还要讨论这个话题;现在先来看看作者在和西方殖民主义进行比较的时候,是怎样从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的观点上对俄国殖民主义作出鉴定的:

允许俄国殖民主义逃避后殖民时代批评家分类法的特征与宗主国和边缘国家之间权力与知识的分配相关。在西方殖民主义内部,宗主国可以为权力与知识的积累而自豪,而宗主国也就依靠这种积累来扩大对边缘国家的统治。俄国殖民统治的基础是……权力本身,而不是知识与权力的结合(……)虽然印度人可能视英国人为敌人,但是他们承认英国人文化优越,尽管不太情愿……在俄国和苏联帝国某些地区,只存在过一种特殊的情况,即服从帝国权力的人对于统治自己的人丝毫没有敬意。在19世纪,关于俄国人文明程度低下的观念广泛流传,就连热爱俄国文化的人士奥古斯特·冯·哈克斯陶森男爵,得到沙皇尼古拉一世津贴在俄国旅行后也断言:“被俄国奴役的国家,多数都享有高于奴役者的文化。”他指的是芬兰、波罗的海诸省、波兰和格鲁吉亚。(波兰语版,下同,第28—29页)

但是,即使是对于被划进帝国的、一般习惯上又可能被认为比俄国文化低下的其他民族的文化,莫斯科的政府者们,除了自己的权力以外,也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改善被奴役民族境遇的帮助。相反,俄国的统治一般都戏剧

般地恶化了他们的处境。乌拉尔山以东的面积庞大的领土,不仅西伯利亚,还有中亚细亚,都一直被肆无忌惮地、掠夺式地剥削,其居民的角色就是贱民。在这里,不可避免地浮现出类似与蒙古人统治制度的情况,而这种制度,俄国人凭自己的长期历史经验,是熟知的。毫无疑问,按照斯宾塞的社会体系二分法类型学(工业体系和军事体系),蒙古人也好,俄国人也好,都恰恰构成了军事体系的典型。

汤普逊还注意到了俄国帝国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特殊的俄国民族主义。当然,每一种帝国政治都和民族主义有某种联系。作者在第一章里讨论了民族主义问题,就便讨论了“恶劣的”(进攻型的)和“尚好的”(采取守势的)民族主义。但是,二者之中哪一个也不能没有祖国的概念而存在,因为祖国是从民族方面创立民族主义的人民的历史居住繁衍之地。俄国民族主义的特征在于祖国边界的随意性,亦即不明确性。在历史的早期,“俄罗斯”就已经似乎无处不在,把各种传说据为己有,其实,这些传说和俄罗斯以后的同一性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还有就是,俄罗斯似乎一直就存在着(本文作者有一本前苏联版民族志书籍,其中列有公元1000年的“苏联人口”数字)。在帝国时期,俄国(苏联的)士兵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俄罗斯”。这种“俄罗斯概念”大概是独一无二的帝国理念。

这样,我们就已经进入汤普逊著作的议题。因此,关于帝国的这个重要的理念应该恰当地传播,并且得到支持依据。作者是这样说明的:

在19世纪,俄国口气愈来愈硬的声音开始被听到,于是俄国伟大的小说家们便提出论据,证明整个帝国都是俄罗斯,而且,帝国内部各民族的命运就是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在文学的帮助之下,完成了在言辞上对巨大的非俄罗斯领土的攫取。各种各样的传奇被发明出来,说明帝国的边缘、边远地区具有和莫斯科本身一样的俄罗斯性格。于是,在俄国和俄国国外,俄国是一个没有天然国界的国家,俄国之所以持续开拓,是为了保卫自己,还有就是它的扩张具有开拓文明的有益影响。从亚历山大·普希金的《高加索俘虏》(1822)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1855—1856)起,到瓦西里·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和尤利·特里丰诺夫的《愿望》(1963),俄国文学向俄国的和西方的上流社会人士言说,从布列斯特到符拉基

沃斯托克(海参崴)、从卡列利亚—芬兰到车臣的广大领土,由莫斯科来统治,才是正确的。各地被俄罗斯化的上层人士、俄国的殖民移民、苏联的体育团体、军队合唱团,在面对外国观察家的时候,都只代表了单一民族的俄罗斯人。(第76—77页)

作者从这个角度,或多或少地详尽分析了相当大的一组俄国和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把很多篇幅拨给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具体地说,即他的小说《癌症楼》,雄辩地确认了该书的殖民主义性质。作者提出的分析具有高度启发性,但是我不准备评价,因为我不是文学理论家,也不是文学批评家。但是,我同意在波兰语版标题中明确表达的主要含义。我只想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一点显而易见,所以没有鲜明表述——伟大的俄国作家们没有为克里姆林宫服务;他们相信他们书写的一切。

这个庞然大物的帝国,本来是普遍地、有效地刻印在集体意识之中的,为什么在我们眼前骤然瓦解、或者正在瓦解中呢?关于这个题目,已经出版了许多大部头的著作。我认为,汤普逊发表了迄今基本上一直没有引起我们注意的、十分重要的见解。她只用一句言简意赅的话语来表述:

可以说,俄国帝国主义之所以遭受失败,是因为它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多地、更长时间地依赖士兵和武器,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没有能够用思想取代武器。(第30页)

赤裸裸的武力和暴力不足以持久地建设社会;为此建设之目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资源。看来,强力与意识形态结合的时期,在俄国历史中,是20世纪。在这一时期内,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苏联的威力。但是为时短暂,才七十年,而且勉勉强强。即使在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代表的眼里,这种结构原始、被工具化的思想意识,要从经验上被打造得容易接受,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俄国重又只剩下了他自己的思想。但是,若要重建帝国,这已经是太少了。作者在本书结尾部分说明,令人诧异的是,俄国当代作家(还有历史学家)现在依然不能够摆脱这一沉重的僵死思想,即:俄罗斯祖国(Rossiya-Rodina)。那么,还能怎样评论政治家们呢?

关于“伟大俄罗斯”的神话,曾经命中注定沉重地压在俄国历史、它的

居民以及它的近邻和远邻身上；那么，从精神上结构这一神话，俄国自身能否做到呢？汤普逊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希望。作者认为，正是妇女，确切地说，她们在谈论俄国的话语中的声音，将会成为解构帝国神话的本质因素。这一女权主义的声音是漫长隧道尽头的唯一的光亮。但是，这是东方之光。在我最近数年中所阅读的关于俄国的著作中，《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最有趣、最具启发性。

（卡奇米日·索瓦[Kazimierz Sowa]，波兰社会学家，波兰克拉科夫市雅盖沃大学和热舒夫市的热舒夫大学教授，著作有《俄国：延续还是转折点》[1995]等）

精选书目

Adam, Ian, and Helen Tiffin, eds. *Past the Last Post: Theorizing Post-colonialism and Post-modernism*. Calgary, Alberta: Univ. of Calgary Press, 1990.

亚当提芬等:《过去的和最后的标杆:对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阐释》

Adrianova-Peretts, V. P., ed. *Russkaia demokraticheskaia satira XVII veka*. Moscow: Nauka, 1977.

阿德里安诺娃-佩莱茨:《17世纪俄国具有民主精神的讽刺作品》

Allworth, Edward A. *The Modern Uzbeks: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0.

阿利沃思:《现代乌兹别克人:14世纪到现在》

——, ed. *Central Asia: 130 Years of Russian Dominance. A Historical Overview*.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 Press, 1994.

阿利沃思:《中亚:俄国统治130年历史一览》

Altstadt, Audrey L. *The Azerbaijani Turk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2.

阿尔特施塔特:《阿塞拜疆的突厥人》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

Arx, Jeffrey. *Progress and Pessim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1985.

阿尔克斯:《进步与悲观主义》

- Ashcroft, Bill, et al. *The Empire Writes Back*. London: Routledge, 1989.
阿施克罗夫特:《帝国回信》
- Astaf'ev, Viktor. *Povesti i rassказы*. Moscow: Sovetskii Pisatel', 1984.
阿斯塔菲耶夫:《中短篇小说》
- Badretdinov, Sabirzyan, "Sincere Soldiers and Naive Servants." *Transitions* 5, no. 12 (December 1998), 97-100.
巴德列吉诺夫:《真诚的士兵和天真的仆人》
- Baron, Salo W. *Modern Nationalism and Religion* (1947). New York: Meridian, 1960.
贝伦:《现代民族主义与宗教》
- Barr, P. *The Mem-Sahibs. The Women of Victorian India*.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76.
巴尔:《夫人们: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度妇女》
- Bazyłow, Ludwik. *Historia nowożytnej kultury rosyjskiej*. Warsaw: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86.
巴齐洛夫:《俄国新文化史》
- Belinskii, V. G. *Sobranie sochinenii*. 3 vols.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hudozhestvennoi Literatury, 1948.
别林斯基:《全集》
- Berdiaev, Nikolai. *The Russian Idea*. Translated by R. M. French.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
- Berry, L. E. and Crummey, R. O., eds. *Rude and Barbarous Kingdom*.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1968.
贝里:《粗鲁而野蛮的王国》
-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霍米巴巴:《文化的位置》
- Billington, James H. *The Icon and the Ax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毕灵顿:《圣像与斧头》
- Bobrowski, Tadeusz. *Pamiętnik mojego życia*. 2 vols. Warsaw: Państwowe In-

stytut Wydawniczy, 1979.

鲍勃罗夫斯基:《我的生平纪事》

Boehmer, Ellek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95.

博埃默:《殖民和后殖民文学》

Brydon, Diane and Helen Tiffin. *Decolonizing Cultures*. Sydney, Australia: Dangaroo Press, 1993.

布莱顿:《文化非殖民化》

Bunin, I. A. *Sobranie sochinenii*.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66.

普宁:《选集》,文学出版社

Canovan, Margaret. *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6.

凯诺万:《民族特征与政治理论》

Carrère-d'Encausse, Hélène. *The End of the Soviet Empire: The Triumph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卡莱尔-邓考斯:《苏俄帝国的终结:各个民族的胜利》

——. *Confiscated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卡莱尔-邓考斯:《被没收的权力》

——. *Decline of an Empire: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in Revolt (1978)*. Translated by M. Sokolinsky and H. A. LaFarge. New York: Newsweek Books, 1979.

卡莱尔-邓考斯:《一个帝国的衰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造反》

Cherniavsky, Michael. *Tsar and People: Studies in Russian Myth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切尔尼亚夫斯基:《沙皇与人民:俄国神话研究》

Chernyshev, S. B., ed. *Inoe: Khrestomatiia novogo rossiiskogo samosoznaniia*. 3 vols. Moscow: Argus, 1995.

切尔尼舍夫:《另类:新的俄罗斯意识文选》

Chew, Allen F. *An Atlas of Russian History: Eleven Centuries of Changing*

- Bord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1967.
丘:《俄国史地图:国境线变化一千一百年》
- Christian, R. F. *Tolsto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9.
克里斯蒂安:《托尔斯泰》
- . ed. and trans. *Tolstoy's Diaries*. New York: Scribners, 1985.
克里斯蒂安:《托尔斯泰日记》
- Clardy, Jesse & Betty. *The Superfluous Man in Russian Letters*. Lanham, MD: Univ. Press of America, 1980.
克拉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
- Clyman, T. W. and Diana Greene, eds. *Women Writers in Russian Literature*. Westport, CT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4.
克莱曼:《俄国文学中的女作家》
- Conquest, Robert, ed. *The Last Empire: 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Future*.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与苏联的前途》
- Curtin, Philip D., ed. *Imperialism*. New York: Walker, 1971.
科尔廷:《帝国主义》
- Curtius, Ernst. *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Bern: Francke Verlag, 1948.
科尔修斯:《欧洲文学与拉丁文中世纪》
- Czapski, Józef. *The Inhuman Land* (1949). Foreword by Daniel Halevy, introduction by Edward Crankshaw, translated by Gerard Hopkin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1.
查普斯基:《非人之地》
- Czubaty, Jaroslaw. *Rosja iswiat: wyobraźnia polityczna elity władzy imperium rosyjskiego w początkach XIX wieku*. Warsaw: Neriton, 1997.
楚巴迪:《俄国与世界:19世纪初期俄罗斯帝国当权派的政治想象》
- Dabrowska, Maria. *Noce i dnie* (1932-1934). Warsaw: Czytelnik, 1959.
董布罗芙斯卡:《黑夜与白昼》
- Dalberg-Acton, John Emerich Edward. *Selected Writings*. 3 vols. Ed. by J. Ru-

- fus Fears.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Classics, n. d.
道尔贝格-埃克顿:《选集》
- Davies, Norman. "World War II: Grand Illusion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5 May 1995.
戴维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宏大的假想》
- .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84.
戴维斯:《上帝的战场:波兰史》
- De Zepentek, Tötösy Stev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Method, Application*. Amsterdam and Atlanta, GA: Rodopi, 1998.
德·柴潘泰克:《比较文学:理论、方法、运用》
- Deutsch, Karl W.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1953.
德意奇:《民族主义与社会交际》
- Dobrzynski, Judith. "Russia Pledges to Give Back Some of Its Art Looted in War." *New York Times*, 3 December 1998.
多布仁斯基:《俄国发誓归还战争期间掠夺的艺术品》
- Domostroi: po spisku imperatorskogo obshchestva istorii i drevnostei rossiiskikh*. Moscow, 1882. Reprinted by Bradda Books, Letchworth, England, 1971.
《家训:依据俄国历史与古代文集帝国学会登录册》
- Dostoevskii, F. M. *Dnevnik pisatel'ia*. 3 vols. Paris: YMCA Press, n. d.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
- Dunlop, John. *The Faces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Nationalis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3.
邓洛普:《现代俄国民族主义诸面目》
- Durova, Nadezhda. *The Cavalry Maiden*. Translated by Mary Fleming Ziri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89.
杜罗娃:《骑兵队少女》

- Erofeev, Viktor, ed. *Russkie tsvety zla*. Moscow: Izdatel' Dom Podkova, 1997.
叶罗非耶夫:《俄国的恶之花》
- Fadiman, Clifton, ed. *Living Philosophies: The Reflections of Some Eminent Men and Women of Our Time*. New York: Doubleday, 1990.
费迪曼:《活的哲学:我们时代某些杰出男女的思考》
-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ated by C.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1968.
法农:《世界上受苦的人》
- Fennell, John. *The Crisis of Medieval Russia, 1200-1304*.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3.
芬纳尔:《中世纪俄罗斯的危机,1200-1304》
- , and Anthony Stokes, eds. *Early Russian Literature*. London: Faber & Faber, 1974.
芬纳尔:《早期恶棍文学》
- Fisher, Alan. *The Crimean Tatar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8.
菲舍:《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 Flaubert, Gustave. *Flaubert in Egypt: A Sensibility on Tour*.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Francis Steegmull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福楼拜:《福楼拜在埃及:旅途杂感》
- Ford, Peter. "Crossing Europ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nline*, 19 and 31 July 1998.
福特:《横穿欧洲》
- . "The View from the Kremlin: Russia as Eternal Superpow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nline*, 29 May 1997.
福特:《克里姆林宫的观点:俄国是永恒的超级大国》
- Fuller, William C., Jr. *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富勒:《俄国的策略和权力,1600-1914》
- 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Seabury, 1975.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 Gandhi, Leela. *Postcolonial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98.
- 甘地:《后殖民理论:批判导论》
- Garrard, John J., "Corresponding Heroines in *Don Juan and Evgenii Onegi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73, no. 3 (1995).
- 加拉德:《“唐璜”与“奥涅金”中对应的女主角》
- Glavatskii, M. I. *Rossia, kotoruiu my ne znali, 1939-1993*. Cheliabinsk: l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95.
- 格拉瓦茨基:《我们所不了解的俄国》
- Glenn, John. *The Soviet Legacy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格林:《苏联在中亚的遗产》
- Goble, Paul.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http://www.rferl.org/>), 2 August 1999.
- 格勃尔:《民主与发展》
- . "North Caucasus: The Return Of A Dangerous Concept,"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6 November 1998.
- 格勃尔:《北高加索:一个危险概念的恢复》
- . "Can Russian Diplomacy Hold Russia together?"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23 September 1998.
- 格勃尔:《俄国的外交能够保持俄国完整吗?》
- Gombrowicz, Witold. *Ferdydurke (1937)*. Translated by Eric Mosbacher. New York: Grove, 1968.
- 贡布洛维奇:《费尔迪杜凯》
- Gorer, G. and J. Rickman. *The People of Great Russia (1949)*. New York: Norton, 1962.
- 格勒:《大俄罗斯的人民》
- Goscilo, Helena. *The Explosive World of Tatyana N. Tolstaya's Fiction*. Armonk, NY: M. E. S harpe, 1996.

- 格西洛:《托尔斯泰娅的爆炸性的世界》
- Graham, Sheelagh, ed. *Nikolaj Gumilev, 1886-1986*. Berkeley, CA: Berkeley Slavic Specialties, 1987.
- 格拉汉姆:《尼古拉·古米廖夫,1886-1986》
- Grant, S. A. "Obshchina and mir." *Slavic Review* 35, no. 4 (1976).
- 格兰特:《公社与村落》
- Gross, Irena G. and Jan T. Gross, eds. *War through Children's Eye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5.
- 格罗斯:《儿童所看到的战争》
- Gross, Jan T.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8.
- 格罗斯:《来自外国的革命:苏联对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征服》
- Gumilëv, N. S. *Sobranie sochinenii*. Edited by G. P. Struve and V. Filippov. Washington, DC: V. Kamkin, 1962-1968.
- 古米廖夫:《全集》
- Haraszti, Eva. *Kossuth as an English journalist*. Translated by Brian McLean. Boulder, CO: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 Press, 1990.
- 哈拉斯提:《英国记者科苏思》
- Hastings, Adria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 Ethnicity,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7.
- 哈斯丁斯:《民族特征的构成:民族、宗教、民族主义》
- Haxthausen, August von. *Studies on the Interior of Russia* (1844). Edited by S. Frederick Starr, translated by Eleanore L. M. Schmidt. Chicago: Chicago Univ. Press, 1972.
- 哈克斯陶森:《俄国内幕研究》(1844)
- Hayes, C. J. H.,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New York: Smith, 1931.

海士:《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

Hechter, Michael.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黑齐特:《国内殖民主义:英国民族发展中凯尔特人的边缘地位,1536-1966》

Herder, J. G.,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1784-1791). Translated by Frank Manuel. Chicago: Chicago Univ. Press, 1968.

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

Hobsbawn, Eric 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2d rev.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0.

霍布斯鲍姆:《1780年以来的民族和民族主义》

——.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3.

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

Hobson, J. A.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Allen & Unwin, 1948.

霍布森:《帝国主义研究》

Holquist, Michael. *Dostoevsky and the Nov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7.

霍尔奎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小说》

Jakóbiec, M., ed. *Literatura rosyjska*. 2 vols. Warsaw: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70.

雅库别茨:《俄国文学》

Iashen, K. et al. *Istoriia uzbekskoi sovetskoi literatury, 1917-1985*. 5 vols. Tashkent: Izdatel'stvo Fan, 1987.

雅申:《苏维埃乌兹别克文学史,1917-1985》

Johnson, Paul. *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Eighties*. New York: Harper, 1983.

约翰逊:《现代:20世纪20到80年代的世界》

Jonge, Alex de. *Fire and Water: A Life of Peter the Great*. New York: Coward

McCann, 1980.

钟格:《火焰与洪水:彼得大帝传》

Kapuściński, Ryszard. *Imperium*. Warsaw: Czytelnik, 1993. English translation: *Imperiu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卡普希钦斯基:《帝国》

Kara-Murza, A. "Modernizatsiia versus degradatsiia." *Nezavisimaia gazeta*, 16 June 1997.

卡拉-穆尔查:《现代化与堕落》

Karamzin, N. M. *Istoriia gosudarstva rossiiskogo*. 9 vols. St. Petersburg: Evdokhimov, 1892. Reprinted by Mouton, The Hague, 1969.

卡拉姆津:《俄国国家史》

——. "O liubvi k otechestvu i narodnoi gordosti,"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2.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teratura, 1964.

卡拉姆津:《论爱祖国与民族自豪感》

Karimov, Islam. *Uzbekistan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卡里莫夫:《跨入 21 世纪的乌兹别克》

Kedourie, Eie. *Nationalism*. London: Hutchinson, 1961.

凯杜里:《民族主义》

Keenan, Edward. "On Certain Mythical Beliefs and Russian Behaviors." *The Legacy of Histor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edited by S. Frederick Star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基南:《论某些神话信仰与俄国人的行为》

——. "Muscovite Perceptions of Other East Slavs before 1654: An Agenda for Historians." P. Potichnyj, ed. *Ukraine and Russia in Their Historical Encounter*. Edmonton, Alberta: CIUS Press, 1992, 20-38.

基南:《1654 年以前莫斯科维关于其他东斯拉夫人的概念:历史学家议题》

Kelly, Catriona. *A History of Russian Women's Writing, 1820-199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 凯利:《俄国妇女写作史,1820 - 1992》
- Kenez, Peter.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5.
- 凯尼兹:《依赖宣传的国家的诞生》
- Kennan, George. *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 2 vols. London: James Osgood, 1891.
- 肯南:《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
- Kennan, George. "On American Principles." *Foreign Affairs* 74, no. 2 (March-April 1995).
- 肯南:《论美国原则》
- Khaitmenov, A. Kh., et al. *Istoriia uzbekskoi literatury s drevneishikh vremen do Velikoi Oktiabrskoi sotskialisticheskoi revoliutsii*. 2 vols. Tashkent: Izdatel'stvo Fan, 1987.
- 哈伊特梅诺夫:《乌兹别克文学史:从古代到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前》
- Kiernan, V. G. *Marxism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1974.
- 基曼:《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
- Kiniapina, N. S., et al. *Kavkaz i Sredniaia Azia vo vneshnei politike Rossii: vtoraiia polovina XVIII-80-e gody XIX v.* Moscow, 1984.
- 吉尼亚皮纳:《高加索与中亚在俄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8 世纪后半期到 1980 年代》
- Kipling, Rudyard. *Verse*.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1940.
- 吉普林:《诗选》
- Kohler, Phyllis Penn, ed. and trans. *Journey for Our Time: The Russian Journals of the Marquis de Custine*. Washington, DC: Gateway, 1987.
- 科勒:《我们时代的旅行:居斯廷侯爵的俄国旅行日记》
- Kohn, Hans.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44.
- 科恩:《民族主义思想》
- Kolakowski, Leszek.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Translated by P. S. Fall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 柯拉柯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流》

- Kross, Jaan. *The Czar's Madman*. Translated by Anselm Hollo. New York: Pantheon, 1993.
 克罗斯:《沙皇狂人》
- Kucharczywski, Jan. *The Origins of Modern Russia*. New York: Polish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America, 1948.
 库哈热夫斯基:《现代俄国的起源》
- Kundera, Milan. "A Talk with the Author by Philip Roth," translated by Peter Kussi, in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translated by Michael Heim. New York: Penguin, 1980.
 昆德拉:《菲利普·罗思与作者的谈话》
- Lane, Christel. *The Rights of Rulers: Ritual in Industrial Society: The Soviet Ca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1.
 雷因:《统治者的权利:工业社会的礼仪:苏联个案》
- Lazari, Andrzej de, ed. *Ideas in Russia: A Trilingual Lexicon*. 3 vols. Warsaw: Semper Press, 1999.
 拉扎里:《俄国的思想:三种语言的词汇》
- Lednicki, Waclaw. *Tolstoy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Hague: Mouton, 1965.
 莱德尼茨基:《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之间》
- Lermontov, Iu. M. *Geroi nashego vremeni*, edited by B. M. Eikhenbaum.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62.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
- Likhachëv, Dmitrii S. "Smekhovoi mir" drevnei Rusi. Leningrad: Nauka, 1976.
 利哈乔夫:《古代罗斯的“欢笑世界”》
- . *Poetika drevnerusskoi literatury*. Leningrad: Nauka, 1967.
 利哈乔夫:《古代俄国文学的诗学》
- . "Kul'tura Kievskoi Rusi B. D. Grekova." *Istoricheskii zhurnal*, 1/2 (1945), 89-90.
 利哈乔夫:《格列科夫:基辅罗斯的文化》
- Lotman, Iurii. *Stat'i po tipologii kul'tury*. Tartu, Estonia: Univ. of Tartu

Press, 1970.

洛特曼:《文化类型学论文集》

Malik, Hafez, ed. *Central Asia: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and Future Prospec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马利克:《中亚:战略意义和未来展望》

Massa, Isaac de Harlem. *Breue Description des chemins qui menent et des fleuves qui passent de la Moscovie*. (1613). M. Obolensky, ed. *Histoire des Guerres de la Moscovie*. Brussels: Fr. I. Olivier, 1866.

马萨:《联结莫斯科维的铁路和穿越莫斯科维的河流的简洁描写》

Mickiewicz, Adam. *Dziela wszystkie*. Edited by Konrad Gorski. Wroclaw and Warsaw: Ossolineum, 1969-1972.

密茨凯维奇:《全集》

Miller, David.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米勒:《论民族性》

Minority Rights: Problems, Parameters, and Patterns in the CSC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ontext. Washington, DC: CSCE, 1992.

《少数派的权利: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问题、数据与模式》

Molnar, Thomas. *Twin Powers: Politics and the Sacre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8.

莫尔纳尔:《孪生的权力:政治与神圣》

Moore-Gilbert, Bart. *Postcolon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98.

莫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

Moser, Charles A.,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0.

莫塞:《剑桥俄国文学史》

Mote, Victor. *Siberia*. Boulder, CO: Westview, 1998.

莫特:《西伯利亚》

Motyl, Alexander J. "'Sovietology in One Country' or Comparative Nationality Studies?" *Slavic Review* 48, no. 1 (Spring 1989).

莫提尔:《“一个国家的苏维埃学”还是比较民族研究?》

Novikov, V. S. *Il'ia Glazunov*. Leningrad: Avrora, 1989.

诺维科夫:《伊里亚·格拉祖诺夫》

Novodvorskaia, Valeriia. “Kachnëm pravo na trud.” *Novoe vremia* Online, no. 41 (1998).

诺沃德沃尔斯卡娅:《欢迎劳动权利》

——. “Ia khochu, chtoby eto ne konchilos’.” *Novoe vremia* Online, no. 30 (1998).

诺沃德沃尔斯卡娅:《我希望事情不是一次结束》

——. “Throw Everything Overboard That Smells of Blood,” translated by Steven Clancy. *Sarmatian Review* 17, no. 3 (1997), 480-484.

诺沃德沃尔斯卡娅:《把带血腥味的东西抛出船舷》

——. “Brosaite za bort vse, chto pakhnet krov'iu.” *Novoe vremia* (September 1996).

诺沃德沃尔斯卡娅:《把带血腥味的东西抛出船舷》

——. *Po tu storonu otchailaniia*. Moscow: Novosti, 1993.

诺沃德沃尔斯卡娅:《超越绝望》

Nowak, Andrzej, ed. *Kronika Polski*. Kraków: Kluszczyński, 1998.

诺瓦克:《波兰纪事》

Ogonëk, 1988-1998.

《星火》

Olcott, Martha B. *The Kazakh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7.

奥尔科特:《哈萨克人》

Orlov, A., et al. *Posobie po istorii otechestva dlia postupaiushchikh v vuzy*. Moscow: Prostor, 1994.

奥尔洛夫:《本国史参考资料,报考大学学生用书》

Paksoy, H. B. “Muslims in the Russian Empire: Response to Conques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9, nos. 3-4 (Autumn/Winter 1986).

帕克索伊:《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对于征服的回应》

- . *Central Asia Reader: The Rediscovery of Histor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中亚读本:历史的重新发现》
- Partiinoe stroitel'stvo, 1938-1945*.
《党的建设》
- Pastukhov, Vladimir. "Budushchee Rossii vyrastaet iz proshlogo. Postkommunizm kak logicheskaiia faza razvitiia evraziiskoi tsivilizatsii." *Polis*, nos. 5-6 (1992).
帕斯图霍夫:《俄国的未来源于过去——后共产主义是欧亚文明的逻辑发展阶段》
- Peck, Anna. "Polscy zesłańcy a kolonialne widzenie świata: Relacja z podróży po Syberii Henry'ego Landsdella." *Przegląd Wschodni* 5, no. 1 (1998), 137-170.
佩克:《波兰流放者与殖民地世界观:亨利·兰兹戴尔西伯利亚旅行札记》
- Petrovich, Aleksei. "Kazaki i severnyi Kavkaz." *Nezavisimaia gazeta*, 4 June 1994.
彼得罗维奇:《哥萨克与北高加索》,独立报
- Petrushevskaiia, Liudmila. *Sobranie sochinenii*. 5 vols. Khar'kov and Moscow: Folio and TKO, 1996.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选集》
- Pierce, Richard A. *Russian Central Asia, 1867-1917: A Study in Colonial Rule*.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
皮尔斯:《俄国的中亚,1867-1917:中亚统治研究》
- Pipes, Richard. "Is Russia Still an Enemy?" *Foreign Affairs* 76,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7).
派普斯:《俄国还是敌人吗?》
- . "Diplomacy and Culture: Negotiation Styles." In Richard F. Staar, ed. *Arms Control: Myth versus Realit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派普斯:《外交与文化:谈判风格》

——.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Scribners, 1974.

派普斯:《旧制度下的俄国》

Plakans, Andrejs. *The Latvian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5.

普拉坎斯:《拉脱维亚人》

Plumb, John H. *The Death of the Pas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0.

普兰:《过往时代的死亡》

Pravda, 1939-1945.

《真理报》

Procope, Hjalmar J. *Finland Reveals Her Secret Documents: On Soviet Policy March 1940-June 1941*. New York: Funk, 1941.

普罗科普:《芬兰公开秘密文件:论1940年3月到1941年6月的对苏联政策》

Pronin, Aleksandr. "Tragediia Generala Ermolova: emu neobkhodimo bylo pokorit' narody, priznavavshie lish' pravo sily." *Nezavisimoe voennoe obozrenie*, no. 40 (15-21 October 1999).

普罗宁:《叶尔莫洛夫将军的悲剧:他必须征服只超人强力的民族》, 独立军事观察

Pushkin, A. S.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10 vols. Moscow: Nauka, 1966.

普希金:《全集》

——. *Journey to Arzrum*. Translated by Brigitte Ingemanson. Ann Arbor, MI: Ardis, 1974.

普希金:《阿尔兹鲁姆旅行记》

——. *Eugene Onegin*. Translated by Walter Amdt. New York: Dutton, 1963.

普希金:《叶夫盖尼·奥涅金》

Putnam, P., ed. *Seven Britons in Imperial Russia, 1698-181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2.

普特曼:《七个英国人旅居帝俄, 1698 - 1812》

Ra'anani, Uri, ed. *The Soviet Empire: The Challenge of National and Democratic Movements*. 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90.

拉安南:《苏联帝国:对民族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挑战》

Radwan, Marian, ed. *Inventarz materiałów do dziejów Kościoła Katolickiego w Rzeczypospolitej i w Rosji*. 3 vols. Lublin: Instytut Europy Środkowo-Wschodniej, 1997-1998.

拉德万:《波兰共和国和俄国天主教会史资料汇编》

Rasputin, Valentin. G. *Sobranie sochinenii*. 3 vols.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94.

拉斯普京:《选集》

——. *Uroki frantsuzkogo. Povesti i rasskazy*.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87.

拉斯普京:《法语课:中短篇小说》

——. *Poslednii srok, Proshchanie s Matëroi, Pozhar*. Moscow: Sovetskaia Rossiia, 1986.

拉斯普京:《最后的期限,告别母亲,火灾》

Reznichenko, Grigorii, et al. "Aral'skaia katastrofa." *Novyi Mir*, no. 5 (May 1989), 182-241.

列兹尼琴科:《咸海厄运》

Riabikin, C. *Noveishaia istoriia Rossii, 1991-1997: Posobie dlia uchitelei, starsheklassnikov, abiturientov i studentov*. St. Petersburg: Neva, 1997.

里亚比金:《俄国当代史,1991-1997:教师、高年级学生、毕业生和大学生参考资料》

Riasanovsky, N. V. *A History of Russia*, 4th ed.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84.

里亚赞诺夫斯基:《俄国史》

Romanenko, A. *Posobie po istorii Rossii, XX vek: dlia vypusknikov i postupaiushchii v vuzy*. St. Petersburg: Triton, 1996.

罗马年科:《20世纪俄国史参考资料:中学毕业生和报考大学学士用书》

Rorlich, Azade-Ayse. *The Volga Tatar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罗利奇:《伏尔加河畔的鞑靼人》

- Rothberg, Abraham. *Aleksandr Solzhenitsyn: The Major Novels*.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1971.
罗思贝格:《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主要的长篇小说》
- Rothschild, Joseph.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罗特希尔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欧东部》
- Ruthven, K. K., ed. *Beyond the Disciplines: Papers from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Symposium*, no. 13. Canberra, Australia: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1992.
鲁思文:《超越学科: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讨论会文集》
- Rybakov, Anatolii N. *Deti Arbata*. Moscow: Sovetskii Pisatel', 1987.
雷巴科夫:《阿巴特大街的孩子们》
- . *Children of the Arbat*. Translated by Harold Shukman. Boston: Little, Brown, 1988.
雷巴科夫:《阿巴特大街的孩子们》
-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1979).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萨义德:《东方主义》
- .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 Scheler, Max. *Ressentiment*. Translated by W. Holdhei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舍勒:《愤怒》
- Seton-Watson, Hugh.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西顿-沃森:《1801-1917年的罗斯帝国》
- Shafer, Boyd A. *Fac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2.
舍费尔:《民主主义面面观》
- Shirer, William 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0.
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 Shklovskii, V. B. *Sobranie sochinenii*. 3 vols.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74.
施克洛夫斯基:《选集》
- Simmons, Ernest. *Pushkin*. New York: Vintage, 1964.
西蒙斯:《普希金》
- . *Leo Tolstoy*. New York: Vintage, 1960.
西蒙斯:《托尔斯泰》
- Simon, Gerhard, *Nationalismus unter Nationalitätspolitik in der Sowjetunion*. Baden-Baden: Nomos, 1986.
西蒙:《苏联民族政策指导下的民族主义》
- Skabichevskii, A. M. "Asketicheskie nedugi v nashei sovremennoi peredovol intelligentsii." *Russkaia mysl'* 21 (October-November 1900).
斯卡毕切夫斯基:《我们当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中间的禁欲主义病症》
- Slovar' russkogo iazyka Akademii Nauk SSSR*. 4 vols.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59.
《苏联科学院俄语辞典》
- Slowacki, Juliusz. *Dziela wszystkie*. 15 vols. Wroclaw: Ossolineum, 1998.
斯沃瓦茨基:《全集》
- . *Anhelli*. Translated by Dorothea Prall Radin London: Allen & Unwin, 1930.
斯沃瓦茨基:《安海利》
- Smirnov, S. G. *Zadachnik po istorii Rossii*.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1995.
斯米尔诺夫:《俄国史习题集》
- Smith, Anthony D.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1986). Oxford: Blackwell, 1993.
安东尼:《国家的种族起源》
- . *The Ethnic Reviv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1.
史密斯:《民族复兴》
- Snyder, Louis L. *The Dynamics of Nationalism: Readings in Its Meaning and*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D. Van Nostrand, 1964.

斯奈德:《民族主义的驱动力:其意义和发展阅读书目》

Solov'ev, S. M. *Istoriia Rossii s drevneishikh vremen (1851-1879)*. 15 vols.

Moscow: Izdatel'stvo Sotsial'no-Ekonomicheskoi Literatury, 1959-1966.

索洛维约夫:《始于远古时期的俄国史》

Solzhenitsyn, Aleksandr. *Av gust chetyrnadtsatogo*. 2d rev. ed. Paris: YMCA Press, 1971.

索尔仁尼琴:《8月14日》(俄文版)

——. *August 14*. Translated by H. Y. Willet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89.

索尔仁尼琴:《8月14日》(英译本)

——. *The Mortal Danger*. Translated by M. Nicholson and A. Klimoff.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索尔仁尼琴:《致命的危险》

——. *Sobranie sochinenii*. Paris: YMCA Press, 1979.

索尔仁尼琴:《选集》

——. *Cancer Ward*. Translated by Rebecca Frank. New York: Dell, 1968.

索尔仁尼琴:《癌病楼》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1939-1944.

《苏联国家与司法》

Spivak, Gayatri.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London: Routledge, 1990.

斯皮瓦克:《后殖民时代评论:访谈、策略、对话》

Strakhov, N. N. *Kriticheskiia stat'i ob I. S. Turgeneve i L. N. Tolstom*. Kiev: Izd. I. P. Matchenko, 1901. Reprinted by Mouton, The Hague, 1968.

斯特拉霍夫:《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评论》

Suchanek, Lucjan, ed. *Emigracja i tamizdat*. Kraków: Universitas, 1993.

苏哈尼克:《侨居与国外出版物》

Swearingen, Roger.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7.

- 斯维林根:《西伯利亚与远东》
- Szporluk, Roman, 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 施波鲁克:《俄国和欧亚新国家的民族身份和民族特征》
- .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88.
- 施波鲁克:《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马克思与李斯特》
- Taylor, Peter J. *The Way the Modern World Works*. New York: John Wiley, 1996.
- 泰勒:《现代世界运作的方式》
- Terras, Victor. *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1991.
- 泰拉斯:《俄国文学史》
- Thompson, Ewa M., ed. *The Search for Self-Definition in Russian Literature*. Houston: Rice Univ. Press, 1991.
- 汤普逊:《俄国文学中对自我定义的寻求》
- . *Understanding Russia: The Holy Fool in Russian Culture*. Lanham, MD: Univ. Press of America, 1987.
- 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
- . “The Wallenberg Case: The Inferred Soviet Viewpoint.” *Raoul Wallenberg in Perspective*. Edited by K. D. Reiser and Thomas Neumann. Houston: Southwest Regional Office of 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 1986.
- 汤普逊:《沃伦贝格个案:被引用的苏联观点》
- Timofeev, L. I. *Osnovy teorii literatury*. Moscow, 1974.
- 季莫非耶夫:《文学理论基础》
- Tolstaia, Tatiana N. *Na zolotom kryltse sideli... rasskazy*.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87.
- 托尔斯泰娅:《她们坐在金色的台阶上……短篇小说》
- . *Sleepwalker in a Fog*. Translated by Jamey Gambrel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 托尔斯泰娅:《大雾中的梦游症患者》
- Tolstoi, L. N. *The Kreutzer Sonata and Other Stories*. Translated by Louise and Aylmer Maud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97.
- 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
- . *War and Peace*. Translated by Aylmer Maude and edited by George Gibian. New York: Norton, 1984.
- 托尔斯泰娅:《战争与和平》
- . *Great Short works of Leo Tolstoy*. Translated by Louise and Aylmer Maud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 托尔斯泰娅:《托尔斯泰短篇作品杰作》
- . *Voina i mir*.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63.
- 托尔斯泰娅:《战争与和平》
- .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lubileinoe)*. 91 vols.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hudozhestvennoi Literatury, 1929-1964.
- 托尔斯泰娅:《全集》(周年纪念版)
- Tolz, Vera. "Conflicting 'Homeland Myths' and Nation-State Building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Slavic Review* 57, no. 2 (Summer 1998).
- 托尔兹:《后苏联时代“祖国神话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冲突”》
- Toranska, Teresa. *Them: Stalin's Polish Puppet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 托兰斯卡:《他们:斯大林的波兰傀儡》
- Troyat, Henri. *Pushkin*. Translated by Nancy Amphous. New York: Minerva Press, 1975.
- 特洛亚特:《普希金》
- Trubachëv, O. N. *V poiskakh edinstva*. Moscow: Nauka, 1992.
- 特鲁巴乔夫:《寻求统一》
- Turgenev, Ivan. *Fathers and Sons*. Edited by Ralph Matlaw. New York: Norton, 1966.
- 屠格涅夫:《父与子》
- . *Sobranie sochinenii*. 10 vols.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hu-

dozhestvennoi Literaturny, 1961.

屠格涅夫:《全集》

Vakhobov, M. *Tashkent v period trekh revoliutsii*. Tashkent, Uzbekistan: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Uzbekskoi SSR, 1957.

瓦哈伯夫:《三次革命时期的塔什干》

Valiev, Rimzil, et al. "1997 in Review: Tatarstan Faces Challenges,"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31 December 1997.

瓦利耶夫:《1997年回顾:鞑靼斯坦面临挑战》

Verdery, Katherine. "Ethnicity as Culture: Some Soviet-American Contrasts." *Canadian Review of Studies in Nationalism* 15, nos. 1-2 (1988).

维尔德里:《作为民族特征的文化:几项苏美和约》

Vernadsky, George.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1961.

维尔纳茨基:《俄国史》

Veske, M. P. *Slaviano-finskie kul'turnye otnosheniia po dannym iazyka*. Kazan': Obshchestvo Arkheologii, Istorii i Etnografii, 1890.

维斯克:《从语言资料看斯拉夫—芬兰文化关系》

Vigny, Alfred de. *Poèmes*. Paris: Univ.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66.

维尼:《诗选》

Vitaliev, Vitali. "Projections: Remembering Galina Starovoitova." *Transitions* 6, no. 1 (January 1999).

维塔利耶夫:《投影:追忆加琳娜·斯塔罗沃伊托娃》

Wandycz, Piotr. *The Lands of Partitioned Poland*.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万迪奇:《被瓜分波兰的各地》

Welsford, Enid. *The Fool: His Social and Literary History*. London: Faber & Faber, 1935.

威尔斯费尔德:《愚人:其社会史和文学史》

Whitlock, Gillian, and Helen Tiffin, eds. *Re-Siting Queen's English: Text and Tradition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msterdam and Atlanta, GA: Rod-

pi, 1992.

维特洛克:《校正皇后英语:后殖民文学中的本文与传统》

Whitmore, Brian. "Russia: Yeltsin Launches New TV Channel To Control Information."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29 August 1997.

维特莫尔:《俄国:伊里奇开辟新电视频道控制新闻》

Wilezek Piotr. "Jesuits in Poland According to A. F. Pollard." *Sarmatian Review* 19, no. 1 (January 1999).

维尔泽克:《波拉尔记载的在波兰的耶稣会教士》

Yeltsin, Boris.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A. Fitzpatrick.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叶利钦:《为俄国而斗争》

Yergin, Daniel and Thane Gustafson. *Russia 2010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 New York: Vintage, 1995.

叶尔金:《2010年的俄国,对全世界的意义》

Zograf, N. I u. *Antropologicheskie issledovaniia muzhskogo velikorusskogo naseleniia Vladimirskei, Iaroslavskoi i Kostromskoi gubernii*. Moscow, 1890.

左格拉夫:《对符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省、科斯特罗马省男性大俄罗斯居民的人类学研究》

Zotov, Igor'. "Aleksandr Solzhenitsyn, Al'ber Kamiu i krizis voobrazheniia." *Ogonëk*, no. 29 (4408) (July 1995).

左托夫:《索尔仁尼琴、加缪与想象力的危机》

Zuev, F. G., et al. *Istoriia Pol'shi*. 2 vols. Moscow: Akademiia Nauk, 1958.

祖耶夫:《波兰史》

索引

- 阿卜杜拉希道 Abdurashidaw, Razzaq, 123.
- 亚当 Adam, I., 50n, 223.
- 阿多诺 Adorno, Theodore, 13n.
- 阿赫玛托娃 Akhmatova, Anna, 201.
- 阿胡纳瓦 Akhunava, Etibar, 123.
-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Aleksei Mikhailovich, tsar, 54, 156, 161.
- 阿列克辛 Aleksin, Rear Admiral V. I., 124, 125.
- 亚历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tsar, 55, 56, 66, 73, 91, 95, 101, 104, 105, 113, 155.
- 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tsar, 86, 111.
- 阿利戈 Aliger, Margarita, 169, 176.
- 阿利沃思 Aliworth, Edward A., vi, 12n, 114, 117, 125n, 126n, 223.
- 字母变化(从阿拉伯或者拉丁字母变成西里尔字母,或者反向的变化) alpha-bet change (from Arabic or Latin to Cyrillic, or vice versa), 19-20, 165, 194n.
- 阿尔特施塔特 Altstadt, Audrey L., 12n, 223.
- 安德森 Anderson, Benedict, 6, 11, 13n, 223.
- 阿尼西莫夫 Anisimov, Evgenii, 17.
- 反犹太主义 anti-Semitism, 138, 175.
- 阿伦特 Arendt, Hannah, 51n, 194n.
- 亚美尼亚人与亚美尼亚 Armenians and Armenia, 20, 80, 84n.
- 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 John, 194n.
- 阿尔克斯 Arx, Jeffrey, 13n.
- 阿谢耶夫 Aseev, Nikolai N., 19.
- 埃施克罗夫特 Ashcroft, Bill, 37, 49n.
- 阿斯塔菲耶夫 Astafev, Viktor P., 132, 138, 142, 144-5, 151n, 152n, 197n, 217, 223.
- 奥斯丁 Austen, Jane, 33, 63, 96, 98, 120, 133.
- 澳大利亚人与澳大利亚 Australians and Australia, 39, 138, 148.
- 阿维林采夫 Averintsev, S. S., 35.
- 阿扎耶夫 Azhaev, Vasilii N., 43.
- 巴德列吉诺夫 Badretdinov, Sabirzyan, 48n, 119, 126n, 223.

- 巴尔扎克 Balzac, Honoré de, 87, 89.
- 巴兰诺维奇 Baranovich, Lazar, 54.
- 巴仑 Baron, Salo W., 13n, 223.
- 巴齐洛夫 Bazylow, Ludwik, 81n, 223.
- 贝克特 Beckett, Samuel, 207.
- 白俄罗斯人与白俄罗斯 Belarusians and Belarus, 16, 42, 74, 148, 165, 166-180, 189, 192n.
- 别林斯基 Belinskii, Vissarion G., 71, 72, 79, 83n.
- 别洛夫 Belov, Vasilii I., 217.
- 别雷 Belyi, Andrei, 21, 55, 204.
- 本宁森 Benningsen, Alexandre, 83n.
- 别尔嘉耶夫 Berdiaev, Nikolai, 50n, 223.
- 伯恩斯塔姆 Bernstam, Michael, viii, 126n.
- 贝桑孔 Besançon, Alain, 12n.
- 贝特尔海姆 Bettelheim, Bruno, 180-181, 196n.
- 霍米巴巴 Bhabha, Homi, 36, 37, 38, 39, 49n, 50n, 69, 83n, 118, 150, 223.
- 毕灵顿 Billington, James H., 190, 223.
- 布洛克 Blok, Aleksandr A., 76, 88, 204.
- 博埃默 Boehmer, Elleke, 11, 14n, 224.
- 《青铜骑士》Bronze Horseman, The, 76-9.
- 布热津斯基 Brzezinski, Zbigniew, 52n.
- 布尔加科夫 Bulgakov, Mikhail A., 215.
- 布尔加林 Bulgarin, Faddei, 21.
- 普宁 Bunin, Ivan A., 17, 47n, 224.
- 布里亚特人与布里亚齐亚 Buriats and Buriatia, 133, 134, 142.
- 加缪 Camus, Albert, 109-110, 111, 114, 115.
- 《癌病楼》Cancer Ward, 115-124, 126n, 205, 229.
- 康纳汀 Cannadine, David, 8, 25, 44.
- 凯诺万 Canovan, Margaret, 5, 6, 13n, 49n, 86, 224.
- 卡莱尔 Carlyle, Thomas, 78.
- 卡莱尔-邓考斯 Carrère-d'Encausse, Hélène, 12n, 120, 126n, 224.
- 叶卡捷琳娜二世 Catherine II (the Great), 17, 26, 42, 43, 54, 74, 97.
- 高加索诸民族 Caucasus, the, nations of, 1, 20, 28, 53-74, 80, 85, 113, 136, 169, 205, 219, 220.
- 中亚国家 Central Asia, nations of, 1, 19, 23, 85, 105, 111-115, 116-125, 167, 205.
- 中欧国家 Central Europe, nations of, 6, 13n, 19, 22, 30, 102-103, 110, 188-9.
- 恰达耶夫 Chaadaev, Pètr Ia., 219, 220.
- 车臣人与车臣 Chechens and Chechnya, 3, 4, 9, 10, 44, 51n, 52n, 72, 74, 140, 191, 200, 218, 220.
- 契诃夫 Chekhov, Anton P., 28, 45, 115, 171, 204-205, 208.
- 切尔尼亚耶夫 Cherniaev, General Mikhail, 111, 112.
- 切尔尼亚夫斯基 Cherniavsky, Michael,

- 103, 105, 108n, 224.
- 切尔尼舍夫 Chernyshev, S. B., 49n, 51n, 197n, 224.
- 丘 Chew, Allen F., 28-29, 30, 31, 82n, 113, 224.
- 《阿巴特大街的孩子们》*Children of the Arbat*, 136-142, 229.
- 克里斯蒂安 Christian, R. F., 107n, 224.
- 丘吉尔 Churchill, Sir Winston, 27.
- 克兰西 Clancy, Steven, viii, 221n, 227.
- 克莱曼 Clyman, T. W., 224.
- 科恩 Cohen, Stephen, 24, 48n, 164, 194n.
- 殖民地依赖关系 colonial dependency, 40-41, 80.
- 殖民主义 colonialism, 1, 2, 6, 9, 39, 163, 164;
- 定义 definition of 32; 内部的 internal, 16, 20, 165; 西方的 Western, 46.
- 俄国殖民主义 colonialism, Russian, 15, 18, 22, 24-25, 32-3, 35, 38, 40, 45, 63, 71, 111, 115, 118, 133, 141, 163-64, 165, 190, 213.
- 殖民主义者话语 colonialist discourse, 43, 44.
- 殖民地, “白色的” colonies, “white,” 1, 39-40, 129, 148.
- 康奎斯特 Conquest, Robert, 83n, 84n, 126n, 218, 222n, 224.
- 康拉德 Conrad, Joseph, 33, 43, 63, 65, 139, 150.
- 高乃依 Corneille, Pierre, 94.
- 克罗默 Cromer, Lord Evelyn Baring, 43.
- 科尔廷 Curtin, Philip D., 13n, 224.
- 科尔修斯 Curtius, Ernst, 157, 158, 193n, 194n, 224.
- 居斯廷 Custine, the Marquis de, 27, 49n.
- 查普斯基 Czapski, Józef, 48n, 111, 224.
- 捷克人与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 Czechs and Czechoslovakia/the Czech Republic, 8, 10, 18, 104, 134, 167, 215.
- 楚巴迪 Czubyty, Jaroslaw, 49n, 81n, 224.
- 董布罗夫斯卡 Dąbrowska, Maria, 50n, 224.
- 达吉斯坦人与达吉斯坦 Dagestanis and Dagestan, 4, 16.
- 道尔贝格-埃克顿 Dalberg-Acton, Lord J. E. E., 5, 12n, 224.
- 道林 Dallin, Alexander, 164, 194n.
- 戴维斯 Davies, Norman, vii, 30, 49n, 50n, 83n, 84n, 107n, 224.
- 俄国话语的“虚脱心态”“default mode” of Russian discourse, 76-77, 145, 176, 219.
- 德里达 Derrida, Jacques, 10, 37.
- 杰尔查文 Derzhavin, Gavriil R., 55, 77.
- 德意奇 Deutsch, Karl, 6, 13n, 224.
- 德·柴潘泰克 De Zepentek, Tötösy, 165, 224.
- 狄更斯 Dickens, Charles, 33, 85, 96.
- 杜勃罗留波夫 Dobroliubov, Nikolai A.,

- 71, 73, 79.
- 家庭观念 domesticity, 95-96.
- 家训 *Domostroi*, 53, 54, 81n, 161, 194n, 224.
- 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evskii, Fëdor M., 18, 22, 29, 33, 43, 45, 72, 90, 99, 104, 115, 125n, 139, 185.
- 涂尔干 Durkheim, Emile, 3.
- 杜罗娃 Durova, Nadezhda, 95, 107n, 224.
- 东欧国家 Eastern Europe, nations of, 5, 13n, 22, 30, 110, 187.
- 东正教与幽默 Eastern Orthodoxy and humor, 159-162.
- 艾亨鲍姆 Eikhenbaum, Boris M., 79-80, 83n, 84n, 227.
- 艾略特 Eliot, T. S., 80.
- 认识论体系 epistemological systems, 38;
启蒙时代认识论 Enlightenment epistemology, 3, 4, 10-11, 32, 41, 185;
认识论在俄国 epistemology in Russia, 41-42, 186; 中世纪认识论 medieval epistemology, 35, 41.
- 叶尔马克 Ermak (Yermak), 136.
- 叶尔莫洛夫 Ermolov (Yermolov), General Aleksei P., 57, 60-61, 64, 113, 136, 140, 169, 228.
- 爱沙尼亚人与爱沙尼亚 Estonians and Estonia, 16, 18, 21, 134, 165, 173, 183, 192.
- 民族 *ethnie*, 8, 98.
- 鄂温克人 Evenki (Evenks, Tungus), 119, 139, 140, 151n.
- 费南 Fanon, Frantz, 11, 42, 43, 50n, 225.
- 芬纳尔 Fennell, John, 125n, 193n, 225.
- 费希特 Fichte, J. G., 7.
- 菲利波夫 Filippov, A., 49n.
- 财务报 *Finansovaia gazeta*, 168, 175, 181, 182.
- 芬兰人与芬兰 Finns and Finland, 18, 21, 61, 76, 78, 165, 166, 174, 181-183, 188, 194n.
- 菲舍 Fisher, Alan, 12n, 225.
- 福楼拜 Flaubert, Gustave, 62, 82n, 87, 89, 124, 225.
- 弗莱契 Fletcher, Giles, 16, 58.
- 冯维辛 Fonvizin, Denis I., 77, 94.
- 福特 Ford, Peter, 23, 43, 49n, 51n, 225.
- 福斯特 Forster, E. M., 43.
- 福柯 Foucault, Michel, 10.
- 弗朗克 Frank, Rebecca, 49n, 124, 126n, 229.
- 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69.
- 福劳德 Froude, J. A., 13n.
- 富勒 Fuller, William C., Jr., 51n, 225.
- 福尔采娃 Furtseva, Ekaterina A., 201.
- 伽达默尔 Gadamer, Hans-Georg, 2, 12n, 225.
- 甘地 Gandhi, Leela, 5, 6, 11, 12n, 38, 40, 48n, 49n, 50n, 225.
- 加拉德 Garrard, John, viii, 125n, 225.
- 格鲁吉亚人与格鲁吉亚 Georgians and

- Georgia, 9, 18, 20, 59, 66, 82n, 84n, 85, 192, 220.
- 德国人与德国 Germans and Germany, 6, 7, 9, 21, 30, 40, 146, 165, 166, 167, 168, 176.
- 热罗姆 G rome, Jean L on, 69.
- 赫尔岑 Gertsen (Herzen), Aleksandr I., 220.
- 吉皮乌斯 Gippius, Zinaida N., 201.
- 格拉瓦茨基 Glavatskii, M. I., 196n, 197n, 225.
- 格拉祖诺夫 Glazunov, Il'ia S., 132, 150n, 227.
- 格林卡 Glinka, Mikhail I., 77, 175, 195n.
- 格勃尔 Goble, Paul, 12n, 20, 52n, 225.
- 果戈理 Gogol', Nikolai V., 22, 66, 89, 99, 132, 137.
- 贡布罗维奇 Gombrowicz, Witold, 70, 83n, 225.
- 戈尔巴乔娃 Gorbacheva (Gorbach va), Raisa, 145, 186.
- 戈尔查科夫 Gorchakov, Prince Aleksandr M., 92, 116.
- 格西洛 Goscilo, Helena, 221n, 222n, 225.
- 格拉汉姆 Graham, Sheelagh, vi, 125n, 225.
- 格兰特 Grant, S. A., 107n, 225.
- 格列契 Grech, Nikolai I., 45.
- 希腊天主教 Greek (Eastern Rite) Catholic Church, 42, 74, 85-6.
- 格罗斯 Gross, Jan T., 166, 179, 191n, 194n, 195n, 196n, 225.
- 古拉格群岛 Gulag, the, 24, 135, 155, 172.
- 古米廖夫 Gumil v, Nikolai S., 112-113, 125n, 147, 204, 225.
- 古辛 Gushchin, Lev N., 17.
- 古斯塔夫森 Gustafson, Thane, 67-68, 83n.
- 哈金斯 Harkins, William E., 215, 222n.
- 哈斯丁斯 Hastings, Adrian, 86, 225.
- 哈克斯陶森 Haxthausen, Baron August von, 18, 47n, 67, 83n, 225.
- 海士 Hayes, C. J. H., 13n.
- 黑奇特 Hechter, Michael, 20, 39, 48n, 226.
- 黑格尔 Hegel, Georg W. F., 11, 41, 56.
- 祖国 *Heimat*, 8.
- 海明威 Hemingway, Ernest, 123.
- 赫尔德 Herder, J. G., 13n, 226.
- 《当代英雄》 *Hero of Our Time*, 68-74, 227.
- 希特勒 Hitler, Adolf, 114, 163, 167, 177, 189.
- 霍布斯鲍姆 Hobsbawn, Eric J., 5, 8, 12n, 13n, 46, 51n, 226.
- 霍布森 Hobson, J. A., 13n, 226.
- 霍尔奎斯特 Holquist, Michael, 97, 226.
- 亨廷顿 Huntington, Samuel, 19, 90.
- 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45, 77, 109, 112;

- 定义 definition of, 32.
- 帝国空间 imperial space, 88-89, 122-123, 201-205.
- 爱尔兰人与爱尔兰 Irish, the, and Ireland, 18, 19, 39.
- 伊萨科夫斯基 Isakovskii, Mikhail V., 172.
- 伊凡四世(雷帝) Ivan IV, tsar (the Terrible), 16, 162, 188.
- 杰拉维奇 Jelavich, Barbara, 190.
- 犹太人与犹太教 Jews and Judaism, 74, 129, 147, 150, 167, 170, 175, 179.
- 约翰逊 Johnson, Paul 12n 226.
- 《1828年远征期间阿尔兹卢姆旅行记》
Journey to Arzrum during the 1828 Campaign, 60-67.
- 卡夫卡 Kafka, Franz, 29.
- 卡普希钦斯基 Kapuściński, Ryszard, 49n, 117, 126n, 130, 226.
- 卡拉姆津 Karamzin, Nikolai M., 16, 55-57, 81n, 113, 194n, 226.
- 卡列利亚人与卡列利亚 Karelians and Karelia, 44, 165, 166, 183.
- 卡塔耶夫 Kataev, Valentin P., 170.
- 考夫曼 Kaufman, General K., von, 111, 112, 114.
- 哈萨克人与哈萨克斯坦 Kazakhs and Kazakhstan, 12n, 52n, 85, 111, 116, 117, 134, 210.
- 凯杜里 Kedourie, Elie, 5, 12n, 226.
- 基南 Keenan, Edward L., 16, 47n, 226.
- 凯利 Kelly, Catriona, 221n, 226.
- 肯南 Kennan, George, 23, 33, 43, 48n, 83n, 194n, 226.
- 肯南(小) Kennan, George (Sr.), 131-132, 150n, 226.
- 卡巴罗夫 Khabarov, Erofei P., 136, 144.
- 哈哈马达 Khakhamada, Irina, 203.
- 凯拉斯科夫 Kheraskov, Mikhail M., 55, 93.
- 霍达谢维奇 Khodasevich, Vladislav, 21.
- 霍米雅科夫 Khomiakov, Aleksei S., 104.
- 克尔恺郭尔 Kierkegaard, Søren, 90.
- 基曼 Kiernan, V. G., 57, 82n, 226.
- 吉普林 Kipling, Rudyard, 62, 76, 82n, 99, 123, 226.
- 科恩 Kohn, Hans, 12n, 226.
- 柯拉柯夫斯基 Kotakowski, Leszek, 13n, 22, 48n, 227.
- 科希秋什科 Kosciuszko, Thaddeus, 113.
- 科苏特 Kossuth, Lajos (Louis), 7, 13n, 225.
- 克罗斯 Kross, Jaan, 18, 47n, 227.
- 库哈热夫斯基 Kucharzewski, Jan, 3, 12n, 227.
- 昆德拉 Kundera, Milan, 18, 47n, 227.
- 库图佐夫 Kutuzov, Field Marshal Mikhail I., 100, 101.
- 拉脱维亚人与拉脱维亚 Latvians and Latvia, 12n, 21, 134, 165, 173, 183, 210.
- 拉扎里 Lazari, Andrzej de, 227.

- 莱德尼茨基 Lednicki, Waclaw, 102, 107n, 227.
- 列宁 Lenin, Vladimir I. (Ul'ianov), 78, 92, 110, 169, 186.
- 列昂诺夫 Leonov, Leonid M., 145.
- 莱蒙托夫 Lermontov, Mikhail lu., 28, 53, 65, 68-74, 79, 82n, 84n, 139, 200, 227.
- 列斯科夫 Leskov, Nikolai S., 132.
- 利哈乔夫 Likhachëv, Dmitrii S., vii, 45, 51n, 81n, 155-156, 158, 160, 162, 163, 193n, 227.
- 李斯特 List, Friedrich, 3, 12n, 229.
- 《文学报》*Literaturnaiia gazeta*, 35, 166, 167, 170, 171, 172, 173, 177, 180, 181, 195n.
- 立陶宛人与立陶宛 Lithuanians and Lithuania, 9, 16, 20, 21, 36, 74, 102, 134, 148, 165, 168, 173, 183, 192.
- 活着,可要记住 *Live and Remember*, 133, 142.
- 洛特曼 Lotman, Iurii M., 193n.
- 廖塔尔 Lyotard, Jean-François, 106.
- 迈斯特 Maistre, Joseph de, 27.
- 玛丽安娜 *Marianne*, 8.
-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Marx, Karl, 3, 12n; Marxism, 22, 36, 166, 186.
- 马萨 Massa, Isaac, 53, 81n, 130, 227.
- 毛德 Maude, Aylmer, 64, 107n, 230.
- 莫泊桑 Maupassant, Guy de, 87.
- 麦克米林 McMillin, Arnold. vii, viii, 193n.
- 梅德韦杰夫 Medvedev, S., 218, 222n.
- 梅德韦杰夫 Medvedev, Zhores, 124.
- 中世纪的娱乐与罪恶 merriment and sinfulness, medieval, 156-158; 莫斯科维的 Muscovite, 158-162.
- 米什莱 Michelet, Jules, 64, 92.
- 米赫尼克 Michnik, Adam, 220.
- 密茨凯维奇 Mickiewicz, Adam, viii, 7, 13, 78-79, 84n, 127n, 227.
- 米勒 Miller, David, 86, 227.
- 米留科夫 Miliukov, Pavel M., 77.
- 莫尔纳尔 Molnar, Thomas, 107n, 227.
- 莫洛托夫 Molotov, Viacheslav M., 163, 165, 174, 177, 181, 182, 189, 195n;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 Molotov-Ribbentrop pact, 163, 176, 177, 189-190.
- 俄国大纪念碑式建筑风格 monumentalism, Russian, 202-204.
- 莫尔-吉尔波特 Moore-Gilbert, Bart, 50n, 227.
- 莫塞 Moser, Charles A., 83n, 22, 7.
- 莫特 Mote, Victor, 131, 134, 138, 150n, 151n, 227.
- 莫提尔 Motyl, Alexander J., 194n, 227.
- 穆拉夫 Murav, Harriet, 124.
- 莫斯科维 Muscovy, 16, 17, 30, 74, 113, 156, 158-160, 187.
- 拿破仑 Napoleon, 76, 87, 88, 91, 95, 99, 100-101, 103, 104, 105; 拿破仑入侵 Napoleonic invasion, 56, 59, 88, 102.

-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1, 2, 3, 6, 7, 11;
 防御型的 defensive, 9; 扩张型的 expansive, 9; 神话-象征情结 myth-symbol complex of, 7, 8, 9; 民族主义与自由 nationalism and freedom, 9-10; 民族主义与读写能力 nationalism and literacy, 10; 民族主义与文学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8, 10-11; 民族主义与战争 nationalism and war, 8; 俄国民族主义 Russian nationalism, 163, 164, 166, 176, 180-181.
- 国家地位 nationhood, 7, 8, 9, 35, 86.
- 涅恰耶夫 Nechaev, Sergei G., 221.
- 涅克拉索夫 Nekrasov, Viktor P., 88.
- 新批评 New Criticism, 38.
- 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 tsar, 18, 42, 67, 73, 79, 105, 106, 154, 155.
- 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tsar, 45, 79.
- 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78.
- 诺尔维德 Norwid, Cyprian K., 75.
- 诺沃德沃尔斯卡娅 Novodvorskaia, Valeriia I., 46, 51n, 218-221, 222n, 227.
- 新时代 *Novoe vremia*, 218, 219, 220, 221n, 222n.
- 诺伊斯 Noyes, George R., viii, 84n.
- 星火 *Ogon'ek*, 17, 24-25, 35, 45.
- 奥尔科特 Olcott, Martha B., 12n, 227.
- 奥莱什凯维奇 "Oleszkiewicz," 78-79.
- 学术中的“东方主义”方法论 "Orientalist" methodology in scholar-ship, 31-33, 62, 63, 178.
- 奥尔洛夫 Orlov, A., 196n, 197n, 227.
- 帕克索伊 Paksoy, H. B., 125n, 126n, 227.
- 党的建设 *Partiinoe stroitel'stvo*, 166, 168, 183, 196n, 228.
- 帕斯凯维奇 Paskievich, Field Marshal Ivan F., 60, 61, 76.
- 帕斯捷尔纳克 Pasternak, Boris L., 212.
- 帕斯图霍夫 Pastukhov, Vladimir, 45, 51n, 228.
- 保罗一世 Paul I, tsar, 113.
- 彼得一世 Peter I (the Great), 26, 28, 54, 59, 77-78, 124, 135, 153, 154, 155, 185.
- 彼得罗维奇 Petrovich, Aleksei, 82n, 228.
-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Petrushevskaia, Liudmila S., 73, 81n, 199-217, 228.
- 皮库利 Pikul', Valentin S., 207.
- 派普斯 Pipes, Richard, 12n, 23, 48n, 49n, 106n, 160, 193n, 228.
- 皮萨列夫 Pisarev, Dmitrii I., 96, 107n.
- 普拉坎斯 Plakans, Andrejs, 12n, 228.
- 波戈金 Pogodin, Mikhail P., 56.
- 波兰人与波兰 Poles and Poland, 9, 18, 42, 54, 74-79, 102, 103, 134, 147, 165, 166-179, 190; 波兰化 polonization, 184. 波列弗依 Polevoi, Nikolai A., 56.
-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28, 74, 97.

- 后殖民研究 postcolonial studies, 31-41, 106.
- 后殖民文学研究策略 postcolonial literary strategies, 36, 37.
- 真理报 *Pravda*, 18, 166-170, 172-184, 195n, 196n, 228.
- 普里马科夫 Primakov, Evgenii, 44, 47.
- 普希金 Pushkin, Aleksandr S., 18, 26, 28, 43, 53, 57-58, 60-67, 76-79, 80, 82n, 84n, 86, 94, 96, 107n, 112, 113, 125n, 188, 200, 219, 228.
- 普京 Putin, Vladimir, 4.
- 普特曼 Putnam, P., 49n, 228.
- 阔尔巴西起义 Quorbashi rebellion, 40, 116.
- 拉安南 Ra'anani, Uri, 12n, 44, 51n, 228.
- 拉伯雷 Rabelais, François, 157.
- 拉辛 Racine, Jean, 94.
- 拉吉谢夫 Radishchev, Aleksandr N., 74.
- 拉德万 Radwan, Marian, 50n, 228.
- 兰鲍德 Rambaud, Alfred, 174, 195n, 196n.
- 兰杰尔 Ranger, Terence, 13n, 49n.
- 兰索姆 Ransom, John Crowe, 123.
- 拉斯普京 Rasputin, Valentin G., viii, 22, 130, 132-138, 140, 142-144, 151n, 155, 217, 228.
- 莱姆 Reim, Carl, 146.
- 愤怒 *ressentiment*, 8, 13n, 18, 32, 92, 229.
- 罗德斯 Rhodes, Cecil, 121.
- 里亚比金 Riabikin, C., 196n, 197n, 228.
- 梁赞诺夫斯基 Riasanovsky, Nicholas, 2, 49n, 189-190, 197n, 228.
- 理查德逊 Richardson, Samuel, 94.
- “祖国”的神话 *Rodina/otechestvo*, mythology of, 8, 34, 39, 71, 89, 99, 100, 101, 122, 132, 145-146, 204, 217.
- 罗曼斯 Romains, Jules, 46.
- 罗马年科 Romanenko, A., 196n, 197n, 228.
- 罗马尼亚人与罗马尼亚 Romanians and Romania, 77, 163, 165, 174, 183-184, 189, 190.
- 浪漫主义 Romanticism, 38, 39, 55, 94.
- 罗利奇 Rorlich, Azade-Ayse, 12n, 228.
- 罗思贝格 Rothberg, Abraham, 110, 111, 125n, 228.
- 罗特希尔德 Rothschild, Joseph, 194n, 228.
- 俄国入侵 Russia, invasions of, 30-31; 军事史 military history of, 28, 45, 165, 185; 自我形象 self-representation of, 41-42, 46-47, 79-80, 86-89, 91, 98, 106, 139, 153-156, 181-182.
- “俄国”, 术语意义的含混 “Russia,” terminological ambiguities of, 16-18, 44.
- 俄罗斯帝国 Russian empire, 10, 15-16, 24, 30, 32-33, 39, 41, 43, 44, 46-47, 79, 97, 123, 129-130, 146, 153-154, 163, 185-187, 192, 200, 213.

- 俄国后殖民话语 Russian postcolonial discourse, 39, 199-221.
- 俄国人 Russians, 16-18, 28, 29, 30, 41, 58, 79, 118, 168, 187, 188.
- 雷巴科夫 Rybakov, Anatolii N., 28, 138-142, 151n, 202, 229.
- 萨义德 Said, Edward, 5, 11, 12n, 20, 31-36, 51n, 69, 81, 97, 103, 106n, 107n, 109-110, 126n, 127n, 133, 141, 229.
- 斯坎梅尔 Scammell, Michael, 124, 152n.
- 西顿-沃森 Seton-Watson, Hugh, 42, 50n, 82n, 83n, 107n, 125n, 229.
- 舍费尔 Shafer, Boyd A., 13, 229.
-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illiam, 77, 92.
- 沙拉莫夫 Shalamov, Varlaam T., 111.
- 申格利 Shengeli, Georgii, 50n.
- 夏伊勒 Shirer, William R., 190, 229.
- 席什科夫 Shishkov, Aleksandr S., 93, 94.
- 施克洛夫斯基 Shklovskii, Viktor B., vii, 153-155, 163, 193n, 229.
- 肖洛霍夫 Sholokhov, Mikhail A., 29.
- 西伯利亚人与西伯利亚 Siberians and Siberia, 24, 29, 44, 53, 54, 130-145, 149, 167, 210.
- 西蒙斯 Simmons, Ernest, 75, 84n, 106n, 107n, 229.
- 故事 *skaz*, 132, 145, 151n.
- 斯科别廖夫 Skobelëv, General Mikhail D., 112, 169.
- 斯拉夫派 Slavophiles, 56, 91.
- 斯洛伐克人与斯洛伐克 Slovaks and Slovakia, 8.
- 斯沃瓦茨基 Slowacki, Juliusz, 7, 50n, 131, 229.
- 斯米尔诺夫 Smirnov, S. G., 196n, 197n, 229.
- 史密斯 Smith, Anthony D., 7, 12n, 13n, 86, 87, 93, 99, 106n, 229.
- 斯奈德 Snyder, Louis L., 13n, 229.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socialist realism, 34.
- 索尔仁尼琴 Solzhenitsyn, Aleksandr I., vi, 20, 22, 24, 28, 31, 43, 48n, 49n, 50n, 110, 111, 113, 115-125, 126n, 140, 147-149, 152n, 201, 204, 207, 217, 229.
- 苏维埃国家 Soviet nation, the, 8.
- 索因卡 Soyinka, Wole, 148.
- 斯皮瓦克 Spivak, Gayatri, 10, 14n, 36, 38, 39, 48n, 50n, 70, 83n, 229.
- 斯大林 Stalin (Dzugashvili), Iosif V., 34, 80, 110, 121, 163, 164, 168, 169, 172, 175, 189, 220.
- 斯塔罗沃伊托娃 Starovoitova, Galina, 8, 220.
- 没有国家属性的民族 stateless nations, 10.
- 斯坦因 Stein, Gertrude, 123.
- 斯滕特 Stent, Angela, 67-68, 83n.
- 斯特恩贝格 Sternberg, General R. von Ungern, 117.
- 斯托克斯 Stokes, Anthony, 160, 193n,

- 225.
- 斯托雷平 Stolypin, Pëtr A. , 147-148.
- 斯特拉霍夫 Strakhov, Nikolai N. , 88, 96, 106n, 229.
- 苏哈尼克 Suchanek, Lucjan, vii, 229.
- 苏马罗科夫 Sumarokov, Aleksandr P. , 55, 94.
- 苏沃洛夫 Suvorov, General Aleksandr V. , 60, 169.
- 斯维林根 Swearingen, Rodger, 12n, 229.
- 施波鲁克 Szporluk, Roman, 3, 12n, 74, 84n, 229.
- 鞑靼人与鞑靼斯坦 Tatars and Tatarstan, 19, 20, 118, 121, 134, 136, 210, 211.
- 术语挪用(作为殖民主义的副产品) *terminological appropriation* (as a byproduct of colonialism), 25, 33.
- 泰拉斯 Terras, Victor, 83n, 230.
- 萨克雷 Thackeray, W. M. , 85, 87, 96.
- 汤普逊 Thompson, Ewa M. , 12n, 49n, 50n, 125n, 150n, 193n, 230.
- 提芬 Tiffin, Helen, 39, 49n, 50n, 223, 230.
- 季莫菲耶夫 Timofeev, L. I. , 153, 230.
- 丘特切夫 Tiutchev, Fëdor I. , 18, 72, 77, 90.
- 托尔斯泰娅 Tolstaia, Tatiana N. , 208-209, 219, 230.
- 托尔斯泰 Tolstoi, Lev N. , 28, 43, 44, 64, 67, 82n, 85-106, 107n, 218, 230.
- “致诽谤俄国的人”“To the Slanderers of Russia,” 76.
- 特劳古特 Traugutt, Romuald, 10.
- 特雷沃-罗珀 Trevor-Roper, Hugh, 8.
- 特里方诺夫 Trifonov, Iurii V. , 43.
- 特鲁巴乔夫 Trubachëv, O. N. , 49n, 230.
- 屠格涅夫 Turgenev, Ivan S. , 28, 42-43, 50n, 64, 71, 98, 208, 230.
- 突厥人与突厥居民 Turks and Turkic population, 20, 21, 58, 62, 84n, 116, 139.
- 特瓦尔多夫斯基 Tvardovskii, Aleksandr T. , 173, 176.
- 乌克兰人与乌克兰 Ukrainians and Ukraine, 9, 16, 19, 21, 42, 48n, 54, 74, 97, 137, 148, 165, 166-181, 183-184, 187-188, 190, 200.
- 乌拉姆 Ulam, Adam, 163-164, 194n, 195n.
- 乌沙可夫 Ushakov, V. , 35, 49n.
- 乌斯特里亚罗夫 Ustrialov, Nikolai G. , 56.
- 乌兹别克人与乌兹别克斯坦 Uzbeks and Uzbekistan, 40-41, 85, 110, 111, 114, 115-125, 147, 200; 乌兹别克文学 Uzbek literature, 123.
- 瓦哈波夫 Vakhobov, M. , 125n, 230.
- 瓦利耶夫 Valiev, Rimzii, 48n, 125n, 230.
- 维尔德里 Verdery, Katherine, 13n, 230.
- 威尔第 Verdi, Giuseppe, 36, 103.

- 弗美尔 Vermeer, Jan, 95-96.
- 维尔纳茨基 Vernadsky, George, 2, 189, 197n, 230.
- 维尼 Vigny, Alfred de, 89, 91, 107n, 230.
- 乡村作家 Village Writers, the, 35, 217.
- 人民观察家 *Vöelkischer Beobachter*, 168, 177, 195n.
- 伏尔泰 Voltaire, 26.
- 冯·施塔克尔贝格 Von Stackelberg, General G. K., 21.
- 维索茨基 Vysotskii, Vladimir, 220.
- 沃尔科特 Walcott, Derek, 148.
- 沃伦贝格 Wallenberg, Raoul, 4, 230.
- 战争与和平 *War and Peace*, 85-106, 205, 230.
- 维特摩尔 Whitmore, Brian, 191, 197n, 230.
- 维尔切克 Wilczek, Piotr, viii, 231.
- 威尔逊 Wilson, President Woodrow, 6-7.
- 雅库特人与亚库齐亚 Yakuts (Iakuts) and Yakutia, 139, 141.
- 亚诺夫 Yanov, Alexander, 124.
- 叶利钦 Yeltsin (Eltsin), Boris N., 45, 51n, 138, 191, 192, 231.
- 叶尔金 Yergin, Daniel, 67-68, 83n, 231.
- 南斯拉夫人与南斯拉夫 Yugoslavs and Yugoslavia, 8.
- 热罗姆斯基 Zeromski, Stefan, 83n.
- 佐托夫 Zotov, Igor', 120, 126n, 231.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引论 民族主义、殖民主义、身份特征

第一章 问题

第二章 帝国生成

第三章 日益巩固的幻想：俄国民族资格的新核心神话——《战争与和平》

第四章 俄国文学中的中亚叙事

第五章 苏联晚期的帝国欲望

第六章 学术与帝国：苏联文学研究学术中的俄国意识形态——维克托·施克洛夫斯基与德米特里·利哈乔夫

第七章 解构帝国：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附录

一 德国学者昆策尔的评论&〔德〕克里斯蒂娜·昆策尔

二 波兰学者索瓦的评论&〔波兰〕卡奇米日·索瓦

精选书目

索引